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人文与社会译丛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德国]乌尔里希·贝克 著 何博闻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风险社会

本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责任编辑 李瑞华 陆月宏 封面设计 胡 苨



ISBN 7-80657-565-0
I·495 定价:17.70元

人文与社会译丛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德国]乌尔里希·贝克 著 何博闻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社会／（德）贝克(Beck，U.)著；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ISBN 7-80657-565-0

Ⅰ.风… Ⅱ.①贝… ②何… Ⅲ.社会学-研究 Ⅳ.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15391号

书　　名　风险社会
作　　者　[德国]乌尔里希·贝克
译　　者　何博闻
责任编辑　李瑞华　陆月宏
原文出版　Sage Publications，199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32千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65-0/I·495
定　　价　17.7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圈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序　言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

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9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

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 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 19 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10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①]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

① 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近来获得了广泛的讨论，并为A. 吉登斯(1990,1991)和S. 拉什(1992)所进一步发展。

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11 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12 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

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13]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

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人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14 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

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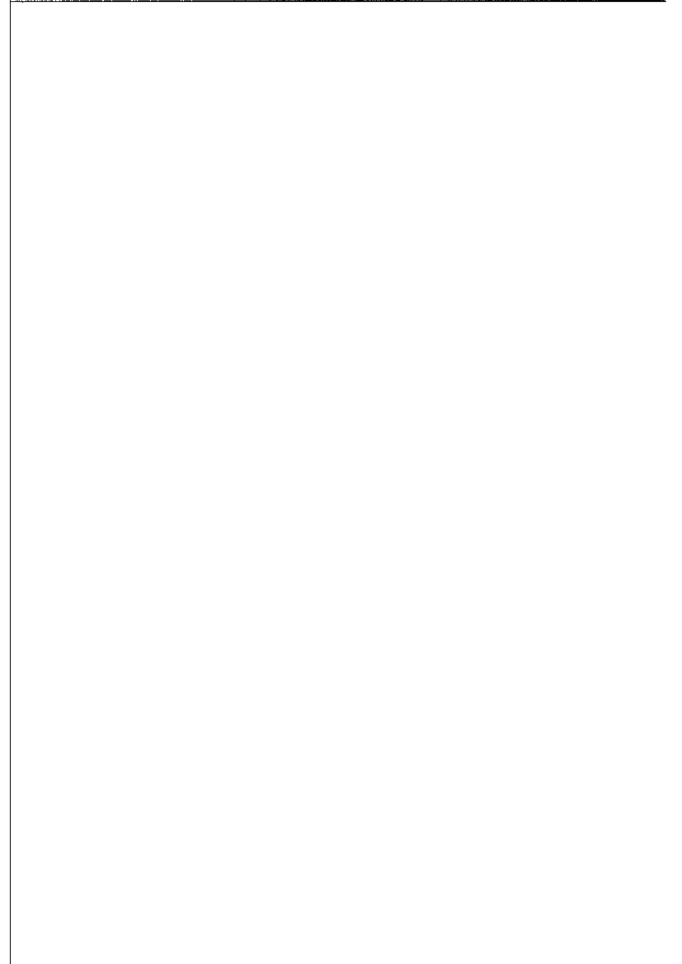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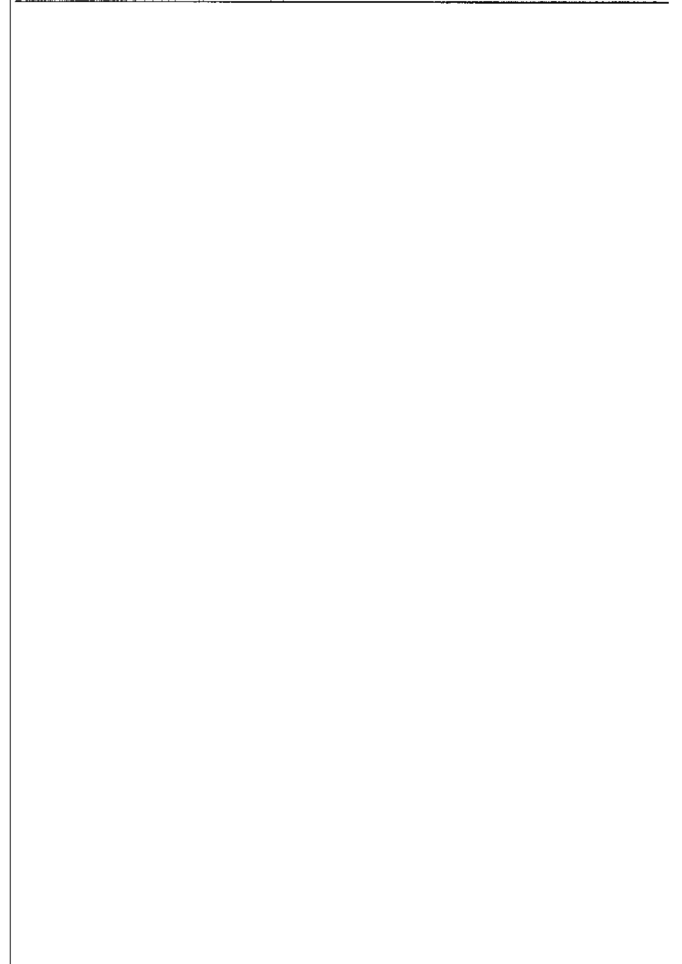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 15 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 P. 格罗斯和 L. 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16

（陆月宏　译）



第一部分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



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

这种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在历史上(至少)与两种情况有关。首先，就像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转变发生在——并且是在此程度上——那些纯粹的物质需要上面，它们通过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法律和福利国家的保护和规范，能够在客观上被降低，并且在社会中被隔离。其次，这种范畴的转变同样依赖于以下事实：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①

① 现代化意味着组织和工作中的技术理性化和变化的狂潮，但除此之外，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社会特征和标准生涯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爱的模式的变化，权势结构的变化，政治压制和参与形式的变化，对现实的看法以及知识模式的变化。在社会科学对现代性的认识中，耕犁、蒸汽机车和微芯片是一个更为深层的、构成和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进程的可见指示物。最后，生活所依赖的确定性源泉变化了(Etzioni, 1968; Koselleck, 1977, Lepsius, 1977; Eisenstadt, 1979)。最近几年(本书德文第3版出版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潮流。现在，争论的中心是用后现代的观点质疑现代化的可能性(Berger, 1986; Bauman, 1989; Alexander and Sztompka, 1990)。

随着这些情况的发生，一种思考和行动的历史模式就被另外一种模式相对化或超越了（在马克思或韦伯最宽泛的意义上）。“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它与新的风险社会的范式相重叠，后者要解决的是与前者相类似然而又是极为不同的问题。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最后，它们在什么地方以一种“延迟的副作用”的形式闪亮登场？如何限制和疏导它们，使它们在生态上、医学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既不妨害现代化进程，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

从而，我们不再仅仅关心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问题，而是也要并主要地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个体领域中的）科技发展和使用的问题，被对实际或可能使用的科技的风险进行政治和经济“管理”——依据特别界定的有关它们之重要性的观[19]点去发掘、治理、认识、避免或掩盖这些危险——这样的问题所遮盖。对安全性的承诺随着风险和破坏的增长而增长，并且这种承诺必须对警觉和批判性的公众通过表面的或实质的对技术—经济发展的介入而不断地重申。

两种有关不平等的“范式”都系统地与现代化的特定阶段相联系。只要在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像今天在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中那样），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在这种短缺社会的境况下，现代化进程是随着用科技发展的钥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的主张

而开始的。从阶级到阶层化和个体化的社会中，这些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赖中解放出来的承诺，都是以社会不平等范畴进行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富裕的福利国家中，正在发生一种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为了“每天的面包”的斗争，与在20世纪前半叶以及被饥饿折磨的第三世界人们相比，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超越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首要问题的紧迫性。对很多人来说，“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虽然这种发展状况撤消了现代化进程的合法基础——对明确的物质短缺的斗争——但我们还要准备接受它的一些（不再是完全）看不见的副作用。

与此相应的，是有关财富的源泉已经被不断增长的“有害副作用”所“玷污”的知识在扩散着。这绝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它在力图征服贫困的努力中被长时间地忽略了。这一阴暗面同样通过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而获得了它的重要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这两方面都助长了一种逐渐增加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它突出地但又是有争议地决定着公众的讨论。

系统而言，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或早或晚，在现代化的连续进程中，“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在联邦德国，我们最迟在70年代早期已经在面对这种转变的开始——这正是我的论点。这意味着两种类型的主题和冲突在这里是重叠的。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但我们也不是仅仅生活在短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只要这一转变发生，就会出现一种实质的社会变迁，它将使我们远离原先的思考和行动模式。

风险社会的概念能够表达它被要求表达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吗？它涉及的不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古老现象吗？难道风险不已 20

经是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在这里正是相对于工业社会时代把它们区分出来的。同样正确的是，风险并不是现代性的发明。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的国家和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了“风险”。但这些是个人的风险，而不像那些随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在较早的阶段，“风险”这个词有勇敢和冒险的意思，而不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自我毁灭这样的威胁。

森林消失到现在也经历了数个世纪——最先是被变成农田，然后是乱砍乱伐。但今天作为工业化的不明确的后果，森林的消失是全球性的，并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像挪威和瑞典这样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自身几乎没有任何污染严重的工业，同样要遭受影响。它们不得不以森林、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消失为代价，来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污染债。

据记述，在19世纪，掉到泰晤士河里的水手并不是溺水而死，而是因吸进这条伦敦的下水道上恶臭和有毒的水汽窒息而死的。走过一条中世纪城市的狭窄街道，就像让鼻子遭受夹道的鞭挞。“街道上，收税栅栏边，马车旁，到处都是成堆的粪便……巴黎房屋的表面被小便泡软了……社会上有组织的便秘使整个巴黎有陷入一种溃烂过程的危险。”(Corbin，1984：41ff.)那些年代里刺激着人的鼻子和眼睛的，从而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危险是明确的，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另外一个区别直接与此相关。过去，危险能够追究到医疗技术的缺乏上。今天，它们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因而今天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性(人类、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的现代起因，与中世纪表面上类似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它们是工业化

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

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风险，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与这种发展同时出现的。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贫穷风险”——迫使19世纪一直屏住呼 21 吸。“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曾经一直是自动化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冲突、保护（和研究）的主题。为了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减少或限制这些类型的风险，人们在政治上着实付出了一些时间和努力。尽管生态和高科技的风险已经搅扰了公众相当长的时间，但接下来将要成为本书讨论焦点的东西，还是具有新的特质。在它们所产生的苦难中，它们不再与它们起源的地方，即工业工厂相联系。从它们的本质上看，它们使这个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比如，核电站单独来看不可能被保险或者说是不可保险的。原子能事故（在“事故”这个词狭隘的意义上）已经不是事故了。它超出了世代。那些当时还未出生的或者多年以后在距离事故发生地很远的地方出生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以惯常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的生产和破坏的力量，是一种错误的但同时又使这些力量有效合法化的方法。风险学家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就好像在19世纪的地方性事故和20世纪末常常是徐缓的、灾难性的潜在威胁间，不存在一个世纪的差距。确实，如果你区分了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风险计算就会

引致新的工业化的、由决策产生的不可计算性和威胁，无论出于战争还是福利的目标，它们都在高风险工业的全球化进程中散播。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这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与这些全球化后果相比，早期工业化的危险确实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高度发展的核能和化学生产力的危险，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畴，比如空间和时间、工作和闲暇、工厂和民族国家，甚至还包括大陆的界线。换一种方式说，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

关于文明中这些自陷危境的潜在可能的社会建筑学和政治动力学，将会占据我们讨论的中心。整个论证可以分列为五个论题：

(1) 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本质上是与财富不同的。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

22 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然而，它们却基于因果解释，而且最初仅仅是以有关它们的(科学的或反科学的)知识这样的形式而存在。因而，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2) 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

① 更成熟的有关工业社会的风险和风险社会的风险的区分，请参见贝克(1988,1992)。

影响，这就是说，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了。在某些方面，这些现象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但它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在所难免。它们不仅是对健康的威胁，而且是对合法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与对现代化风险的认知相联系的，是生态的贬值和剥夺，它们经常而系统地与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利益和财产权利相矛盾。同时，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间的不平等。它逐渐破坏了国家司法的秩序。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3) 虽然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但它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风险的界定中，总是有失败者也有赢家。二者之间的差距与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权力分化有关。现代化风险从赢家的角度看，是一桩大买卖。它们是经济学家长久以来所追寻的不可满足的需求。饥饿和需要都可以满足，但文明的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它们无法满足，是无限的和自我再生的。你可以像卢曼那样说，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但这意味着：随着对它自己释放的风险的经济发掘，工业社会产生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政治可能性。

(4) 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坦率地讲，你可以说：在阶级和阶层地位上，存在决定意识，但在风险地位上，意识决定存在。）知识获得

23 了一种新的政治意义。相应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必须在一种有关风险知识的起源和扩散的社会学理论中进行阐述和分析。

(5) 社会地认识的风险，像清楚地表现在有关森林破坏的争论中的那样，包含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那些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东西，变得具有政治性——在工业化过程自身中对起因的消除。突然间，公众和政治将它们的规则延展到工厂管理的私人领域——产品计划和技术设施。公众有关风险定义的讨论的要点，在这里以一种典范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不仅是自然和人类健康的次级问题，而且是这些副作用所带来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对工业决策的官僚化审查、新市场的开辟、巨额浪费、法律程序和威信的丧失。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或多或少地增加，在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

污染的科学界定和分配

有关空气、水和森林的污染和毒化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包括对一般性的自然和环境破坏问题的讨论，仍旧完全或主要为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方程式所引导。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科学的“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着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义。相应地，在完全由化学、生物和技术术语引导的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知不觉地把人仅仅归结为一个有机物。从而，这样的讨论就有着重复它长久以来正确地指责的一种有关工业化进程的广泛乐观主义观点的危险，有着退化为一场忽略了人、没有对社会和文化意义加以考虑的有关自然

的讨论的危险。特别是过去几年的论争,虽然又展开了对技术和工业的批判,在核心上却仍旧是技术专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他们殚精竭虑,以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以及原材料短缺等等的相对状况图表,来援引和发布空气、水和食物受污染状况的数据。他们富于激情,一心一意,似乎忘记了某个叫马克斯·韦伯的人曾说过,如果排除了社会权力和分配的结构、科层制、普遍模式和理性化,这样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或者同时)就是荒谬的。一种认识正悄悄出现,依照它,现代性被简化为以凶手 24 和受害者的形式出现的技术和自然的指涉框架。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风险依旧为这种研究理路所掩盖,同时也不为这种思考方法所知(这也包括政治环境运动)。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德文)中说:"在母亲的奶水中,常常发现浓度相当高的六六六、六氯代苯和滴滴涕。"(1985:33)这些有毒物质存在于现在已经从市场上消失的杀虫剂和除草剂里面。依据报告,它们的来源是不确定的(33)。在另外的地方他们说:"人口对铅的接触量,平均起来看并没有达到危险的水平。"(35)在这样的陈述中,什么东西被遗漏了呢?这也许可以用以下的例子做类比。两个人拥有两只苹果,其中一个人把苹果都吃了。这样,可以说他们平均一人一个。把这种说法换到全球范围的食物分配问题上就是:"平均"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足够的食物。这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犬儒主义: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人们因饥饿而死去,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暴食成为食品消费中重要的问题。也许,这种说法对于污染和毒害问题就不那么玩世不恭,因为平均的接触量对于人口中的所有群体来说,就是实际的接触量。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吗?为了维护这样的说法,难道我们对其他人所吸人和摄入的毒素的了解,不是先决条件吗?人们理

所当然地去询问“平均量”的做法，其实是一件令我们惊异的事情。一个询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了社会上不平等的风险地位。但这确实是那个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或许存在这样的群体和生活境况，对于他们，铅和与之类似的“平均来说无害的”东西，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危险？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中心的邻近地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这个以及其他有关污染和毒害的报告的特点不仅仅是缺少了对社会分化的考虑，它同样表现在分化——根据发散源头的区域界限以及年龄的差异——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上，这两个尺度都是基于生物学的（或更一般地说，自然科学的）考虑。不应去指责专家委员会。这只是反映了对环境问题的科学和社会思考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成自然和技术的问题，或者是经济学和医学的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对于环境的工业污染和自然的破坏，以及它们只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才有的对健康和社会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影响，居然缺少社会的思考。这种欠缺正变得具有讽刺意义——它似乎没有触动甚至包括社会学家自己在内的任何人。

人们研究和调查污染和毒物的分配，水、空气和食物的污

25 染。其结果以多种颜色根据地区界线而不同的“环境地图”呈现给警觉的公众。只要环境的状况被以这种方式呈现，这种呈现和考虑的模式显然就是恰当的。然而，只要我们从这种模式中去推导人类所承受的后果，那么，隐含的思想就是简化的。无论它是宽泛地说所有的人——不管他的收入、教育水平、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这需要进行验证）饮食生活娱乐的机会和习惯在同一个污染中心里受到同样的影响，还是完全地排除了人甚至他们的痛苦，而只谈论污染及其在地域内的分配和影响，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相应地，以自然科学术语进行的有关污染的讨论，在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苦难的错误结论和一种排除了人的选择性苦难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自然观之间摇摆。同时，没有考虑到的是同样的污染，依照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知识和教育程度等等，对于不同的人会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

特别严重的是从单个污染事件着手的研究，从未能够确定对人的污染程度。对于单一产品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当它在人们于整体市场化的更高阶段所组成的“消费者矿藏”中集中起来的时候，也许就会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范畴错误。一种基于自然和产品的污染分析，不能回答安全的问题，至少只要“安全”或“危险”与摄入或吸入那些污染物的人无关，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我们所知道的是某些药物治疗会减少或增加单个污染的影响。但现在人们显然(还)没有单纯依赖药物生存。他们还在呼吸污染的空气，饮用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等等。换言之，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十分显著地积累起来。那么，它们因此会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就像通常依据算术法则进行的求和计算那样？

论现代化风险的知识依赖

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两者都构成地位——分别是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在每一种状况下，它们都关涉十分不同的利益和有关利益分配的不同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就是去处理人们所需求的稀缺物品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等等问题。相对来说，风险是以不可取的丰裕状况出现的现代化的附带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消除或者否定并且加以再诠释。获取的主动逻辑对应着转嫁、规避、否认和再诠释的否定 26
逻辑。

像收入和教育这样的东西是可以为个人所经验的消费品，风险和危机的存在和分配主要是通过论证来传递的。那些损害健康、破坏自然的东西是不为人的眼睛和感觉所认识的，甚至那些表面上明确无误的观点，仍旧需要有资格的专家来评判其客观性。很多这些新近出现的风险（核或者化学污染，食物污染，文明病），完全逃脱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某些情况下这些危险不会对它们所影响的人产生作用，而是作用于他们的后代；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这些危险的典型方式，是像三里岛的反应堆事故那样，造成放射性物质对基因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将受害者抛给专家的评判、错谬和争执，同时使他们受着可怕的心理重压。

将分离的东西结合起来考虑：因果性假设

文明的风险地位的知识依赖性和不可见性，并不足以使我们从理论上界定它们，它们还包括另外的内容。有关风险的陈述从来没有简化为仅仅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它包括理论的和规范的内容，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像"在儿童身上有高浓度的铅"以及"母乳中的杀虫剂成分"这样的发现，并不比河流中的硝酸盐浓度或者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这样的现象更像是文明的风险状况。必须添加一种因果的解释，以使这些现象呈现为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和现代化的系统副作用。从而，在社会公认的风险中，现代化进程的权威和机构，以及它们特殊的利益和依赖被假定并被置于（以因果的模式）与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相分离的破坏和威胁的征兆的直接关联之中。依照这样的方式，在慕尼黑近郊的住宅区里，一位母亲坐在一所带有三个卧室

的公寓里，照顾她三个月大的孩子马丁的情景，是与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与那些发觉自己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规强迫以过度施肥的方法进行专门化的大规模生产的农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供人们去寻找副作用的范围仍旧是开放的。最近，在南极的企鹅身上发现了过量的滴滴涕。

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化风险出现在地理上特定的地域，同时它也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次，它们形成有害影响的曲折途径是多么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那么，在现代化风险中，空间和时间上分离的东西，实质上同时也是客观上，以因果关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关责任的社会和法律的语境。至少从休谟开始我们就知道，因果关系的预设是不为我们所了解的。预设必定是想像的，默认其真理性的。同样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暗含的因果关系常常维持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我们甚至在风险的日常意识中，都是在处理一种理论的进而是科学化的意识。

27

暗含的伦理

即便是这种制度上分离的事物的因果联系也还是不够的。经验到的风险假设了一种有关安全感丧失和信任崩溃的一般化的视角。因此，即便在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无声无息地接近我们的地方，它仍旧在根本上是局部化的，是值得去过的生活的受伤形象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必须再度获得信仰，就是说，它们不能像那个样子被经历。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象，在那里，人类(或者不管还会剩下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护和恢复。尽管有这些不可认识的地方，这种风险的风险性在其中第一次变得具体的规范视野，也不能完全被数学和实验取代。在所有这些客观化之后，迟早会出现接

受的问题，它会重新提出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希望如何生活？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人类的人性特质和自然的自然特质？在这种意义上，广泛的有关"大灾难"的讨论是一种客观化的、直接的、激烈的表达：这种发展是不受欢迎的。

这些复活了的问题——人类是什么？我们将自然看做什么？——或许会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学间变换它的叙述口径。在最发达的文明发展阶段，风险甚至——或者尤其——在它们被传统的数学公式和方法论争执的魔术帽子变得不可见的地方，再次占据了议事日程的高度优先位置。对风险的界定是伦理学，以及还有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中心——商业、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内部的复活。你可以说，它们是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所不需要的民主化方式，后者因为风险思维，而以某种方式变成公开的讨论。风险界定是一种未被认可的、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兴趣和事实的共生现象。它们不会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或另一种情况。它们不再因为专业化而相互分离，并依据各自的理性标准去发展和确定。它们需要一种跨学科、国界、行业、管理部门和政治的协作，或者，它们更可能分裂成为对抗的定义和界定斗争。

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

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和重要的结果：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群体的竞争和冲突的要求、利益和观点，它们共同被推动，以原因和结果、策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很多科学家确实在以他们客观理性的全部动力和悲情去工作，而他们的定义中的政治成分和他们追求客观性的努力

程度成比例增长。但在他们工作的核心深处,他们继续在依赖社会性的东西,进而提出期望和价值。你能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还可以接受的和不再可以接受的污染接触量的界限？什么样的妥协是预设标准？为了满足经济的利益而发生一次生态灾害的可能性能被接受吗？什么是必然、假设的必然以及必须被改变的必然？

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地反驳着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其次,你必须预设一种伦理的观点以使风险的争论具有意义。风险的界定是基于数学的概率和社会的利益,特别当它们是带着技术可靠性被提出的时候。为了处理文明风险的问题,科学总是要放弃它们的实验逻辑的根基,而与商业、政治和伦理建立一夫多妻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成一种"没有证书的永久婚姻"。

这种风险研究中隐藏的外部确定,至少在科学家们似乎仍旧要求对理性的垄断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问题。对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将自己限制在基于可能的事故对某些可计量的风险的判断上。从一开始,风险的维度就被局限在技术的可管理性上。在某种范围内,尚不具有技术可管理性的风险被认为——至少在科学的计算和司法的判断中——是不存在的。这些不可计量的威胁结合成一种未知的剩余风险(residual risk),它成为给予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工业馈赠。对于人口的大部分以及核能的反对者来说,这种风险的灾难的潜在可能性是最核心的问题。无论事故的概率是多么的小,如果一个事故就意味着全体毁灭的话,那都是太大了。但是,风险的量化概念集中在风险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上,而否认它们——比如说有限的空难和核工厂的 29

爆炸(虽然不太可能,却影响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和世代)——之间的区别。而且,在公众论争中,危险的性质扮演了一个在所有风险研究中根本没有涉及到的角色,比如说:核武器的增加;化学和原子技术从民用到军用转变的可能性;普通产品和军事产品之间的灰色地带,它随着风险工业和市场在全球的扩展而扩展;人性(错谬和失败)与安全的矛盾;以及那些将后代视同儿戏的重大技术决策的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没有理想的系统和理想的人适合它的需要 甚至力图建立某种类似理想系统的尝试,也只意味着建立理想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独裁

换言之,在风险论争中变得清晰的,是在处理文明的危险可能性的问题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双方都是在绕开对方谈论问题。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得到风险专家的回答,而专家回答的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

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但它们同时保持着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状况。严格地说,即使是这种划分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风险研究不无困窘地伴随着吁请它加以遏制的"技术恐惧症"的脚步,而且近些年来它从"技术恐惧症"中得到了一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物质支持。公众的批评和焦虑主要来自于专家和反专家(countetr expertise)的辩证法。没有科学论证和对科学论证的科学批判,它们仍旧是乏味的;确实,公众甚至无法感受到他们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这里我们可以修改一条著名的谚语: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上面并不是要勾勒普遍和谐的图景。相反，在这里提出的是经常为了得到接受而争斗的对抗的理性要求。在两个阵营中，十分不同的东西占据了关注的中心位置，十分不同的东西被看做变化的或不变的。在一个阵营中对变化的关注重点在于生产的工业模式，在另一个阵营中，在于事故可能性在技术上的可管理性。 30

定义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风险

风险的理论内容和价值关涉意含着另外的成分：冲突着的文明风险定义的可以观察到的多样性。可以说，这里产生着过量的风险，它们有时是相对化的，有时是互补的，有时又是对抗的。一种危险的产品可能通过夸大其他产品的风险来为自身做辩护（比如，对气候影响的夸大将核能的风险"减到最小"）。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土壤、植物、空气、水和动物受危害的状况，在这种为了最有利的风险界定而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它表现了共同利益和那些自己没有选举权和发言权的人的选择（或许只有给予小草和蚯蚓以消极的公民权才会恢复人性的意义）。这种多元论在风险的领域里是明显的；风险的紧迫性和存在随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而变化不定。而这对风险的实质内容产生的影响是人们明显可见的。

在风险中产生的、实质的或潜在的破坏作用与工业生产体系间的因果关系，为无数的个体诠释打开了大门。实际上，至少在实验里，人们可以将一切事物和其他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只要保持基本的模型——现代化是原因，破坏是副作用。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被确证的。即使那些被确证的东西，也必须针对系统

的和持续的怀疑论来维护自身。然而，重要的是即使在不可计数的个体诠释中，个体状况也是一再相互联系的。让我们以森林破坏为例。只要树甲虫、松鼠或者负有专门责任的林业机构仍旧被看做原因和罪魁，我们关心的似乎就不是“文明的风险”，而是粗心的林业机构或贪食的动物。

当风险要想得到认识而必须突破的这种典型的局部性误诊被超越的时候，当森林的破坏被认为是工业化的后果的时候，一种十分不同的原因和罪魁的谱系出现了。只有那时，风险才成为一种长期的、系统产生的问题，不再能够在局部性层次上得到缓解，而要代之以政治的解决。一旦这种观念的转变确立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成为可能。是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以及它们的光化学分解产物——碳氢化合物，或别的什么还不知道的东西，带给我们最终的和永久的秋天——落叶？这些化学公式是单独出现的。然而，在它们后面，公司、工业部门、商业机构、科学和 31 专业团体面对的是公众批判的枪口。因为社会所公认的每一个“原因”都受到要求其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它起源于其中的行动体系也在变化。即使公众的压力被挡开，销售下降、市场崩溃以及消费者的“信心”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耗费巨大的广告活动来重新赢取和巩固。汽车是“国家的首要污染源”，因而是真正的“森林杀手”吗？或者我们必须在燃煤动力工厂安装高质量高级别的滤气装置？或者那也被证明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造成森林死亡的污染物从临近国家的气窗和排气管道中畅通无阻地到达我们的家门口（或者森林）？

凡是被寻找原因的聚光灯照亮之处，批评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然后，仓促组织起来的准备不足的“辩论消防队”必须以强劲的反辩去平息这些怒火，并抢救那些还能够抢救的东西。那些发现自己作为风险的制造者而处于公众声讨中心的人，竭尽

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且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这一图景自我生产着。通往媒体的渠道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工业中的不安全感加剧了: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到生态伦理学抨击的人。完美的论证,或者至少是能够说服公众的论证,成为商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公众人物,还有"论证技师们"(argumentation craftsmen),在组织中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因果的链条和破坏的循环:系统的概念

再次坦率地说,所有这些影响的发生是完全独立于暗含的因果解释的,无论这些解释从科学的观点看是多么可靠。一般而言,各种科学和学科所关心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风险界定的社会影响因而是不依赖于它们的科学合法性的。

然而,解释的多样性还基于现代化风险自身的逻辑。首先,我们企图在破坏性影响与个人因素间建立联系,而后者很少能够从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中被分离出来。在商业、农业、法律和政治的现代化中,高度专门化的机构在系统上的相互依赖是与不存在可分离的单个原因和责任的情况相一致的。是农业污染了土壤,或者耕种者只是破坏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他们对于化学饲料和肥料工业来说或许只是次级的和从属的市场?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来预防土地的污染吗?专家原本在很早以前就可以禁止或彻底限制这些有毒化学品的销售,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依靠科学的支持,他们继续发放生产 32 "无害"的有毒化学产品的许可证,而那些化学品正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而且还会更深)。专家、科学和政治,谁会接过这烫手的山芋?但首先他们都不种地。那么是耕种者吗?但他们受着欧共体的压榨,他们必须为了生存而通过大量施肥进行过度生

产……

换言之，与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相一致，存在一种总体的共谋，而且这种共谋与责任的缺乏相伴。任何人都是原因也是结果，因而是无原因的。原因逐渐变成一种总体的行动者和境况、反应和逆反应的混合物，它把社会的确定性和普及性带进了系统的概念之中。

这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揭示了系统这个概念的伦理意义：你可以做某些事情并且一直做下去，不必考虑对之应负的个人责任。这就像一个人在活动，却没有亲自在场。一个人进行物理的活动，却没有进行道德或政治的活动。一般化的他人——系统——在个人之中并通过个人行动：这是文明的奴隶道德，在其中人们进行个人和社会的行动，似乎从属于自然的命运，即系统的"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当我们面对可怕的生态灾难时扔掉"烫手的山芋"的方式。[⑦]

风险内容：作为行动刺激物的未然事件

风险当然不会在已经发生的影响和破坏上耗尽自身。这里必须存在一种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和风险的潜在要素间的区分。在第二种意义上，风险主要表现了一种未来的内容。这部分是基于现存可计算的破坏作用在未来的延续，部分是基于普遍的缺乏信心和"风险倍数"(risk multiplier)。那么在本质上，风险与预期有关，与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存在威胁的破坏作用有关，当然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举一个来自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的例子(1985)：这个委员会注意到，从氮肥中产生的高浓度硝酸盐到目前为止很少(如果有的话)会渗透

---

⑦ 对基于"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政治策略的论证请参见贝克(1988)。

到我们汲取食用水的深层地下水中。硝酸盐在底土层就分解了。这如何发生、还能持续多久并不知道。我们没有理由不无保留地期望在未来这种保护层的过滤作用还存在。"应该小心的是,现有的对硝酸盐的过滤经过几年或几十年会发展到更深的地下水层,这对应于时间的流逝有一种延迟。"(上述报告 29 页)换言之,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

与财富的具体可感相比,风险具有某种非现实性。在根本的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一方面,有很多危险和破坏今天已经发生了:水体的污染和减少,森林的破坏,新的疾病,等等。另一方面,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规模大到以至于在其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破坏的风险。因而,即使作为猜测,作为对未来的威胁和诊断,风险也拥有并发展出一种与预防性行为的实践联系。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我们在今天变得积极是为了避免、缓解或者预防明天或者后天的问题和危机——或者什么也不干。数学模型所预期的劳动市场的瓶颈,对教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预期的失业威胁是今天的生活状况与态度的重要决定因素。预期的环境破坏以及核恐惧颠覆了社会,并使大批的青年走上街头。在对未来的讨论中,我们处理的是"预期变数",是现在(个人的和政治的)行动的"预期的原因"。这些变数的意义和重要性直接与它们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威胁成正比。我们(必须)预期后者来确定和组织我们现在的行动。

33

合法化："潜在的副作用"

当然，这假定风险已经成功地通过了社会认可的程序。最初，风险是要避免的东西，其非存在性直到消失时都是隐含的——这是按照那句其实意味着"in dubio pro looking away"（在疑问中向前看）的谚语"in dubio pro progress"（在疑问中前进）来说的。一种合法化的模式显然是与此相联系的，这种模式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截然不同的。风险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使自身合法化——人们既不想看到也不需要风险的后果。风险状况首先必须突破围绕着它们的禁忌防护物，然后"以科学的方式诞生"在科学化的文明中。这一般以"潜在的副作用"的形式发生，它同时避免和证明了危险的现实。那些无法看到的东西是无法预防的，是以最好的意图产生出来，却是预定目标所不需要的问题产儿。"潜在的副作用"从而代表了一种许可，一种文明的自然命运，它同时承认并有选择地分配和证明了不想要的后果。

34

阶级特定的风险

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和媒介与财富的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但并没有排除这样的情况，即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相反，（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依阶级而定的风险分配的"规律"，以及因之而来的通过在贫穷弱小的

人那里集中风险而形成的阶级对抗加剧的“规律”，早已经被合法化，并且在今天仍适用于风险的某些核心的维度。对于非熟练工人来说，失业的风险比熟练工人大得多。与在相应的工厂里工作相联系的来自工作压力、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物质的风险，在不同职业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临近工业生产中心的居住区——永久地接触着空气、水和土壤中的各种污染物——它们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害怕失去收入，就会有更高的忍受限度。

不仅仅是这种社会过滤或放大效应产生了随阶级而定的苦痛。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或许也是不平等地分配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手头有必需的长期银行存折，就可以通过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者自己建造居住地（或者通过买第二套住房、休假等等）来规避风险。膳食和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和求知的模式也是如此。装得满满的钱包使你可以吃“精细饲养的母鸡”的蛋、用“嫩莴苣头”做沙拉、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你可以躲开某些东西（比如铅含量高的老牛肝），通过成熟的营养膳食技术，你可以改变每周的菜谱，从而使北海鱼类中所含的重金属被分解、补充或者以猪肉和茶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来中和（但也许是加剧了它的作用？）。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为了运用“营养工程学”在化学工业和农业过量生产的污染物和毒物上搞一点自己的小花样，十分丰富的相关知识是必须的。然而，很有可能的是，基于阶级而分配的“反化学的”营养和生活习惯是依赖于 35 知识，并且是通过对报纸、电视有关污染的新闻报道的反应而形成的。在用“营养学意识”全面武装的那部分人中，日常的“反化

学"(作为化学工业的一个支系,它经常以整洁的包装送到消费者手上)将会把生活的所有户内领域——饮食起居、疾病闲暇——推向外部(而且已经是这样了)。从以上分析你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估:通过这些反思性的和有充分资金保障的对付风险的方法,原来的社会不平等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了巩固。但这没有触及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

与这种风险状况的加剧相应的是,秘密逃脱偿还风险债的途径和可能性在缩小同时又在普及。风险的指数式增长、逃脱风险之不可能、政治箝制和宣扬兜售逃脱的秘诀,这些东西是互为条件的。对某些食物来说,这些逃避秘诀还是有作用的,但在水的供应上,所有的阶层都使用同一个管道。当你在远离工业的"田园牧歌"里看到"森林遗骸"时,阶级界线在我们都呼吸的空气面前消失了。在这些状况下,只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而且即使这样,也只在某种程度上有作用。毕竟我们知道建筑上的石头和地面上的苔藓遭受了什么。

文明风险的全球化

这一切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套话: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张——自然、健康、营养等等的危机——社会分化和界限相对化了。由此不断出现判若云泥的结果。然而,客观地说,风险在其范围内以及它所影响的那些人中间,表现为平等的影响。其非同寻常的政治力量恰恰就在于此。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确实不是阶级社会;其风险地位或者冲突不能理解为阶级地位或冲突。

当你去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类型、特殊分配方式时,上述问题就变得更为清晰。它们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

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腐蚀雕像和艺术宝藏,它也早就引起了现代习惯屏障的瓦解、即使是加拿大的湖泊也正在酸化,甚至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森林也在消失。

全球化趋势带来不具体的普遍性的苦痛、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危险,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逃避的可能,人们就不再去考虑它们了。这种末世论的生态宿命主义使私人和政治气氛的钟摆向任意的方向摆动。风险社会从歇斯底里转变到漠不关心的状态,然后再按相反方向运动。无论如何,行动是属于昨天的。或许人们能获得无所不能的和始终有效的杀虫剂。 36

"飞去来器效应"

包含在全球化当中却又明显与其相区别的是一种风险分配的模式,它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爆炸力。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前面提到的"潜在的副作用"甚至对生产它们的中心也是反戈一击、现代化原动力自身也深深卷入了它们释放并从中获益的风险旋涡之中。这能够以各种方式产生出来。

仍旧以农业为例。在德国,从 1951 年到 1983 年,每公顷的化肥消耗量从 143 公斤上涨到 378 公斤;而在 1975 年至 1983 年间,农药的使用总量从 2.5 万吨上升到了 3.5 万吨。每公顷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没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快、谷物的产量翻了一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了 20%。这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很小的增长,而相应的是耕种者可见可感的自然破坏程度的不成比例的极大增长。

这种惊人发展的一个突出指标，是很多野生植物和动物的急剧减少。“红名单”——官方用来记录这些对生物生存的威胁的“死亡证明”——越来越长。

> 格陵兰生长着680种植物，其中519种处于危险之中……依赖草场生活的鸟类，比如白鹳、麻鹬、草原石鸭，在急剧地减少；人们试图通过“草场鸟类计划”来保护巴伐利亚最后的鸟群……受到影响的动物包括地栖鸟类，处于食物链最高层的像猛禽、猫头鹰和龙蝇这样的动物，或者其特定的食物——如原来整个生长旺季都有的大型昆虫和花蜜——正在变得稀少的动物。（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1985:20）

因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可见的次级影响”，当它们使自己偶然的生产中心处于危险之中时，就变成可见的首要影响。现代化风险的产生伴随着“飞去来器弧线”。以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支持的密集的工业化农业，不仅仅造成附近城市里母亲奶水和37儿童身体中铅含量的非常规上升，还经常削弱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土地肥力的下降，极端重要的动物和植物的消失，以及土壤侵蚀的危险。

社会危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在最难以想像的情况下——一次世界核大战中，它会明确地表现出来：战争同样摧毁了侵略者。这里变得明确的是地球变成了一个弹射坐椅，它不再承认富裕与贫穷、黑人与白人、北方与南方或者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但是，这种效应只有在它实际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但它实际发生时，它便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存在了。因而，这种启示录式的威胁不会在其现实的威胁中留下任何可靠的踪迹

(Anders, 1983)。生态危机则不同。它甚至削弱农业的经济基础,从而减少了人们的食物供应。在这儿,影响是可见的,它不仅影响自然,而且影响富人的钱袋和当权者的健康。从主管当局——并且根本不分党派——你可以听见这个领域里尖厉的、启示录般的声音。

生态的贬值和剥夺

“飞去来器效应”不必通过对生命的直接威胁来表明自身,它也可以影响某些次级媒介,如金钱、财产和合法性。它不仅对单个的资源反戈一击,而且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森林的破坏不仅仅造成鸟类的消失,也使土地和森林财产的价值下降。哪里建成和规划了核电站和火电厂,哪里的地价就会下降。城市和工业区域、高速公路和大道都污染着周边地区。也许对这样的问题还存在着争议:德国7%的土地是否因为这些影响而受到如此的污染,凭良心说已经不能进行耕种了;抑或这只是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原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正在经受一种缓慢的生态剥夺。

这种影响可以是普遍性的。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和危险、食物和消费品中含有毒物质的新闻、有危险的——甚至更糟糕的,实际有害的——化学品、毒物或者反应堆事故,具有一种或缓或急的财产权的贬值和剥夺的影响。通过无限制的现代化风险的生产,一种使地球不适于居住的政策以突进与限制相交替的方式被实施,有时是以使灾难性加剧的方式。作为“共产主义威胁”被我们反对的东西,是作为我们绕开受污染的自然的行动总和发生的。在市场机会的争夺中,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论争,所有的人都追寻一种“烧焦的地球”的政策去反对另外所有的人——伴随着轰动的却不能持久的成功。 38

那些被污染的和认为被污染的东西是属于你的，无论你是谁——因为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丧失，区别已经没有意义了。即使维持着法律上的所有权，它也会变得无用和无价值。因而，在"生态剥夺"的例子里，我们关心的是在维持法律所有权的同时社会和经济的剥夺。这适用于食物，同样也适用于空气、土壤和水。它适用于所有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东西，尤其适用于那些依赖于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东西过活者。"居住毒素"的讨论表明：所有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的东西都可以包含在这里。

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基本认识要多简单有多简单：所有威胁地球上生命的东西，同样威胁那些依赖于生活和生活需求商品化过活的人的财产和商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真正的和系统加剧的矛盾，在增进工业化进程的利益和财产与它们常常是危险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使财产和利益受到威胁和剥夺(更不要说生活的财产和利益)——之间产生。

由于反应堆事故和化学物质灾难，在最先进的文明发展阶段，地图上的"空白点"再次出现。它们是那些威胁我们的东西的标记物。甚至是毒害事故或突然发现的有毒垃圾，都会使住宅区变成有毒废物区，使耕地成为废地。但存在很多初级的和隐匿的方式。从污染的海洋中打捞的鱼不仅威胁吃它们的人，而且也威胁所有依赖打鱼为生的人。整个工业区域变成了怪异的鬼城。这就是"飞去来器效应"的意愿：甚至使污染性工业的车轮停止。但不仅仅是它们的停止。化学烟雾不关心污染者补偿原则。在整体和平等的基础上，它打击所有的人，不管他或她在烟雾产生中担负什么责任。因而，化学烟雾当然不会是疗养院的广告可以利用的因素，也当然不是一个大推销员。法律上确立的、在这样的机构中有效地公布空气中最大烟雾水平(像空气和水的温度一样)的需要，会使温泉浴场管理机构和度假产业

成为反污染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即使它们一直反对建立标准。

风险地位不是阶级地位

通过这种方式，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一种社会动力开始发挥作用，它不能再包含在阶级的范畴里并通过它加以理解。所有权意味着非所有权，从而意味着一种紧张和冲突的社会关系，在其中相互的社会认同还在发展和巩固——"那儿他们上去了，这儿我们下来了"。风险地位的状况是十分不同的。任何被它 39 们影响的人都非常糟糕，但没有从别人（即没有受到影响的人）那里剥夺任何东西。用一个类比来表达就是："被影响"的"阶级"并没有面对一个不受影响的"阶级"。它至多面对一个还没有被影响到的人组成的"阶级"。逐渐增加的健康的短缺，甚至将使那些（健康和福利）仍旧不错的人在明天就进入靠保险公司的"施粥场"过活的行列，后天就成为不法的和痛苦的贱民群体。

当局面对毒害事故和有毒废料丑闻，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法律、司法和补偿问题，说的都是一种明确的语言。对于智者，逃脱风险的自由可能一夜间就变成不可逆转的痛苦。围绕着现代化风险产生的冲突，是围绕着与进步和获利的原动力一致的系统原因发生的。它们与风险的规模和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赔偿的要求和（或者）过程的根本改变有关。在这些冲突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对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进步"、"繁荣"、"经济增长"或者"科学理性"这样的概念是否仍旧是正确的。在这种意义上，这里爆发的冲突具有了文明内部关于现代性正确道路的学说之争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阶级冲突相比，这些冲突更像中世纪的教派斗争。

工业风险和破坏都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它们使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完全与有效的反对污染的国际协议联系起来。污染的超国家性再也不能以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应对。从现在开始，工业国家必须同意依照它们的输出和输入的国内均衡来对它们进行区分。换言之，在不同的拥有“积极的”、“中性的”或者“被动的”的污染均衡的工业国家间，国际不平等出现了，说得更明白些，在“污秽的国家”和那些不得不来清除、吸纳或者以不断增长的死亡、剥夺和贬值来补偿的国家之间，国际不平等出现了。社会主义“兄弟般的共同体”很快也将面对这样的区分及其中的冲突根源。

作为命运的风险地位

与现代化风险在国际间的难以控制相应的是它们扩散的方式。至少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它们在风中和水中游荡。它们可以是任何和所有的东西，而且与生活的绝对需求——呼吸的空气、40 衣食、居所——一起，它们通过了所有其他严密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域。不像诱惑人却也可以抛弃的财富——对于它们，选择、购买和决定总是可能和必须的——风险和破坏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自由的(!)决定而隐晦和无阻碍地隐藏着。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文明的风险归因。在某些方面，这使我们想起了中世纪社会的地位命运。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人出生在哪里，就不可能以任何成就来脱离它，不可能以“小的差异”(但有大的影响)——我们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来摆脱它。

因而，在开始着手去除归因、发展隐私性并把人们从自然和

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发达文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风险的全球归因，对于它个人的决策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毒物和污染与工业世界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我们无法决定的风险伤害的经验，使我们理解了那些惊颤、无助的暴怒和"没有未来"的感觉，人们矛盾地并带着必然不断增长的批判来回应技术文明的新近成就。创造并保持一种对不可逃避的事物的批判性的疏远是完全可能的吗？仅仅因为不能逃避就抛弃批判性的疏远，进而以冷嘲热讽或犬儒主义、漠然置之或者欢呼雀跃来逃避不可逃避的东西，这是可容许的吗？

新的国际不平等

世界范围内的平等的风险状况不会掩盖那些在风险造成的苦痛中的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那些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相互交叠的地方——这同时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居住在临近烟囱的地方，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的旁边。"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明镜》）——印度博帕尔（Bhopal）毒物泄露事故，已经使这些观念进入全球公众的意识中。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而且你不得不做一个天真的傻瓜，继续假定当班的扳道工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对此更多的证据是，我们已经证实"新的"（创造工作机会的）技术对于无职业的偏远地区人口，存在"更高的接受性"。

在国际范围内，物质的贫困和对危险的忽视相互重合的观

41 点，在经验上是正确的。"一个德国发展专家是这样描绘在斯里兰卡对农药的随意使用情形的：'在那里，他们赤手泼洒滴滴涕，整个人都变白了。'"在特立尼达的安的列斯岛（人口120万），据报道共有120人死于农药。"一个农民说：'如果你在喷洒农药后没有觉得难受，那是因为你喷得还不够多。'"（《明镜》1984，第50期：119）

对这些人来说，拥有输送管道和球罐的化工厂的复杂装置是成功的昂贵标志。相比之下，它们所包含的死亡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不可见的。对化工厂来说，它们所生产的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首先标志着从物质需求中获得解放。它们是"绿色革命"的先决条件，系统地为西方工业国家所支持。在过去几年中，它们使食物产量增长了30%，在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达到了40%。每年，"几十万吨的农药被播撒到棉花、水稻、烟草和果树田地里"（119），这一事实隐藏在这些明确可见的成功后面。在可见的因饥饿而死亡的威胁和不可见的因有毒化学物质而死亡的威胁之间的争论中，那些基于物质贫困提出的论据是胜利者——没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土地的产量会下降，而害虫和腐烂也会造成损失——有了化学物质，贫困的边缘国家会建立它们自己的粮食储备，并获得一点点对有权势的中心工业国家的独立性。第三世界的化工厂加强了这种生产上的独立性和摆脱对昂贵进口产品的依赖的印象。反对饥饿、获取自主的斗争形成了一层保护外壳，在其后面，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见的）都被压制和最小化，并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扩大、散播并最终通过食物链回到了富裕的工业国家。

安全和预防性法规并没有充分建立，即使有，它们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常常是没有读写能力的那部分对工业一无所知的农村人口，很少能负担得起防护服装的费用，这给资方提供了难以

想像的机会来合法化那些处置风险的方式，这些方式在具有高度风险意识的工业国家是不可想像的。资方可以制定严格的安全条例，知道它们无法施行，却硬说条例得到遵守。通过这种方式，资方使自己保持清白，廉价地和问心无愧地把事故和死亡的责任推卸给人们对危险在文化上的无知。当灾难真的发生，贫困国家的司法混乱和利益纷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制定出一种抹杀和混淆的政策，通过有选择地界定问题以限制灾难性后果。从法律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的生产的经济条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工业康采恩，并且和克服物质贫困、争取民族自觉的国家的特殊利益结合成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这是在这个词最本真的意义上说的）。饥饿的魔鬼与倍增的风险的堕落天使争斗着。特别危险的工业被转移到贫困的边缘国家。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来自博帕尔和拉丁美洲的描述和报道说着它们自己的语言。 42

维拉帕里西

世界上最肮脏的化工城坐落于巴西……每年贫民窟的居民都不得不重修他们皱纹铁皮天棚，因为酸雨在腐蚀它们。任何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长皮疹，像巴西人说的："鳄鱼皮"。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维拉帕里西的居民，一个1.5万人的贫民窟，大多数人仅能建得起普通的灰色石头小屋。他们甚至在超级市场出售防毒面具。大多数孩子患有哮喘、支气管炎、鼻喉疾病和皮疹。

在维拉帕里西，凭嗅觉找路是很容易的。在拐角处，一条露天的下水道在冒泡，另一处地方，有黏糊糊的绿色水流。一种像烧糊的鸡毛的味道指示着钢铁厂，而臭鸡蛋的

味道则标志着化工厂。城市里的专家制定的排放标准，实行了一年半之后在1977年失败了，显然，它不能对抗污染。

这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的历史开始于1954年，当时巴西的佩格罗普拉斯石油公司选择了这个沿海的湿地建立精炼厂。很快，巴西最大的钢铁康采恩克斯皮亚和巴西美国合资的科佩格拉斯化肥公司也来了，跟着就是像菲亚特、道氏化学以及联合煤炭这样的跨国公司。这是巴西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军政府邀请国外的企业在那里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巴西还能担负得起进口污染”，这是计划部长保罗·维罗萨1972年夸下的海口。这一年召开了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他宣称，巴西惟一的环境问题是贫困。

“疾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酒精和烟草”，佩格罗普拉斯公司的发言人说。“当他们从克帕特奥来的时候已经患病了，”联合煤炭的老板保罗·菲古艾里多认同这种看法，“而如果他们的病恶化了，就会算在我们头上。这根本不合逻辑。”多年来，圣保罗州州长一直试图给克帕特奥以新鲜的空气，他辞退了懒散的环保机构的13名官员，并启用计算机监控排放。但只有几千美元的罚款并没有触动那些破坏环境的人。

在这一年的2月25日，灾难发生了。因为佩格罗普拉斯公司的粗心大意，70万升的石油流进了维拉索科沼泽地上密集的房屋之间。在两分钟之内，火浪扫荡了贫民区。超过500人被烧死。小孩的尸体根本就找不到了。“他们是被烧成蒸汽了”，一位巴西官员说。(《明镜》1984，第50期:110)

博帕尔

鸟从天空中坠落。水牛、奶牛和狗横死在街道和田地里　在中亚(原文如此)的阳光下几个小时就膨胀起来。所有的地方都有窒息的人,他们蜷曲起来,口吐白沫,抽搐的双手抠进土地里。在这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有3000个这样的人,新的受害者仍不断被发现;当局已经停止计数。2万人可能失明。同时有20万人受伤。

43

在博帕尔城,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灾难于上星期天晚上和本星期一早上发生了。毒气云从一家化工厂发散出来,形成了超过65平方公里的寿衣;当它最终消散的时候,令人作呕的甜甜的腐败味到处都是。城市成为和平中的战场。印度教徒在柴堆上焚烧死人,每次25个。很快火葬用的木头就没有了,于是改用煤油。穆斯林的墓地变得过分拥挤。早先的坟墓不得不挖开,这触犯了伊斯兰的戒律。"我知道把两个人葬在同一个墓里是罪过,"其中一个挖墓者抱怨说,"也许安拉会宽恕我们。我们在一个墓里埋了三四具乃至更多的尸体。"(110)

然而,与物质贫困相比,因为这些危险造成的第三世界的贫困化,对富裕的社会是具有传染性的。风险的倍增促使世界社会组成了一个危险社区。"飞去来器效应"精确地打击那些富裕的国家,它们曾经希望通过将危险转移到国外来根除它们,却因此不得不进口廉价的食物。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极端的国际不平等和世界市场的相互联系使边缘国家的穷邻居来到了富裕工业中心的门槛外。他们成为国际污染的温床,就像狭窄的中世纪城市中穷人的传染病一样,是不会绕过那些世界社区的富裕邻居的。

两个时代、两种文化：论风险的感知和风险的生产间的联系

因此，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不平等是相互重叠和互为条件的；后者可以产生前者。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给风险的生产提供了无法攻破的防护墙和正当理由。这里必须在对风险的文化和政治的关注与它们实际上的扩散之间进行精确区分。

在阶级社会中，跨越了所有阶级隔阂的主要关注点是可见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在这里，饥饿与剩余或者权势与弱小相互对峙着。困苦不需要自我确证。它就是存在着的。它的直接性和可见性与财富和权力的物质证明相对应。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的确实性是可见性文化的确实性：饥饿憔悴与饱食肥满、宫殿与棚屋、华丽与褴褛相对照。

这些明确有形的性质在风险社会中不再能够保持。不可感知的东西不再是虚幻的东西，甚至反过来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危险现实。当下的需要与已知的风险因素竞争着。在风险的优势统治下，可见的稀缺或剩余的世界变得昏暗起来。

在可感知的财富和不可感知的风险的竞赛中，后者不可能取得胜利。可见的不能和不可见的竞争。这种自相矛盾判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见的风险赢得了比赛。

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感知的风险的忽视——它总能在对有形需要的消除中找到自己的正当理由，而事实上它确实拥有这样的正当理由（看看第三世界吧！）——是风险和威胁生长、开花和繁殖的文化和政治土壤。在阶级、工业和市场社会问题与风险社会问题之间的相互重叠和竞争中，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总能取得胜利，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需求的具体性压制着对风险的感

知，但这仅仅是对风险的感知而不是其实质和影响；被否认的风险增长得异常迅速和完全。在以化学工业，也包括反应堆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生产的某个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和冲突的优势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的社会不可见性，并非其不现实性的证据；相反，它是风险社会的原动力，因此也是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证据。

这就是阶级地位和风险地位在第三世界里相互重叠和加强的事实所告诉我们的；然而，这同样也适用于富裕工业国家里的行动和思想。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仍旧享有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失业的威胁被大肆渲染，这是为了使规定的标准排放口更大些，使管制更松懈一点，或者是为了阻止任何对食物中有毒残余的调查。出于经济后果的考虑，没有对整个化学制品的记录；它们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出于上述原因却可以自由地流通。与环境风险斗争本身就成为了工业的一个兴旺分支，在德国它因确保了数百万人的安稳（太安稳了）工作而被默认了。

与此同时，精确的风险"管理"工具正被磨得锋利，斧子正被抡起来。那些指出风险的人被诽谤为"杞人忧天"和风险的制造者。他们所表明的威胁被看作是"未经证实的"。他们阐明的对人和动物的影响被称作"骇人听闻的夸张"。人们说，在确定情况如何并进行合适的测量之前，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只有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才能给进一步的环境保护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祈求对科学和研究的信任。他们说，他们的理性迄今为止找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对科学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焦虑被污蔑为与"非理性主义"类似。它们被假定为邪恶的真 45 正根源。风险属于进步就像起伏颠簸属于高速行驶的船只。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忍受着它。比如，死于交通事故。可以这么说，每年德国都有一个中型城市消失

于无形。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有很多空闲土地和天空可以用于发生由放射性物质或废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引起的小型灾难（鉴于德国的安全技术，这些灾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不同的）。

即使这种解释占有优势地位，它也不会使我们看不到它的不现实。它的胜利是损失巨大的胜利。这种观点在哪里流行，它就在哪里产生它所否认的风险社会。但这里不存在安慰；相反，只有不断增长的危险。

世界社会的乌托邦

因而，同样并且特别是在否认和无感知中，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objective community）形成了。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后面，风险的现实威胁着、增长着，根本不管社会的和国家的区别。在独立的围墙后面，危险肆无忌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宏伟的和谐将在不断增长的文明风险面前崩溃。恰恰是在处置风险方面，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出现了。这些现象不再与阶级社会的计划有关。它们首先从晚近工业社会的风险的两面性中产生：风险不再是机会的阴暗面，它们也是市场机会。与风险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是那些因风险受折磨的人和那些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因而，新的对立在那些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出现了。

这些商业和消除风险间的紧张，以及风险定义的生产和消费间的紧张，延伸到所有的社会行动领域。这里存在着有关风险的规模、程度和紧迫性的界定的斗争的根本源泉。通过确定

可接受的水平，作为患者和牺牲者受害的人数或增加或减少。通过勾画出因果关系，公司和职业被推到遭受谴责的枪口上。政客和政治活动通过抓住个别事件来缓解压力，而不是整体地为事故和破坏负责。另一方面，风险界定的观察者接管并扩大了他们的市场机会。某些人，如化学家，脚踩两条船；他们使人患病，然后又给人药片来医治他们继发的疾病（比如，过敏症的治疗）。

风险的市场开拓支持了一种普遍的在揭露和掩盖风险之间的摇摆——其结果是，最后没有人清楚是否"问题"可能有"解 46 答"或者恰恰相反，没有人清楚谁从什么得益了，没有人清楚哪里创新的责任通过因果的推测被掩盖或取消了，也没有人清楚是否整个有关风险的讨论并不是有着颇为不同的意图的政治戏剧错位的表现。

但与财富不同，风险总是仅仅产生局部的两极分化，这些分化基于风险也同时生产的益处，至少当它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是这样的。只要增长的破坏因素被发现，这些益处和差异就消逝了。迟早，风险仅呈现给我们威胁，它将使与之相关的益处相对化并削弱，并且正是随着危险的增长，在不同的利益间，它们使风险的共同性成为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在风险折磨的苍穹下——无论它有多么宽广——共同性同样在对抗背后形成。为了预防核能和有毒废料的危险，阻止对自然的明显破坏，不同阶级、党派、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公民运动

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产生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型的受威胁者共同体，它的政治实施能力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要现代化危险普遍化并因而席卷了那些保留下来的未卷入地区，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相对）就发展出一种团结处于全球风

险地位上的受害者的趋势。因此，在有限的情况下，朋友和敌人、东和西、上和下、城市和乡村以及南和北都暴露于指数式增长的文明风险的同等压力下。风险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它们包含了一种基层的摧毁边界的发展动力，通过它，人们在文明自陷危境的一致状况下被推到了一起。

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控制了冲突和一致的新的源泉。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

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所发展的自陷危境的潜在可能性，也使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有了更多的现实性或者至少有了更大的紧迫性。19世纪的人们因为经济破产的惩罚而必须学会使自己服从于工业社会和付薪劳动的条件。同样，他们在今天和未来因为文明劫难的阴影，同样要学会坐下来去寻找和实施解决跨越所有边界自我施加的威胁的方法。这个方向上的压力在今天已经可以被感觉到。环境问题只能以一种客观上有意义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在于跨越边界的谈判和国际协议，相应地也在于跨军事同盟的会议和协议。拥有难以想像的破坏力的核武库的威胁扰乱着不同军事区域中的人们，并且创造了一个危险社区，它的生存能力仍旧必须得到自我证明。

47

政治真空

但是，那些从我们不能理解的恐怖中至少获得某种政治意义的尝试，不能使我们漠视这样的事实：这些新发的客观共同危

险,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迄今为止还在稀薄的空气里飘荡着。相反,它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普遍存在的内社会党派(intrasocial party)、工业社会的工业和利益组织相抵触 在社团主义社会的丛林中,这样跨越群体的全球风险是没有其位置的。在这里,每一个组织都有它的委托人和社会基础,它们由对手和盟友组成,相互促进和竞争。危险的共同性使利益群体组织的多元化结构面临着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混淆了那些共同设计出来并很好地得到保持的妥协惯例。

的确:危险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被改造为预防性的风险管理政策。甚至,哪种政治体系或政治制度能够承担这项任务还是不明确的。一个不可理解的社区与问题的不可理解性相应产生。但它更多地仍旧是一个理念而不是现实。与此同时,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能力或者甚至是一种有关它的理念的真空出现了。这个有关危险如何在政治上被处理的问题的开放性,与不断增长的行动和制定政策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后面隐藏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政治主体的问题。19世纪的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以足够的理由选择了无产阶级充当这个角色。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理论困难,今天这些困难还存在着。这一假设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显而易见性正在衰退,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它太正确了。工人的政治和工会运动的收获是巨大的,它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削弱了工人先前作为未来领导者的角色。它更多地成为正在被未来腐蚀的既得利益的保护者,而不是一种政治想像的源泉——凭借它,可以去寻找并找到解决风险社会威胁的答案。

在风险社会中,与阶级社会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相应的,仅仅是或多或少由有形的大规模危险造成的所有人的受害。你不必是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就会相信如此广泛的焦虑可 48

以很容易地被压抑。每一个人但又没有人对此负责。在古典工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参与为了他自己的工作的斗争(收入、家庭、斗室、汽车、爱好以及休假的愿望等等。如果这些都失去了,那么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处于一个窘境——污染或不污染)。但无形的、普遍的折磨在政治上能被完全组织起来吗?"每个人"能成为政治主体吗?从危险的全球性到政治意愿和行动的共同性,这在因果关系上是不是过于跳跃了?全球化和整体的受害难道不是一个不去注意那些成问题的处境——或者仅仅间接地注意——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的理由吗?这些难道不是制造替罪羊的根源?

从需求型团结到焦虑促动型团结

即使政治的表达是开放的并且政治的后果是暧昧的,在从阶级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中,社群的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这两种类型的现代社会表达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阶级社会在它的发展动力上(在它从"机会均等"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各种变体这些不同的表述中)仍旧与平等的理念相联系。风险社会就不是这样。它通常的对应方案(counter-project)——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平等的乌托邦包括很多实质的和积极的社会变迁目标,而风险社会的乌托邦仍旧是特别消极的和防御性的。基本上,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作为一种目标出现了。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

在基本社会境况中——两个社会中的人们在此境况中生活

和结合在一起，它推动他们、区分他们、融合他们——存在着相应的差别。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但是，焦虑的约束力量如何起作用甚至它是否在起作用，仍是完全不明确的。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焦虑社群可以对抗压力？它们使什么样的行动动机和推动力产生作用？焦虑的社会力量真的会打破个体的功利评判吗？产生焦虑的危险社群是如何构成的？它们以什么样的行动模式来组织？焦虑将会使人们投入非理性主义、过激行为和狂热吗？迄 49 今为止，焦虑还没有成为理性行动的基础。这一假设也不再成立了吗？焦虑——不像物质需要——或许是一种政治运动不牢固的基础？焦虑社群甚至可能因为相反信息的细微气流而被吹垮吗？ 50

第二章
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

任何被这些问题触动的人，都会对风险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感兴趣——除了它的技术、化学、生物及医疗专门知识之外。那就是将在这里进行的研究。一种同19世纪的类比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出发点。我的论题是，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关心的是某种类型的贫困化(immiseration)，它与19世纪的劳工大众的贫困化是可比较的，但又是根本不可比较的。我们为什么说"贫困化"呢？那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

文明的贫困化？

在19世纪和今天，被大多数人作为灾难经受的后果，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在两个时代中，我们关心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剧烈的和威胁性的干预。它们的出现是与生产力、市场整合以及财产和权力关系的发展的确切阶段相联系的。每次，都会有不同的物质后果——19世纪是物质的贫困化、贫穷、饥饿和拥挤；今天是生活的自然基础的威胁和破坏。两者也有可比较的方面，比如危险的数量以及危险产生并依靠其生存的现代化的系统本质。这里存在着它的内在动力——不是恶毒(malevolence)，而是市场、竞争、劳动分工，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更加全球化一些而已。就像以前一样，潜在因素(副作用)在两种情形下都只能通过冲突表现出来。然后是像现

在那样，人们走上街头去抗议，一直存在着对进步和技术的强烈批判，以前有卢德派[1]——以及与之相反的主张。

因而，就像今天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对问题有了逐步的认可。系统产生的苦难和压抑越来越可见，并且必然会为那些曾经否定它们的人所承认。法律顺着流行的风向扬帆决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政治和街头的强力支持：普遍选举权、社会福利法案、劳工法以及决策参与。今天类似的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无害的东西、酒、茶、牛面团等等都变成危险的东西。化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长期毒物。曾经被高度赞扬的财富源泉（原子能、化学、基因技术等等）都转变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危险的显而易见性为传统的意在减小和掩盖危险的惯有做法增添了越来越多的障碍。科学、商业和政治中的现代化原动力，发觉自己处于抵赖的被告这样一个难受的位置，因为一系列间接证据而不住地冒汗。 51

你几乎可以这样说，我们原来就看到了全部，没有什么新东西。但系统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个人和社会经受的苦难的当下性（immediacy）与今天的文明危险的无形性（intangibility）相对照；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这是些采用化学公式、生物语境和医学诊断概念的危险。当然，这样的知识建构并不能使它们减低危险性。相反，有意或无意地，通过事故或灾难，在战争或和平之中，人口的一大部分在今天面对着灾难和破坏，我们的语言和想像的力量无力把握它们，我们对之缺少道德的和医学的范畴。我们关心的是绝对的和最

[1] Luddism，指在1811年到1816年期间骚乱并捣毁节省劳动力的纺织机器的英国工人。他们认为这些机器会减少就业，现在比喻反对技术或工艺变化的人。——译注

终的"不",它威胁着我们,普遍的"不可",不可思议,不可想像,都是"不可"、"不可"、"不可"。

但它只是威胁?只是吗?这里展现出另外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并且不仅仅是梦想家的狂想)。

这种现实和可能性间的类型上的差别,被这样的事实进一步补充:在拥有最高程度社会安全的最发达国家中,危险造成的贫困化与物质的贫困化(至少你可以看一看19世纪以及第三世界饥饿国家的景象)正好相对。人们并不贫穷,相反常常是富裕的;他们生活在大量消费和富足的社会里(当然会伴随社会对立的加剧);他们的教育程度很高且见多识广,可是却感到害怕,感到威胁,并为了不让他们"现实主义 悲观主义"的未来观的惟一可能的检验发生,或者实际上制止它们,而将自己组织起来。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在这种意义上,出现的问题不能像19世纪那样通过生产的增长、再分配或者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展来解决,而要代之以集中的和大规模的"反诠释的政策"(policy of counter interpretation)或对普遍的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再思考和再规划。

这些差异也使十分不同的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显得可以理解了。在过去,个人所经受的苦难由他的阶级命运所决定。你出生在一个阶级中,它就附在你身上,从小到老。它包含在一切事情中:你吃的东西,和谁并且如何一起生活,有什么样的同事和朋友,抱怨什么人,如果有必要的话,走上街头去抗议什么人。

52

相反,风险地位包含了十分不同的受害类型。对于它们,没

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们是普遍的和不具体的。你听说它们，读到它们。这种通过知识的传递，意味着这些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是具有更高教育程度并积极求知的。与物质需求的竞争涉及另外一个特征：风险意识和行动主义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生存的直接压力得到缓解和消失的地方，就是说，那些更富裕更受保护的群体（国家）。风险的不可见性的魔力也可能被个体的经验——一棵可爱树木的垂死征兆，在某个地区规划的核电站，有毒废料事故，媒体的有关报道以及类似的事件——所打破，它们使人们对新的征兆、事物中有毒的残留物质等等变得敏感起来。这种类型的苦难不会产生对自身和他人都可见的社会组织，不会产生社会阶级或阶层。

在人们如何被阶级地位和风险地位所影响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是本质性的。坦率地说，在阶级地位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地位上，正相反，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特别是个体经验的缺乏和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它围绕着界定危险的所有方面。为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潜在威胁——比如失业——对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是明确的。这不需要特殊的认知方式、测量程序、统计调查，不需要对有效性的思考和对容忍阈限的考虑。苦难是明确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独立于知识的。

那些发觉每天喝的茶里面有滴滴涕，新买的蛋糕里有甲醛的人，处于一种十分不同的境地。他们的受害不是由他们自己的认知方式和可能的经验决定的。茶里面是否有滴滴涕或者蛋糕里是否有甲醛，以及在哪里发生的污染这样的问题，就像这些物质是否并且达到多大浓度时会导致长期或短期的有害作用这样的问题，仍旧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然而，对这些问题如何确定，决定了一个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受苦难。无论是还是

否，人们受危险的程度、范围和征兆，在根本上是依赖于外部知识的。以这种方式，风险地位创造了在阶级境况中所没有的依赖性；被影响的群体正变得难以承受他们的苦难。他们丧失了他们认知自主性的主要部分。有害的、危险的和有敌意的东西在所有的地方等着他们，但它们是敌意的还是友善的这样的问题超出了人们的判断能力，这是留给外部知识生产者的假设、方法和论争的问题。相应地，在风险状况中，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带来危险的"特洛伊木马"，并且风险专家会因此相互争论，即使是在他们宣告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是否接受或者征求专家的建议也完全不是由受影响的群体所决定的。他们不再去挑选专家，相反是专家挑选受害者。他们可以随意地干涉或不干涉，因为危险可以散播到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上。而这就是它们现在安顿的地方——不可见的又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们现在需要专家作为解答它们大声地提出的问题的源泉。风险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是喷泉，问题从这里升向表面，而受害者不会拥有任何解答。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所有处于知识生产范围内的有关文明风险和危险的判断，从来不仅仅是知识实质的问题（调查、假设、方法、程序、可接受的值等等）。它们同时也是有关谁受苦难、危险的范围和程度、威胁的因素、受牵连的人口、延迟的影响、需要做的测量、要负责的人以及补偿要求的判断。例如，如果在今天以一种有社会约束力的方式确定，在日常产品和食物中滴滴涕或者甲醛的浓度是有害健康的，那么这就相当于一场灾难，因为到处都是这样的产品。

这明确了一个问题：当危险的潜在可能性增加的时候，科学研究的余地就变得越来越狭窄。在今天承认设定一个杀虫剂可

接受的安全值是错误的——而这在科学中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正常情形——就等于引发了一场政治的(或经济的)灾难，并且必须因为这个原因而加以制止。今天，科学家在各个领域所应付的破坏性力量给他们强加了一种非人的无谬规律。不仅是一种最具人性的特质要起而打破这规律，而且规律自身也与进步和批判的科学理念相抵触(有关这个问题，请看第七章)。

与收入减少的新闻不同，有关食物和消费品中含有毒物质等的新闻具有一种双重冲击。威胁与一种评估危险的自主权的丧失相联系，人们直接地受其支配。整个知识的机构都是开放的，还有它的长走廊、等候坐椅、负责的和部分负责的人，以及难以理解的耸肩和装模作样的人。这里有前入口、侧入口，有秘密的出口，有提示和(相反的)信息：人如何得到知识，如何对待它，但实际上是如何扭曲和翻弄它，最终齐整地呈现出来，以使之并不表达它实际的意义，指示出人们宁愿为自己保留的东西。只 54 要应付的不是非常现实的和个人化的危险，所有这些都不会太激烈，也容易加以忽略。

另一方面，与风险研究者的研究同时，出现了一种在每个人的厨房、茶座或者酒桌上发生的类似探究。如果我们首先撇开这种劳动分工的话，可以说，他们每一个重要的认知决定都造成人口血液中有害物质浓度的急升或骤降。那么在风险地位上，与阶级地位不同，生活的质量与知识的生产相联系。

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以下看法：政治社会学与风险理论在本质上是认知社会学，这不仅仅指科学社会学，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有关以下内容的社会学：所有知识的混合物和原动力的组合与对立，它们的基础、要求、错误、非理性、真理性，以及它们不可能知晓它们所主张的知识。概括地说，表现在今天的未来危机是不可见的，它是正在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但仅仅作为一种偶

然发生的状况，它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过错。因而，这种主张的错误在于预测的意图。在丰裕的财产面前，它是不可见的苦难，最后会达到全球的范围，但没有它的政治主体。而且，如果你正确地看待它和19世纪的相似与不同，就会知道它是一种明确无误的贫困化。与灾害的记录、污染的结算和事故的统计相应，其他的指示物也表明了对贫困化主题的支持。

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影响链条上，不再外在于我们个人的经验；相反，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这里仅仅列出最突出的现象：森林破坏的加剧，内陆河道和内海充满了泡沫，动物身体受到石油污染，建筑和艺术品被腐蚀，一系列的泄毒事故、丑闻和灾难，以及传媒对此的报道。每日的食物和用品中所含毒物和污染物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可接受的值"所提供的屏障，似乎更适合瑞士奶酪的要求(孔越多越好)，而不是公众的保护制度。应该负责的政党否认的声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空洞。虽然这个论点的某些方面还要加以阐明，但上述现象应该已经表明，潜在性的终结具有两个方面：风险自身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明确的是，是风险加剧了，还是我们的观念变化了。两方面趋同了，互为条件，互相加强，并且因为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

55 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

植物和动物的死亡名单与更为敏锐的公众意识、不断增加的对文明危险的敏感性相结合——顺便说一下，不要把后者与对技术的敌意相混淆并加以妖魔化。主要是那些对技术感兴趣的年轻人看到并谈论这些风险。增长的风险意识可以从对西方工业国家人口的比较研究中、从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大众媒介相应的新闻和报道中看出来。潜在性的丧失，对现代化风险的

不断增长的感知，对上一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而现在它已经是最首要的政治因素。它不是普遍觉醒的结果，而是基于一些关键发展的结果。

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增加；其次，并与之相互联系，与风险的交往在增长。对现代化危险和风险的证明远不仅仅是批判，它也是一种首要的经济发展要素。这在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中，同样也在不断增长的为了战胜文明疾病而进行的对环境保护的公共开支上，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工业体系得益于它产生的弊病，并且爽快地说，谢谢你(Jänicke,1979)。

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被明确地去掉了它们最后的自然因素的支撑，并进而去掉了它们的有限性和可满足性 饥饿可以被缓解，需求可以被满足，风险则是"需求的无底洞"，它是无法满足的、无限的。和需求不同，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被操纵。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进而是市场，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它们可以随意解释，随意地设计，并且可以无限再生。因为风险社会的胜利，生产和消费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预定的和可操纵的需求作为商品生产的参照点的地位，被自我生产的风险所代替。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一个大胆的对比的话，可以说在风险生产中，发达资本主义吸收、普遍化、日常化了战争的破坏力量。与战争相似，人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风险能够"摧毁"生产的模式(比如，高污染的汽车或者农业残留)，并进而克服销售危机，建立新的扩张的市场。风险生产及其认知动力——对文明的批判，对技术的批判，对环境的批判，大众媒介中对风险的夸大和研究——是需求革命的系统内在的标准模式。关于风险，你可以像卢曼那样说，经济体系成为自我指涉的，独立于它满足

56 人类需要的语境。

然而，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种对风险的征兆和标志的"处置"因为它们被以这种方式对待，风险肯定会增长，肯定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原因或源泉被消除。所有的事情都必定在掩饰风险的语境中发生——掩盖、减少污染的征兆，在保留污染源的同时安装过滤器。因此，我们拥有的不是防止性的而是象征性的消除风险增长的工业和政策。"好像"必将获胜并成为纲领性的要素。因而需要"激进的保护主义者"和那些从技术上研究危险的科学家和半科学家。有时候是自我资助(自助!)，有时候是公共资助，这些群体一般是为建立新的风险销售市场而进行"预先宣传的机构"——人们可以这样说。

虚构吗？论战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种这样的趋势。如果它胜出了，那也是代价巨大的胜利，因为风险实际上会从所有的掩饰中产生，并因此而成为面对每一个人的全球危险。将会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风险的爆炸力量将毒害每一个人对利益的兴趣。然而，即便是可能性也阐明了反思性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工业社会通过风险的成倍增长和对风险的经济开发系统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危境和对它自身的质问。社会一历史境况和它的动力，可以与工业社会开始、封建时代衰微时的境况相比较。封建贵族依靠商业资产阶级(通过基于采邑的商贸授权，也通过贸易税收)过活，并且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励这些活动。通过这种方式贵族们不自觉而又必然地创造了一个在权力上不断得到巩固的后继者。以同样的方式，发达工业社会从它自己产生的危险中得到"滋养"，并因而创造了社会风险地位和政治潜能，这种潜能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唤起了对现代化基础的质疑。

错谬、欺骗、过失和真理:论理性的纷争

在风险的剩余大大遮蔽了财富的剩余的地方,风险和风险感知之间表面上无害的区分获得了其重要意义——并且同时丧失了它的正当性。科学的风险界定对理性的垄断,因为这种区分得到维持而又衰落了。因为它提出了以一种专业化的方式并通过专家的权威,客观负责地确定风险的可能性。科学"确定风险",而人们"感知风险"。对这一模式的偏离表明了"非理性"和"对技术的敌意"的程度。

这种在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区分也包含着一个公共领域的 57 形象、"偏离的"公众风险"感知"的非理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在技术精英眼中,公众的大多数仍旧像是刚上学的工程学学生。他们当然是无知的,但很认真;努力但不得要领。这样,人们只是自称的工程师,并不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他们只需要被填满技术的细节,就可以共享专家对风险的技术可管理性的观点和估价,因而分享了他们的缺乏风险意识。在公共领域中的保护、恐惧、批评和反抗是一个纯粹的信息问题。如果公众仅知道技术人员知道的东西,他们就会很安逸,否则,便处在无望的非理性中。

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即使是在高度数学化和技术化的外表下,有关风险的陈述中也包括这样的陈述:我们希望生活得如何——这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只能通过走出它们学科的边界才可以独自回答的陈述。但一切都颠覆了。人们不接受对风险的科学界定,这不应该被指责为"非理性"的行为;正相反,它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的风险陈述的可接受性的文化前提是错误的。技术风险专家在对他们暗含的价值前提的经验确证上,特别是在关于什么可以为人们接受的假定上,是错误的。对于人们风险

感知的"谬误和非理性"的讨论，是这个错误的主要部分；科学家从经验主义批判那里收回了他们自己借用的文化接受的概念，把他们对其他人观念的看法抬升到教条的高度，并为自己戴上了摇摇晃晃的冠冕来充当人们非理性的裁判，而人们的观点正是他们应该去确证并作为自己工作基础的东西。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看待它：在对风险的关注中，自然科学家不知不觉地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失去了权力，将自己推向了民主化。在它们隐含的关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念中，风险陈述包含了一点共同决定的意味。科技的风险感知也许会通过对非理性前提的否定来反对这些，就像封建领主反对普遍选举权的出现，但同时它却为他们作出了决定。否则，一切将会陷入永久的和系统的争论之中，而这是与它对其假设的经验正确性的要求相抵触的。

在（理性的）风险确定和（非理性的）风险感知间的区分，也颠倒了科学和社会理性在文明风险意识起源上的角色。它包含着一种对历史的歪曲。今天被认可的科学—技术文明的风险和威胁的知识，只是通过对抗大规模的否认，通过对抗已经陷入狭隘进步信念的自我满足的"科技理性"的强烈抵制才得以确立。科学对风险的研究，每每都落在以环境、进步和文化的视角对工业体系进行的社会批判后面蹒跚而行。在这种意义上，在对风险的科技关注中总会存在一种改宗者的未曾明言的文化批判热情，而工程科学对风险感知中的理性的垄断要求，是与已皈依路德教的教皇对无谬性的要求一样的。

不断增长的风险意识必须作为各种理性要求——某些是针锋相对的，某些是相互重叠的——之间的斗争而重构。你不能把它们之于可靠性和理性的等级关系，而必须去问——在风险感知的例子里——"理性"如何社会地产生，亦即它如何得到信

任又如何变得可疑，如何被定义、再定义、获取和抛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风险的科学和社会感知的(非)逻辑以它们的合作与对立应该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系统的错误和过失的源泉被构建进对风险的科学感知中，这种感知只有在社会风险感知的参照视野中才变得可见。然后反过来问，在何种程度上社会的风险感知还依赖于科学理性，即使它系统地否定和批判科学，并威胁要去复活一种前文明的教条？

我的论点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的起源并不在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在于科技理性面对文明的风险和威胁的增长时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过去的，并且确确实实就是现在的和有危险的未来的。事实上它是逐渐发展直至变得完全可见。这并不是单个科学家或者学科的失败，而是系统地基于科学对风险的制度化和方法论的研究理路。因为它们是被建构的——它们有着过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对方法论和理论的专注，受到外在因素决定的缺乏实践——科学完全不可能对文明的风险做出适当的反应，它们永远纠缠在这些风险的起源和增长当中。有时带着"纯粹科学方法"的清晰意识，有时带着不断增加的负罪的痛苦，科学变成了水、空气和食物的全球性工业污染，以及相关的普遍化疾病和动物、植物与人的死亡的合法保护人。

如何表明这点呢？现代化风险意识已经针对科学理性的抵制而确立了自身。一条科学错误、误判和掩饰的宽阔道路通向了它。不断增长的对风险的意识和社会认可的历史，与科学解神秘化的历史是一致的。认可的另一面是对以下说法的反驳：科学"看不到罪恶，听不到罪恶，闻不到罪恶，不知道罪恶"。 59

对风险的经济漠视

最初关于技术的风险因素的错误在于对核风险的不相称的误解和轻视。现在的读者在阅读 1959 年西德发行的官方指导手册时，可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强烈的耀眼的闪光是核弹爆炸的第一个信号。它的热效应会产生燃烧。

因而，马上遮住敏感的身体部位，如眼睛、脸、脖子和手。

马上跳进坑洞或者沟渠！

在汽车里，马上钻到仪表盘下面，停车，伏在车上，全身蜷曲保护脸和手

如果可能，寻找大的桌椅家具保护自己。

在地下室里，你比在顶楼有更大的求生机会。并不是每一个地下室都会坍塌。

在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被使用时，马上戴上你的防毒面具。

如果没有防毒面具，不要深呼吸，用潮湿的手绢包住嘴和鼻子来保护你的呼吸道。

当环境允许的时候，清除你身上的放射性和毒性物质。

不要惊慌，不要莽撞，但要行动！[①]

启示录般的灾难对于公众消费来说是隐晦的。每一次核威胁都固有的"对测量的嘲弄"(travesty of measurement)(Anders, 1983)被完全误解和轻视了。建议不知不觉地遵循着一种可笑

① 《国防政治信息：来自全世界的国防报告》(Cologne, 1959)，引自安德斯(1983:133)。

又可怖的逻辑:"如果你死了,小心! 延误是危险的!"(133)

核物理学学科和技术的声名衰落不是巧合。它也不是个体化的制约或者独一无二的科学学科的"操作事故"。而且在这个极端情形中,它使我们意识到工程科学在处置自我生产的风险上主要的制度性错误的渊源: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中,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略。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而与之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虑。

因此,风险的生产和对它们的误解在科技理性的经济独眼畸形中有其起源。它的视野被对生产力的好处所指引,因而它也被系统地决定的对风险的漠视所打击。正是这些以所有的商业谋略来预测、发展、检验和探索可能的经济效用的人们,总是在逃避风险,进而深深地为它们"未预料到的"甚或"不可预料的"到来而震惊。另一种观念认为只有在事后并违逆风险定向的自然科学的愿望,对生产力的益处才会"看不见"也"不合意愿"地作为一种对危险的有意识监控的"副作用"而被注意到,这似乎完全是荒谬的。这再一次表明了在历史上盛行于科学定向 60 的技术发展中的[用哈贝马斯(1971)的术语]提高生产力的知识旨趣(productivity raising knowledge interest)——一种与财富生产相联系并且仍旧内含于它的旨趣——是多么不证自明。

"副作用"的声音

虽然这种状况在一方面产生了机会,但另一方面它却使人们受苦。那些受假性哮吼折磨的孩子的父母,在对现代化风险的科学否认前碰了壁。所有那些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夜里咳喘、倒在床上、睁大惊恐的眼睛努力呼吸的人,都只会感到无限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空气里的污染物不止威胁树木、土壤和水源,

而且威胁婴幼儿，他们便不再接受咳喘的痉挛是命中注定的看法。在全德国他们联合组成了超过100个的市民倡议团体。他们的要求是："减少二氧化硫，而不是仅仅代之以废气处理！"（柯尼希，《明星》，1985年4月）

他们不需要再考虑自身处境的问题。科学家所称的"潜在的副作用"和"未被证实的联系"对他们来说，是在有雾的天气里憋青了脸去呼吸，喉咙里发出咯咯声的"咳喘的孩子"。在他们这里，"副作用"是具有声音、外貌、眼睛和泪水的。而且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只要与既有的科学真理抵触，他们的主张和经验就一无是处。接近新建的化工厂的农夫的牛会变成黄色，但在得到"科学证明"之前，这种现象不会受到质疑。

因而，人们自己成为了有关文明风险的小的、私人的替代性专家。对于他们，风险不是风险，而是值得同情的苦难，因尖叫而变得青紫的孩子。他们为之奋斗的是那些孩子。在一个每个人只担负他自己很小的责任的高度职业化的体系中，没有人会为之负责的现代化风险，现在拥有了它的宣扬者。父母们开始去收集资料和证据。那些对于专家来说仍旧是"不可见的"和"未证明的"现代化风险的"空白点"，在父母们的认知方法下很快变得明确了。比如他们发现，德国订立的可接受的污染值是太高了。虽然研究表明，儿童甚至短时间接触浓度为每立方米空气200微克的二氧化硫就会（令人惊讶地）患假性哮吼，但德国现行的规定值是这个值的两倍。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可接受的值的四倍。父母们证明，测量结果总是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是因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居民的峰值经过靠近森林的居民的值平均后，被抵消了。"但我们的孩子，"他们说，"在平均值
61 上并不会患病。"

被揭露的科学家的"欺骗技巧"，表明了在处置风险上科学

的和社会的理性之间的范畴差异。

对风险的因果性否认

一开始是各种各样的苦难。人们发现自己处在同一道篱墙的两边。如果科学家出了错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形就是他声誉上有了污点(如果“错误”是有权势的人所需要的，那甚至会为他博得提升)。在受害的一方，同样的事情表现为十分不同的形式。这里，在决定可接受的值上的错误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肝脏损伤或患癌症的危险。相应地，两者测量错误之错误程度的紧迫性、时间范围和标准也是不同的。

科学家坚持他们工作的“质量”，把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标准保持在很高的位置，以保障他们在职业和物质上的成功。就在这一事实上，他们对风险的处置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非逻辑(non logic)。坚持说因果关联还没有确立，这对科学家来说可能不错，一般来说也值得称道。当处置风险的时候，受害者的情形是正相反的；这种做法使风险增加。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要规避的风险，风险即使是很微小的可能性也具有其威胁性后果。如果对风险的认识基于“不明确的”信息状况而被否认了，这就意味着必然的反作用被忽略了而危险在增加。参照科学精确性的标准，可能被判定为风险的范围被减到最小，结果科学的特许暗中在允许风险的增加。坦率地说：坚持科学分析的纯洁性导致对空气、食物、水体、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的污染，我们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在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共谋。

这不再仅仅是一般的和抽象的联系，而且存在为它服务的科学和方法论工具。这里存在着一种包含在现代化风险中的因果关系假设——这种假设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被理论上的

根据所证明(概括的讨论,请看 Stegmuller,1970)—所假定的重要特征。我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因果检验的有效性尺度进行的认识过程的可控制性。这些尺度定得越高,被认识的风险的范围就越小,而未认识的风险的积累就越多。当然同样正确的是,在风险面前的认识之墙只会越高。那么,对抬高的有效性标准的坚持就是一种高度有效和完全合法的建构,这意味着要去阻挡和疏通风险的洪流,但要使用一个使风险与对风险的成功"漠62 视"(derecognition)成反比例增长的内置屏幕。

在这些情形下,因果证明的自由化将会如崩塌的水坝,并且这意味着那些需要被认识的风险和破坏的洪流将通过其广泛的影响而动摇整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所以,在与科学和法律的美妙和谐中,我们继续采用所谓的污染者补偿原则作为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方法 我们知道,因为其自身结构,现代化风险一般不能依照这种原则正确地得到解释。通常并不存在单一的污染者,面那是从很多烟囱里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并且这些污染物是与无法确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疾病通常有很多"原因"。在这些情形下,任何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证明的人,都是对工业造成的文明污染和疾病的最大程度无视和最小程度承认、以"纯粹"科学的天真,风险研究者保卫着"证明因果关系的高超技艺",进而阻碍了人们的抗议,以缺少因果关联为由将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他们似乎降低了工业费用,把政客挡在了墙的后面,而实际上他们打开了防洪闸门,使生活受到普遍的威胁。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说明同样的思想和行动是通过财富生产还是风险生产的参照系进行观察,决定了其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验证,是科学理性的核心内容。保持精确而对自己和他人"不承诺任何东西"是

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同时,这些原则来自于别的语境,甚至可能来自于一个不同的知识时期。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对于文明风险在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当污染泄露只能在国际交换模式及相应的平衡中理解和测量的时候,将单个物质的单个生产者与确定的疾病建立直接的和因果的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些疾病可能还有其他的影响和促进因素。这就相当于仅仅用五个手指去计算电脑的数学潜力。任何坚持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人都否认这种现实联系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科学家不能确定单一破坏的任何单一的原因,空气和食物的污染程度并没有降低,因化学烟雾造成的呼吸道肿瘤以及死亡率——它在每立方米300微克的二氧化硫浓度下显著地提高了——并没有降低。

在其他国家,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使用了与此颇为不同的标准。当然,它们常常仅仅是通过社会冲突而确立的。在全球文明风险交织的视角下,日本的法官已然决定他们不再能够以有害于受害者并最终反对所有人的方式来解释严格因果验证的不可能性——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在统计上相关,因果关联就可以在污染程度和某些疾病间确立起来。那些排放污染物的工厂就会在法律上负责并被宣判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在日本,很多公司在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环保诉讼中,被迫担负对受害群体的大量赔付。对德国的受害者来说,对他们遭受的伤害与疾病的因果否认肯定像是彻底的嘲讽。因为他们收集和提出的证据被否认了,所以他们在总是以漠然的和陌生人的态度面对它们自己生产的风险和危险的科学理性和实践中,体验到一种现实的丧失(loss of reality)。 63

虚伪的欺骗:可接受水平

在风险科学家的控制下还存在其他的"认知上有害的防洪

闸门"(cognitive toxic floodgate)。他们确实支配着巨大超凡魔力:abracadabra! shimsalabim! 在某些地方这被尊为"酸雨之舞"——以浅显的话说,可接受水平判定和最大浓度的规定,都是对一无所知的表达。但因为那从未发生在科学家身上,他们对之便有很多的说辞、方法和比喻。最主要的表达"我也不知道'的说法就是"可接受的水平"。让我们来详细分析这个说法。

与风险分配相关,"允许的"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污染和毒物的痕量的可接受水平,有一种和财富分配的效率原则类似的意义:它们允许毒物的排放,并且仅仅在那个限定的程度上视其为合法。任何限制污染的人也同时赞同污染。任何仍旧有可能发生的事物,不管它可能的危害有多大,通过社会的界定都可以是"无害的"。可接受值也许确实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但它们同时允许对自然和人类的一点点毒害。这"一点点"到底会是多大,在这里是关键的问题。是否植物、动物和人能承受或大或小的一点点毒物,一点点有多大,"承受"在这一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从发达文明的毒素和抗毒素工厂——它们对判定可接受水平至关重要——中产生的轻松而恐怖的问题。

我们并不想去关心数值甚至可接受的值(极限值)从前是伦理的而不是化学的问题这样的事实。因此我们处理的是"对食物和烟草产品中农药及其他化学产品和杀虫剂的最大含量的判定",这是引用带有一种发达工业文明的残余生物学伦理的蹩脚官方语言。然而,这仍旧是特别消极的。它表达的是原先不证自明的原则:人不应该相互毒害。更精确地说,应该是:不能完全地毒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允许了显著的和富于争议的那一点点。那么,这一判定的主旨不是污染的预防,而是污染的许可程度。污染被允许已不再是一个基于这个判定的问题。可接受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是以污染和有毒物质供养自己的文明

64

的撤退路线。实际上更明确的反毒害的要求被作为乌托邦而遭到拒斥。与此同时，一点点被允许的毒害成为了常规。它在可接受的值背后消失了。可接受的值使一种集体标准化的毒害的永恒定量成为可能。它们同时通过宣称发生的毒害是无害的而造成了它们不允许发生的毒害。如果你坚持可接受的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就没有毒害任何人或任何生物——不管实际上你所生产的食物中含有多少毒素。这表明毒素等的生产不仅仅是某一个产业的问题，而且是确定可接受的值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跨越了制度和体系界限，跨越了政治的、部门的和产业的界限的合作生产的问题。

如果人们能够同意完全无毒害这个并非完全荒谬的前提，那么这里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这里也不会再有对最大浓度判定的需要。因而问题就在于容许，在于道德的双重标准，在于最大浓度判定的是或否上。这里人们不再去关心伦理的问题，而是关心社会生活最低限度的规则——不相互毒害——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违反。它最终归结为这样的问题：毒害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不被称作毒害，什么时候它开始被称作毒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以至于要完全留给毒物专家去解答。地球上的生命依赖于它，而且不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你只要踏上了"允许的毒性作用"的光滑斜坡，那个多少毒性是"允许的"这个问题就获得了这样的重要性，好像哈姆雷特带着一点点悲怅所归结出的那个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隐藏在最大浓度判定——这个时代的特殊记录——之中。对此不在这里讨论。我们想转而讨论对可接受的值确定自身的基础，并探究它的逻辑和非逻辑，这就是说，我们将探询它是否可能知道它声称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完全允许毒性存在，那么就需要一个可接受水平的

判定。但这样的话，那些不包含在其中的东西就变得比包含在其中的东西更重要。因为那些没有包含在其中的、不属于其范围的东西，是不被看做有毒的，能够自由地没有任何约束地被引入循环圈之中。可接受水平裁定的沉默，它的"空白点"，是它最危险的陈述。它不予讨论的是威胁我们最甚的。伴随着最大浓度判定，农药的界定以及什么东西作为"非农药毒素"而排除在外的问题，成为通向对自然和人类长期和永久毒害的道路上的第一个岔道。定义的斗争，不管它看起来如何只发生在学术圈

65 内，都对每一个人有着或多或少的毒害后果。

任何因为还没有获得充分鉴定或者因为太复杂而不适合概念归类的现象，任何不能保持在概念规划界限之内的事物——所有这些都被归类的定义要求所掩盖，维持着不被注意的状况而免除了有毒性的怀疑。那么，最大浓度判定就基于一个最为可疑和危险的专家统治谬误：（还）没有被认识的或者不能被认识的东西就不是有毒性的。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述就是，在有疑问的状况下，请保护毒物不受人类的危险干预。

举例来说，最大浓度判定在德国即使和其他工业国家相比，也表现出巨大的漏洞。一些毒物族类甚至没有出现在判定中，因为在法律看来它们不是农药。污染物名单拖在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后面无望地跛行。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在很多年前就告诫说，应该反对在与未知数目的化学物质的比较中过高估计已知的污染物参数，因为前者的毒性是不明确的，它的浓度是未知的，它的潜在污染效应没有被任何法规所消除。已经涉及到的有四百多万种化合物，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化合物对健康的可能影响我们所知甚少……但仅仅它们的数量……它们各种各样的应用，和其中某些物质已经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就使化学污染物逐渐成为人类健康和预期寿命的重

要决定性因素。"[1]

即使出现了对新的化合物的关注，作为惯例，相应的评估也要进行三年或者四年。总之，在这段时间内，有潜在毒性的物质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

这些沉默的真空可以进一步探究，它仍旧是可接受值的创造者如何为单一物质确定可接受值的秘密所在。主张可接受的值与人和自然对化学物质的承受能力有关，这不是完全荒谬的想法。后者是所有空气、水、土壤、食物和用具中各种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收容所。任何确定承受阈值的人必然要考虑这种累积作用。然而，那些为单个毒性物质设定可接受水平的人，要么是从人们只是摄入特别的毒素这个完全错误的假设出发，要么他们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完全错过了谈论人的可接受值的机会。进入循环圈的污染物越多，与单一物质相关的可接受值就越多，这样的情况越真实，整个把戏的手法就变得越加愚蠢，因为对人类的全部毒害威胁增加了——我们只需要假设一个简单的等式：各种各样的毒性物质之和等于更高的整体毒性水平。 66

你同样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论证单个毒性物质的协同作用。如果我不知道这些复杂的毒性物质的协同作用产生的影响，我怎么能知道这种或那种毒性物质在这种或那种浓度下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从内科学的领域我们已经知道，药物可以减弱或加强各自的药效。可接受水平所许可的无数局部影响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样的推测并不完全是误导。判定同样没有对这个核心问题给予解答。

这里出现的两个逻辑漏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当你转

① *Environment Quality 1975*，CEQU的第6次报告(Washington)，326，引自耶尼克(1979:60)。

到可能的局部毒害影响这个完全错误的层面时系统地产生的问题。一方面确定可接受水平进而允许某种程度的毒害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不付出任何智力上的努力去探究在协同作用中毒素的累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即使不是玩世不恭的也是轻蔑不屑的。这使我们记起这样的情景：一伙站在他们的受害者面前的下毒者，以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情向法官确证，他们每一个人在可接受水平下都是表现良好的，因而应该被宣判无罪。

现在很多人会说，那是些很好的要求，但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是因为一些根本的原因。我们只拥有单个污染物的特殊知识。即使那些知识也是远远落在工业上化合物和化学原料的增加的后面的。我们缺乏研究人员和专家。但人们是否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呢？所提供的有关可接受水平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有一点进步。如果同时释放了千百种其他的有害物质，而这些物质的协同效应并不被提及的话，对单一污染物设定可接受水平就仍旧是一个骗局！

如果任何其他方式确实都不可能的，那不过意味着职业的过度专业化体系及其正式组织在面对工业发展促成的风险时是失败的。它也许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不适合对危险的限制。当然，人们在他们的文明风险地位上不仅受到了单个污染物的威胁，而且整体地受到了威胁。强迫人们通过单个污染物的可接受值表格去回答有关他们的整体危险的问题，就等于是对不再仅仅是潜在的危险结果的集体嘲弄。也许，可以在一个普遍信仰进步的时代犯这样的错误。但在今天，在科学的"可接受值的理性"的合法保护下，面对广泛的抗议和有关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证据还坚持错误，就远远超出了信仰危机的维度而足够诉诸公共检察官了。

但先让我们把这些考虑放在一边。让我们先看看对可接受

水平的科学建构。当然这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方式。简略地 67 说,所有的可接受值的确定都至少是基于以下两个错误的结论。

首先,是从动物实验的结果得出人类反应的错误结论。让我们选择有毒的二恶英(TCDD)来讨论,它在塞维索酿成了大祸(联邦环境办公室,1985;乌尔班,1985)。它来源于很多化学产品的生产,比如,木材防腐剂、除草剂和消毒剂。它同样在垃圾焚烧中产生,而且事实上焚化温度越低,产生的量越大。二恶英的致癌作用在两种动物身上得到了验证。它们被喂食了二恶英。但现在从文明的大毒物锅中出现了关键的方法论问题:一个人能承受多少?即使是小动物的反应也是十分不同的;豚鼠比老鼠敏感10-12倍,比仓鼠敏感3000~5000倍。狮子的结果还不清楚,大象已经被选为实验对象……

如何基于这些结论得到有关毒物的耐受性的结论,仍旧是变"可接受水平"戏法的人未公开的秘密。让我们假定谈论"那些"人是可能的。让我们把婴儿、孩子、领救济金的人、癫痫病患者、店主、孕妇、临近或者远离烟囱生活的人、阿尔卑斯山的农民和柏林人都装在一个灰色的"那些"人的大口袋里。让我们假定实验室里的老鼠和教堂里的老鼠反应是一样的。问题依旧存在,我们如何从A推论到B,从极端多样化的动物反应推论到完全未知的人的反应?而人的反应从来就不是可以从动物的反应推论出来的。

简要地说,只有遵循抽彩模式:抽一个数码然后等待。像抽彩一样,人们有自己的方法。在可接受水平上,抽彩是安全因素。什么是安全因素?我们是通过"实践"得知它们是什么的("最大值",《自然》1985,第4期:46—51)。所以人们能做的就是抽一个数码,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去等待。但人们可以马上做这些。为了这个目的,本来是没有折磨动物的必要的。重申一

次：从动物实验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那只是给在人为的条件下非常局限的问题提供的解答，并且常常表现出极端多样化的反应——只有超人才可以知道某种毒素对于“人”的“可接受的”剂量。可接受水平的设定者是预言家，他们有“三只眼”的本事，他们是使用实验序列和系数做道具的晚近工业化学的魔术师。不管看起来是如何用心良善，整个事情仍旧是表明“我们也不知道”的一种非常复杂冗赘的和刻意使用数字的方式。姑且等待。实践会告诉我们。由此，我们触及了第三个要点。

可接受的水平当然满足了象征性的去除毒害的功能。针对越来越多的有关毒物的报道，它们是一种象征性的定心丸。它们标示着某些人正在努力并关注着。实际上，它们起到了提高一点人类实验阈限的作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当物质进入循环圈，我们才可以发现它的影响是什么。而这恰恰是第三个错误结论之所在，它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是一桩丑闻。

对人的影响最终只能以人来进行可靠的研究。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再一次，我们发现没有讨论伦理问题的必要，而我们完全将自身局限在实验逻辑之中。化学物质以所有可以想像的方式在人群中散布：空气、水、食物链、产品链等。那会怎么样呢？错误的结论何在呢？不过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人身上进行的实验并没有发生。更确切地说，这像研究动物那样，通过把小剂量的化学物质施用于人们来进行。它没有发生，是在对人们的反应没有系统的测量和记录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验动物的行为模式对人没有有效性，但它们被十分认真地记录并建立关联。为了慎重起见，人自身的反应是不被注意的，除非有人记录并证明确实是这一毒素伤害了他。对人的实验确实进行了，但不可见，没有科学的核实，没有测量。没有统计，没有相关的

68

分析，所有一切都发生在受害者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并且他们即使去探究什么，也是以一种颠倒的举证责任进行的。

并不是我们不能知道定量的毒物是如何单个地或整体地影响人的。我们并不想知道这些。人们被假定自己会去发现这些。一个永久的实验正在进行，可以说，在其中作为实验室动物的处于自助活动中的人，不得不依靠那些坐在那里紧皱眉头的专家收集和记录有关自身中毒症状的资料。即使是已经发表的有关疾病和森林退化的数据，对于可接受水平的魔术师很明显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那么，我们关心的就是一种永久的大规模的实验，它以一种颠倒的和抬高了的举证责任来要求无意识的人类主体报告在他们当中积累起来的毒性征兆。无需留意他们的论证，因为毕竟存在着合适的可接受水平。那些实际上只能从人类的反应中确定的水平，被我们坚持着以便否认受害者的恐惧和病患！而所有这些都是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下进行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变"可接受水平"戏法的人不知道。承认"也不知道"会让人舒服一点。他们不知道，还装做知道，即使在他们原本早就应该知道得更多的地方，他们还继续坚持拥有不可能有的"知识"，这些才是恼人的和危险的事情。

69

断裂的科学理性

高度工业化文明中风险意识的起源，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确实不是光荣的一页。它依靠科学否认的持续掩护而形成，并且仍旧受其压制。到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情另一方。科学已经成为对人和自然的全球污染的保护者。在这方面，不夸张地说，在很多领域中科学处置风险的方式，在没有进一步去关注它们的理性历史声誉之前，都是在挥霍这种声誉。"直到进一

步的关注”，就是说，直到科学家意识到它们处置风险的错误和缺陷在制度上和理论上的来源，以及直到他们自我批判并在实践中学会接受由此而来的结果。

生产力的增长是和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趋势上，风险呈现了一种蚕食关系。它们使实质上和时空上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和危险的关联。它们从过度专业化的筛子中漏下来。它们是存在于专业化之间的东西。对风险的处置促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横跨并超越了所有精心设立并加以维护的边界的协作。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在此方面，亚系统和功能领域的去分化，专家的重新网络化和降低风险的工作统一化，成为系统理论和组织的主要问题。

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风险生产内在地侵蚀着科学理性目标所指的生产力理想。

> 抨击征兆、关心事实的传统环境政策，最后既不能满足生态的标准也不能满足经济的标准。在生态上，它总是落后于破坏环境的先行生产过程；在经济上，问题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清理费用与不断下降的生态上的获益的对比。这种双重无效率的原因何在呢？
>
> 一个主要的原因肯定在于这样的事实：传统的环境政策是在生产过程的结尾而不是开端——也就是对技术、场所、原材料、成分、燃料或要生产的产品的选择——开始的……这是采用管末治理(end-of-the-pipe)来对环境破坏

> 进行事后清理。以业已存在的破坏环境的技术为出发点，我们假定积累下来的污染物和废物的扩散要降低到某一程度。通过在生产过程的结尾采用消除污染的技术，潜在的污染扩散被限制在工厂里，以浓缩的形式收集起来。典型的例子是在污染进入外界空气之前捕获它们的过滤装置，如消除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的滤气器，还有垃圾和废水处理厂，以及针对现在颇受争议的汽车尾气的催化转化技术……
>
>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环境保护领域，清理费用（限制和收集污染物的费用）的增加同清理水平的上升是不成比例的，这也适用于作为一种生产手段的回收技术。而从作为整体的经济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资源的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必须转而去保证一种指定水平的排放量，这样的资源就不再是为消费目的所用了。这里存在一种反生产力的工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的危险。(Leipert and Simonis, 1985)

越来越明显的是，工程科学面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们可以继续以过时的19世纪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这样它们将混淆风险社会的问题和早先工业社会的问题。或者它们直面真正的、预防性的风险管理的挑战。这样它们必须重新思考并改变它们自己对理性、知识和实践的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得以应用的制度结构。（有关这个问题请参见第七章。）

公共风险意识：二手的非经验

在对科学的文化批判中，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人们最终要求助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即科学理性。很快人们会遇上这样的

规律，只要风险没有获得科学的认识，它们就不存在——至少在法律上、医学上、技术上或科学上不存在，因而它们不需要预防、处置和补偿 再多的集体呻吟也不能改变这些，只有科学可以 因而科学判断对真理的垄断迫使受害者自己去运用所有科学分析的方法和手段达到他们的要求。但受害者们同样也被迫马上修正这样的分析，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理性的解神秘化，因而拥有了一种对工业主义的批判者来说十分暧昧的意义。

一方面，科学知识之要求的柔和化，在为它们自己的观点获得空间时是必须的 它们开始知道改变科学论争的道岔所必须的杠杆，这样有时候火车头就转向琐碎化，有时候转向严肃地对待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判断的不可靠性的增长，未被认识的可疑的风险的灰色区域也在增加。如果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准确地确定因果联系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科学只是被搁置的一个受到掩盖的错误，如果"怎么都行"，那么，从哪里得到那些只相信某些风险的权利呢？就是这一科学权威的危机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关于风险的困惑。对科学的批判也是不利于对风险的认识的。

71

相应地，常常表现在环境保护运动和对工业、专家和文化的批判中的受害者的风险意识，对于科学通常既是批判又是轻信的。一种坚实的科学信仰背景是现代化批判的悖谬基础的一部分。因此，风险意识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普通人的意识，而主要是为科学所决定并且基于科学。为了完全地认识风险并使之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参照点，从原则上说，在客观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差很大的状况间不可见的因果联系，以及或多或少是推理性的预期就必须被相信：它们免除了总是要面临的反对。但那意味着不可见的——甚至在本质上超越了感知，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关联和计算的——东西，成为不受质疑的个人思考、感

知和经验的要素。可以说,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被颠倒了过来。人们不再仅仅从个人经验上升到普遍判断,而是缺乏个人经验的普遍知识成为了个人经验的主要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一个人要去抗击风险,那么化学方程式和反应、不可见的污染水平、生物循环和连锁反应必然会支配着他的所见所思。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风险意识中不是在处理"二手经验",而是在处理"二手的非经验"(second hand non experience)。进而,只要"知晓"还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知晓风险。

一个推测的时代

风险意识这一基本的理论特性有着人类学的重要意义。来自文明的威胁带来一种新的可与古代的上帝和魔鬼的国度相比的"阴影国度"(shadow kingdom),它们藏匿在可见世界的后面,并威胁着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今天,人们不再与驻留在事物中的精神相符合,而发现自身暴露于"放射性物质之中",吞食着"毒性水平",即使在梦里也因为"核屠杀"而不得安眠。拟人论的自然诠释以及环境的位置,被有着不可感知的但又普遍存在的潜在因果性的现代风险意识所代替。危险的和敌意的东西隐匿在无害的面具后面。观察所有的东西都要采用一种双重的视角,而且它们也只能通过这种双重的视角来理解和评判。可见的世界必须依照一种只存在于思想中而尚隐匿于世界中的次级的现实来加以研究、相对化和评价。评价的标准只存在于次级的而不是可见的世界里。 72

那些只是使用事物,将它们看作所显现的样子,只是呼吸和吞咽,而没有探究其背后的毒性状况的人,不仅仅是幼稚的,而且误解了威胁着他们的危险,进而毫无保护地将自身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之下。放纵、直接的享受、简单的得过且过都破产了。

在所有的地方,污染和毒素都如中世纪的魔鬼一样狞笑并玩弄着它们的把戏。人们无可逃避地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呼吸、进食、居住、穿衣,所有的事情都为它们所贯穿。出去旅游最终还不如吃粗粮有所补益。危险也等待在旅游的目的地并且潜伏在谷物里 就像与兔子赛跑的乌龟,危险一直在那里。它们的不可见并不证明它们不存在;相反,因为它们事实上发生在不可见的领域中,这就给了它们可疑的危害以无限的空间。

伴随着批判性的文化风险意识,在几乎所有日常生存的领域中,一种由理论决定的现实意识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像伏魔师的凝视,被污染折磨的当代人的凝视指向不可见的东西。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的推测时代的黎明。人们总是就相互矛盾的对现实的诠释而争论着。在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发展中,现实越来越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诠释。

不过在今天也有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发生。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可见的世界仅仅成为一个阴影,一个在本质上脱离了我们的感知的现实的反映。因而,可见世界在整体上贬值了,但它仍然是一个参照点。类似的论断也适用于康德的在本质上超越了我们的知识的"物自体"概念。这是针对"天真的实在论"的,它将个体的感知复制为"世界自身"。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世界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即使它只是为我而存在的,我手中的苹果同样是红的、圆的、有毒的和多汁的……

直到进入文化风险意识,日常思想和想像才改变了它在可见世界里的位置。在与现代化风险的斗争中,我们不再关心呈现给我们感知的事物的特定价值。就其现实性程度来说,争论主题变成了那些日常意识不可见、不能感觉的东西:放射性物质、污染物以及未来的威胁。因为这种与缺乏个体经验的理论

的联系，有关风险的争论总是在刀刃上左右摇摆，有着通过科学（或反科学）的分析而变成一种现代降神会的危险。

精神的角色将被不可见但普遍存在的污染和毒素所代替。所有的人对于特定的次级毒素都有其个人的敌意联系，拥有自己的逃避仪式、咒语、直觉、怀疑和确信。只要把不可见的东西 73 放进来，它很快就不止是决定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污染物的精神了。这都可以加以讨论，可以分立，也可以被融合。新的共同体和替代性的共同体出现了，它们的世界观、准则和确定性都围绕着不可见的威胁的中心而组织起来。

生物的团结

它们的中心是恐惧。什么样的恐惧呢？在什么意义上，恐惧具有形成群体的作用呢？它又是源于什么样的世界观呢？在逐渐意识到风险的过程中，有时候被宣扬有时候被违反的情感和道德、理性和责任，不再能够像在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中那样，通过市场中相互纠结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这里所表达的不是基于竞争的个体利益——它们坚信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达到所有人的共同福利。这种恐惧和它的政治表现形式不是基于功利的判断。同样可能的是，由于太轻易太匆忙以至于不能看到在其中有一种自有其根据的对于理性的理性兴趣，这一次是在生活的自然和人类基础的语境中直接得到再表达的。

在环境保护与和平运动中，同样也在工业体系的生态学批判中广泛表达的普遍化的受害意识里，很可能谈到其他层面的经验。在森林被毁、动物灭绝的地方，人们也在某种意义上感觉到自身受到了伤害。在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对生命的威胁，触及了将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需求连接在一起的有机生命的共同经验。在森林退化中，人们体验着作为"有道德诉求的自然物"，作

为事物中可运动的事物，作为被威胁的自然整体的天然组成部分，对这些，他们是承担着责任的。一种对自然的人类意识的各个层面被伤害和唤醒了，这削弱了肉体与精神或者自然与人类的二分法。在威胁中，人们拥有这样的体验：他们像植物一样呼吸，像生活在水里的鱼一样依赖水生活。毒害的威胁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参与进事物中——“一个有意识有道德的新陈代谢过程”，因而，会像酸雨中的石头和树木一样被腐蚀掉。一个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共同体变得清晰可见了，这是一种在危险中同等影响到每一人每一事物的一种生物的团结
74 (Schutz,1984)

“替罪羊社会”

危险的受害者不一定产生一种对风险的知觉；相反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对恐惧的否认。财富和风险的分配在这种压制受害者的可能性中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饥饿不能通过否认来满足。另一方面，危险总是可以被解释得不存在（只要它们还没有发生）。在物质需要的经验中，实际的折磨和主观体验或痛苦是不可分离的。风险就不是这样。正相反，准确地说，风险的特征是折磨会导致意识的缺乏。危险程度的增长，伴随着对其进行否认和轻描淡写的可能性的增长。

对此，我们总是有理由的。风险终究是源于知识和规范的，进而它们可以在知识和规范中被放大和缩小，或者简单地从意识的屏幕上被移除。消除风险或解释掉风险，对于风险意识就是食物对于饥饿所意味的东西。后者的重要性增长到这样的程度：前者（在个体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意识到风险的过程总是可逆的。不安的时代和世代之后可能是其他的时代和世代，对于它们，被诠释降伏的风险成为思考和行动的基本要素。这里，

危险被拘押在他们总是不稳定的"非经验"的认知牢笼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后继世代拥有了与那些如此搅扰着"老一代"的东西开玩笑的权利。有着无法想像的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威胁并没有被改变。对它的感知剧烈地摇摆着。几十年来的说法是："与炸弹一起生活。"屡次三番地，它使成百万的人走上街头。激情与平静可能有着同样的原因：人们无论如何要与其生活在一起的无法想像的危险。

对风险来说，通过解释来转移被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比起饥饿和贫困来说是要容易得多 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不用在这里克服，而可以转移到另外某个方向去寻求并找到象征性的地方、人和东西来克服恐惧。那么，在风险意识中就尤其可能出现并且需要被错置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被错置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准确地说，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种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可见的财富不总是面对着不可见的风险吗？整个事情难道不是一个理知的幻想，一个从神经质的女人和助长风险的人那里传来的谣言吗？最终隐藏在后面的难道不是间谍、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土耳其人或者从第三世界来的要求避难的人吗？正是威胁的无形性和人们面对威胁增长时的无助在助长激烈的和狂热的反应和政治趋势，使社会的因循守旧观念及其受害群体成为直接行动无法触及的不可见威胁的"避雷针"。 75

应付不安全感：一种必要的资格

在旧的工业社会中生存，与物质贫困的斗争和规避社会萧条的能力是必要的。这是以"阶级团结"为集体目标和以教育行为和职业安排为个体目标的行动和思考的焦点。在风险社会

中，另外的能力变得极为重要。在这里，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涯中和政治上处置危险的能力，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在害怕失去社会地位、阶级意识和向上流动的取向——这是我们多少学会去处理的事情——的地方，其他的核心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处理归因于危险的结果以及存在于其中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如果我们不能克服恐惧的原因，我们如何能够处置这恐惧？如果不是故意地忘却，不是为恐惧所窒息，我们如何能够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而不仅仅是在火山冒出的蒸气上？ 76

在家庭、婚姻、性别角色和阶级意识以及与这些相联系的政党和制度中，传统的和制度化的应付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方式失去了意义。这同样要求个体去处置恐惧和焦虑。或迟或早，在教育、医疗和政治中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必定要从这些不断增长的依靠自己去应付不安全感的压力中产生出来（有关内容参见第二部分）。因而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成为必要的文化资格，而对这种它所要求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了教育制度的核心任务。

被承认的现代化风险的政治动力

如有毒的鸡蛋、酒、牛排、蘑菇以及核工厂和化工厂的爆炸所表明的，在现代化风险成功地通过了社会认知（承认）的程序的地方，世界的秩序改变了——即使最开始很少有行动。专业化责任的限制失效了。意在忽略危险的建构崩溃了。在技术细节上，公众得到了发言权。在安逸的资本主义舆论中，因为给国库和对就业机会所带来的好处而长期被放纵的商业，突然间发觉自己坐在了证人席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戴着手铐，面对着那些原先用来控诉被当场抓获的下毒者的问题

是否只局限于这些呢？实际上，市场崩溃了，费用要支付了，禁令和审判迫在眉睫，出现了要彻底更新技术生产体系的压力，以及这样的情况：选民流失，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人们在其同类中感到孤立——在技术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细节上——每一个人突然间都想插话了，但最终不是以可比较的规 76 则，而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来发言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细节被以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点来加以研究。任何致力于反污染的人，必须从"生态一道德"的观点去详细审视工业的运行。在这之前，他们必须给予那些控制运行，或更精确地说，那些被假定控制运行的人以同样的详细审视。然后是那些从系统地发生的错误中得益的人。

在哪里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并且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卷入进来，不仅仅有知识，而且有集体的对风险的知识和信仰，以及对原因和结果的关联链的政治阐述——在哪里风险就发展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它们丧失了所有的东西，它们的潜在性，它们的安抚性的"副作用结构"，它们的不可逃避性。突然间，问题就直截了当地出现了，无条件地作为纯粹的、爆炸性的对行动的挑战。人们从条件和客观约束的后面出现。原因成为原因制造者和主题陈述。"副作用"大声发言，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拒绝再被转移。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世界已经变化了。这些是反思性政治化产生风险意识和冲突的动力。这并不自动地有助于反抗危险，但它开启了原来封闭的行动区域和机会。它产生了工业秩序的突发熔点，在那里，不可想像的和不可完成的事情在短期内变成了可能性。

在这里开始发生的事情，当然被假设是通过对承认的抵制来加以阻止的。这再一次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在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过程中，什么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至

少不仅仅是健康后果，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影响，而是这些副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副作用：市场崩溃、资本贬值、政治压力、对工厂决策的检查、对赔偿要求的承认、巨大的耗费、法律诉讼以及丢失颜面。

生态和健康的后果可以如他们所愿而成为假设的、被证明的、最小化的或者剧烈的。在哪里它们被相信，在哪里它们便拥有上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后果。以广为人知的社会学语言来说就是：如果人们将风险经验为真实的，作为结果，风险就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真实的，它们就完全混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无）责任结构。因而，一种政治爆炸力随着对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而积累起来。在昨天还可能的事情，今天却突然面临着限制。任何还要淡化化工厂的排放和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可能的军事技术扩散的人，明显地是要77 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可接受的接触量"变成"不可容忍的危险源泉"。在不久的过去还超出人类干预可能性的东西，现在成为政治影响领域的一部分。可接受水平和政策决定不可及的变量的相对性变得显明了。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必然的和可能的、给定的和可变的东西的核实和平衡被重新加以确定了。实质的"技术—经济"内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与军用产品的区别——被重塑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变量。

在这里，我们不再仅仅关心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内容——通过经济政策控制市场、收入的再分配、社会保障措施——而是关心非政治的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危险原因的行为本身成为政治性的。属于工业管理自主性领域的问题，如生产计划的细节、生产过程、能源的类型和废物的清理，不再仅仅是工厂管理的问题。它们继而成为政府决策的烫手山芋，这些在选民的观念中甚至可以与失业问题相提并论。当威胁增加，旧有的

优先性消失了，与之相应的是紧急状况干预主义政策在增加，它从危险状况中获得膨胀的权威和干预的可能性。哪里危险成为了常态，便预定了永久性的制度形式。在那种意义上，现代化风险为局部的权力再分配预备了空间——部分地保持旧形式的责任，部分地明确改变它们。

在商业、政治和公众间关系中的（无）责任的惯常结构不断被撼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的增加越被强调，在其中遭到威胁的公众的核心价值越明显，它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就越明确。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在危险的影响下，责任将获得再界定，权威行使集中化，现代化进程所有的细节都为科层制的控制和规划所包裹。在实际状况中，伴随着对现代化风险的承认和它们包含的危险的增加，系统自身的某些变化发生了。当然，作为每个人的意识变化的结果，作为没有主体、没有精英交换而同时维持着旧秩序的巨变，这不是以公开的而是以沉默的革命形式发生的。

在文明不受约束的发展中，准革命的状况事实上是可归因的。它们作为一种现代化引致的文明命运而形成。因此，一方面它们拥有常规性的伪装，另一方面拥有大灾难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获得并超出革命的政治意义。因而，风险社会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而是灾难性的社会。在这一点上，紧急状态有变成常规状态的危险。 78

我们从这个世纪的德国历史很清楚地知道，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灾难不会对民主制有所助益。不断积累的爆炸力已经是如何的隐晦和惊骇，在"环境专家"的报告里这已经记录得十分清楚了，尽管专家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1985）。那里所描绘的有关植物、动物和人的环境危险的紧急状况，以一种典型的21世纪之初的忏悔的生态道德使那些专家合法化。它产生了一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充满"控制"、"官方认可"

和"官方监督"这样的词句的语言。比较典型的是,在那里根据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分级,需要广泛的干预、规划和控制的可能性和权利(45)。其中讨论了对"农业的监督和信息系统的扩张"(45)。他们夸大了"以生物为主题的研究"和"对某一区域的保护规划"对"全面的土地规划"的挑战,这基于"与相竞争的使用要求对抗"的"延伸至单块土地的精确科学研究"(48及以下)。为了完成它的"恢复自然化"的计划(51),这个委员会建议"将最重要的区域从其所有者的耕作旨趣下完全转移出来"(49)。农民将"被放弃某些使用权利或者采取所要求的某些保护措施而得到的补偿激发起来"(49)。他们讨论了"官方的施肥许可"、"在法律上对施肥的类型、浓度以及施用时间的实质规定"(53)。这"有计划的施肥"(59)像其他保护措施一样,要求一种依据国家、地区和个人操作而设置的分化的"环境监测"系统(61),并且将"要求基础法律规定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64)。简言之,科学的和科层制的极权主义的全景正在被展现出来。

几个世纪以来,农民总是被看作从土地获得"成果"的"小农"(peasantry)——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存都依赖于此——但这一意象正在开始转向它的反面。在这一新的视角下,农业成为威胁动物、植物和人的生命的毒物的分配点(distribution point)。为了在当前获得的高水平农业生产力的情况下规避危险,人们要求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加以征用(expropriation)和(或)规划与控制,所有这些都要在科学和科层制的庇护下。在这里,不仅仅是这些要求(甚或它们实际被提出的方式)是令人不安的因素。相反,它们是危险预防逻辑的一部分,并且考虑到迫近的危险,我们不太容易指出实际上在预防那些在危险的独裁之下必须加以预防的东西的政治替代物。

79 伴随着危险的增长,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

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这种极权拥有预防最坏情况的权利,但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方式产生了某些更坏的情况。文明的"副作用"在政治上的"副作用"威胁着民主政治体制的持续存在。这一体制陷于难堪的困境:或者在面对系统产生的危险的时候失败,或者通过极权和压迫性的"支持力量"的增加去怀疑根本的民主原则。在已经明显的风险生活的未来,突破这两难选择是民主制的中心任务之一。

展望:20 世纪结束时的自然与社会

伴随着工业造成的生活的生态和自然基础的退化,一种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因而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动力开始发生作用,它同样推动了对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这一观点需要某些理论的解释。最后,在这里提出几个要点,它们对于到一个实验性的社会中去冒险是必要的。

前面的讨论概括起来说就是:自然与社会间对立的结束。这意味着,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19 世纪的社会理论(以及其 20 世纪的修订版)把自然作为某些给定的、可归因的、要去征服的东西加以理解,并因此总是将自然作为与我们对立的、陌生的、非社会的东西加以理解。可以说,这些推定已经被工业化过程自身历史地证伪了。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可归因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产物,文明世界的内部陈设,在其再生产的自然状况下被破坏和威胁着。但这意味着成为工业生产循环一部分的自然的破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的破坏,而是变成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见的自然的社会化之副作用是对自然的破坏和威胁的社会化,以及它们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和冲突的转化。对生活的

自然状况的侵犯成为对人的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威胁——这伴随着完全新型的对高度工业化的全球化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挑战。

正是文化对自然的威胁向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秩序的威胁这一转变，是一种再次证明了风险社会概念的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古典工业社会的概念基于(19世纪意义上的)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工业)风险社会的概念则从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的观点出发，而对自然的伤害的变形要通过社会子系统来予以描述。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的次级自然的状况下，“伤害”的意义依据的是科学的、反科学的和社会的界定。在这里，这一争论通过把现代化风险的起源和觉知作为指引而得到了追述。那意味着“现代化风险”是我们在其中对文明固有的对自然的伤害和破坏进行社会性把握的概念安排和范畴设置。在这一冲突的场景中，决策依照风险的合法性和紧迫性作出，而风险将如何被压制或处置的方式也被决定了。现代化风险是科学化的“次级道德”，在其中，以一种社会上“合法的”方式就被工业耗尽的超自然(ex-nature)的伤害来进行协商，也就是说，以一种声称是有效补救的方式。

主要的后果是，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社会及其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家庭子系统不再被理解为与自然相分离的部分。环境问题不再是我们周围的问题，而是——在它们的起源和它们的所有影响上——彻底的社会问题、人的问题：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与世界和现实的关系，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文化世界通过工业转化的“驯服自然”必须直接地理解为典型的非环境和内部环境，我们着重培养的使自己疏远和逃避的可能性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失败了。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任何继续将自然说成

非社会的人,就是在说一些不再能够把握我们的现实的另一个世纪的术语。

本质上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是一种处处可见的高度综合的产物,一种人造的"自然"。如果"自然的"意味着自行其是的自然,那么它的一分一毫都不再是"自然的"。即便科学家也没有面对"自然"的产物,他们以职业的科学耐心运用一种纯粹的科学方式来研究它们。在他们的行动和知识中,他们是掌控自然的普遍化社会要求的执行者。当他们独自或在某一学科的实验室里专心于他们的素材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注目着他们。当他们移动他们的手臂,那就是制度的手臂,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手臂。在这里,被当作"自然"的东西是被带入文化过程之中的内在"次级自然",从而担负和过分担负了不是很"自然的"系统功能和意义。在这些情况下,无论科学家做什么——测量、询问、假设或者核实——他们都增进或损害了健康、经济利益、财产权利、责任或司法。换言之,因为那是一个在系统中循环和被利用的自然,所以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客观的手里,自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以极端的客观性在数字的语言沙漠中进行的,以单单一个评价的词语甚或最小的标准惊叹号表达的测量结果——可能曾经是老马克斯·韦伯纯粹的乐事——可能包含了一种从未被最具启示力的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或伦理学家所涉及的政治爆炸力。 81

因为他们的对象以这样的方式"被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法领域中。他们注意到这一点并在他们的工作——测量程序、容忍阈限的确定、因果假设的追寻——中作出反应。从这有魔力的领域而来的引力,有时候甚至能指导他们书写的笔。他们使问题进入这样一种轨道,它必须通过一种纯粹实质的基础来加以证实。并且当在论

证中作出某些决定时，它们还可能构成使事业前景亮起红灯的能量源。这些都不过表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学、伦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处在它们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下。（参见第七章有关内容）

因此，因为其"主题"明显的政治特性，自然科学滑入到一种一直为社会科学所熟知的工作和经验的历史境遇中。似乎一种统一的科学趋同发生了，但这趋同具有讽刺意味地来自于主题的政治化，而不是首先受到怀疑的东西，即社会科学的半科学特征对自然科学所假定的超我（super ego）所采取的态度。在未来，这将成为对所有科学的角色的主要洞见，即需要一种受到制度上加强和保护的道德和政治的支柱来指导完全恰当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将拥有有意识的去假设和设定它的政治含义的责任。以某种方式，科学工作的实质特征和政治意义可能在某一天和谐一致。这将首先意味着当政治敏感性导致的禁忌地带增加的时候，将出现一种相应增长的、通过强调知识的首要位置来无情而高效地打破它们的制度化意愿。这将清楚地显示出为了我们文明的持续存在而隐瞒风险的那些过分陈旧的制度性的、经由科学传递的惯例和仪式。

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批判必须始终与（社会学的）陈词滥调做斗争，后者认为传统的模式在现代性过程中被打破了。甚至最明显的规则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甚至最世俗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重要的。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的文化批判的锋芒从一开始就被社会科学自身磨钝了。然而只有一个糟糕的社会学家才能够用一种我们知道在合理化理性的不断胜利中达到其顶峰的进化论的乐观主义，来同现代性的阴暗面进行反复论辩。

这多少与社会学的如下证明有所不同：群体受到忽视、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经济危机一个接着一个。考虑一下组织起来的

82

竞选团体，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里蕴涵着很多爆炸性的力量。然而，这里也有一种相应的东西连接了这些和那些前面提到的思想的特征，并将它们与科学的风险报告区分开来：对价值的违背是有选择性的，并且能够被永久地制度化。这对于社会不平等同样是正确的。它对于威胁生存的现代化的后果并不适用。这些伴随着一种普遍的和平等的基本模式。它们当然有可能制度化，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不可逆转地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健康"当然同样是一种在文化上被抬高的价值，但它除此之外也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健康威胁的普遍化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和永久的对生存的威胁，它们现在正以相应的严酷性贯穿经济和政治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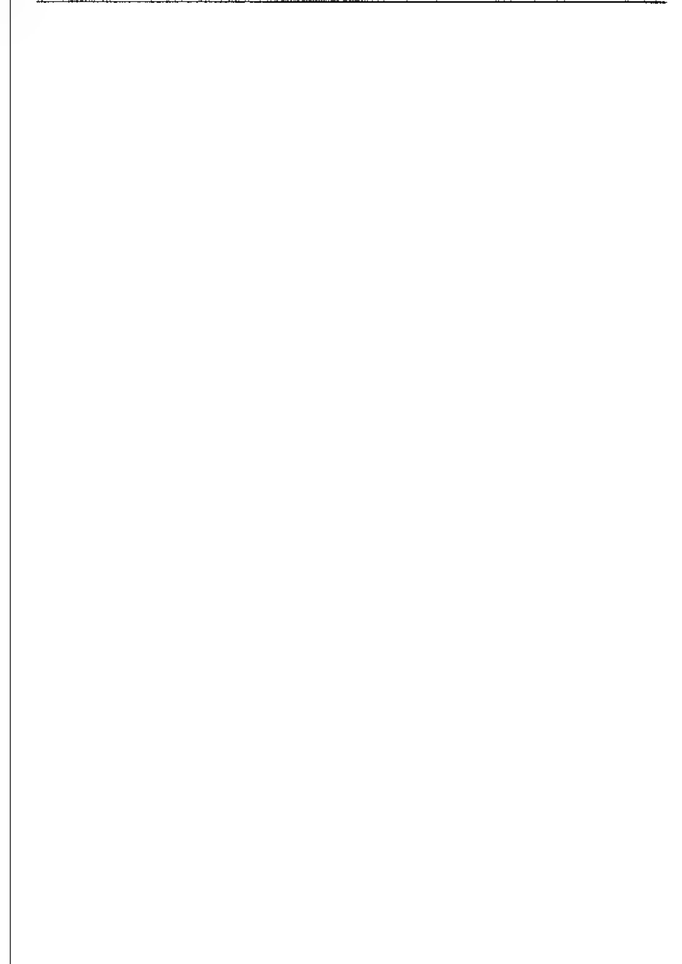
尽管有在现代性进程中洒在它们上面的泪水，但不仅仅是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人们终究能够和它们一起生活）受到威胁。至少在被侵犯的根本层次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多长的受到威胁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名单能被限制在植物和动物上。可能我们处于一个习惯化（habituation）历史进程的开端。可能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将不再被天生缺陷的图景——如现在满世界生活的满是肿瘤的鱼和鸟——所搅扰，就像我们今天不再为被违背的价值、新的贫困和持续高水平的大规模失业所搅扰。这将不是第一次标准将因为对它们的违背而消失的情况。拥有广泛基础的观点仍旧认为一切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但正相反，随着自然不断被工业化，对它的破坏将是普遍的并将如实被感知。（这是一个没有人会喜欢的事实，专业化批判对此特别不感兴趣。）

这在社会学家听来是矛盾的，不熟悉公式，却求助于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危险公式——无论它们是以科学的方法还是以什么其他方式得到证明的——将很可能会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

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前提。相反，这些前提暗含的内容可能将首先在其向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延伸中变得明显。当然那同样意味着，伴随着现代化风险的发展，社会科学家像所有人一样，依赖于被外在于他们的领域的专业人士控制的二手的非经验，而承受着对他们破碎的专业自主性理想的损害。社会科学家能够通83 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所提供的东西几乎不能与之相比。[①]

① 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请参见贝克(1988: Part Ⅱ)。

第二部分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
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



现代化风险的分配逻辑，如在前面一章所阐明的那样，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正在形成的全球的风险境遇和它们所包含的发展和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是新型的和相当可观的，但它们与社会的、身世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感相互重叠。在发达的现代性中，后者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

这第二种特征从现在开始将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两个方面——风险和不安全感的总和，它们的相互助长或者中和——共同构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总之，你可以提出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在世纪之交，不受羁束的现代化过程超出了它的坐标系。这一坐标系确立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分离的认识，确立了对科学、技术和社会阶级的文化事实的认识。它着重描述了一个人们的生活滞留其中的轴线——家庭和职业。它一方面假定了某种通过民主方式合法化的政治的分配和分离，另一方面又假定了商业、科学和技术的“亚政治”。

暧昧性：个体和发达的劳动市场

这部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评估：我们是发生在现代性中的一次社会变迁的见证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从工业社会

的社会模式——阶级、阶层、家庭、男女的性别身份——中解放出来，就像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人们从教会的世俗统治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一样。论证可以被概括为七个要点。

(1) 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性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和意识，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和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这些"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在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与此同时，不平等的关系仍旧是稳定的。这怎么可能呢？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上，人们已经被解除了阶级义务，而不得不求助于他们自己对个人劳动市场生涯的规划。

个体化的过程原先大多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以不同的形式，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职业者"、劳动市场过程的动87 力、劳动力流动、教育和改变职业等的特征。进入劳动市场消解了这些约束，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与从传统网络和劳动市场的束缚中获得的双重意义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家庭、邻里甚至朋友，以及与地方文化和风景的纽带，都与个体的流动和劳动市场所需要的流动的个人相抵触。这些个体化的激流与集体的命运(大规模失业和非熟练化)斗争着；然而，在福利国家的状况下，多少是可以归因的阶级生涯转化为依赖于行动者决定的反思性生涯。

(2) 因而就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出现了一种暧昧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家以及阶层的研究者，一切也许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收入的等级制分化以及雇佣劳动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与某一社会阶级的纽带不可思议地隐退为人们行动的背景，作为阶级文化之典型的基于身份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丧失了它的光彩。整体趋势是生存的个体化形式

和状况的出现，它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主张间——包括有关人们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或亚文化的问题——做出选择。事实上，我们也要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接受由此而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形式的变化和分化，这与隐含在大群体社会（large group society）的传统范畴当中的思想是相抵触的，后者谈论的是阶级、等级和社会阶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对立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永久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将历史经验概括进一个永恒的模式中的做法可以被表述为排中律：或者资本主义通过惟一开启的门——阶级斗争的加剧——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伴随着“激烈的革命”，从而通过后门，以变化了的所有权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而重新出现；或者阶级斗争不断地进行下去。个体化主题坚持了受到排除的中间状况，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以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来说就是，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而它却有着个体化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所有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3）这一朝向社会不平等的“无阶级性”趋势，在大规模失业上表现为一种教科书式的范例。一方面，长时间没有工作的失业者比例在上升，那些离开劳动市场或者从未进入过的人的 88
比例也在上升。另一方面，失业者数量的恒定性决不意味着已登记的个案和受影响的人的恒定性。在德国，从 1974 年到 1983 年，大概有 1250 万人，或者说每三个有薪就业的德国人至少失业了一次。同时，在已登记的和未登记的失业（主妇、青年和早退休的人）之间以及就业和不充分就业（弹性化的工作时间和雇佣方式）之间的灰色地带在不断地增长。因而，或长或短的

暂时失业的广泛分布，与一种其数量不断增长的长期失业和失业—就业杂合体同时存在。社会阶级的文化不能为此提供一种定向语境。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个体化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结果，系统的问题在政治上减轻了，并且转化成为个人的失败。在生活的解传统化模式中，一种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是新型的即时性的东西产生了，在社会危机显示出个体起源的意义上，这是危机和疾患的即时性，并且仅在间接的和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能被理解为社会的。

（4）对具有身份特征的社会阶级的"脱离"，结合着一种对性别身份的"脱离"，这首先表现在妇女变化了的状况上。最近的资料表明：不是社会地位或者缺乏教育，而是离婚成为妇女陷入"新的贫困"的原因。这表现了妇女摆脱作为配偶和主妇而受供养的程度，这是一个不再能够被核实的过程。因此个体化的旋涡在家庭内部确立：劳动市场、教育、流动性——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双重或三重的意义。家庭成为一个舞台，在上面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职业需要、教育约束、双亲责任和家庭生活的单调乏味之间转移各种抱负目标的把戏。"协商家庭"（negotiated family）形成了，在其中两个性别的个体都进入了一种或多或少受控制的感情安抚的交换过程，而这个过程总是可以取消的。

（5）甚至这些作为个体的事件发生在两性间的争端，也有着另外一个维度。从一种理论的视角看，在男女之间发生的家庭内外的事情，遵循一种普遍的模式。这些是反思性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私人参数的后果，因为工业社会秩序总是分开现代性的那些不可分开的原则——个体自由和平等——并且与生俱来地将之归诸一个性别，却对另外一个性别保留。工业社会从来不可能只是作为工业社会而存在，而总是作为半个工业社会和半个封建社会而存在，它的封建方面不是传统的遗迹，而是工

业社会的产物和基础。就这样，当工业社会胜利时，它总是推动了家庭伦理、性别命运以及与婚姻、亲子、性事有关的禁忌的消解，甚至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的重新统一。 89

(6) 这清楚地表明了当今的个体化（与在文艺复兴或早期工业时代的表面上相似的个体化相比较）的特殊性质。新的方面来自于这些后果。世袭等级的地位不再为社会阶级所占有，性别和家庭的稳定参照框架也不会代替社会阶级的位置。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社会性的所是所为与个体决定缠绕在一起。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表述就是：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家庭外，个体都变成了他们教育的和以市场为中介的生存以及相关的生活计划和组织的能动因素。生涯自身获得了一种反思性的规划。

然而，在发达的劳动市场社会中，个体状况的分化决不等同于成功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并不标示着通过个体的复兴而开始的世界的自我创造。相反，它伴随着一种朝向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解传统化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劳动市场，并因此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规的规范和支持、交通规划、产品报价、医学的可能性和方式、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建议和照顾。所有这些都指向正在确立的控制的特殊模式。

(7) 相应地，个体化被认为在历史上是与社会化过程相对立的。由此而来的生活的"个体"模式的集体性和标准化，当然很难加以把握。然而，恰恰是矛盾的爆发和对其不断增长的意识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共同性。可能出现的是，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与现代化风险和风险境况相联系而形成。可能在个体化过程中，期望会作为（在物质的、时间的和空间的形式中，在构造社会关系中）"自己的生活"的要求而被唤起，然而这是面临社会和政治阻碍的期望。以这种方式，新的社会运动一再出现。

一方面，这些运动对增长的风险和增长的风险意识、风险冲突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它们在替代选择和青年亚文化的无数变体中以社会关系、个人生活和个人自身的身体进行着实验。共同体首先产生于对私人“个人生活”的行政和工业干预所激起的反抗的形式和经验，并且在反抗这些侵犯的时候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攻击性姿态。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新的社会运动（生态学、和平、女权主义）是风险社会中的新的风险状况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们来自于在解传统化文化中对社会的和个人的认同与责任的寻求。

90

第三章 超越身份和阶级？

发达社会就是风险社会吗？在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时，我们马上面对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事实。当以社会—历史视角审察这种境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稳定性。对此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特别是在德国，在主要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尽管有技术的和经济的转变以及过去二十或三十年中为了引入变化而做的种种努力，但除去某些相对较小的变化和重新配置，还没有发生可感觉到的变化。[①]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不平等的主题几乎从日常生活、政治和学术中完全消失了。很可能是这样，在经济停滞和持续较高甚至是上升的失业状况下，它再一次成为社会上一个具有爆炸性的论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有很多不平等失去了作为一个论题的意义。在其他语境中，或者以新的冲突形式（如为了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民众反对核电站的自发行动、代际不平等，甚至地区和宗教的冲突），有关不平等的问题被不时地提出来。但如果公众的和政治的讨论被当做实际发展状况的一种准确指示，就很容易得出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我

① 这一章的文本与德文版的第三章并不一样；它基于贝克 1983 年和 1984 年的著作。它首先出现在梅雅（Meja）等人 1987 年的著作 340—353 页。

们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的结论。阶级社会的概念，只有作为一个过去的图景仍旧有它的用处。它还具有活力是因为还没有合适的替代概念。[①]

接下来的分析旨在解释一种矛盾的事态。我的论题是，在德国的历史上，社会不平等的模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和教育的变化以及其他的社会变化，都对此做出了贡献。这些变化被一些社会学研究注意到了，但还未得到系统的分析或者作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发展本身得到解释。因此我愿意表明，作为生活标准变化的一个结果，亚文化阶级认同已经瓦解了，基于身份的阶级区

91 别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支持，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体化过程已经开始了。结果，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等级模式逐渐被颠覆。它不再与现实相符(Weber，1972)。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社会阶层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平等的社会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在所有富裕的西方和工业化国家中，一个个体化过程发生了。虽然这个过程仍旧在继续，但顽固的不平等使我们并没有看到它。更准确地说，一种引向个体化的特殊历史发展出现了。它们瓦解了历史延续性的经验；结果人们丧失了他们传统的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他们自己的个体(劳动市场)命运，即那些风险、机会和矛盾(Berger，1975；Touraine，1983)。

个体化过程是强有力的，它使对社会结构的解释具有难以

① 在这里我提到的德国阶级结构发展的特殊性，是与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不同的，比如在英国，阶级成员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仍旧是非常明显的，并且还是一个有意识认同的目标。在说话(重音、表达方式、用词)、居住区域(“有房阶级”)的截然阶级区分、教育的类型、服饰以及所有能够包括在“生活方式”概念下的东西中，这都是非常显明的

避免的暧昧性。经验的阶层研究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可能不会发现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毕竟,收入的不平等、劳动分工的结构、雇佣劳动的基本决定因素,相对来说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阶级"的依附削弱了。它现在对人们的影响很小了。为了经济生存的目的,现在个人被迫使自己成为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

作为个体化"动力"的劳动市场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这难道不意味着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遗忘、误解或者简单地忽略了?这包括我们认识到的所有东西:社会的阶级特征以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本质、大众社会和资本集中、意识形态的歪曲和异化、不变的人性品质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难道个体化的概念不也过早宣告了社会学的终结,敲响了它的丧钟吗?

这需要更准确的论证。个体化的存在通过很多定性访谈和研究已经在经验上得到证明。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的要求。换言之,人们要求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能够据以行动的权利 无论这些要求如何可能是错觉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不能忽略的现实。就像它们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所发展的那样,它们来自于德国生活的实际情况。

但在今天同样变得显明的是,这样一个个体化过程可能是十分不安定的,这特别表现在那些群体突然面对失业或失业的威胁,并且被迫面对他们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个体化而剧烈瓦解——尽管有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的地方。 92

在个体化过程的消极影响中有个体从传统支持网络(比如家庭或者邻里)中的脱离,补充性收入来源的消失(比如部分时

间耕种),以及与此相应地在所有生活领域中对报酬和消费的依赖性的增加。在这种新的生活状况下,收入的主要保障,亦即稳定的工作——不管有没有社会保障——都丧失了,人们突然间面临一个深渊。我们从美国已经得到更令人不安的消息:超过1200万的人失业,超过3000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在德国的福利领取者和所谓的"流动人口"中间也存在值得警觉的变动 妇女在未来可能面临特殊的威胁。因为这一个体化过程,一方面她们脱离了家庭提供的传统的支持网络,而新的离婚法也迫使她们在经济上依靠自己。另一方面,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是特别不确定的,并且我们已经知道失业妇女的百分比要比男性高得多,尽管存在很多少报的现象(Beck-Gernsheim,1983;也请参看第四章)。

这些发展如何与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兴起相区分呢?资产阶级中间的个体化过程主要来自于所有权和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结构的统治和权威的斗争中发展了它的社会和政治认同。与此相对,在晚期现代性中,个体化是劳动市场的产物,并且在不同工作技能的获得、提供和使用中表现出来。这一论点可以通过考虑劳动市场的三个维度——教育、流动和竞争——来加以阐明。

教育

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活过程。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境况的生产者,并且以这种方式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涯的生产者。当学校教育的时间延长的时候,传统的定向、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被改造,并且被普遍化的学习和教育模式以及普遍化的知识和语言模式所代替。根据时间长度和内容,教育至少使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发现和思考成

为可能。受过教育的人将对境况的反思性知识与现代性的前景结合起来,并且以这种方式变成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动因。举 93 例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分工的等级模式不再能顺利地发挥功能。人类物质资源浪费的内容和意义及其社会后果得到接受。此外,教育与选择联系起来并进而需要个人对向上流动的期望;这些期望甚至在"通过教育向上流动"是幻想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因为教育只不过是防止向下流动的手段(就像在教育机会扩张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因为只有成功地通过功课、考试和测验,个体才有可能完成正规教育。学校和大学的正规教育,反过来提供给个人通向劳动市场中的个体化职业机会的资格。

流动

一旦人们进入劳动市场,他们便经验到流动。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模式和安排,并且除非他们准备经受经济上的失败,他们总是被迫去掌握自己的生活。劳动市场通过职业流动、居住或就业的场所、就业的类型以及它引发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将自己展现为一种隐藏在人们生活的个体化背后的驱动力。它们变得相对独立于继承的或新形成的纽带(如家庭、邻里、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在劳动市场对流动的需要与社会约束间存在一种隐藏的矛盾。像格奥尔格·齐美尔在货币的例子中所论证的,这意味着放松地方性的网络而建构非地方性的网络。通过独立于传统的纽带,人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独立的性质,它首先使个人命运的经验成为可能(Kaelble, 1983b; Goldthorpe, 1980)。

竞争

竞争基于资格的可交换性,并因而迫使人们去推销自己的工作和成就的个人性和惟一性。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引向了一

种同等者间的个体化，所谓同等者，准确地说就是在互动和行为的领域表现出一种共享的背景（相似的教育、相似的经验、相似的知识）。特别是在那些这样的共享背景仍旧存在的地方，社群被竞争的酸雨瓦解了。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削弱了但没有消除同等者的平等。它引致了在同质社会群体中发生的个体的分离。

然而教育、流动和竞争决不是彼此独立的。不如说，它们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正是这种相互促进使它们引致了个体化过程。

94

其他的发展状况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德国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现了集体的向上流动趋势、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和更高的收入。与此同时，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得以保留。然而这意味着一种原来独占性的消费类型和生活方式的民主化，比如私人汽车、假期旅游等等。个体化的影响可以通过妇女运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妇女现在自己挣钱，这意味着她们不再依赖于丈夫的收入，而可以建构她们自己在家庭内外的生活。

第二个例子是劳动关系司法仲裁。劳动法作为一种专门的立法分化出来，引向了一种利益的个体化，它不再为了得到承认而依赖于高度集中的利益群体（如组织和政党）。因而，受到影响的个人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为自己的（他们努力保护的）权利辩护。

个体化和阶级形成：马克思和韦伯

在福利国家中，朝向个体化的推动力可以通过考察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不平等理论来更为准确地加以理解。马克思很有可能是最坚定的“个体化”理论家之一。他总是强调说一种史无前例的解放过程已经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果开始

了。以他的观点来看,从封建关系中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先决条件。但即使在资本主义自身中,人们也被接连不断的浪潮拉动着脱离了传统、家庭、邻里、职业和文化。

马克思从未对这种个体化过程中的阶级社会变体深究到底。对他来说,这一孤立和“脱离”的资本主义过程总是被贫困化的集体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所缓冲。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正是解放和脱离的过程以及工人生活条件的恶化引起了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他认为,个体的无产阶级作为市场交换的参与者,在资本主义系统地根除了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形成稳定的团结纽带这样的问题是无意义的。马克思总是将个体化的过程和阶级的形成视为同一。这仍旧是很多当代阶级理论家的基本立场。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论题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准确镜像。如我所描述的,个体化过程只有在作为马克思所预言 95 的阶级形成的条件的物质贫困化被克服的时候,才能确立。朝向个体化的趋势只在很少几个国家里,并且只是在最近的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才被意识到。

现在我可以精简我的论证,转向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家马克斯·韦伯。一方面,广为人知的是,马克斯·韦伯比马克思更为赞赏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忽略了最近在市场社会中朝向个体化的趋势。事实上,韦伯论证说,这些不可能成功,但他没有采用与马克思相同的认为阶级形成源于贫困化的观点。依照韦伯的看法,朝向个体化的趋势被基于身份的传统与亚文化的延续性和权威所阻碍。韦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传统的“与身份相联系”(status-bound)的态度,已经同专门知识和市场机会相结合,成为实质性分化的“社会阶级地位”。因而韦伯的工作已经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末

马克思主义劳动史学家所详细论证的基本观点(Thompson，1963；Giddens，1973)。对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支配生活世界、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与其说是“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不如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和前工业的传统。“资本主义文化”因而不像经常假设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创造。相反，它具有一种前资本主义的起源，被重塑和消耗它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和同化了。即使不同的对传统生活方式“去魅”和“解神秘化”的趋势确实获得了一种根基，强有力的“个体化”过程仍旧被韦伯理解为受到基于身份的社群组织的束缚和缓冲，它们自身与靠市场维持的社会阶级地位联结在一起。很多有关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仍旧沿着马克斯·韦伯的这一思路进行。

历史研究表明，这确实适用于50年代早期的发展，但我不相信它仍旧能够把握德国战后的发展，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和芬兰的发展。在那个时节，经过市场中介并由身份塑造的共同生活经验的不稳定单位——马克斯·韦伯将它们都归在社会阶级的概念之下——开始分裂。它的不同因素(比如基于特殊市场机会的物质条件，传统和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对共同的纽带和对流动的意识，以及交际的网络)开始缓慢地分解。它们通过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和不断增长的对教育的依赖，以及得到加强的流动、竞争和劳动关系仲裁，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

96

对于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工人来说依旧很真切的传统的内部分化和社会环境，从50年代开始逐渐消解了。与此同时，工业劳动力内部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间的区别被抹平了。在所有的地方，教育改革都伴随着对教育的依赖。越来越多的群体热衷于获得教育证书。结果，新的内部分化出现了。虽然

这些可能仍旧与传统的群体间差异相对应，但教育的影响使它们与传统的差异在根本上不同。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巴塞尔·伯恩斯坦(1971)的观点：新一代人必须以"详细的"言谈规则代替"有限制的"言谈规则。在与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新模式以及不断增加的地方劳动力流动的关联中，内在于社会阶级的新的等级和分化发展出来。它们预示了服务行业的扩张和新职业的出现。在德国，大量外籍工人的涌入也是为形成这种阶层做出贡献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们占据了社会阶梯的最底层。这些新的等级并不现成地符合既有的研究范畴。因而，它们对人们生活前景的意义还没有被注意到。

同时，传统的居住方式总是被新的城市建筑规划所代替。这些变化也产生了新的个体化形式。它们影响着基于居住和生活格局的互动模式。拥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混合在一起，邻里的社会关系组织得很松散。因而传统的超越家庭的社区模式开始消失。情况经常是，家庭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网络中选择各自的关系和生活。这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隔离的增长或者相对私人化的家庭生活的流行——虽然这些可能发生了。但它确实意味着既有的(依照归因被组织起来的)邻里关系以及它们的限制和对它们加以社会控制的机会一起瓦解了。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现在由个人来选择；同样，社会纽带也变成反思性的，所以要通过个人来确立、维持并不断地更新。

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这也许意味着互动的消失，也就是说，就像经常发生在老人身上的那样，社会隔离和寂寞可能成为关系的主要模式。然而，它可能同样意味着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等级制和分层形式可能在与熟人、邻居和朋友的关系中发展。这些关系不再首先取决于"身体上的"接近。无论它们是否 97
超越了地方性区域，它们都基于个人的兴趣、抱负和责任，这些

个人自视为他们自己的交际和关系圈子的组织者。结果,新的居住模式可能发展出来,它包含着对邻里和共同合作的生活格局的再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实验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Badura, 1981: 20—38)。选择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是一种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能力。如阶级社会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它是一种基于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而学来的能力。对生活的反思性控制,对个人生涯和社会关系的规划,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即应付不安全感和反思性的不平等。

然而,所有这些证明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出现,它为个人的自我形成、在相对的社会保障下发展私人空间和传统权威的衰微提供了可能。复杂的新关系同样在政治上以一种政治私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以这些来说明施加在私人空间上的社会和法律限制的扩张;来说明非传统的甚至公开具有攻击性的与个人自由的新形式相一致的社会实验的扩张;来说明对传统的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间的区分的挑战的扩张。因而,在文化和反文化间、社会和替代群体间的区分出现了。这些新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认同形式经常在政治上具有刺激效应。它们的推动力在过去二十年里切实地被我们感受到。

这些以及其他的发展状况引致了这样的结论:当马克斯·韦伯谈论社会阶级时,他所想到的社群和市场社会的不稳定的联系,正在战后发展过程中部分地转变甚或消解。任何等级的人似乎都不再理解和经验到它们。新的生活模式表现出强有力的对社会关系进行再组织的可能性,这不可能遵照马克思或者韦伯的方法而加以正确理解。

结果,下面这些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阶级认同消失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方面,什么时候雇佣工人的状况和风险成为普遍化的,另

一方面,什么时候阶级丧失了其亚文化基础并且不再被感觉到?阶级认同不再为身份地位所塑造,这是可以想像的吗?在个体化状况下,持续的不平等仍旧能被阶级的概念或者更为一般化的社会不平等的等级模式所把握吗?或许所有这些等级模式在范畴上都取决于传统的身份依赖?当然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98 个体化的过程中嵌入了反过来产生新的社会群体和冲突的矛盾、那么个体化的过程如何转变为它的反面?新的社会认同形式如何能够被发现,新的生活方式如何被发展出来?风险的社会感知和风险社会的动力能够是或者成为超越地位和阶级的社会冲突和认同的一个核心的轴线吗?或者是否风险社会因为个体化而相反地缺乏政治反抗力量?你可以想像三个绝不相互排斥的后果。实际上,它们可能是相互重叠的。

首先,阶级不会仅仅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衰微就消失。结果,社会阶级从地区性的和特殊性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阶级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开始了,但我们仍旧需要去理解它的历史动力。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再能在没有进一步限制的情况下被说成仍然是一种阶级团结形成的历史。

第二,在刚才描述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公司和工作场所都失去了作为冲突和认同形成的场所的意义。新的社会纽带形成和冲突发展的源泉出现了。它们首先存在于可归因的人种、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等的差别中;其次存在于新的和变化着的分化中,这些分化产生了私人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与认同方式领域里的反思性中。因而,内在于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中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开始出现。

第三,阶级社会的终结不是某种激烈的革命。它包含了一种在后传统社会中无情的发展和集体经验到的个体化与原子化过程。矛盾的是,这些后传统社会是人们逐渐变得不自足的社

会(参见第七章)。与此同时,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在所有的社会部门中都变成了一种冲突和社会形成的源泉。

走向一种个体化雇员社会

存在很多去发展新的社会形式的不同企图,无论它们引起的动荡有多么强烈,它们总是被它们自身也暴露在走向个体化的不断更新的浪潮之中的事实所限制。个体化的动力势头正盛,但新的和持久的、在深度上与社会阶级的穿透力相当的社会格局如何被创造出来,仍旧是完全不明确的。正相反,尤其在不远的将来,作为一种对付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方法,将开启新的个体化进程的机会的社会和技术创新很可能被启动——特别是就劳动市场关系的更大灵活性以及支配劳动时间的法规而言。但99 这同样适用于新的交往的模式。这些或者仍旧是前景或者是已经顺利进行的技术和社会革命,都将释放出一种深刻的生活方式的个体化。

如果这一估价是正确的,一种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结构的变体将获得其重要意义。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旁边暗淡下去。典型的特征以及这样一个社会的危险现在都逐渐变得明确了。与主要以传统和文化来界定的阶级社会相对,一个雇员的社会必须以劳动法和"社会政治"范畴来加以界定。其结果是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在其中,传统的和严重的不平等与某些不再传统的、个体化的后阶级社会(与马克思的阶级社会观点一点都不相像)的因素同时存在。这一过渡社会凭借一系列典型的结构和变迁表现出其特点。

首先,个体化过程剥夺了社会认同的阶级差别。社会群体在自我理解和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上都失去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们也失去了它们独立的认同和成为一个成长性政治势力的机

会。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直到本世纪很晚近的时期仍旧构成对社会认同的形成具有相当意义的社会和政治主题的社会流动的观念(个体在实际的身分阶级间移动),变得没有意义了。

第二,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结果是社会问题逐渐以心理学的方式被感知:个人机能不全、负罪感、焦虑、冲突和紧张。矛盾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新的即时性,一种风险和疾患的直接联系。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它们不再(或者只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根据它们在社会领域中的根基来感知。这是对当今心理学兴趣的复兴的一个解释。个人成就取向同样获得了其重要意义,现在可以预测的是,与成就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及其对社会不平等的(伪)合法化趋势相联系的所有问题,在未来都会出现。

第三,为了应付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组成政治和社会的联盟。然而这些不一定遵循如阶级模式这样的单一的模式。与其他所有的私人化生活隔离开的私人化生活的孤立,可以被最异质化的社会和政治的事件和发展所击碎。相应地,不同群体和阵营的暂时联合形成了又瓦解了,这取决于关涉到的特殊议题和所处的特殊情境。以这种方式,风险和风险冲突,就它们被个人感知这一点来说,同样正在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乐于接纳 100 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业是可能的,比如,参与当地居民反对机场噪音污染的运动,参加钢铁工人联盟,然而在面临迫近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却投票支持保守党。这样的联合代表了在个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的实用主义联盟,发生在社会的不同战场上。冲突领域的激增已经被观察到了。个体化的社会为新的和多面的冲突、意识形态和联盟提供了战场,这一切超出了所有既有的图式化的范围。这些一般着眼于单个问题的联盟,决不是异质性

的，而是针对具体情境和人物的。由之而来的所谓结构，容易受晚近的社会时尚（议题和冲突）的影响；社会时尚被大众媒体推动着，就像春季、秋季和冬季的时装发布会那样支配着公共意识。

第四，永久的冲突倾向于依据可归因的特征而出现，这些特征现在和以往一样无可否认地和歧视联系在一起。人种、肤色、性别、少数民族、年龄、同性恋和肢体残疾，这些是主要的可归因的特征。在发达个体化的条件下，这些准自然的社会不平等导向了有着十分特殊的组织效应的发展状况。这些发展企图通过着眼于此类不平等的不可避免性和永久性，以及着眼于它们与成就原则（achievement principle）的相容，它们的有形性，以及一个作为它们的直接可见性的结果的事实——它们使独立的社会和个人认同成为可能——来争取其政治力量。与此同时，个人命运逐渐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经济趋势和历史必然性所决定，比如说，被经济危机或繁荣、进人大学和就职的限制性许可、年龄群的规模等等所决定。

选择个体化过程的要求和允诺以及它的社会解放冲动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是可能的吗？——正是借助于它的社会解放冲动，以一种新的方式（超越了地位和阶级），个体和群体被组织成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事务的自觉主体。或者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最后基础会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被清扫吗？那么个体化的社会不会因为冲突和疾患的显在征兆而衰败、分崩成为一种事实上不可能预防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现代化野蛮主义的一种新的和隐伏的形式——的政治冷漠吗？

101

第四章
"我是我":性别化空间和家庭内外的冲突

语言的气压计指示着暴风雨的天气:"关于家庭的战争"(Berger and Berger, 1983),"性别的战斗"(Ehrenreich, 1983),或者"对亲密的恐惧"(Sennett, 1976)。作者们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不是那么平和的辞藻来描绘两性间的事态。如果你把语言当真,你就不得不相信爱情和亲密已经变成它们的反面。当然,这是为了争夺公众的注意力而进行的语言上的夸张。然而它们也表明男人和女人在婚姻和家庭(或者不管还剩下什么)的日常现实中相互面对时的深刻不安全感和伤害感。

但愿这只是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但只以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确定两性间的关系——包括两性间的性关系、感情、婚姻和亲子关系等等——就不能认识到除此之外的东西;它们同时还是其他的一切:工作、职业、不平等、政治和经济。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异,正是这所有东西的不均衡混合物使这一议题变得这样难解。任何谈论家庭的人必须也讨论工作和钱财,而任何谈论婚姻的人也要讨论培训、职业和流动,特别是有关不平等的分配的内容——尽管现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平等的教育条件。

这一存在于男女间的全方位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在西方国家真的开始发生变化了吗?数据说着一种双重语言。一方面,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特别是在性关系、法律和

教育上。然而整体上说，除了性关系，这些变化更多地是停留在意识和字面上。另一方面，它们与一种男女行为和状况的持久性（特别是在劳动市场以及社会保障领域）相对立。这具有表面上的矛盾效果：平等的增加带来了在意识中更为明确的不平等的持续和加剧。[1]

这一历史地创造的新意识和老状况的混合物，在两种意义上是具有爆炸力的。通过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不断增加的对她们的地位的意识，年轻妇女形成了对职业和家庭中更多平等与合作的期待，这种期待在劳动市场和男性的行为中遭遇了相反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反，男人实践着一种平等的修辞学，并不以行动来配合语言。在两方面，幻觉都在消失；伴随着以（在教育和法律上的）平等为先决条件的平等化，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不合理。女性对平等的期待与不平等的现实间的矛盾，以及男人的共同责任的口号和对旧有的角色任务的保留间的矛盾，正变得严重起来，并且决定着其各种各样完全矛盾的政治和私人表现在未来的发展。因而我们处于从"封建意义上"可归因的性别角色——以及所有相关的对立、机会和矛盾——中获得解放的过程的开端。意识跑在了现实条件的前面。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意识拉回来。对于长期冲突的预测可以说的东西很多；性别的对立将决定正在走近的未来。

这些男女间的主题和冲突不仅仅是它们表现出来的样子：男女间的主题和冲突。在它们之中，也有一个社会结构在私人领域中正在崩溃。看起来是私人"关系冲突"的东西具有一般性

① 有关这一普遍说法的经验证据，请参看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1990）。其中有更多的论述。

的"社会 理论"方面，我将在这里以三个主题来进一步论述它们。

(1) 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某些传统的遗留不容易加以驱除。没有男女角色的分别就不会有传统的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形象是基于一种不完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分裂的人类劳动力的商品化。总体工业化、总体商品化与有着传统模式和角色的家庭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雇佣劳动预设了的家务活，通过市场流通的商品预设了核心家庭的模式和可归因的角色。就此而言，工业社会依赖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这些不平等与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因而在实际的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家庭的基础(婚姻、性关系和亲子关系等等)受到了怀疑。这意味着在二战后的现代化阶段，工业社会的进步和瓦解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反思性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的普遍主义不能认识到它自己的、自我划定的禁忌区域，并削弱了妇女同她们因工业而产生的被迫从事家务劳动和受丈夫供养的"身份命运"之间的纽带。因而再生产和生产在生涯中的和谐以及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变得薄弱了，对妇女的社会保障的缺失变得可见了，等等。在今天爆发于男女之间的冲突中，必须加以解决的是工业社会的个人化矛盾，它同样摧毁了他们通过其反思性现代化和个体化而共同生活的能力的基础。

104

(2) 使人脱离阶级文化的个体化的动力，并没有在家庭的大门前停住脚步。人们正被从性别的约束、从它的准封建属性和前提中脱离出来，或者，人们灵魂的最深层次被撼动着，而原动力是一种他们自己并不明白的力量，虽然无论在他们面前它是如何的陌生，他们都是它最内在的体现。支配他们的规律是：

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男人。世界在“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分裂了。在性别关系中的个体化过程有着十分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在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追寻中，男人和女人从传统的模式和可归因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普遍的被削弱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寻求伙伴关系中的快乐而被推进束缚中。对共同的内在生活的需要，如表现在婚姻和契约的理想中的那样，并不是一种原初的需要。它随着个体化作为其机会的反面所带来的丧失而增长。结果，从婚姻和家庭走出来的道路迟早总是转了回去——反过来也是如此。超越性别的挫折和要求而存在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就是性别的挫折和要求、它们的反面、依赖、亲睦、漠然、孤独、分享——或者所有这些。

（3）在所有男女共同生活的模式中（婚前、婚姻和婚后），世纪的冲突爆发了。这里，它们总是展现它们私人的和个人的一面。但家庭只是事件的环境，而不是其原因。你可以变换这个舞台，但上演的戏剧仍旧是同样的。两性对其工作分层、亲属关系、职业、政治、发展以及在他人身上和针对他人自我实现的卷入，已经开始动摇。在婚姻（和私通）关系中，冲突是通过开启选择的机会（如配偶双方不同的职业流动、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的劳动分工、避孕和性交的方式）引致的。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和矛盾的影响和风险，进而意识到他们的状况的差异。确定对孩子的责任同样取决于双亲的职业生涯，并因而取决于他们在现在和将来的经济依赖和独立，这种依赖和独立对所有反过来与之关联的男人和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后果。这些抉择的可能性有着个人的和制度的侧面。也就是说，制度性解决方法的缺乏（比如缺乏白天的儿童照

105 顾时间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不充分的社会保障）加剧了私人关系

中的冲突,相反,制度性的条款减轻了两性间的私人"口角"。相应地,私人的和政治的解决策略必须被看作是相互关联的。

这三个基本的论题——工业社会的"封建特征",男女生活历程中的个体化倾向,对由选择的机会和对选择的约束造成的冲突状况的认识——接下来将进一步加以发展和阐明。

工业社会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

男女之间生活状况的对立的特点可以通过将它们从阶级状况中分离出来而在理论上得到确定。大部分劳动人口的物质贫困化造成了阶级对立。它们公开地被争论着。伴随着家庭的解传统化产生的对立主要在私人关系中爆发,它们在厨房、卧室和托儿所里被争论着。它们表面上的伴随物和征兆是对关系的永久讨论或者在婚姻中无声的对立、遁入孤独和回归、对突然不再理解的伴侣丧失信任、离婚的痛苦、对孩子的溺爱、对一点点可以称做自己的生活的争夺——费力地从伴侣那里得到但又仍和他或她分享着——对日常生活琐事中的压抑的寻求——这是一种你是你自己的压抑。随便你叫它什么,"两性的持久战"、"退回到主体"、"自恋的时代"都可以。这确实是社会形式——工业社会的封建内部结构——在私人领域的崩溃。

伴随工业体系产生的阶级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固有的",它基于生产的工业模式自身。两性的对立既不服从于现代阶级对立的模式也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遗迹。它们是第三种实体。就像劳动和资本间的对立,在工资劳动预设家务劳动的意义上,它们是工业体系的产物和基础,而生产和家庭的领域和形式在19世纪就分离并确立了下来。与此同时,男人和女人相应的状况就基于出生的归因。就此而言,它们是陌生的杂种,即现代等级。借助于它们,一个工业社会的地位等级制在现代性

中建立起来。它们从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中得到其爆炸性力量和冲突的逻辑。相应地，可归因的角色以及性别身份的对立像阶级对立一样爆发了，这不是在早期的现代性中，而是在晚期的工业现代性中，就是说，这是在社会阶级已经被解传统化，而现代性不再在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和家106 务劳动的大门前徘徊的时候发生的。

在19世纪工业主义的胜利伴随着核心家庭的形成，核心家庭在今天又变得解传统化。生产和家庭劳动从属于相对立的组织原则(Rernch, 1986)。如果市场的原则和力量适用于前者，在后者当中的无薪日常劳动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的契约本质与婚姻和家庭的集体共同性形成对照。生产领域需要的工业竞争和流动，遇到了家庭中的相反要求——为伴侣的牺牲和对家庭共同规划的热衷。在家庭再生产和依赖市场的生产的定型过程中，两个具有相对立的组织原则的价值体系的时代——现代性和现代的反现代性——在工业社会中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两个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并且相互对立的时代。

家庭和生产的分离所确立和强加的生活状况同样有着时代的差异。因而这不仅仅是基于生产，基于收入、职业以及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地位的差异等等的不平等体系。还存在一个与之横向交叉的不平等体系，它构成了在相对平等的"家庭状况"与各种各样的生产状况之间的时代差异。生产劳动以市场为中介，以货币为回报。进行生产劳动使人们——无论他们如何束缚于所依赖的工作——成为自给自足的人。它们成为流动过程、相关的计划等等的目标。无薪的家庭劳动通过婚姻作为自然而然的嫁妆施加给女人。在本质上说，进行家庭劳动就意味着对供养的依赖。那些进行家庭劳动的人——并且我们知道她们是谁——用"二手的"钱来操持一个家庭，并且仍旧依赖于作为自

我供养纽带的婚姻。这些工作的分配 —并且这里存在着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仍然是处在决定之外。它们是由出生和性别所规定的。原则上，即使在工业社会中，一个人的命运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终身的家务劳动或者依靠劳动市场过活。这些封建的"性别命运"被同样奉献给它们的爱所削弱、消除、夸大或隐藏。爱是盲目的。因为爱能够作为对性别命运自我创造的痛苦的逃避而出现——无论那痛苦可能多么巨大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不平等不可能是真实的。然而那是真实的，并且使爱显得陈腐和冷漠。

表现出来并被哀叹为"对亲密的恐惧"的东西，以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的术语来说，就是被工业社会的规划一分为二的现代性的矛盾，工业社会总是将现代性不可分离的原则——个人自由和超越出身的平等——与生俱来地从一种性别那里拿走并将它归诸另外一种性别。工业社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地作为工业社会而存在，而总是仅仅一半是工业的，另一半是封建 107 的。这一封建侧面不是传统的遗迹，而是构建进工作和生活的制度安排的工业社会的基础和产物。

在二战后福利国家的现代化中，发生了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对依赖市场的标准化生涯的需要被延伸到女性的生活环境中。原则上看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东西，仅仅是发达市场社会的原则超越性别界限的应用。另一方面，全新的阵营在家庭内和男女之间一般以这种方式产生，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确实正在被消除。这是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工业社会超越其性别区分的扩张，以同等的方式消解着家庭伦理、性别命运、婚姻禁忌、亲子关系和性关系，甚至进行了家务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再统一。

工业社会中基于身份地位的等级制汇集了很多因素：在生

产和家庭间的劳动领域的划分以及二者相对的组织，出生带来的相应生活状况的归因，通过爱、婚姻和亲情提供的关爱承诺和对孤独的补救而出现的对整个状况的掩饰。回过头去看，这样的结构必须建立，也就是说，不顾抵制而推行。

所以人们一直倾向于以十分片面的视角看待现代化。而它实际上是双面的。与工业社会在19世纪的出现相应的是，现代的封建性别秩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的现代化伴随着反现代化。在生产和家庭间的暂时差异和对立被确立、证明并被理想化为永恒的真理。出自男性灵感的哲学、宗教和科学的联盟，将所有的一切与女人的"本质"和男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

因此，现代化不仅仅消解了农业社会的封建状况，而且确立了新的封建状况，并且在其反思性的阶段消解这些状况。同样的东西——现代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不同的整体状况下具有相反的结果。那时的后果是家务劳动和工资劳动的区分，现在的后果是对新的再统一形式的争取；那时是妇女因为婚姻供养而受的束缚，现在是她们涌向了劳动市场；那时是刻板的男女角色的确立，现在是男人和女人从封建的角色指派中解放出来。

这些是现代性在今天如何侵蚀它们在工业社会中安置的反现代性的征兆。与生产和再生产紧密联系，并且与紧密的核心家庭传统在集中共同性、角色分派和情感中可以提供的一切相联系的两性关系，开始崩溃了。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变得不确实了，这包括共同生活的方式，谁做什么、如何做、在哪里做，或者对性关系和爱情以及它们与婚姻家庭的关系的看法。家长制度分裂为母爱和父爱的冲突，而孩子以其强烈的先天连结能力成为惟一一个不离开的成员。一个争取和试验工作与生活、家

务劳动与工资劳动"再统一模式"的普遍过程开始了。简言之,私人领域正变得具有反思性和政治性,并且辐射到其他领域里。

但这只指示着发展的方向。这些思考突出的一点在于:既有的市场社会的问题不能在分裂的市场社会内部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制度结构中得到解决。当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并且想要去过一种经济上独立的生活时,这既不可能发生在核心家庭传统的角色分派中,也不可能在专业工作、社会法律、城市规划、学校教育等等——这些都恰恰预设了有着性别身份基础的核心家庭的传统形象——中发生。

在个人负罪感和两性关系的失望中进行的"核心冲突",也基于以下事实:我们仍旧企图(几乎)仅仅通过男女的私人面对来从性别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这发生在核心家庭的框架里,却保持着制度结构的延续性。这相当于改造社会,却使家庭中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保留下来的是不平等的交换。妇女从家务劳动和婚姻供养中的解放是被一种男人向"现代封建生活"的倒退所推动的,这种倒退正是妇女所拒斥的。在历史上,那就像让贵族去做农民的奴隶。但男人不会比女人更愿意追随"回到厨房!"的号召(妇女应该比任何其他的人知道得更清楚!)。但这只是一个特征。仍旧重要的是男女的平等化不能在以他们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制度机构中确立。我们不能强迫新的、"圆形的"人进入劳动市场、就业体系、城市规划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所要求的"方"孔里。如果这样做了,没有人会惊奇于这样的结果:两性的私人关系成为冲突的舞台,这些冲突只能够通过男女的"角色交换"和"混合角色"的拉锯战得到不适当的解决。

从男女角色中解放?

上面概述的这种前景奇怪地与经验资料相抵触。它们毕竟

109 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记录了一种朝向性别身份等级制更新的反趋势。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谈论一种完全的"解放"？女人和男人同等地从他们的"性别命运"的指派中解脱出来了吗？什么状况促成了这些，什么状况又阻碍了这些？

如上面引用的资料所提到的，过去十年里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将妇女从传统的归结于女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五个重要的状况虽然绝不存在因果联系，却是明显的。

首先，生涯结构、生活阶段的替续已经被不断增长的生活期望所转变了。如阿瑟·E.尹姆霍夫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着重说明的，这引向了一种"妇女在人口统计学上的解放"。在以前的世纪里，妇女的寿命——以统计学的术语说——正好够用来生育社会要求的成活子女的数目，这些"女性任务"今天在大约四十五岁就结束了。"为了孩子的生活"今天已经成为妇女的一个短暂的生命阶段。这紧接着一个平均三十年的"空巢期"——超出了传统的对妇女生命的关注。"今天，仅就西德来说，就有超过 500 万处于'最佳年华'的妇女生活在后双亲的关系里……经常……没有任何实质的有意义的活动。"（Imhof 1981:181）。

第二，现代化，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个阶段，重构了家庭劳动。一方面，家庭劳动的社会孤立决不是一种固有的结构特征，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即生活世界解传统化的结果。在个体化过程之后，核心家庭加深了它们的边界，并且一种"孤立的生活"形成了，它依据保留下来的责任（阶级文化、邻里和熟人）来自我管理。只有以那种方式，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孤立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技术自动化的过程延伸进家庭劳动。各种各样的器具、机械和消费品减轻和清除了家庭劳动。它成为在工业生产、有偿服务和技术装备完善的私人家庭之间不可见的

和从不停息的“遗留工作”。总起来说,孤立化和自动化带来了一种“家庭劳动的去技艺化”(Offe, 1984),它同样指引着妇女走出家庭去追寻一种“充实的”生活。

第三,如果母性仍旧是与传统女性角色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就很难过分估价避孕和计划生育措施以及为了使妇女摆脱传统的要求而合法地终止妊娠的可能性的重要意义。孩子,进而是母亲(及其所有的后果),不再构成“天生的命运”,而至少在原则上是被期待的孩子和有意识去做的母亲。当然,资料同样表明,没有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和看护孩子的责任的母亲,对很多 110 人来说仍旧是一个梦。但较年轻的一代妇女,不像其母辈,她们可以(共同)决定是否、什么时候要孩子和要多少孩子。与此同时,女性性欲被从“母亲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并且可以有意识地发掘并违反男性的标准发展。

第四,不断增长的离婚表明了婚姻和家庭供养的脆弱之处。妇女总是因“没有丈夫”而贫困(Ehrenreich, 1983)。几乎有70%的单身母亲必须过每个月少于1200马克的生活(1985)。她们和女性的救济金领取者是救济机构的常客。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被“解放”了,脱离了丈夫的终身供养。在统计数据所记录的妇女涌入劳动市场的现象,同样表明了很多妇女理解了这一历史教训及其后果。

第五,教育机会的平等——它同样是青年妇女强烈的职业动机的一种表达——趋向于同一个方向。

所有这些在一起——人口统计学上的解放、家庭劳动的去技艺化、避孕、离婚、对教育和职业的参与——表现了妇女从她们现代的、不能改变的女性身份命运中的解放程度。因此,个体化的旋涡——劳动市场、教育、流动、事业计划——双重或者三重地影响着家庭。家庭成为一台持续上演的戏法表演,上面充

斥着各种相互分歧的涉及职业以及它们对流动的要求的抱负、教育强制、冲突的对孩子的义务和家务劳动的单调乏味。

但这些导向个体化的状况面临着其他一些使妇女重新回到传统角色分派的状况。真正确立起来的会给所有男人和女人创造经济上独立的生活的劳动市场社会,将加剧既有的糟糕的失业状况。这意味着在大规模失业和从劳动市场被排除的状况下,妇女从婚姻供养中摆脱出来,却不能自由地通过在家庭外的工作获得一种自主的生活。然而这也意味着她们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不再存在的丈夫那里得来的经济保护。在真正的工资劳动者的行为语境中这种处于"得到自由"和"自由去做"之间的中间状态,也被她们向母性的复归进一步加强了。只要妇女还生育孩子,感觉到自己对他们的责任,并且把他们看作自己主要的生命任务,孩子就仍旧是在职业竞争中可预期的"障碍",同样也是做出不利于经济独立和职业生涯的有意识决定的诱因。

111 以这种方式,妇女的生活被解放和复归旧的归因角色之间的矛盾拖来拖去。这同样反映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上。她们脱离了家庭劳动然后又转回来,并且力图"以某种方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矛盾的决定来结合歧异的生活状况。环境的矛盾扩大了她们的矛盾状况;比如,她们必须在离婚法庭忍受法官的质问——为什么忽视职业规划。在家政上她们被质问为什么没有尽她们的婚姻义务。她们因为她们的事业抱负破坏了她们丈夫原本就困难的职业生活而受到责难。离婚法和离婚的现实,社会保障的缺乏,被关闭的劳动市场的大门和家庭劳动的主要负担,突出表现了个体化过程给女性生活处境带来的矛盾。

男人的境况是颇为不同的。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女人不得不摆脱旧有的"为了他人而生活"的归因角色,不得不寻

求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而对男人来说，去过独立的生活与旧有的角色认同是一致的。在作为“事业男人”(Career man)的类型化男性角色中，经济个人化和男性角色行为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历史上，男人是不知道什么配偶(妻子)供养的，而通过工作谋生的“自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台工作传统上是由女人承担的。父亲的欢乐和责任总是可以作为小量的娱乐活动来享受。父亲的身份对职业没有任何障碍；相反，不得不去这么做，换言之，所有将妇女驱逐出传统角色的因素在男性这一方面是没有的。在男性的生活处境中，父性和事业、经济独立和家庭生活并不是依据家庭和社会的状况要去争取和调和的对立物；相反，它们与传统男性角色的共通性是被规定和受到保护的。但这意味着个体化(在通过市场的中介谋生的意义上)巩固了男性的角色行为。

如果男人也反抗他们的性别角色指派，他们也是出于不同的理由、矛盾同样出现在男性角色的事业固恋(fixation)上，比如，为某些我们对之既没有闲暇和需要也没有能力去享受的东西做出牺牲，无意义的过度竞争，为了我们并不认同却必须认同的职业和组织的目标竭尽全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的“冷漠”等等。然而脱离男性角色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固有的，而具有外部的起源(因为妇女发生的变化)，并且拥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男人因为妇女对劳动的更多参与而从作为家庭的惟一供养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解脱了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缘故服从于受其他人的意愿和目标所支配的事业这样的 112 束缚，结果，有可能出现一种不同类型的事业和家庭的义务。另一方面，“家庭和睦”变得脆弱了。男性生活中女性决定的方面变得不平衡了。与此同时，男人得到这样一种暗示：他们在日常事务和感情上依赖于女人。在两个领域，主要的推动力都是要

解脱对男性角色指派的认同，尝试新的生活模式。

造成男女对立的冲突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主要有两种“催化因素”：孩子和经济保障。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冲突可以在整个婚姻过程中被隐藏，但在离婚的情况下它们公开地表现出来。比较典型的是，责任和机会的分配在从传统的婚姻向双薪模式（two earner model）的婚姻的转变中发生了改变。概括地说，在婚姻供养的模式中，妇女在离婚后拥有孩子却没有收入。在双薪的模式中，乍看起来，除了妇女有收入并拥有孩子（依照流行的法律判例），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就男女间经济不平等正在缩小——无论是通过妇女的从业、离婚法的供养条款还是老年援助——而言，父亲们都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不利之处，部分是在自然上的，部分是在法律上的。妇女将孩子作为她们的子宫的产品而拥有，我们知道无论在生物上还是在法律上那都属于她。卵子和精子的财产关系分化了。孩子当中父亲的那部分，仍旧总是依赖于母亲及其处置权。这对所有关于终止妊娠的问题同样是正确的。就从男性和女性角色进程的疏离而言，钟摆倾向于往回摆。将自己从事业“命运”中解脱出来并转向孩子的男人，却回到了一个空巢家庭。不断增长的父亲绑架在离婚诉讼程序中没有判决给他的孩子的案例（特别在美国），说明了这一点。

但分离了男女生活状况的个体化，反过来也使他们重新结合起来。当传统逐渐消解时，关系的允诺在增加。所有丧失的东西突然间在另外的东西中又被发现了。首先上帝离开了（或者我们废黜了他）。“信念”这个词，曾经意味着“经历过”，已经呈现出“违反我们更佳的判断”这样的浅薄意味。当上帝消失的时候，去找神父的机会也消失了，因而负罪感增加并且不再能摆脱。当对错的区别变得模糊的时候，负罪感在尖锐的质问下并

没有变得缺乏意义,而仅仅是变得不显著、不可辨别。我们至少可以解释其内在苦痛的社会阶级文化,已经从生活中蒸发到术语和数据的云层中。与记忆和交往一起成长的邻里,因为流动而消失了。我们可以去结识熟人,但他们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这 113 个中心点的,人们也会参加俱乐部。接触的范围不断增加、拓展,更为丰富。但其多样化使它们更短暂,更容易被表面现象所左右。在彼此声称感兴趣的同时,任何多要一点的想法都会马上遭到反对。甚至性关系都可能这样被交换,短暂得像握手一样。

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事物处于运动状态并对"可能性"敞开大门,而各种各样的关系也许还不能代替稳定的初级关系的认同形成作用。如研究所表明的,两方面都是必须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和延续的亲密关系。高兴地结了婚的家庭主妇被交往问题和社会孤立所折磨。凑在一起交流他们的问题的离了婚的男人,即使是被容纳在网络里,也难以克服不断涌现的孤独。

在对现代爱情的理想化中,现代性的轨迹再一次表现了出来。赞扬是现代性留下的丧失的反面。不是上帝,不是神父,不是阶级,不是邻里,不过至少是"你"。"你"的尺度就是如果没有它就会流行的反向空虚。

那同样意味着,不是物质基础和爱情,而是对孤独的恐惧,使婚姻和家庭得以保持。尽管有所有这些危机和冲突,威胁着家庭和婚姻或者在家庭和婚姻之外令人担忧的东西也许是婚姻最为牢固的基础:孤独。

在所有这些当中,首要的是关于家庭的争论的一种根本的相对化。两性共存以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形式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制中已经被标准化了,这样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被神圣化或者被诅咒;人们看到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或者他们看到家

庭从归之于它的危机云团上再次崛起。所有这些仍旧与错误替代物(false alternative)的判定联系在一起。任何让家庭来担负所有的善或者所有的恶的人,走得还不够远。家庭仅仅是男女间的历史冲突状况变得可见的表面。在家庭内或者在家庭外,两性总是相互遭遇,二者间累积的矛盾也是如此。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相对于家庭的解放?伴随着个体化动力向家庭的扩展,共同生活的方式开始急剧变化。家庭和个人生涯的联系松懈了。扬弃了囊括在其中的男女的双亲生涯的终生标准家庭,成为一种有限的情形,而常规的情况,特别对于我们关注的特殊生命阶段来说,是一种在不同的家庭和非家庭的共同生活方式间的摇摆运动。个人生涯的家庭责任沿着生命阶段间的时间轴线变得多孔,并进而被消除。在逐渐变得114 可互换的家庭关系中,男性和女性的个体生涯的自主性在家庭内外分离了。依据不同的生命阶段,每一个人都经过多个家庭生活和非家庭生活模式,并且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越来越过着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涯。因而只有在个人生涯的纵向部分,而不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或者在家庭统计表中,家庭个体化才被发现,它是(家庭内外的)个体生涯和家庭间的优先地位的颠倒。从经验上看,从家庭中获得解放的程度产生于有关离婚和再婚的数据以及共同生活的前、中、外的婚姻形式——单个地并与对家庭的赞同和反对联系来考虑,它们仍旧是矛盾的——的生涯摘要(biographical synopsis)。处在家庭和非家庭这两个极端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确定"第三条道路:一种矛盾的、多元的转变中的整体生涯。生活形式的这种个人生涯多元主义——亦即,与其他单独或共同的生活形式相混合或被其他共同或单独生活形式所打断的家庭的交替——正在变成个体化状况下男女协作或对立的(矛盾的)"标准"。

从他们整个的生命来考虑，大多数人因而进入了一种痛苦而可怕的、被历史地规定的对他们共同生活形式的测验阶段。他们开始尝试一种松懈或者协调男女个人生涯的反思性方式，其后果在今天根本不可能被预知。但所有被经受的"错误"都不能制止任何人的更新了的"企图"。

对不平等的意识：选择的机会和对选择的束缚

男女境况中的差异和对立并不是在昨天才形成的。然而直到60年代，绝大多数妇女都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二十年来对它们的关注在增加，并且我们为了让妇女获得同等权利而在政治上付出努力。因为最初的成功，对不平等的意识加强了。实际的不平等、它们的条件和原因必须同对它们的意识相区分。男女的对立具有相互之间可能相当独立的两个方面：境况的客观性，和它们合法性的丧失以及对此的意识。如果我们将对不平等的长期接受与它们受到质疑的短时期相比较，并同时看到对某些不平等的消除实际上不过是使人们认识到它们的时候，我们不应低估意识的独立意义。现在，我们将会探究这些意识的条件。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决定和对决定的限制在所有的行动领域都激剧增加了。以略带点夸张的口气，你可以说"怎么都行"。谁刷碗、什么时候以及谁去换尖叫的孩子的尿布、谁去买东西、谁去打扫房间逐渐变得和谁回家时买熏肉、谁决定是否搬 115 家以及为什么床第之乐必须和婚姻登记官指定的每日伴侣一起享受这样的问题一样不明确。婚姻关系可以从性关系中并且进而从亲子关系中分离出来；亲子关系可以被离婚所加强；整个事情都能以共同或者分开生活来区分，并且因为多个住处的可能性和总是存在取消决定的潜在性而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力量。这

种数学运算在等式的右边得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虽然处于波动之中——而且给予我们有关直接和多重嵌套的隐匿生活的多样性的一些观念；这些生活在今天越来越隐匿在"婚姻"和"家庭"这样不变的和冠冕堂皇的词汇后面。

在生涯的所有维度上，选择的机会和选择的束缚都开放着，它们好像是强加给我们的。一个规划和协议的整体机构成为必要的，它在原则上可以取消，并依赖于它对不均等的负担的分派的合法化。在论争和共识中，在错误和与这些选择相联系的冲突中，对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风险和后果变得明确了。如果系统地加以考察，把给定转变成决定有着双重意义。不做决定的选择逐渐变得不可能了。首先，做决定的机会获得了一种我们难以摆脱的强制性。必须仔细考察私人关系的动力、存在的问题进而是不同后果间的平衡。其次这同样意味着，通过思考做出的决定成为对涌现出来的不平等以及它们引起的冲突和意在解决的努力的意识的提出者。

这已经伴随着颇为传统的有关流动的决定发生了。一方面，劳动市场并不考虑个人的环境而要求流动。婚姻和家庭则要求相反的东西。考虑其最终的后果，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自由接受市场的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生存。市场主体最终是单个的个体，不受亲戚关系、婚姻或家庭的阻碍。结果，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的。

只要婚姻意味着妇女对事业的放弃、对孩子的责任以及依据丈夫的职业前程的"共同流动"这样的看法还被视作理所当然，关系的要求和劳动市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仍旧是隐匿的。当配偶双方都必须或想要自由地作为挣取工资的人来谋生的时

候,矛盾就公开爆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制度上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或改良措施(比如,针对所有公民的最低工资或者不与职 116 业劳动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对所有阻碍配偶共同工作的因素的消除;相应的"可接受性标准"等等)。然而,这些既没有出现也不能以某种方式预期。因此夫妻必须寻找私人的解决办法,这在他们可选择的范围内等于内部的风险分配。问题是:谁将放弃经济独立和安全?而这些是在现代社会中谋生的无疑议的前提条件。毕竟,任何随着配偶搬迁的人都(总是)接受了相当大的职业劣势——如果她事实上没有被完全抛出事业的轨道。冲突的水平相应地提升。婚姻、家庭和各种关系成为彻底的现代化市场社会的个人化矛盾得到补偿的场所,但补偿不再是完全的。

职业流动的决定性问题和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结合起来:生养孩子的时间、数量和对孩子的抚养,总是存在的平均分配日常家务的问题,避孕措施的"单方面性",不愉快的终止受孕问题,性欲的类型和频度的差异,更不要说即使在人造黄油广告中都能感受到男性至上主义的那种态度的非理性。在所有这些引起冲突的有关男人和女人如何共同生活的重要问题中,地位的分裂变得明显了:同在女性生活处境中相比,父母身份的时间安排在男性生活处境中遭遇到十分不同的预设和阻碍

如果婚姻最终"服从于回忆"(subject to recall)——比方说,"适合于离婚"(如充斥市场的婚姻咨询手册所要求的,通过合约性的协议来避免因为婚外性行为而分割财产)——那么要避免的分割就简直是可预期的,并且所有决定和规则的不平等的后果就越来越公开。如果你考虑新的技术可能性和禁忌的瓦解——像心理学和教育学所阐明的那样塑造孩子心理的可能性,干预妊娠过程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科学虚构的人类遗传学的

现实——那么困扰家庭的东西就把曾经统一在它之中的位置逐渐分裂了：女人反对男人，母亲反对孩子，孩子反对父亲。传统的家庭统一性在面对其做决定的要求时分崩离析了。并不是人们将很多这样的问题带给家庭，就像他们所相信并责难他们自己的。几乎所有的冲突问题都有其制度的方面（比如孩子的问题，主要基于在制度上得到很好保护的以职业责任来共同照料孩子的不可能性），但这一洞见当然不支持孩子！以这种方式，所有从外部冲击家庭的东西——劳动市场、就业体系或者法律——都以某种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和简化的方式进入个人领117 域。在家庭中（以及在所有其替代物中）出现了一种系统地被决定的错觉，即认为家庭包含着改变新近变得显明的在实际关系中两性不平等的核心命运所要求的条件和手段。

即便是家庭的核心，双亲身份的避难所，也开始分离成它的组成部分，即母亲和父亲。今天在德国，与美国和瑞典相比，"仅"有1/10的孩子是在单身父亲或母亲的看护下长大的。当双亲家庭的数量下降的时候，单亲家庭的数量在上升。一个单身母亲不再仅仅是"遗弃"的后果，而是一种选择。因为存在着与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外没有其他任务）的矛盾，所以单亲在很多妇女看来是抚养孩子——现在人们比原来更需要孩子——的惟一方式。

如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1988）和玛利亚·雷里希（1986）所表明的，与孩子的关系和对孩子的责任的性质，伴随着家庭内的个体化过程而变化。一方面，在个体化过程中孩子被看作一个阻碍。孩子耗费钱财和劳动，前途难以预测，将人们束缚住，并将日常计划和生活规划投入一种无望的混乱中。一旦出现，孩子就发展并完善一种"需求的专政"，并且通过他们声带的赤裸裸的力量和微笑的暖意将自己的生物节律

强加在他们的父母身上。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情况使孩子成为不可替代的。

孩子是最后留存下来的、不可消除的、不可交换的基本关系的来源。双亲来了又走,而孩子留下了。所有想要却不可能在关系中实现的东西都指向了孩子。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两性间关系的脆弱,孩子获得了一种对实际陪伴和一种在生物学交换中的感情表达——在其他情况下正逐渐变得不寻常和有疑问——的垄断。这里有一种带有时代错误的社会经验在受到褒扬并得到培养,它正在变得不可能,并且恰恰因为个体化过程而为人们所渴望。对孩子的溺爱,给予他们的"童年阶段"——这可怜的受溺爱的小东西——以及在离婚当中及以后对孩子的丑陋争夺是这一状况的某些征兆。孩子成为孤独的最终替代品,这种孤独可以针对不断消失的爱的可能性而确立起来。这是私人类型的复魅(re-enchantment),它伴随着去魅过程出现并从中得到自身的意义。出生的数目下降了,而孩子的重要性在上升。通常孩子就是一切。孩子的花销总是处在难以承受的边缘。但那些相信(经济的)耗费使人们不生育孩子的人,只是落入了他们自己的"支出—收益"的思考方式的陷阱里。

工业社会不仅仅保存而且产生的那一点点中世纪成分正在消逝了。人们正在从被美化成自然的东西的封建性别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其历史维度上认识到这些是重要的,因为这一"社会历史"变迁是作为私人的个体冲突发生的。将苦痛感受全部回溯到早期童年社会化的个体历史的心理学(和心理疗法),正在变得行不通。在那些冲突使人们面对指派给他们的生活模式的地方,在那些人们失去了如何生活的楷模的地方,他们的不幸就不能回溯到他们自己的个体生涯历史的错误和决定之中。在从现代的封建男女性别命运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性欲、婚姻、色 118

欲和双亲身份同不平等、事业、劳动市场、政治、家庭及包含在其中的对未来没有意义的生活形式有很大很深的关系 心理学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化及对其思考方式的"社会历史"修正，要想不在个体性的表面搁浅这是必要的 ——个体性通过将问题的原因错置在那些有问题的人身上而从中获益。

未来发展的前景

根本的冲突正在确立。但如何以公共和私人的方式"克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结论不能从前面提到的解放的客观因素中得到。这主要依赖于政治发展与支持和补偿的制度可能性，这同样也依赖于个体的星丛与出现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个人安排的可能性。历史上出现的可能性领域在这里将由 三个(决不是相互排斥的)变量来加以描述：复归家庭传统形式；依据男性模式的平等化；超越男女角色的生活形式的实验。

复归核心家庭

在追问"家庭"的未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从错误的前提开始。广为人知的核心家庭模式面临着某些"缺乏家庭"的模糊观念，或者被归结于另外 一种家庭模式正在取代核心家庭。如果上面所概述的分析是正确的，就不太可能是 一种家庭形式取代另一种家庭形式，而更可能将出现广泛的家庭和超家庭的共同生活形式，而且它们将持续共存下去。典型地，很多这些形式——独身、婚前与婚姻中的共同生活、公社生活、经过一次或两次离婚后的各种亲子关系等等——将成为 一个整体生涯的不同阶段。

但即便是作为现代化后果的生活形式的分化和多元化，也

被很多人看作和指责为对现代世界中的生活的文化价值和基础 119 的威胁。对很多人来说，逃离婚姻和家庭是过度的个人主义，而应该从制度上通过支持家庭的相应措施来加以反对。当然，这特别是指那些希望获得“她们自己的生活”的妇女们，她们超越了她们在家庭劳动和婚姻供养上的归因角色，同时在政治的和私人的努力中遇到了威胁、怀疑和阻碍。保留“家庭”的措施因此将定位于家庭生活的标准模式——挣钱的丈夫、做饭的妻子以及两个或三个孩子——这是一个仅仅伴随着 19 世纪早期的工业社会而产生的模式。除了所有这些得到证明的个体化和解放的趋势，还有导致强调“回到厨房!”的要求的状况和发展。

绝大多数妇女都远离经济独立和拥有职业保障的个人生涯。这甚至表现在参加工作的妇女的人数上。在德国，1988 年只有刚刚过半的(51.7%)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妇女在工作——这些妇女在家庭外工作或被正式注册为失业——虽然比例在增长(1983 年是 50.7%)。同一年龄段的男人有 4/5 在工作。换言之，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的妇女仍旧依赖于婚姻和她们丈夫的供养。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与有限的并很可能在缩减的劳动市场的总体容量，保留并维持了传统的男女角色和责任。从工资劳动解脱出来转向婚姻供养的趋势，因为很多妇女对孩子的期望而得到支持。妇女角色的两个稳定因素——失业和对孩子的需要——在青年妇女缺乏教育的状况继续存在以及缺少职业教育的地方是特别有效的；这导致了更年轻的一代女性中的根据教育等级制而产生的生涯模式的分化。

但任何在劳动市场紧闭的大门后面看到对家庭的拯救的人，忽视了在这些条件下男女被假定并且希望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现在，年轻妇女如何应对她们坚定地表达出来的工作要求

的失望，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丈夫的依赖，这仍旧是完全不明确的。同样不明确的是，是否相应地有很大一部分男人准备（并且甚至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职业状况的基础上）再次接受挣钱者角色的束缚。无论在任何哪一种情况下，妇女对平等的期望与工作和家庭中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都被转移到家庭内外的私人领域。不难预测的是，这相当于一种由外因形成的私 120 人关系中冲突的扩大。最后，劳动市场的篱墙只是在表面上稳定了核心家庭；实际上，人们将挤满离婚法庭的过道或者婚姻顾问和心理医生的候诊室。

同时，妇女新的贫困以这种方式被预定了。任何迫使妇女离开劳动市场回到厨房的人，在面对上升的离婚数字的时候都失败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或她正在为社会的大部分人保持着社会安全网上的孔洞。

这指出了所有意在恢复男女在职业和家庭中的旧有关系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根本缺陷。首先，它们在法律上与既有的现代原则和基于民主建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平等的地位不是归因于出身，而是通过成就和参与对每个人开放的工作而得到的　相抵触。其次，家庭内的和两性间的变化被简化为一个私人的问题，而其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的联系却被忽略了。

这不仅反映在时常得到宣扬的有关如何冉次弥合失去和谐的家庭的意见上。一些人相信特殊的“家庭教育课程”可以提供补救办法。还有人将择偶的专业化看做核心的疗法。而还有人相信，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婚姻咨询机构和治疗措施，问题将获得完全的解决。从色情文学到合法堕胎，再到女权主义，所有的东西都因为造成“家庭危机”而受到责难，并要求有恰当的因应措施。这里，困惑和无助是解释的源头。冲突得以产生的历史

发展和社会情境仍旧完全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

然而,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车。任何真的要恢复50年代的核心家庭的人,必须拨转现代化的时钟。那意味着通过强调母性或者改善持家的形象来使妇女离开劳动市场,这不仅仅是偷偷摸摸地而且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并且,不仅仅是离开劳动市场,而且是离开教育。男女间的工资差异将会增加;即使平等的法律权利得到保留。必须要加以检视的问题是,不幸是否不是从普遍选举权开始的;流动、市场、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将被限制或禁止。简言之,现代性的不可分割的原则将被分割,自然地归因于一个性别并自然地对另一个性别保留,并且始终是这样。

男女的平等

作为一种选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妇女平等的要求。现代性的普遍原则要针对它的家长式的划分——在家务上、在议会和政府中、在工厂里、在管理上等等——来证明和建立。在对妇女运动的讨论中,平等的要求总是和改变"工作的男性世界"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斗争是为了争取妇女的经济保障、影响力和共同决策,也是为了使其他"女性的"取向进入社会生活。讨论的对象将是某种解释的常常是不可见的后果。如果平等在"为所有的人建立的劳动市场社会"的意义上得到解释和执行,那么完全流动的个体的社会将应运而生。 121

如果考虑到其最终的结论,那么充分发展的现代性的形象就是单个的个人。在市场的需求中,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的需求被忽略了。那些在此意义上在劳动市场中要求流动而不考虑家庭利益的人就是在要求家庭解体——恰恰是在他

们作为市场的使徒的能力中。劳动市场和婚姻(或一般的关系)间的矛盾,只要婚姻还等于妇女的家庭责任和对职业或流动的放弃,就还是隐匿的。今天,它爆发到这样一个程度:家庭分裂和专职工作取决于(结婚的)配偶的审慎。伴随着这种与市场相一致的对平等的解释,个体化的旋涡越来越控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它也表现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里迅猛增长的单身家庭和单身父母的数量上。它同样通过正处于这些状况下的人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得以明确。

在根本上必须或应该独自过的生活中,尽管存在着社会的取向和任何个人的多样性,为了避免这种生活方式免受其内在的危险,预防措施都是必须的。交际圈必须为最富变化的场合而建立和维持。这要求人们更多地去准备帮助别人承受负担。友谊网络的强化仍是不可缺少的,而这还是单身生活能够提供的乐趣 甚至恰当选择的蜉蝣都具有其吸引力。所有这些都假定了一种尽可能有保障的作为收入来源、自我确证和社会经验的职业地位。这必须相应地加以维持和保护。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个人生活的宇宙",依据作为中心的本我(ego)及其敏感、潜能、弱点和力量来加以塑造和平衡。

但只要这一个体化的生存模式获得成功,危险就会增长:它可能成为一种基本上仍然被需要的关系(婚姻、家庭)的不可逾122 越的障碍。在单身生活中,对另一半的期待和把那个人结合进一种真正是"自己的"生活结构的不可能性一起增长着。那样的生活充满了不在场的另一半。现在,已经没有留给他或者她的空间。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孤独的抵抗:关系的多样性、给予它们的权利、生活习惯、对日程的控制、应付伪装之下的极度痛苦的退却方式。所有这些脆弱的和小心调试的平衡,被所需要的伴侣关系所危及。独立的设计成为孤独的监狱的门闩。个

体化的圆圈封闭了。"自己的生活"必须得到更好的保护，帮助产生它们所要防范的痛苦的墙应该更高一些，

单身的生活形式不是现代性的歧路。它是充分发展的劳动市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逻辑中发生作用的对社会纽带的否定，在其最发达的阶段开始侵蚀持久伴侣关系的前提条件。因而，它是一个矛盾的社会化(sociation)例证，在其中，破裂了的高度社会性不再显现，如这里表明的，这一反应至今还是一个"理想型的特征"。然而如资料所表明的，它确实适合于不断增长的现实的破裂。进而，它可能是在当前的制度状况下要求两性平等所带来的不可见的和不需要的后果。如大部分妇女运动一样，进一步拓展现代性据以发动的传统，并主张和追求与市场相一致的男女平等，这是所有人的绝对的权利。然而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可能情况下，在这条路的尽头都不是与平等权利的和谐，而是在相互抵触和分离的过程和境况中的孤立，这在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外表下已经存在着很多征兆。

超越男女角色

上面这两种极端的变体都误解了占据核心位置的基本事态。在家庭和劳动市场间出现的矛盾，并没有在第一种保留家庭的模式或第二种使劳动市场普遍化的模式中得到解决。男女间的不平等不是一个可以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结构和形式中得到修正的肤浅问题，这一点仍旧没有被认识到。相反，这些时期性的不平等被置入工业社会的基本规划中，被置入其生产与再生产和家庭与工资劳动的关系中。在那些关系中，矛盾在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间产生。相应地，它们不能通过赞成在家庭和职业间的"选择自由"来加以消除。男女的平等 123 不能通过以不平等的设计联结起来的制度结构来完成。只有整

个发达工业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通盘考虑，从而反映出家庭和关系至关重要的需求，超越男女角色的新型的平等才会一步步获得。再家庭化的伪选择或者市场的完全权力，在这里与限制和缓冲市场关系的第二种方式——它与有意促成社会生活形式的做法有关——相冲突。接下来，我们将主要关注基本概念的要点。

原则可以被看作这里所概述的理论解释的精确镜像。可以说，伴随着家庭的个体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分离在家庭内开始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只有工作和生活的再统一的制度可能性在分离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以及在分散的市场生涯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存在或有可能存在，从中产生的矛盾相应地才能被克服。

让我们先从劳动市场要求的流动性开始。首先，可以想像去减轻流动自身的个体化影响。到现在为止，职业流动在个体流动中还是必然的事情。家庭，进而是妻子，跟随着丈夫流动。由此出现的选择——妻子放弃事业（以及其所有的长期影响）或者"分裂家庭"（作为离婚的第一步）——作为个人问题遗留给结了婚的夫妇。与此相对的是，我们正在尝试并制度化一种流动的共同模式，它的原则是：如果你需要他或她，你必须给他或她的配偶找到一个工作机会。就业机构将必须为家庭组织就业咨询和推荐。企业（和政府）将被要求不仅去倡导"家庭价值"，而且要通过共同就业模式（或许包含一些组织）来帮助他们。相应地，你也必须去考虑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流动障碍（比如在兼职的学术工作市场中）是否可以减少。

当然，鉴于（德国）超过200万的稳定的大规模失业，减少整体流动性的要求甚至似乎比它实际上还不现实。类似的效果可以从十分不同的出发点得到，比如通过普遍放松存在于加入劳动市场和谋生间的联系。也许社会援助在所有公民的最低收入

方面可以增加,也许保护不健康者和老年人的问题可以与工资劳动脱开关系。这种在劳动市场中的松动有其传统(福利国家的担保,劳动时间的减少等等)。考虑到在大规模失业中表现出来的紧缩效应——妇女涌入劳动市场,伴随着因为劳动生产力 124 的提高而出现的劳动量的减少(参看第六章) 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即使是一种受到以"亲家庭的"方式压制的劳动市场动力,也仅仅是解决问题的 ·个方面。人的社会共同存在将再 ·次成为可能。核心家庭以及其受到削弱的社会关系表现了 ·种劳动的极度强化。很多通过多个家庭的协作(更)容易完成的事情,如果必须由单个家庭来做,将成为超长期的负担。最好的例证是父母的任务和关切。但包含多重家庭的生活和协作群体往往被居住状况所排斥。职业流动和单身的趋势已然成为现实。居所正在变得更小。它们还将按照单个家庭流动的需要来设计。公寓、房屋和居住区的规划排斥多个家庭 -起流动的可能性。而这只是 -个例子。不仅仅是居所、房屋和居住区规定了个体化并阻碍了社会生活。几乎不存在任何对实质变化的幻想的限制。比如说孩子的抚养,可以不仅仅通过邻里的帮助来减轻负担,而且这也可以通过合法认可新的职业——"白天妈妈"(day mother)——或者通过还没有使父母的家教成为"隐匿的课程"的一部分的教育系统来完成。

对于这 ·"乌托邦"的实现和维持当然有很多可说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理论论争,特别是有关打破家庭保守主义和信奉市场之间的虚伪对立的论争。诚然,某种制度改革仅意味着创造并保护 ·种可能性的领域,男女自身将创造和试验超越封建归因角色的新的共同生活

形式。[1]

因而，颇受攻击的“私人性和内在性的避难所”(refuges of privacy and inwardness)获得了一种核心的重要性，一眼就可以看出，70 年代的社会运动衰落成了“主观的自我反应”。如任何人所能看到的，在婚姻和家庭内外的关系和义务的日常现实中，在不适合未来的生活方式的负担下，进行着艰巨的劳动。整体上来说，变化——我们必须改变仅仅将它们看做私人现象的做法——正在出现。正在成为反思性规划的个人生涯，甚至奇特地拥有了革命的潜力。在这里，被结合在一起的是所有类型的共同生活的敏感实践，是尽管有挫折但仍要修复两性关系的努力，以及一种基于共同的和被承认的压迫的再次觉醒的团结。前进中的倒退源于很多因素，但也肯定源于对抗制度性负担的
125 压力。今天，男女相互指责的很多东西不是他们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一观点可行，我们将获得更多的东西，甚至可能获得变迁
126 所必需的政治动力。

---

① 雷纳·玛利亚·里尔克对这些变得普遍化的错误所知甚多，并在世纪之交(1904)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女孩子和女人，在她们新的个人发展中，将仅仅是暂时地维持着男性特征和缺点的模仿者以及他们生涯的重复者的角色。在这些过渡阶段的不安全感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妇女仅仅是通过大量和多样的(常常是荒谬的)掩饰而从男性的歪曲影响中解放出她们自己的最内在的本质……妇女的这种在痛苦和落魄中诞生的人性，将在她于外在境况的转变中摆脱仅属于女性的习俗惯例的时候出现，而仍旧没有发现这种变化的男人将会因之而感到惊异和触动。某一天(其可信的征兆今天，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已经出现并被谈论着)，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的女孩子和女人，她们的名字将不是简单地指示着男性的对立面，而是她们自己的东西，是不表明任何保留和限制的东西，而仅仅是女人的存在和生活。与男人最初的意愿相反，这一过程将根本地改变现在充斥着畸变的爱情的体验，它将爱情重塑为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而这更为人性的爱(它将温和地并以无限的体谅展现自身，将在忠诚和放弃上更友好更明确)，将类似那种我们以这样的努力和奋斗力图得到的爱，即包含两个相互保护、限制和尊敬的独立个体的爱。”(Rilke 1980：78f.)

第五章
个体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

"个体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暧昧不清甚至令人厌恶，但又确实是一个涉及某些重要内容的概念。因而，人们想方设法从重要的方面、从现实来探究它。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术语本身在意义上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在了一旁。现在，我将通过两个步骤的讨论来做一些概念和理论上的澄清。首先，我将勾画普遍的、分析的和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式。这里涉及到从马克思经由韦伯到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的诸多经典论述，或许一些核心的误解也存在于其中。然后，与战后的各种情形相联系，这一"模式"将超越原先的论述而得到补充和澄清。如此，个体化理论将浓缩到这样一个核心论点：德国（或许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如此）过去地 20 年所出现的东西不能再以现有的概念来加以理解。相应地，它将被看做一种新的社会化（societalizaiton）模式（如果我被允许使用这个怪诞的词的话）的开端，一种个体和社会间关系的"变形"或者"范畴转型"[①]。

---

① 科里和罗伯特（1984）在说"作为（历史上新的）社会化形式的个体性"时，他们指的一定是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

个体化的分析维度

“个体化”既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是一项20世纪下半叶的发明。相应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布克哈特),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中(埃利亚斯),在清教徒内心的禁欲主义中(韦伯),在农奴从封建束缚的解放过程中(马克思)就已经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跨代家庭的松散化过程中(伊姆霍夫),发生在离开乡村和城市爆炸性发展的过程中(雷德勒和科克卡)。在这一普遍意义上,“个体化”是指文明进程(在埃利亚斯的意义上,1969)的某些主观—127 生涯性的方面。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普遍的模式)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

这三个因素——脱离(或解放)、稳定性的丧失和重新整合——自身都包含着无数的误解。它们构建了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式。对我来说,将它在概念上以第二种维度——具体而言,就是依照(客观的)生活境况和(主观的)意识(以及认同和个体性)——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得到了如下的图表:

个体化

	生活境况 （客观的）	意识/认同 （主观的）
解放		
稳定性的丧失		
重新整合		

一个有关"个体化"的重要误解来自于将这个术语与右上的单元格等同。很多人将"个体化"与"个人化"（个人性－独特性　解放）联系起来。也许是这样的。但或许相反的论断也同样正确。迄今为止，对于表格右边的东西就几乎或完全没有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以下的讨论基本上将限制在表格的左半边，客观的一边。这就是说，个体化被理解成一个社会学的范畴，置于对生涯和生活境况研究的传统中。这一传统假定在人们所遇到的事情同他们在行为和意识中所做的反应间做出区分具有相当的可能性。[①]与那些首先与意识、认同、社会化和解放相联系的探讨相反，本章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将个

① 表格右边基本上是文化批评的核心主题——"个体的终结"——比如阿多诺（1982）和兰德曼（1971）的著作。相应的探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为社会化理论和研究的对象（如Geulen 1977年的著作所概括的）。我认为卢曼最近的讨论（1985）也在此列。同样请比较努纳温克勒（1985）的概述。

体化理解成为一种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的改变？在发达劳动市128 场的情况下，广泛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境况模式和什么样的生涯类型？

个体化再思考

如何使这个一般模式更为具体呢？也就是说，人们所脱离的那些支撑的社会形式和保障是什么？推进这一切的条件和媒介是什么？它们引向何种新的控制和社会化的形式？

两个有关解放[Freisetzung；在这一语境中，"解放"将适用于这种暧昧的现象；通常意义上的解放(liberation)将被emancipation代替]的核心要点已经被提出来，而另外两个将很快出现(那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从基于身份的阶级的脱离，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而它现在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些解放与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和文化上的阶级责任有关。当然它们是伴随着生产领域中的变化而来的，诸如教育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关系的司法仲裁以及保留基本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社会构成变化。这可以通过家庭结构、居住条件、区位分配、邻里关系、休闲行为、俱乐部成员资格等等的变化来加以描述。从整个社会结构上考虑，这一"无产阶级环境的消解"(Mooser，1983)表现在根据分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以一种经验上有意义的方式，用阶级和阶层研究来解释各种模式的特有困难上。一方面，这些困难导致了一种在决定分层界限方面方法论上隐蔽的保守主义(Bolte，1983)，另一方面，则导致向阶级对立的非历史的先验性的倒退。

第二个有关解放的关键点在于妇女境况的变化。妇女从婚姻的供养——传统主妇存在的物质基石——中脱离出来。因而，整个家庭纽带和供养的结构受到个体化的压力。经协商达

成的临时家庭出现了。[1]

与阶级文化和家庭关系结构相应，还有另外两个有关解放的关键点。它们不再始于再生产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开始，伴随着同职业和公司有关的解放而出现。我们特别是指工作的灵活化和工作场所的分散化（电子化家庭办公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新的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形式（参看第六章）以这种方式出现了。这些导致了（有关福利法案的）供养问题，同时也创造了生活境况和生涯发展模式的新类型。 129

以上就是对这个观点的扼要论证。现在转向更富有建设意义的问题：这些逐渐出现的个人境况与哪种重新整合和控制的类型相联系？首先，我提出三个论点。

（1）个体化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后果。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说得更概略一些就是，不再是社会阶级代替身份群体的位置，或者家庭作为一个稳定的参照框架代替了社会阶级义务的位置。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或者换言之，家庭作为"倒数第二"种世代和性别之间的生活境况的综合物崩溃了，而家庭内外的个体成为以市场为中介的生计以及生涯规划和组织的行动者。

（2）这一社会生涯状况的分化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标准化。更确切地说，就是同一个媒介同时带来了个体化和标准化。这适用于市场、货币、法律、流动和教育等等，它们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方式。正在出现的个体境况彻底地依赖于劳动市场。可以

① 这一事态不仅适用于双亲，而且适用于孩子和年轻一代的事实，已经在谢尔青年研究(Shell Youth Study)中得到说明。在此之后，最近又出现了更理论化的探讨(Rosenmayr, 1985; Hornstein, 1985; Baethge, 1985)。有关女青年和青年女工人的特殊问题，请看迪岑格尔和比尔顿(1982)。

说，它们是市场依赖在生活（谋生）的各个角落的延伸，它们是市场依赖在福利国家阶段的延迟后果。它们在充分发展的市场和劳动市场社会中兴起，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记得还有传统的支撑方式。格奥尔格·齐美尔（1958a）早已形象地表明货币是如何进行个体化和标准化的。这不仅对于依赖货币的大众消费和“劳动市场中的解雇（Freisetzungen）”是正确的，而且对于通过培训、仲裁和科学化等方式脱离并重新联结市场社会来说，也是正确的。

（3）但个体化和标准化的共时性还没有适当地包含新兴的个体境况。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它们跨越了分离的私人领域和形形色色的公共领域。它们不再仅仅是私人境况，而且总是制度性的。它们拥有矛盾的两面性——依赖制度的个体境况。制度的外表成为个体生涯的内在品质。（在宽泛的意义上）这一横跨制度边界的生活境况设计来自于它的制度依赖性。解放了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劳动市场，而且因为这样，它们依赖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管理和支持、交通规划、消费供应以及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咨询和照料的种种可能性和风气。这都指向个体境况的依赖制度的控制结构。个体化成为依赖于市场、法律和教育的社会化的最先进模式。

130

生涯模式的制度化

在个体化过程中，阶级差异和家庭联系并没有真正消失。相反，它们退回到相对于新近出现的生涯规划的“中心”而言的后台。生涯自身也成为反思性的。拥有同样收入水平的人们，或者用老式的说法，在同一“阶级”中的人们，可以甚至是必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亚文化、社会纽带和认同间做出选择。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出发，我们不再能够确定其观点、关系、家庭地

位、社会和政治理念与认同。与此同时，新的依赖性产生了。这些都指向个体化进程内在的矛盾性。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个体化产生在普遍的社会化条件下，这种条件使个体自主性日渐消失。个体确实从传统的义务和支撑关系中解放出来，但代之以劳动市场的生存束缚和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拥有的标准化和控制。传统纽带和社会形式（社会阶级、核心家庭）的位置被次级中介和制度所代替，它们在个体生涯上留下印记，并使人们依赖于时尚、社会政策、经济周期和市场，这一切是与人们意识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个体控制的图景相矛盾的。

因而，可以确切地说，正在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依赖于境况和条件的个体化的私人存在，完全脱离了它自己的控制范围。与此相应，风险冲突从其起源和发展框架来看，排斥任何个体的处置。如我们所知，这或多或少包括所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东西：从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漏洞”到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到避免官僚制的专横、提供教育机会、解决交通问题、防止环境破坏等等。因而，个体化实际上在一种普遍的甚至相比以前更缺少个体自主私人生存的社会境况下发生。

受身份影响的阶级文化或家庭生涯的节奏同制度生涯模式相重叠或者被其代替：进出教育体系、进出工作或者退休年龄的确定，都基于社会政策。而且，所有这些都存在于一个纵向的生涯截面中（童年、青年、成年、退休和老年），同样也存在于每日的 131 生活节奏和时间经济中（协调家庭、教育和事业）。相互重叠的领域，在妇女的“标准生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妇女在其生涯中基本上受家庭事务的影响，妇女仍旧过着一种矛盾的双面生活，同时受家庭和机构的影响。对她们来说，家庭的主题仍旧适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和事业的主题也适用，这便导致冲突性的危机和持续出现的无法满足的要求。

个体化意味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所产生的生存形式是孤立的大众市场(没有对自身的意识),对整体设计的家居、家具、日用品的大众消费,以及通过大众媒介发起和采纳的选择、习惯、态度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个体化将人们引向一种在家庭和世族亚文化中并不知晓的内在控制和标准化。

这些制度塑造生涯的方式意味着,教育体系(比如教育计划)、职业生活(整个生涯中以每日为基础的工作时期)和社会保护体系中的规则直接与人们的生涯各阶段相互结合。制度上的决定和干预(隐含地)也是人们生涯中的决定和干预。通过提高日托中心的最低年龄,妇女就很难或不可能同时履行她们的婚姻与职业责任(这也同时意味着妇女被赶出了劳动市场)。通过降低退休年龄,对于整个一代人(连同所有的机遇和问题)来说,"社会性老龄"的时间段增加了。同时,下一代人劳动参与机会的重新分配便完成了。因而,个体化确切地说就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塑造以及在政治上结构化生涯和生活境况的能力。实际的塑造作用总是"看不见的",作为一种与组织内部问题(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和工作等)相联系的决策的"潜在的副作用"。一个更有趣的例子——电视——可以表明这种联系。

电视进行孤立和标准化。一方面,它使人们从传统地塑造和划定的交流、经验和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然而同时,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相似的位置:他们都在消费制度化生产的电视节目,从檀香山到莫斯科再到新加坡都是如此。个体化——更确切地说,就是从传统生活过程中的脱离——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和标准化。所有的人即使在家里都各看各的电视。这样,就出现了一群孤立的大众观众的社会图景,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孤立的大众隐士的标准化集体存在(Anders, 1980)。

这些现象是超越文化和超越国界而发生的。我们可以说,

整个世界中,所有的人都在夜晚相遇在电视的村落里,消费着新闻。在这种意义上,甚至不再能够认为个体境况在制度上依赖于民族国家。它们是全球标准化媒体网络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和国家的边界不再具有合法性。通过媒体,我们过着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面生活。我们在同一时刻既在这里又在其他某处;我们对于自身来说是独自一人,而我们却在听同样的一场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或者,当我们在这里独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黎巴嫩内战恐怖景象的参与观察者。这些新出现的生活境况在其两地性(bilocality)中似乎显示出一种个体化和制度化的"精神分裂症"。然而,存在非常不对称的机会来看透这一点。如果你在内部,就很难看清;但对于那些处身外部的并对之有争议的人来说,就比较容易。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

新的控制和影响的机会也与此相关。从大部分公众(他们如果被忽视,就会引起退缩的症状)的观看习惯考虑,电视节目一劳永逸地安排了家庭每日和每周的时间表。

私人领域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与外部环境隔离的领域。外部的条件和决策转变成内部的并成为私人的,这发生在电视网、教育体系、公司或者劳动市场中,或者发生在一般不考虑其私人生涯后果的那种交通体系中。任何没有看到这些情况的人,都会错误地理解发达现代性阶段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基本特征,即不断出现的个体化私人领域与教育、消费、交通、生产和劳动市场等等似乎独立的生产部门和领域间的重叠与交织

当这种制度依赖增长的时候,正在出现的个体境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制度依赖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拥有某种优先性。谋生的关键在于劳动市场。进入劳动市场的条件需要教育提供。任何无法进入这些领域的人面临的将是社会上

和物质上的湮没。没有良好训练的境况和有训练但没有相应的工作一样糟糕。惟有在这些条件下,那些被职业培训体系排除在外的人,才会落入社会深渊。是否具有培训的机会,成为年轻人能否进入社会的问题。同时,经济或人口的"上升和衰退"造成了整个一代人落入社会的边缘。这就是说,依赖制度的个体境况在相应的同辈群体状况中带来了随着经济和劳动市场周期133 出现的代际劣势和特权。然而,这些总是表现为政府机构的不充分照顾和支持,从而政府机构就承受着防止出现制度上预定的整个一代、一个生命段或年龄群的机遇匮乏的压力,或者通过法律条例和福利国家收入再分配对那些匮乏进行补偿的压力。

制度以法律上确定的标准生涯范畴行动,这些范畴与现实相差得越来越远。标准生涯的基础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因而,社会保护体系就与参与工资劳动相适合。同时,不能进入或很难进入就业体系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考虑到始终规模庞大的失业群体,社会保险所基于的那些标准和规范愈发显得无法满足,家庭内和男女之间的生活境况也越来越无法与它们相适应。供养家庭的人(family bread-winner)这一概念,已经被一种家庭中赚钱者和供养者、提供照料者和后代抚养者根据阶段和决定的不同而共同分担和互换的图景所取代。"完整"家庭的位置被多种多样的"分裂"家庭所取代。单身父亲群体的增长面临让母亲垄断抚养孩子的权利的离婚法的歧视。

一个其发展远离了工业社会的生活轴线——社会阶级、核心家庭、性别角色和事业——的社会,面对的是一个服务、管理和政治机构的体系,它们现在逐渐具有了一种代表衰微的工业时代的功能。它们通常以教育和规约行为干涉"背离"了官方规范标准的生活方式。它们成为那些现在只适用于人们当中不断减少的一部分的确定性的提起者和鼓吹者。以这种方式,制度

性规划的规范和社会地有效的规范间的对立加剧了，而工业社会的大厦有滑入标准的律法主义的危险。

通过制度依赖，个体化的社会同时变得对所有那些围绕着传统(阶级)边界存在的冲突、约束和联盟敏感起来。劳动市场中双方的竞争降低为一种确定的对立，而其中心被各种形式所占据，在这些形式当中，受压制的社会性使其自身在私人生活中得到感知。它们可能表现为如下情形：如此这般设计出来的我们后院附近的高速公路，恶化的学校环境，或者我们附近的引起我们“集体命运”意识的核废料储藏堆。

然而，决定性的问题是，制度塑造的集体命运如何在个体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得以表现，它们如何被感知如何被处置 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你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凹透镜彻底 134 破碎了，虽然布满了无数裂纹的镜面本身无法产生统一的映像，但每一块碎片都产生了它自己完整的视角。当人们从社会纽带中脱离出来并通过不断涌涨的个体化浪潮而私人化的时候，一种双面的效应出现了。一方面，感知的方式成为私人化的，而与此同时——沿着时间轴线来考虑——它们变得非历史化了。孩子不再知道他们父母的生活环境，更不要说他们的祖父母了。这就是说，感知和时间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直至最后在一种局限情形中历史缩减为一种(永恒的)现在，而一切都是围绕着个体的自我和生活轴线展开的。另一方面，那些有组织的行为可能影响个人生活的领域在逐步减小，而塑造个人自身生涯的束缚在增多，恰恰是在那些再次成为新制度境况的产物的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决定。根本不受决定影响的生活机会的几率正在减少，而开放的并必须个人化地构建的生涯几率正在增加。从而，生活境况和进程的

个体化意味着生涯成为反思性的;社会预定的生涯转化成为自我生产并将不断生产的生涯。有关教育、职业、工作、居住地、配偶、孩子的数量等等的决定,以及所有暗含的次属决定,不再是可能,而是必须被做出。即使是那些"决定"这个词显得大而不当的地方,因为既没有意识也不做选择,个体都将不得不"补偿"不做决定的后果。这意味着经过制度上和生涯上的规定,生涯结合可能性的构建手段出现了。在从"选择性生涯的标准"(Ley, 1984)开始的转变中,冲突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自己动手"的生涯类型分离出来(Gross, 1985)。富裕与贫穷生活的非此即彼,或者冲突状况的非此即彼,被生命中某些阶段(比如,对刚刚成年的人来说,在婚姻、后代和配偶的选择上是趋同的)特有的问题的积累相对化了,这需要特殊的私人的和制度的规划。

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个体必须忍受永远的不利条件,去学习将自身看做行动的中心和自己生涯、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等的规划者。在反思性生涯的状况下,"社会"必须作为一种"变量"进行个体化的操纵。当然,教育机会的稀缺是一个影响到每个人的问题,但它对于铸造我自己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其他什么人可以为我做这一切吗?为了以中等成绩报考医学专业,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这就是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必须被看做"环境变量",这些"环境变量"可以为了个人的生活空间,通过适合个人行动领域并与可能的接触和行动的"内部分化"相对应的"创造性的措施"来进行中和、破坏和缓和。

所需要的是一个有活力的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模式,这个模式把自我(ego)置于其中心,为它分配并开辟行动的机会,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允许它通过正在出现的有关个人自身生涯的可能性和决定,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肤浅的理智假想拳的外表之下,这意味着为了生存,必须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

心的世界观，它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负起责任，比如说，把它们设想成或变成对形成个体生涯这个目的有用的东西。

作为结果，闸门向由制度和社会产生的风险与矛盾的主观化和个体化敞开了。决定个体的制度化状况不再仅仅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和状况，而且也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后果，他们必须这样看并且这样对待。这同样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在将个体甩出社会轨道的典型行动的特征中，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变化。袭击他们的东西原先被当做上帝或自然的"命运的打击"，比如战争、自然灾难、配偶的死亡，简言之，就是他们并不担负责任的事件。然而，今天那更像一个"个人失败"的事件，从考核不合格到失业或离婚。人们甚至要选择个人的社会认同和成员资格，以这种方式管理自我，改变它的形象。在个体化社会中，风险不仅仅在量上增加；性质上的新类型的个人风险出现了，即选择和改变个人认同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负担，新形式的"罪责归因"出现了。或迟或早，这些对于个人的和反思的处置、规划和生涯生产的束缚，将产生对于教育、照料服务、医疗和政治的新需求。

在最后总结的时候，让我们指出一种最终的、显然是矛盾的基本特征：个人化的生涯，一方面与自我形成重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向事实上无限的可能性开放。任何在系统理论视角中表现为分离的东西，都成为个体生涯的整体组成部分：家庭和工资劳动、教育和就业、管理和交通体系、消费、教育等等。子系统边界适用于子系统，而不适用于依赖制度的个体化境况中的人们。或者，以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化境况跨越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别而存在。子系统边界穿越作为被系统边界 136 所隔离的生涯方面的个体境况。以这种方式考虑，我们关心的是其联系和分裂(在系统层面被忽视了)在个体生涯中不断产生

摩擦、不和谐与矛盾的个体化制度境况。

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如何生活的情形成为系统矛盾（比如教育和就业之间的，或者法律上假设的与实际的标准生涯之间的矛盾）的生涯解决方案。① 这不合乎卢曼的说法：生涯是子系统合理性的总和，而绝不是其环境。不仅仅是在街角商店里买咖啡的行为成为对南非种植园工人进行剥削的共谋。并且不仅仅是由于杀虫剂的普遍使用而使得一个（替代性的）化学基本过程成为幸存的前提。不仅仅是教育和医疗、社会法律和交通规划需要能动的"会思考的个体"，如他们非常好地表述的，这些个体被假定为依靠他们的清醒头脑可以在无常的终极性丛林中找到自己的道路。所有这些及其他专家都将矛盾与冲突丢给个体，并意图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解传统化和全球媒体网络的形成，生涯逐渐脱离了联系的直接区域，而跨越了国家和学科的边界开放着，寻求一种远距离的道德（long-distance morality），它使个体处于一种潜在地不得不持久挺立的位置。在个体落入无意义的泥潭的同时，他们被抬高到世界塑造者的地位。政府（仍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行使权力，生涯却早已经对世界社会开放了。此外，世界社会成为生涯的一个部分，虽然这种持续的过度要求只能通过闭目塞听、简化和冷漠这类相反的反应得到容忍。137

① 研究实践的一个后果是，遵循家庭和分层研究路径的生涯研究变得有疑问了。任何研究个体境况的标准化和（暗含的）政治可构建性的人必须知道教育、就业状况、工业劳动、大众消费、社会法律、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的问题。生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强加的要求的意义上——将类似于某种从主体视角进行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成为一种跨越了专业社会学的布局的研究类型。

第六章
劳动的解标准化

在工业社会中,工作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古希腊城邦中,奴隶被赋予了为生存而劳动的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只是去满足日常的需要,除了维持生活外别无所求。自由民则投身于政治活动和文化创造。即便在中世纪,当劳动依旧是手工劳动的时候,劳动的分工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对贵族来说,劳动是单调乏味的,那是较低阶层的事情。当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家庭的男性后裔不得不从事诸如医疗或法律这样的"平民工作"时,一个衰微世界最确实的标志就出现了。如果你和那个时代的人讲述最新的衰退预言甚或工资劳动的消失,他们将不会理解你的话以及你对这些事情表示出来的激动情绪。

劳动的意义对于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来说,不在于工作本身,至少那不是根本性的。当然,它源自劳动力的耗费是谋生的基础这一事实,特别是对个体化生活方式而言。但即便如此,也只是解释了一部分劳动社会衰退所造成的冲击。在工业时代,工资劳动和职业已经成为生活的轴线。这条轴线与家庭一起,形成了这个时代中生活所处的两极坐标系。这可以通过一个完整无损的工业世界的理想类型化的、纵向的截面加以阐明。早在孩童时期,虽然还完全附着于家庭,孩子就已经通过父亲将职业体验为一把走向世界的钥匙。后来,教育仍旧在其所

有阶段都与不在场的"他人"的职业相联系。成年人的经验完全由工资劳动所左右,这不仅是因为工作本身按时做出要求,而且因为在工作之外、之前和之后,人还要花费时间来考虑它和筹划它。即便是"老年",也通过无职业来加以界定。当人离开了工作,他就步入老年,而这并不考虑人是否觉得自己老了。

或许没有什么可以像下面的情景那样清晰地展现出工资劳动对工业世界中人们的意义——两个陌生人相遇并问对方:你是谁?他们不是以爱好如"鸽迷",或信仰如"天主教",或有关美的理想如"虽然我是一个红头发,但我有副热心肠",而是以他们的职业如"西门子公司的技工"来做回答。如果我们知道交谈者的职业,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知道了他或她是谁。职业在这里成为一种相互辨识的模式,凭借它的帮助,我们可以估价个人的需要和能力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陌生,使人和其职业等同。在生活沿着职业的轨迹展开的社会里,职业确实包含某些关键的信息:收入、地位、语言能力、可能的旨趣、社会交际等等。[①]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尔穆特·谢尔斯基(1942)仍旧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家庭和工作对于现代人还是两种重要的保障形式——它们给予生活"内心的稳定感"。在工作中,个体获得了进入社会活动的途径。甚或可以说,"职业的拥有者"可以穿过他工作的针眼而在小范围内成为"世界的共同塑造者"。在这方面,职业(家庭也一样)确保了基本的社会经验。职业是可以通过参与被经验的社会现实。[②]

① 详细的论述请参见贝克1980年的著作。

② "对我们来说,生活的持续性和职业的持续性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我们更乐意变换社会和地域环境。今天,只要能够在变化中保住职业机会和成就,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更换住地,甚至国家和社会环境,而不会变得'背井离乡'。"(Schelsky,1942:32)

先把这一图景是否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境况的问题放在一边，在今天以及可以预计的未来，很多情况下它都不再有效了。就像另一方面的家庭一样，职业已经失去了很多原有的保障作用。连同职业一起，人们失去了一种源于工业时代的内在生活支柱。工资劳动的问题和要求在整个社会辐射开来。即便在工作之外，工业社会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资劳动社会，这反映在它的生活规划、欢乐和悲伤、成功的理念、平等的评判、社会福利法案、权力的制衡以及政治和文化等等之中。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工资劳动的系统转变，那么我们面临的也是一种社会的转变。

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系统到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系统

在西方工业国家，大规模失业的讨论仍旧沿用旧的论点和概念。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阵营中，都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可以回复到19世纪那种作为经济持续刺激的结果的充分就业。我们正站在一个反工业理性化(counter-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进程的起始点，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就业体系的原则受到威胁，而且不仅仅是职业和资格结构的重新分层——作为一种可能性以上这些还没有被系统地从理论和政治上加以考虑。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专家们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德国)即使经济增长有二至四个百分点，超过200万的高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在那时"有收入就业者"的急剧增长的潜在可能性才会因为婴儿潮一代的来临而减小，同时，工作需求才会大幅度低于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水平。在这一数字游戏中，夹杂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如 140

多年来持续增长的妇女参与劳动的比例；或者迅速增长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产品的应用，最终以销售的上升能对那些为技术所破坏的职业做出多少补偿；最后，在何种程度上，全职工作会转变为多种多样的兼职工作模式，而使原先本质上根据全职职位对工资劳动量进行的所有计算不会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时间的消失而失效。

这样的计算所伴随的不确定性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它们的重要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对发展的估价预示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好日子前的一段长久的等待，但在这些"亏欠"的年份之后，"丰裕"的年份会在劳动市场再次出现，它有着决定性的后果——一种非政策性的休眠(non policy hibernation)由此(或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提倡。依据这种为政策制定者减轻压力的观点，所需要的就是缓和"受影响的几代人"的境况的"过渡性措施"。这不仅不需要对经济的、教育的和劳动市场政策的基本过程的试验，而且说到底这样做也是不允许的

这种近年来很大程度上在学术和政治中流行的解释，随着在这里可以系统地加以质疑的前提而兴衰，这个前提就是：传统就业体系的持续性以及它的支柱——公司、职业生涯、工资劳动等等。这一解释排斥了就业系统的反思性现代化，以及就业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社会政策和法律的现代化浪潮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工资劳动的系统转变的可能性，应该根据以下论述来加以思考。

与亲爱的老波普尔一样，我将从以下的假设开始：一项经验检验，甚至证伪，都需要一种理论取舍才可能成立。因而，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一组假设——不多也不少——它们还没有经过批判性的讨论和经验检验，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在于打破流行的(从而也是政治上意义重大的)持续性思想的理论一元论。只

有通过就业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解释之间由此产生的竞争，将来才有可能对双方理论视角进行经验检验。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劳动的反思性现代化所意味的东西将首先获得阐明(也请参看第八章)。进而，这一系统的转变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并伴随什么样的结果来推进并有可能完成，它将遇到什么样的阻碍，产生什么样的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获得详细的澄清。141

在对到2000年失业发展状况的推断中，以及在人们的教育和生涯规划以及政治思想和行动中，我们仍旧认为当前职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持续的。如此评估的依据是以下这些假设，它们在现代化和自动化的浪潮中变得有疑问了。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过激烈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与危机而兴起的就业体系，奠基于它各个主要方面的高度标准化：劳动契约、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在其合法状态中，劳动就业遵循着为了整个工业部门和就业群体而以集体方式进行协商的标准契约。我们曾经以为工作在空间上集中在(大型)商业机构中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终身的全职工作"仍旧是工厂里以及生涯过程中规划和利用劳动力的时间组织标准。原则上，这一体系使工作和非工作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清晰区分成为可能，而且它构成了相互排斥的就业和非就业的社会与法律地位。在当今和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浪潮中，这一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在边缘地带将开始松动，使劳动法、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这三个支柱变得灵活化。从而，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将成为流动的。灵活而多元化的不充分就业形式正在流行开来。

现在，我们必须知道，即便在最偏远的角落里，终身全职工作的形式也在被各种各样的工作时间的灵活方式所打破。还不太清楚工资劳动的空间集中是否也将如此。一个公司的不同功能，至少是一些特定的领域(行政、打字录入、管理和服务)，可以

通过电子方式连接起来，从而可以非集中地、“地上分散地”或者“不考虑地理因素地”进行组织。从出勤规定的放宽到分工和团队在地理上分散的重新网络化，到通过部分或完全的电子化家中工作来实现附属性职能，这一空间上的分散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所有这些都具有同样的结果。社会劳动和生产过程间的联系松动了，那种直接协作意味着“在同一场所工作”的看法被削弱了。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体系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了它的形象。工作的可见特征，即集中在工厂车间和高楼大厦里的活动，被公司不可见的组织形式所代替。就业体系从旧到新转变的可见特征，将是那些逐渐被放弃的大规模工作建142 筑，它们好比工业时代的恐龙，更多地只是提示我们一个行将消失的时代。最终，没有什么实质上新的东西取而代之。这仅仅反映了相互交织的资本的不可见性向实质工作组织层面的转移。另外，这给管理提供了一种类似的益处，我们可以忽略组织而重组网络。

不言而喻，这些工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灵活化不必同时出现，也不对应就业系统的所有附属领域。我们假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多元化是独立或者依照先后关系发展的。今天还不清楚灵活化将在什么地方永久或暂时地受到客观的或政治的限制，什么功能领域（从而还包括职业群体、工业和分工）将被排斥在外。然而，工作时间的灵活化，全职工作向多种多样的兼职工作的转变，对于收入来说不可能是没有影响的。这就是说，工作时间的分割（说到底它并不是为了更多的就业，而是为了不充分就业的普及和失业的减少），在集体衰退的意义上（跨越专业、职业和等级体系），伴随着令人不快的收入、社会保障、事业机遇和组织中的地位的重新分配。在这种意义上，工作时间政策总是再分配政策，并创造新的社会不安和不平等。这存在着

近年来工会抵抗运动和很多公司推进的积极的仓促(active haste)的基础。即便不充分就业的灵活方式与(年轻)人们不断增长的兴趣相吻合,实际上只是为了平衡工资劳动和家庭劳动,以上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如接下来要说明的,工作的人们在其工作中获得的自主权可以与工作的身心健康风险的私人化——通过工资劳动的空间灵活性——联系起来。劳工保障的规定反对劳动方式分散化的公开推行,而违反和遵从的代价被转嫁到工人自己身上(就像商业企业节省了工资劳动集中组织的费用,这包括从房屋租金到电子设备的维护费用)。

如果你从整体上考虑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解标准化的后果,你便可以说,在工业社会中正在发生一种转变,即从终身的单一工作场所里的全职工作(它时刻伴随着失业的可能性),到充满风险的灵活、多样和分散的就业体系(它可能永远不会引起完全失去付薪工作这个意义上的失业问题)的转变。在这一体系中,以各种不充分就业的伪装出现的失业,已经和就业体系"结为一体",但换来的是一种普遍的就业不安全感,而这在"老的"工业社会的统一的完全就业体系中是闻所未闻的。正如在 143 19世纪,这一发展在根本上也是对双面神雅努斯的追忆。进步与伤痛以一种新的方式相互渗透在一起。公司在生产力上的所得伴随着控制问题。工人以从工作中得到的一点点自由换来了新的束缚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失业消失了,但以普遍的带有风险的不充分就业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一切意味着一种暧昧的矛盾发展已经开始,在其中,进步与后退紧密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其长远后果和风险在政治意识和行动上不可计算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我们说"不充分就业的风险社会体系"时所表示的意思。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习惯化,在工业社会中,工资劳动要在

家庭外进行，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家庭和工资劳动的分离，在风险社会中因为出勤规定宽松化、分散工作场所的电子化网络联结等，而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其深远的影响现在只能加以猜测。这些影响可能包括：更容易的日常交通；进而是自然和人类环境压力的减轻；城市的非都市化；日常局部流动性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那样的流动被电子化的方式替代，因而尽管有空间稳定性的存在它甚至还在增加。

到现在，基本的范畴——公司、职业、工资劳动——不再能够把握正在变得不可见的劳动组织中新的现实。这些范畴对于新出现的不充分就业体系，就好像将封建社会的劳动概念运用于工业社会的劳动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这一发展，工资劳动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被消除了；相反，新出现的灵活多样的不充分就业形式既比原来的工资劳动形式更彻底，同时也不再是工资劳动。这只意味着，戴着工业社会概念的眼镜，我们睁大自己的眼睛力图去认识新出现的劳动现实。

你也可以像这样勾勒出在这里逐渐展开的观点：那些完全对立的方面——正式劳动和非正式劳动、就业和失业——在未来将融合为一个灵活多元、具有风险的不充分就业形式的新体系。通过工资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对不充分就业的这种整合将不会完全代替我们熟悉的就业体系，但它会与之重叠或者削弱后者，而且考虑到缩小的工资劳动规模，将使之处于持续的适应压力下。这一发展还可以描述为一种劳动市场沿着（有关时间、空间和社会福利法案的）规范标准化路线的分岔。以这种方式，新的劳动市场分工在统一标准的工业社会劳动市场与一种灵活多样的风险社会的不充分就业市场间产生，在这里，第二种市场在量上增长并不断控制第一个市场的地盘。这是为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做了一种理论的区分，并勾勒了一种类型学。现

在我们必须证明,经由技术产生的就业体系的现代化已经在这个发展方向上消失了。

所有的劳动政策,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公司内部的,至少从80年代开始,业已服从于系统地产生的工作缺乏的再分配规律。如果人们曾经假设经济复苏也将引起失业减少,但在最近几年已经看得很清楚,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很多企业——几乎所有德国的大企业——在过去几年中提高了它们的营业额,而同时进行了裁员。这一状况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有了与现有劳动力的再组织相结合的微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数控机械装置——电子化的"现代自动化奴隶"——首先占据了生产领域(自动化、化工和机械装置工业)的大部分工作,而计算机也接管了行政和办公室工作。如果你观察1977年到1984年间生产力的提高,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发展的程度和突破性力量。虽然1977年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中每小时生产力提高只有2.7%,但它在1979年上升到4.7%,并从此以波浪起伏的形式下降到1.5%。直到1983年最后一个季度,它突然骤升,在1984年(估计)达到10.8%。这意味着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生产力有了一个可观的提高!(《明镜》1984,第21期:22页及以下)在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上,有与这一发展相应的过程,在1980年只有1255个,到1982年已经上升到3500个,而到1984年已经达到6600个(《南德时报》2月8日,1985:23)。而这里,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发展的第一波,而其终结甚至还难以想像。

在盛行的全职工作就业体系中,失业依照一种清晰的、黑白分明的就业和失业模式进行分配。在当前的危机处境下,工作时间政策的隐藏益处作为一种服务于组织及其被探究的优点和缺点的解救者而被宣扬。标准化的全薪周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十

分有限的。[1] 周工作时数同样也是如此，正如争取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斗争的结果所表明的。它同样适用于降低退休年龄或者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它们都是为了减少集体交涉(collective bargaining)能力之外的工资劳动规模。在标准化的完全就业体系的状况下——这一结论已开始成形——工资劳动的减少必然导致失业者被排除在外。在工作时间灵活化的压力中存在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观点拥有很多的支持者：政府机构，它们在大规模失业的"政治丑闻"的压力下采取行动；妇女和年轻的雇员，他们希望获得家庭和工资劳动更佳的和谐程度或更多的"时间自主权"；公司，它们要在工作时间的组织化利用中发现生产力无可置疑的源泉。这一国家、大部分雇员社会和组织管理的宏大联合，面临着工会(和传统社会民主工党)的抵抗，后者发觉传统就业体系的基础和他们自身的权力地位正在消失。

145

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僵局中，商业正在把兼职工作和不完全就业作为生产力来挖掘，或者更一般地说，在微电子技术的基础

① 这种九工作(失业的简称)与就业体系的结合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以下这些：提高平均最初就业年龄；降低退休或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兼职工作；减少一生总的、每日或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平均休假、节日和工作休息时间；增加整个工作期间脱产培训的时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本世纪工资劳动(在更多的意义上可以指全部西方工业社会)的萎缩。在德国，每日、每周、每年和终身的劳动时间在过去一百年里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在1880年每周工作时间是65小时，在战前仍旧保持在55小时，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降低到48小时。50年代中期后还在47小时，每周工作6天，一年大致2周的假期。现在对比起来，平均假期是6周多，每周工作5天，共40小时。通过常见的提早退休，终身工作时间相应地减少，对很多雇员来说，工作在57到60岁之间就结束了。同时，年轻人越来越晚地进入就业体系。在50年代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每年每个工作小时对应有2.9个非工作小时，而这个比例到1980年上升到1:4.1。持续的教育措施以及耗费在上面的时间过去二十年在工厂里也迅猛提高，所以几乎可以说培训和教育被重新整合进工作和就业体系中

上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对劳动力的常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包含的组织可能性进行解标准化。[①] 当然，这是以一种矛盾的、不统一的和无联系的方式进行的。

令工业社会的观察者惊讶的是，“在核心的工业部门，在使用现有劳动力上，一种根本性的变迁在我们眼前发生，对泰勒主义的陈词滥调中，上述变化被过了狭隘和片面地理解。当然，我仍旧可以说，在核心部门里发生了范式转变”（Kern and Schumann, 1984:149）。在泰勒主义工作形式下的劳动的取代与再组织，恰恰是与最初有效的“管理哲学”相反而发生的。有限的部分活动在现今或即将到来的自动化中可以全部或大部分由机器人生产来承担，由此而来的新的监督、指导和维护工作，可以在一些技巧较高的专业化位置上组合起来。分工的原则以及对劳动的破坏，被一种基于更高技艺水平和专业化自主权的局部任务联合的相反原则所代替。大量的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被少

① 对通过改变作为组织生产力的工作时间来减少工资劳动体系的发现，有着更悠久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马丁·斯卡拉(1968)认为在美国最早对劳动社会的侵蚀是在一战前。当然，统计上可验证的发展趋势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因为它们被看做可逆转的。简要地说，实现了三个基本个事实。首先，车间工人数量和商品生产的扩张水平直到 1919 年都在增加，而工人数目从 1919 年到 1929 年一直在下降，虽然生产力同时期增长了 65%。其次，虽然在整体经济中每年参与工作的人数从 1890 年的 2830 万人上升到 1910 年的 4250 万人，但从 1910 年到 1920 年只增长了仅仅 100 万而最终在 20 年代成为零增长。斯卡拉对这些统计上可记录的发展和关系的解释是，新生产力在 20 世纪初期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影响。以这种方式，不依靠劳动力参与的增长（以工作时间来衡量）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你可以发现对“旧的”工业体系的侵蚀和“新的”20 世纪生产力的发源。三个核心的管理创新保证了 20 世纪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在受到 20 年的抵抗之后泰勒主义最终在工厂里广泛施行；第二，电气化以及其新的可能性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扩散；第三，新的组织技术应用，以平衡地理上非常遥远的企业的集中和分散。在这个早期阶段，信息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合理化已经开启了那些被发掘和利用的生产力增长。亦见赫施霍恩 1979 年的著作。

量的“专业化自动操作工人”所代替。组织灵活性的增加和工作人员的急剧减少，在这个工厂自动化的阶段通过现有劳动的联合和专业化的增强而成为可能。

最初，这基本上只适合核心工业部门的生产领域的情况。几乎同时，全职工作向多样的兼职工作关系的转变正在被推进，特别是在服务行业（零售行业、百货公司、旅店和餐饮业）。经过了最初的一段抵制后，企业已经可以看到生产力从中的获益。146 获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事实上：一方面，公司可以依据订单的情况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以这种方式，一部分企业风险鉴于公开失业的限制而通过灵活的不充分就业转嫁到雇员身上。另一方面，雇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生产时间从工作时间中分离出来，并更长久、更集中、更紧凑地利用生产装置。最终，兼职工作和不充分就业通过更容易的变动工作，通过更及时地补偿因为新技术出现造成的技术贬值，通过多样化来总体上削弱人事部门的权力，会逐渐拓宽公司的人事政策的活动余地。

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泰勒的“分解哲学”已经从劳动的实质方面转化到就业的时间关系和契约关系方面。这一新的“就业关系泰勒主义”的起点不再是劳动和机器的结合，而是时限、法律的保障和无保障，以及多元化的劳动就业契约。基于微电子化的工作时间的灵活安排，还远没有达到极限。这一组织的“时间之谜”的核心在于弹性时间制（在 1985 年上半年已经有 600 万工人采用了这种制度）和不同形式的兼职工作（以周或者月为单位进行的轮换制等等），有超过 20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从中获益。

伴随着工作时间理性化的可能性，公司开始了最初的作为生产力储备的附属职能外放（outsourcing）的试验。这一发展源于秘书和行政工作的再组织。但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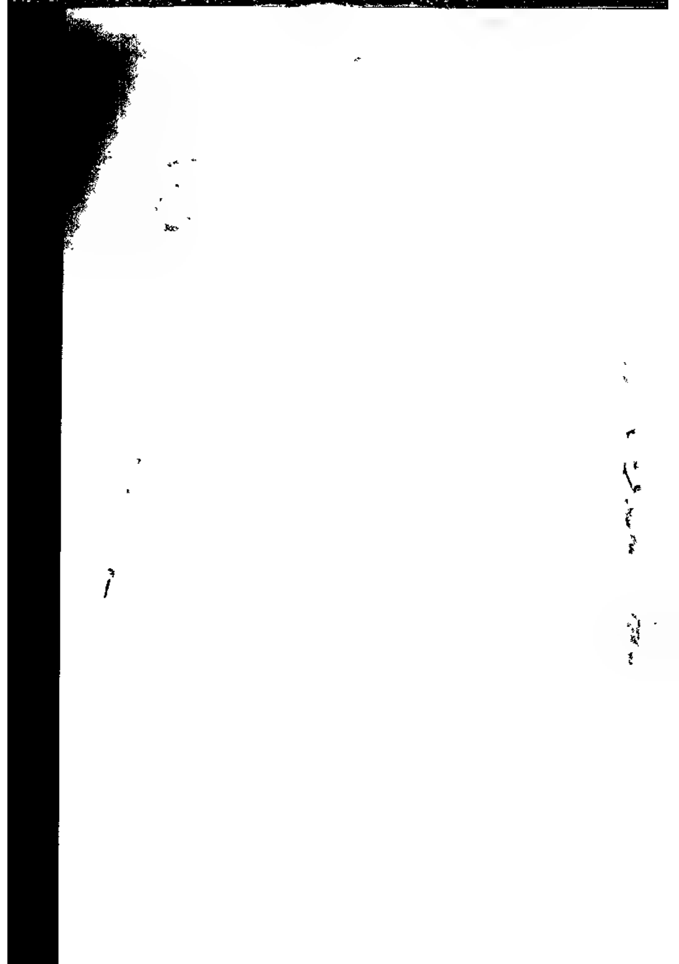
具有的基本可能性，在经过了成功的测试阶段后，它也会适用于其他职能领域。它核心的意义在于，微电子化具有以信息技术的手段来减少或消除在劳动分工中各相连功能领域直接协作的需要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电子通信的使用和恰当的存储介质促成了劳动和生产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分隔，然后是新型的分散劳动，备受争议的“电子村落工业”(electronic cottage industry)代表了它的一个极端形式。这里，特殊之处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传统劳动组织的集中模式的再组织同时发生。生产力的增长，以及非职业化和非店铺化的人力组织新形式的试验和实行，仍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于已经在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出现的不具有合同保障 147 和组织性的就业形式的广泛程度，还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或数据。从它的范围和部门与类型的特殊分配来看，这部分劳动市场在研究地图上还是一个“空白点”。依照卡罗拉·穆勒(1982)的基于临时合同的合法劳动的数据，在1981年注册的临时工有4.3万人。非法的临时工作估计有六到九倍之多。临时工作的扩散大多以工作和服务的假合同的形式、雇佣外籍工人的形式出现，这特别表现在金属制造和建筑业。她也同样援引了微量就业的数字(每周工作少于20小时而不能获得失业救济，每周工作少于15小时而不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以两种形式被雇用的，1979年有大约124万人，大多是妇女)、季节就业的数字(在某段特殊时间内充分就业)和基于能力的可变工作时间的数字[kapovaz]。最后这种形式是一种时间上受限的、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劳动合同；因为它对商业的巨大益处，特别在零售行业，已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我们还必须注意“生产和服务的合同”、“自由职业者”和违法工作等等(Müller 1982: 183—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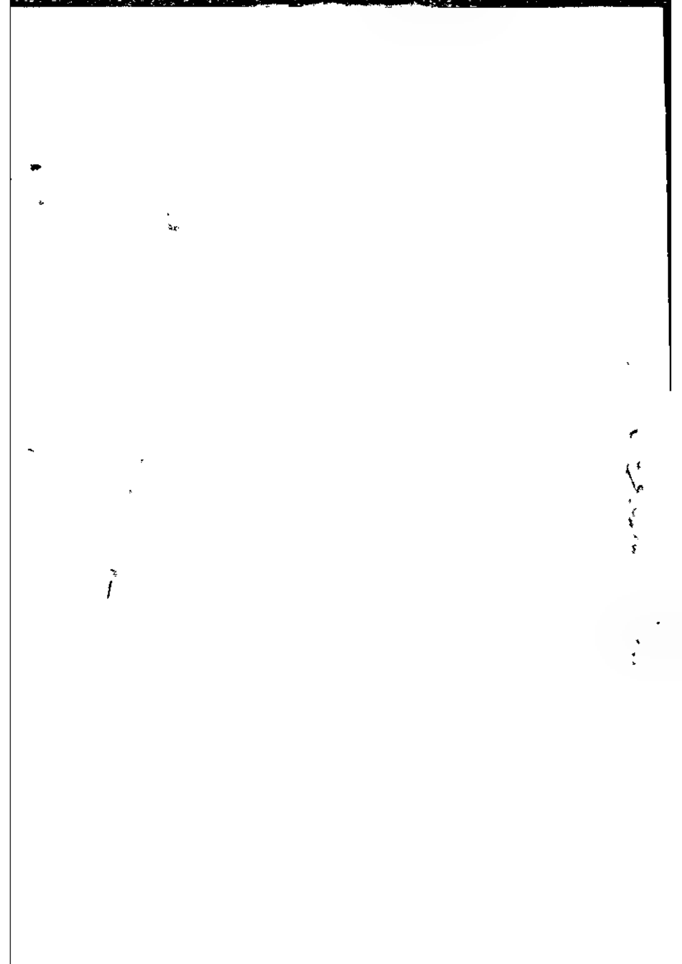
如往常一样,这一状况的爆炸力量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不再像马克思猜想的那样破坏了所有权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思考,生产力的革命潜能有产生相反结果的危险。它会打破劳动契约和劳动市场的关系,即工业社会中劳动力的供应和使用形式,而且以这种方式,将会在劳动市场中的政党与其利益组织间产生完全新型的力量不平衡。考虑到现行工资劳动体系中的利益投入以及它们的政治和组织力量,不难预测这一工业社会的系统转化将遭遇相当大的抵抗,并可能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段。为此,今天不可能做出有关工业社会劳动体系的哪一部分将受到这一反思性现代化的影响、哪一部分不受影响这样的预测 尽管如此,新的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体系和劳动的分散模式可以通过其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来确证自己,而生产力提高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劳动体系的"历史优越性"取决于将不断加剧的工作机会的缺乏状况从作为政治威胁表现形式的公开失业中排除出来,而重新分配甚或使它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从就业者的角度看,不充分就业伴随的风险同因独立处置自己生活而获得的局部的自由和自主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

148 很多人会认为,从全职工作向兼职工作的转变,对克服失业是一大贡献。而相反的情况同样会发生。不断增加的个体化强迫人们进入劳动市场。随着灵活多样的不充分就业和临时就业的出现,遭到截削的劳动市场社会仍在坚守的大坝崩溃了。仍在妨碍参与的障碍——劳动市场与家庭或学校的不相容性被消除了,而作为"隐性储备"的妇女和年轻人可以涌入劳动市场寻找灵活的不充分就业。随着适合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对其的需求会不成比例地骤涨;一场需求的雪崩因此而爆发,那将使以前的所有评估成为废纸一堆。

综上所述，我们关注的是一种工业社会体系在其最发达阶段自我革命的理论。理性化进程不再严格地只发生在工资劳动的工业形式和过程中，而是逐渐地背离它们。不仅是预设的劳动力和工作范畴中的量的分配被释放出来的革新动力再分配了；而且它们的社会形式与组织原则本身也被重新加以塑造。在这一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延续和断裂以某种方式相互交织并互为条件；从我们所知的工业标准化体系向未来灵活分散的不充分就业的断裂性发展，是基于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性化的不变逻辑而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与特定生命阶段的对应关系，意味着就像失业的生命阶段已经成为大部分人标准生涯的组成部分一样，现在作为完全就业与失业之综合的不充分就业正在被整合进就业体系。这一生涯"规范化"有其制度对应物——有着开放的终结。政治反应仍旧是核心的。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未来就会受到贫穷的威胁。随着法律上保证的最低工资的出现，我们会从这一发展中得到些许自由。 149



第三部分
反思性现代化：论科学和政治的普遍化



在前面两部分里，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的指导性理论观念，已经沿着两条论证路线得出：首先是基于风险分配的逻辑（第一部分），然后是基于个体化法则（第二部分）。这两方面论证如何相互联系并同基本概念相联系呢？

（1）个体化进程在理论上被概念化为反思性的产物，在其中，福利国家所保护的现代化进程使那些构建进工业社会的生活方解传统化。工业社会自身的"传统"代替了前现代性。就像封建农业社会中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在19世纪初被消解一样，同样的转变如今发生在那些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阶级和阶层，核心家庭和扎根其中的男女的"标准生涯"，劳动的标准化等等。因而一个19世纪的神话失去了它的神秘色彩，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仍继续主宰着科学、政治和日常生活行动的神话——工业社会在其对工作和生活的规划上是一个现代社会。

相反，首先以工业社会的形式获得认可的现代性的规划，同样也在该形式中被制度性地截削了。在基本原则上——比如说，通过劳动市场的中介谋生的"常规"——工业社会的圆满也成为自身的扬弃。福利国家所保护的劳动市场社会的普遍化，消解了阶级社会和核心家庭的社会基础。在这里，对人们的冲击是双重的。人们从表面上是自然注定的生活方式和工业社会的确定性中脱离出来，而这一"后历史"的终结与他们的思考、生

活和工作形式中历史意识的丧失同时发生。以社会道德环境、家庭、婚姻和男女角色来应付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传统方式不断遭到失败。在同样的程度上,需要个体自身来应付焦虑和不安全感。或迟或早,对教育、咨询、医疗和政治的社会制度的新需求会从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的冲击与颠覆中产生出来。

(2)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性也可以通过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关系得到说明。直到现代化进程使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基础解传统化的时候,以工业社会的方式来使风险分配服从于财富分配逻辑的一元论思想才开始衰微。所要处置的不是将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区分开的风险;也不仅仅是自动化和新科技产生的风险不断增强的性质和程度。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构性的社会153 状况在反思性现代化之后完全改变了;当现代化风险被科学化的时候,它们的潜伏期被消除了。工业系统的乘胜前进逐渐抹杀了自然和社会的界限。相应地,自然的毁灭不再归结于"环境",因为工业将其普遍化,它们就变成系统固有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矛盾。失去了潜在性并作为系统的后果而全球化的现代化风险,不再能够在符合基于工业社会模式的不平等结构的假设下,被含蓄地加以处置。它们发展出一种冲突的动力学,它脱离了生产和再生产、阶级、党派和子系统的工业社会模式。

因而,风险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不仅与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生产和分配"逻辑"间的区别相一致,而且源于以下事实:首要的关系被颠倒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假定了"财富逻辑"的主宰地位,并且断言了风险分配同它的相容性,而风险社会的概念则断言了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相容性以及二者的"逻辑"冲突。

在第二部分中,这些论证将在两个方向上得到深化。在所

有工业社会的概念中，都假定了科学知识和政治行动的可专业化，这就是说，假定它们可以被划定和独占。这明显地表现在为"科学系统"和"政治系统"设计的社会系统和制度中。与之相反，下面将提出的观点是：遭遇到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和已确立的科学化状况的反思性现代化，将导向科学和政治特有的解放(Entgrenzungen)。对知识和政治行动的垄断将发生分化，离开它们原定的位置，并以某种变化了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可得。因而，以下问题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是否仍旧是家庭政策，或者已有的人类基因科学，拥有第一位的权威，来决定人们如何在民主协议和投票之外共同生活。这意味着除了已经形成的特征之外，那些将今天不断涌现的风险与先前的风险区分开的东西，首先是风险的社会变迁范围(第八章)，其次是它们特殊的科学构造(第七章)。 154

第七章
科学超越了真理和启蒙吗?

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它们同时依赖于科学和社会的建构。科学是原因之一,是定义风险的媒介和解决风险的资源,并且凭借这一事实,它开启了自身新的科学化市场。在科学促成并界定的风险与对这些风险的公共批判的相互影响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矛盾重重。这一观点可以通过四个主题加以阐明。

(1) 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反思现代化之间的区分相应,可以从科学实践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中分化出两种格局:初级的(primary)科学化和反思的科学化。首先,科学被应用于一个"既定"的自然、人和社会的世界。在反思阶段,科学面临着它们自己的产物、过失和二次问题,这就是说,它们遭遇到文明的一种二次创造。第一阶段的发展逻辑依赖于一种被截削的科学化,在其中,对知识和启蒙的科学理性吁求仍旧排除了对科学自身应用科学怀疑论。第二阶段基于一种完全的科学化,它同样将科学怀疑论扩展到科学自身的固有基础和外在结果上。以这种方式,科学对真理和启蒙的吁求解神秘化了。从一种格局向另外一种格局的转化发生在科学化的延续中,但恰恰因为如此科学工作的内在和外在关系发生了变化

初级的科学化从传统与现代、普通人与专家的对立中获得

其动力。只有在这一分界存在的情况下,科学内在关系中的怀疑论才能在外在关系中科学结果应用的独裁式发展的同时变得普遍化。这一对科学和进步完全信仰的格局,是20世纪上半叶(虽然确定性消失了)工业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在这个阶段,科学面对的是它可以清除其抵抗的一种实践和一个公共领域,它有赖于科学的成功,并伴随着从尚未得到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承诺。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至于反思的格局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一状况的表征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开 155 端,它是随着认知社会学、意识形态批判、科学理论中的易错论以及专家批判的发展而出现的)。

当它们进入实践时,科学便面临它们自身客观化的过去和现在——科学自身是它们要去加以分析和解决的现实和问题的产物与生产者。以这种方式,科学不仅被当做一种处理问题的源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原因。在实践和公共领域中,科学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对它们的失败的平衡,而且是对它们的成功的平衡,也就是对它们没有信守的承诺的反思。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当成功增长的时候,科学发展的风险似乎以更高比例在增长;当付诸实践时,解放的途径和前提实际上同样展现出它们消极的一面,而这些也将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且,颇为矛盾的是,在一个依照科学分割和职业化管理的世界中,科学扩张的未来前景和可能性也与对科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科学的扩张,在科学专注于科学的时代,预设并行使了对科学和现行专家实践的批判,进而,科学文明使自己服从于一种动摇了它的基础和自我概念的公开传播的批判言论。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揭示了与其基础和后果有关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只会被它所揭示的风险和发展前景的潜在可能性所超过。以这种方式,一种科学的解神秘化过程开始了,在整个过程中,科学、

实践和公共领域的结构将服从于一种根本的变迁。

(2) 结果，一种意义重大的科学知识的非垄断化出现了：科学变得越来越必需，但就在同时，它对于社会所遵行的真理定义变得越来越不够。这种功能的丧失不是偶然的。同样这也不是出于外部的影响。这种情况作为科学有效性要求的胜利和分化的后果而出现；它是在风险社会条件下科技发展的反思性产物。一方面，当在内在和外在关系中都遭遇到自身的时候，科学开始把它的怀疑论的方法论力量扩展到自身基础和实践结果上。相应地，对知识和启蒙的吁求面对得到成功发展的易错论开始系统地减低。原来归之于科学的接近现实和真理的途径，被那些随意的决定、规则和惯例所代替。解神秘化过程扩展到解神秘者身上，并且因此改变了解神秘化过程的状况。

另一方面，当科学越来越分化的时候，有条件的、不确定的

156

和分离的细碎后果在增长并变得不可能加以研究。这一假设性知识的超复杂性，不再可能被机械的验证规则所把握。即便是像名誉、出版物的类型与地位和制度性基础这样的替代性尺度，同样也失效了。相应地，当科学化进行的时候，系统地产生的不确定性扩散到外部关系上，但也相反地使政治、商业和公共领域中科学后果的目标群体与应用者成为知识界定这一社会过程的积极的共同生产者。科学化的“客体”，在它可以而且必须主动操纵不同的科学解释的意义上，同样成为它的“主体”。并且，这不仅仅意味着在对立的高度专业化的有效性要求之间的选择；后者同样可以相互争斗，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重新融人一种适合行动的图景。对于科学的目标群体和应用者来说，反思性科学化开启了在科学成果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新的影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极具暧昧性的发展。它包含着通过科学从科学中解放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使社会上流行的与

启蒙科学主张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免于启蒙了的科学要求,并向通过经济政治利益和"新教条"实现科学知识实践的封建化敞开了大门。

(3) 相对于科学知识的胜利而出现的新的不可变性禁忌(taboos of unchangeability),正在变成科学研究独立性的试金石。进一步的科学化在继续,更为明确的风险境况和冲突进入公共意识中,加剧的形势成为行动的压力,而更具科技特色的社会带有变形为科学地产生的"禁忌社会"的危险。越来越多的部门、机构和状况,虽然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改变的,但被系统地排除在通过"客观限制"、"系统限制"和"自动力"(auto-dynamism)的建构而发生变化这种预期之外。科学不再能保持它们传统的禁忌破坏者的启蒙地位;它们也必须去适应禁忌建立者这一相反的角色。相应地,科学的社会功能在开放或者封闭行动机会间摇摆,而这些矛盾的外在期待在专业内部激起了冲突和分裂。

(4) 即便是科学理性的基础也没有免除普遍化的变化要求。人们创造的东西也可以改变。确切地说,是反思性科学化使科学理性自我强加的禁忌变得可见和有疑问。疑惑之处在于,支撑科技发展的"自动力"的"客观限制"和"潜在的副作用",是自我制造的,因而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现代性方案,即启蒙,尚未完成。它在对科技的工业理解中的实际上的僵化可以被理性的复活打破,并转化成为一种科学理性的动态理论,这种理论融入了历史经验,并以这种方式进一步以一种可以学习的途径来发展自身。 157

科学是否有助于对其实际风险的自我限制和自我控制,对这一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它是否超越了它自己的影响范围并在其成果的应用中去争取一种(政治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对于科学自称不可测量的副作用的可测量性,我们到底实行

什么样的科学？在这种方式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自身产生副作用并进而似乎确证了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的过度专业化是否将保持下去，或者在此情形中的专业化力量是否将会被发现是全新的和得到发展的；我们是否将重新拥有去学习处置实际后果的能力，或者通过忽略实际后果，不可逆转的状况是否会出现——它们基于无谬归因（imputation of infallibility），因而使从实践错误中学习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重要的是，在何种程度上，在处置现代化风险中，对征兆的处理可以被单纯的去掉原因这样的做法所代替，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关于风险的实际禁忌可以在科学上描述或者被考虑到的变量和原因打破。这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风险与威胁是否在方法论上以客观的方法被加以解释，并科学地被展现，或者是否它们被轻视和加以掩盖。

初级科学化和反思性科学化

初级科学化的开始阶段——那时普通人像印第安人那样被逐出他们的"猎场"，赶回"保留地"——很早以前就结束了，并且产生了标志着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间关系的整个优越性神话和权力梯度。那个时代的发展逻辑（是传统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今天只能在现代化的边缘地区才可以观察到——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①] 它的位置，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反思性科学化的冲突和联系所代替。科学文明进入了一个它不再只是去科学地认识自然、人和社会，而是去认识它自己、它的产物、影响和错误的阶段。科学不再与从预先存在的依赖中"解放"相

① 在当前"家庭科学化"的浪潮中，比如专家在家庭婚姻咨询中的主导作用；但即使在这里，科学化遇到的也是一个专业性和科学性地预先形成并受多种方式影响的实践领域。

联系,而是与它们自己产生的错误和风险的界定和分配相联系

不同的状况和过程、不同的媒介和中介,而不是初级科学化时期典型的过失管理,标志着反思性科学化的特征。在第一次浪潮中,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可以依赖科学理性和思考方法相对于传统知识基础、民间知识和日常实践的优越性——有时是真实的,而有时是表面上的——这一优越性很难被归因于科学工作中更低的错误水平,而是归因于在那个阶段社会地组织的对错误和风险的处置方式、 158

首先,对一个还未被科所触及的世界的科学洞悉,允许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问题的原因间进行明确的划分,在界线的两边是科学和它们(实际和潜在)的"对象"。科学的应用与一种明确的将问题和错误客观化的态度一起出现。野蛮的、不可理喻的自然和牢不可破的传统的强制,要为人们遭受的疾病、危机和灾难承担责任。

这一将问题和过失的来源投射到至今还没有获得探究的科学的荒漠的做法,显然与科学至今还没有显著地覆盖它们的应用领域这一事实相关。这也与科学自身的过失的理论和实践源泉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事实相联系。我们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说,科学的历史一直不是获得知识的历史,而是错误和实践过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知识"、"解释"和实践"提出的解决方法",在各种场合、在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中直接对立的原因 只要科学本质上还可以在科学内部成功地对付错误、过失和对它们的实践的批判,这就不一定意味着任何科学理性要求的可靠性的丧失。以这种方式,它们一方面面对相对非专业化的公共领域而保持着它们对理性的独占要求,而在另一方面,它们为学科内部的批判性讨论预备了论坛。

相反地,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甚至把爆发的问题、技术缺陷

和科学化风险追溯到以前科学支持体系的发展程度的不足，都是可能的，那样的支持体系可以转化进新的规划和技术发展浪潮，并因此最终进入一种对理性之科学垄断的加强。这一将错误和风险转化为科技的扩张机会发展前景的做法，一般都发生在使科学发展免遭对现代性和文明之批判的第一阶段，而这使科学发展成为超稳定的(ultra stable)。然而，实际上这一稳定性基于一种方法论怀疑主义的截削；在科学内部(至少如其自称的那样)，批判的规则已经普遍化了，而与此同时，科学成果以一种权威化的方式向外界推广。

显然，这些状况同样被削弱到这样的程度：科学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指导着对科学的关注。相反，确切地说，对错误和问题成因的预测使我们现在必须将科学和技术看做问题和过失的可能原因。在反思性现代化中进入关注中心的风险，摧毁了将风险变成发展机会的学科内部的转化模式。与此同时，它们消解了在19世纪末广泛建立起来的初级科学化的模式以及它在职业、商业、政治和公共领域间的和谐力量关系。

159

对现代化风险的科学研究，意味着以跨学科方式进行的科技发展成为它自身的一个问题；科学化被当做一个问题来进行科学研究。以这种方式，科学和职业在相互应对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将爆发出来。因为科学在这里遭遇了科学，进而是一种科学可以向另一种科学显示的所有怀疑论和所有蔑视。往往是同样具有攻击性和无力的普通人的抵抗被科学所拥有的抵抗机会所代替：反批判、方法论批判以及发生在所有对资源的职业争夺领域中的“阻碍行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的后果和风险只能通过不同科学对科学服务体系的批判(和反批判)才能展现出来。结果，反思科学化的机会似乎与风险和所开列的现代化缺陷成正比例增长，而和对科技文明进步的颠扑不破的信念

成反比例增长。风险得以被科学地开放和对待的大门,就是科学批判、进步批判、专家批判和技术批判。风险破坏了在内部处理错误的可能性,而迫使我们在科学、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的关系间进行新的劳动分工。

以这样的方式,对前现代化风险的揭示必将搅动科学职业间竞争关系这个马蜂窝,而激起一种科学职业经过世代累积而具有的全部反抗的冲动,这种科学职业以所有的力量(包括其科学力量)反对那些对它"宠爱的问题"和它精心构筑的"学术成果流水线"的"扩张主义侵略"。只要有关现代化的某些有疑问方面的公众意识还没有增长,没有转变成批判甚或社会运动,明确表达自己并将自身作为对科学技术的抗议而释放出来,对风险的社会承认和处置还会搁浅在这里所爆发出来的冲突性问题和无法化解的思想流派冲突上。那么,现代化风险只能通过公共认可从外部"强加给"科学,"指定给它们"。它们不是基于科学内部的,而是基于完全社会的界定和关系。即使在科学内部,它们也只能通过背后的动因——社会安排——来发展自己的力 160 量。

这将假定一股至今未知的对科学和文化的批判力量,它至少部分地基于一种对替代的专门知识的接受。伴随着反思性现代化,公众风险意识和风险冲突将引向抗议科学的科学化形式。我们正在经历的对进步和文明的批判,将自身与过去两百年中的批判区别开来。批判的主旨是普遍的;批判至少部分地受到科学的支持,并且现在正使科学面对着科学完全的界定力量。以这种方式产生了这样一个运动,在其中,科学被迫越来越显著地在全体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窘迫、所有的局限和"天生的缺陷"——所有那些长久以来在内部熟谙的东西。出现了"替代"和"受倡导科学"(advocacy science)的各种形式,它们把整个"科

学戏法"同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利益联系起来，并因此而得到恰恰相反的结论。简言之，在抗议科学的科学化过程中，科学强迫自身接受自己的夹道鞭笞。新的着眼于公众的科学专家出现了，科学论证的一些可疑的方面被反科学的思潮暴露出来，而很多科学通过它们的应用实践在前所未知的程度上服从于"政治化的验证"。

以这种方式，科学不仅经历了其公众可信度的急剧下降，而且也开启了自己新的活动和应用领域。举例来说，自然和工程科学遭受了很多公众批评，但同时又能够将其转化为扩张的机会。这些批评与"现有的"和"消失的"可忍受的风险、健康威胁和工作压力等等在概念上、手段上和技术上的差别有关。科学发展进入其反思阶段时所具有的自我矛盾性变得具体了：在公众中流传的对其先前发展的批判成为其扩张的动力。

这就是风险通过与科学、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的紧密相互作用构造自身，并进而反作用到科学，形成"身份危机"、劳动和组织的新形式、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方法论变化的那种发展逻辑。因而，对错误和风险的吸收与整个社会讨论的循环相关，可以说，它而对并与批判科学和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相融合。尽管如此，你也不要被欺骗；通过所有这些矛盾，我们得到了一条科学扩张的道路。现代化风险的公共讨论是一条在反思性科学化的条件下将风险转化为扩张的机会的途径。

这一对文明批判、学科间对立和有着公共影响的抗议运动 161 的解释，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阐述途径，以环境保护运动[①]的例证加以说明。保护运动从工业化的开端就出现了。而保护组织

① 在这里我的论证特别依靠的是罗伯特·C·米切尔(1979)的著作，同一主题请参看诺沃特尼(1979)和库珀斯(1978)。

所表达的有选择的批判(并且既不对工业化造成很多损失,也不是一种根本的批判),从未摆脱对进步的敌意以及围绕着它的复古氛围。这只是在工业化威胁自然的社会证据增加,同时科学解释完全脱离了所提供和被接受的古老保护观念的时候,才会改变。这些情况解释了以下的情形:不断增加的公众针对显而易见的工业化的破坏性后果的不满,支持保护运动并使其从具体的工业案例和状况中脱离出来,将其普遍化并加入一个更广泛的反抗工业化和技术化的运动中。

在美国,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工业化对自然生物体系的破坏性影响的批判性生物学研究,它真正地敲响了警钟。这就是说,使用公众可以理解的科学论证和语言,研究者考察了工业化对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现有的和潜在的影响,并将这些集中到一幅幻想的破坏图景中。[①] 当这些以及其他论证被抗议运动所采纳的时候,上面提及的那个反抗某些形式的科学化的科学化过程就开始了。

环境运动的目的和主题逐渐脱离具体的状况和最终很容易达到的个别要求(建立森林保护区、保护某个物种等等),而成为一种对工业化自身的状况和前提的一般性反抗。需要保护的东西不再是完全个别的状况、可以追溯到原因的可见威胁(石油渗漏、工业废料对河流的污染等等)。问题的中心越来越被对一般公众来说通常不可见和不具体的威胁所占据,这些威胁有时甚至在受其影响的某一个体的一生都不会发作,而是在这一个体的后代身上发作出来。在任何状况下,它们都是需要借助科学的感官——理论、实验和测量设备——才能被看作并被解释为

① 我在这里尤其想到了拉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它出版于1962年并在一个月里出售了一万本。也请看巴里·康姆纳的《科学与幸存》(1963)。

威胁。

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在科学化的生态运动中，抗议的场合和主题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进行抗议的行动者，即受到影响的普通人。在一些带有局限性的例子中，威胁甚至没有任何被感知的可能性，只能通过科学来传达，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被科学建构的。这并没有降低"普通人抗议"的重要意义，但它表现出它对"反科学"中介的依赖性。对威胁的诊断和与其成因的斗162 争，通常只有依靠科学测量、实验和验证工具的帮助才是可能的。它要求相当专业的知识，进行非常规分析的准备和能力，以及一般来说相当昂贵的技术设备和测量工具。

这个例子很具有代表性。因而你可以说，科学卷入了文明风险状况的起源和深化过程，和一种相应的三重危机意识中。不仅科学成果的工业应用产生了问题；科学也提供了认识和提出问题的手段——范畴和认知工具——无论是否把这些问题当做问题。最后，科学也提供了"战胜"与它应对之负责的威胁的前提。因而，如果再次提及环境问题这个例子，那些从前为这场运动所宣扬的控制对自然的影响的思想，今天在生态保护运动的各个专业化部门中已经所剩无几了。

> 恰恰相反，相关的要求是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系统研究和计算机模拟所提供的最新最好的成果中所发现的。生态系统研究运用的概念很现代，并且力图不在部分中而是在整体上去认识自然（因此冒着因系统地生产的漠视导致次级以及更次级之类损害和后果的危险）……那些吃着牛奶早餐背着天然纤维书包的人，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先驱，它的特点是更完美更充分但首先是更全面的对自然的科学化和技术化。(Weingart，1984:74)

正是对自己依赖于自己所抗议的对象这种状况的意识,产生了反科学态度中如此之多的痛苦和非理性。

科学的非垄断化

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你甚至可以说,科学在20世纪里越成功,它们最初的有效性要求就越快和越彻底地被相对化。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展不仅在其外在关系上(如已经表明的那样),而且在其内在关系上(如将要表明的那样)——在它社会性的和理论性的对自身的看法上,在它的方法论基础上和它与应用的关系上——经历着它的持续性的断裂。

初级科学化的模式基于"素朴性",即一方面科学的方法论怀疑论可以制度化,另一方面仍局限于科学的对象。科学知识的基础仍旧像其他科学成果应用的议题那样免遭怀疑。受到质疑和内在怀疑的东西是从外部教条化的。在这背后所掩藏的不仅是"无关行动"的研究实践与实践和政治行动的限制间的差异,它作为系统怀疑论的一个条件必须被缩减并以明确的行动计划来代替。这一科学合理性沿着内在和外在间的边界的二分,特别对应于市场和科学专家群体的职业化利益。科学服务和知识的消费者,不是要偿付被承认的和被揭示的错误、被证伪的假设或者自我怀疑——无论有多么聪明——而是要偿付"知识"。只有那些成功地在市场中通过与其他的职业和普通人群体的竞争而取得知识优势的人,才可以赢得内在地沉迷于"怀疑论的奢侈"(它作为一种基础研究为我们所知)中的材料和制度前提。从这一合理性的观点来看必须普遍化的东西,必然转向市场中的普遍兴趣的反面。

163

教条化和怀疑的艺术在"成功的"科学化进程中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内在成功基于"实验室崇拜"(demigods in lab coats)的崩溃,而外在成功则相反,它基于有意的建构、奉承和对同样那些崇拜物的"绝对无误要求"的顽强辩护——针对所有"非理性批评的怀疑"。对于那些根据其产生的条件总是作为"不断被提及的过失"的后果,必须同时使它符合具有永久有效性的"知识",而这将成为它在实践中可以忽略的最高限度。

在这个意义上,在初级科学化的模式中,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以一种矛盾的方式相互融合。不可分的批判原则被分开;它们的有效性范围被削减了。在外在关系中发展的知识主张的绝对性,与被内在地抬高到规范地位的怀疑的普遍化奇怪地对立着。所有与科学有关的东西都被看做可变化的,除了科学理性自身。这些对不可限制的东西的限制不是偶然的,它们在功能上是必然的。只有它们,给予了科学相对于主要的传统和日常实践的认知和社会优越性。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批判知识主张和职业化努力才能够(矛盾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估价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的科学化进程也必须作为一种教条化、作为科学"教条"提出的不可置疑的有效性的实践来加以理解。其次,初级科学化的"教条"与那些科学依靠对它们的反抗而崛起的教条(宗教的或传统的)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稳定的:它们带有批判和废除自身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通过其不断的成功削弱了自己的界限和基础。在科学论证规范的胜利和普及的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产生了。科学变得不可或缺,而同时又缺乏它原来的有效性要求。在相同的程度上激起了"实践问题"。科学在方法论上追求的安全感的丧失,在其内在和外在关系上都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结果造成了对专家和普通人间合理性梯度

164

的冲突性平等化趋势(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标志就是“医疗事故”诉讼的增加)。进而,通常反映权力梯度的概念失效了,比如现代性和传统、专家和普通人,或者成果的生产和使用。在反思性科学化条件下的这一怀疑论的解放(Entgrenzung),可以通过两条线索加以描述,那就是科学理论和研究实践。

科学理论中的易错论

从初级科学化到反思性科学化的转变,就其自身来说是科学性和制度性地实行的。断裂的动因是把科学批判性地应用于它自身的学科——科学理论和科学史,认知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科学的经验人类学等等——它们一直在侵蚀着从20世纪初开始不断取得胜利的科学合理性的自我教条化的基础。

一方面,这些学科,特别是在依旧有效的初级科学化模式的要求下,以职业的和制度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它们取消了它们应用的条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经成为反思性科学化自我批判变体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替代的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不是20世纪60或70年代的发明。它们从一开始就属于整个科学发展的计划。第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替代性专门知识”的例证——它有着长期的直至今天的影响力——就是对“资产阶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它已经包含了个人自己对科学的信念和普遍化的对现有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矛盾性对立,这些对立也表现在后来的新变体中——曼海姆的认知社会学、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者托马斯·库恩对科学理论中的规范主义(normativism)的历史批判。在这里逐步发生的系统的“乱巢行为”(nest-fouling)就是对自身持续应用易错论,这一开始只是部分制度化的。而这一自我批判的过程并不是稳定进行

的，而是对不断出现的抢救科学事业的“核心合理性”的企图的持续消解。这种最终是亵渎神明的“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例证来加以描述。然而，这一过程在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对科学理论的讨论中那样实行过。

165

最终，波普尔已经开始针对基础思想使用同样的“匕首”，这些思想被用来反对他所有的给予证伪原则——他之所以构建这个原则是为了防止那些江湖骗术——以立论基础的努力。证伪原则中所有的“基础的遗迹”，通过对其自身的持续应用而逐渐被揭示和清除，直到证伪原则依靠的支柱坍毁。因此，费耶阿本德著名的论断“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只是概括了这种经过那么多的科学上的精益求精的努力而达到的状况。①

① 这一论证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步骤。首先，在更接近的研究中，经验资料作为“推测”理论的证伪手段是不够的。后者必须是有根基的。让它基于经验的做法使它脱离了主体间性。同时，在实验（访谈、观察等等）中的数据生产依旧被忽视。如果后者被包括进来，那么理论和经验陈述的界线，即整个工作的关键就崩溃了。探求证伪因素的努力实质上应该如何理解呢？让我们假设一个并未符合理论预期的实验。理论被一劳永逸地驳斥了吗？或者预期与结果的矛盾只被简单地证明？它指向了不同的决策可能，并且在此意义上可以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比如，通过怀疑实验中的一个错误或者按照正相反的思路来进一步建构发展理论）来解决或掩盖(Lakatos, 1974)。在因为托马斯·S.库恩有影响力的论文(Thomas S. Kuhn, 1970)而发生的科学史的转折中，对科学哲学进行反思的经验基础被排除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没有经验主义的理论的地位变得有疑问了。科学理论仅仅是一种逻辑上合格的规范理论，是“好的”科学的至高审查权威，并因而成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科学等同物？或者，它是否满足了自己对一种经验上可验证的理论的要求？那么，考虑到现存的知识生产和构造间的矛盾，它的有效性要求就会急剧地下降。对科学的基于人类学方法的研究最终揭示了即便在自然科学合理性公认的诞生地——实验室——大多数实践也像祈雨舞蹈和丰收仪式那样，着眼于职业和社会赞同的原则(Knorr Cetina, 1984)。

研究实践中的易错论

但你可以说，而且人们在科学实践中就是这么说的：那又怎么样？我们关心一种科学理论——它不过是一种它并不关心的研究实践的“哲学遮羞布”——的自我剖析的什么呢？但在倡导证伪原则以后，必须存在某些随之宣告其总是存在的过剩的结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根本没有。在进步中，科学丧失了真理——就像一个上学的孩子丢了他买牛奶的钱。在过去的30年里，科学已经从服务于真理的活动转变成没有真理的活动，但它要尽力利用它能社会性地获得的真理的好处。科学实践干脆跟随着科学理论成为猜测、自我矛盾和惯例。在内部，科学退化为决策。在外部，风险在扩散。科学无论在外部还是在内部都不能再享受理性的护佑。它们变得独立于真理并且缺乏真理。

这既非巧合亦非偶然。真理走上了现代性的老路。在反思性科学化的过程中，控制并宣告真理的科学宗教被世俗化了。科学的真理要求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没有经受住彻底的自我审查。一方面，科学的要求不得不去解释那些退化为假设和从属于回忆的猜测。另一方面，现实升华成被生产出来的数据。因而，“事实”——原先是现实的核心——仅仅是对那些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发问的问题的回答，是收集或者忽略的规则的产物。一台不同的计算机，一位不同的专家，一个不同的研究所——就是一个不同的“现实”。如果它还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奇迹而不是科学。举出另外一个（自然）科学研究实践的非理性的例证，就无异于肢解尸体。问一个科学家有关真理的问题，就像问一个神父有关上帝的问题那样令人窘迫。在科学圈里说“真理”这个词，就代表着无知、平庸、不加思考的模糊说法和从日常语言中得来的掺杂情感的词汇。

166　当然，这种丧失具有吸引人的一面。真理是一种超自然的成就，一种趋于神的提升。它是教条的近亲。如果你拥有了它，宣告了它，就很难改变它——虽然它不断在改变。科学正在变得具有人性。它与错误和过失裹挟在一起。科学没有真理也照样行得通，甚至更好些，更诚实一点，有着更多的适用性，更大胆更勇敢。反面也是吸引人的，它总是有机会的。整个场景变得绚丽多彩。如果三个科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十五个念头在打架

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为了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真理定义而向科学成果求援，变得越来越必要，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充分。这一必要与充分间的不一致关系以及因此造成的灰色区域，反映了科学丧失了其最核心的功能，那就是对知识的代表性确定。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体和使用者——在政治和商业中、在大众媒介和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一般性的科学论证，而同时越来越独立于个体的决定和科学对真理和事实的判断和陈述。

知识要求向外部力量的转化基于科学的分化——这是明显的悖谬。它首先表现在判定的超复杂性和多样性上，即使它们不公开地相互抵触，不相互补充，而只是维护不同的乃至不相干的东西，因而最终迫使实践者去做出他自己的认知决定。另外还有它们自称的半武断，这在具体的境况中总是被否认，但总是在很多调查结果的不一致以及对惯例和决策的方法论求助中出现。作为回应，假设性的科学总是使用的"是……但是"和"一方面……另一方面"为知识的定义提供各种可能的选择。

调查结果的洪流，它们的矛盾之处和过分专业化，把接受变成参与，变成伴随或针对科学的知识自发形成过程。现在你可

以说，它总是这样的。政治和商业相对于科学的自主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及的两个特性就在桌面下消失了：这样的自主性是科学生产的：它从科学的剩余中兴起，这种剩余同时将它自身的需求降低为假设性的，并提供了一幅自我相对化的多元主义诠释图景。

这样的后果对于知识生产的状况具有强大的影响。丧失了真实性的科学，面临着要其他的东西告诉它真理是什么的威胁。不仅仅是受直接影响的兴盛的“御用科学”(court science)是这样。近似的本质、非决定性以及决定后果的可能性，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躲避科学审察的选择标准，在无论如何必须把握的超复杂性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包括基本政治观点的一致性，资助者的利益，政治内涵的预期；简言之，政治接受。 167

由于科学产生自身的过度复杂性，在走向方法论的制度化的道路上，科学被一种隐含的对其认知实践的封建化所威胁。相应地，一种新的排他主义在外部关系——或大或小的科学家群体，相互隔离并围绕着隐含的应用的优先性组织起来——中出现。关键在于这不仅是在实践的接触中相应地发生的，而且是已然存在于实验室、科学家的办公室和科学成果生产的密室中。科技生产的风险变得越不可预测，它们决定公众意识的方式越明显，政治和经济行动者受到的压力就越紧迫，社会行动者确保接近“作为决定力量的科学”就越重要——无论是为了减弱、分散、再定义还是为了夸大和阻止以方法论批判这种方式进行的“对决策的外在干预”，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过程具有另外的侧面。因为它还是会带来一点点启蒙的作用。人们脱离了专家对他们“恩主式的”认知指导(Illich, 1979)。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担当科学评估员的角色。对

科学家来说，发生在科学论证方式的普遍化过程中的科学的功能转换，具有某些令人愤怒的地方，如邦斯和哈特曼(1985)所说：

> 在这个普遍化过程中，从启蒙运动开始就被看做进行验证的惟一权威方式的科学论证，似乎丧失了它们理性上无懈可击的权威光环，而在社会上变得随手可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趋势将自身作为科学化进程的后果来呈现。科学不再是无比神圣，而可以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被争论这一事实，意味着作为科学话语的结构关联原则的系统怀疑论，不再是后者的特权。"未启蒙的群氓"与"启蒙了的公民"间的区别，或者以更现代的说法，普通人与专家的区别，逐渐失效并转变成不同专家间的竞争。在实际上所有社会子系统中，规范和价值的内在化被按照系统化知识的竞争性内容进行的反思所代替(16；也请参看 Weingart，1983:328)。

为了能经受得住专家间的跨专业的竞争，仅仅提供"洁简的"意义验证就不够了。有时，你必须作为个人并令人信服地出现。在反思性科学化的条件下，信任的生产(或动员)变成有效性要求的社会推动力的一种主要来源。[①]

168

今天，在科学曾经作为科学被相信的地方，考虑到科学论调自相矛盾的喋喋不休的争议，对科学的信仰或者对替代科学(或这种方法、这种路径和这种取向)的信仰变成决定性的了。或许

① 这也许是为什么当诠释的过剩状况发展的时候，个人特征和个人网络对于这些诠释的实际应用的重要性趋于增加的原因之一。

只有"额外"的表现、个人的说服能力、接触和通向媒体的途径这样的东西,才会给予"个人发现"以"知识"的社会品质。在信念决定科学论证的地方,它便很快恢复了主宰地位——当然,它不再是外在形式中的信念,而是科学了。在正在出现的过渡期里——在其中,科学对于知识的生产是必须的,但又是不够的——具有相当差异的各种学说相应地重新构建自身。这使很多事情成为可能:宿命论、占星术、神秘主义、自我崇拜和自我牺牲,它们与科学的详尽发现、对科学的严厉批判和对科学的信仰杂糅纠缠在一起。这些新炼金术奇怪地逃脱了对科学的批判,因为它们不是在科学面前,而是在与科学的互动中发现它们的"真理"和支持者的。

科学的免疫性不仅仅适用于这些极端的例子。相当普遍的例子是,以科学武装的意识形态和歧视偏见,可以再次针对科学而捍卫自身。它们求助于科学是为了反对它的要求。你必须懂得更多,包括替代性的研究。受到进一步关注的反对,在结果面前消失。只要我们手里握有几条基本的(方法论)疑义,在任何情况下都足够使顽固的科学新知在自身中消亡。直到60年代,科学还可以依靠没有疑义地相信科学的公众,但今天,它的努力和进步总是伴随着不信任。人们怀疑未尽之言,考虑副作用并预料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科技文明到处蔓延,带着不可改变性的禁忌(taboos of unalterability)。在这片丛林中——出自行动的事物的存在不允许被承认——寻求对问题的"中立"分析的科学家陷入一种新的困境中。每一个分析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是绕开行动变量的社会禁忌化还是研究它们。这些决策的可能性影响着研究自身的安排(甚至在那些由雇主决定的场合);因而它们处于变量选择、寻求假设的方向和范围、概念设计和计算风险的方法等科学实

践的最核心区域。

与初级化的后果相比，这些研究决策的后果内在地是更加可以估计的。如果后者外在于(无力的)潜在社会领域的产业和生产——人和自然的健康——今天对风险的确定就对核心权力地带——商业、政治和制度控制机构——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这些情况拥有使它们自身所承受的任何代价高昂的次级影响变得可知的"制度化专注"和"集体力量"，因而，风险的"不可见性"严格依照社会状况受到限制。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影响的"次级特征"。对发展的观察研究被归入对风险的官方研究能力(或一个辅助部门)。这里，方针是广为人知的，也就是法律基础。所有的人都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毒素浓度和什么样的最高限度的突破会导致什么样的决定性的(法律和经济)后果。

但这意味着风险被科学化了；次级影响的可评估性从一个外部问题转化为一个内部问题，从一个应用问题转化为一个知识问题。外在性消失了。后果是内在的。起源和应用的情形合二为一。因而研究的自主性同时也是一个知识问题和一个应用问题。突破禁忌的可能性成为好的或差的研究的一个固有条件。这也许仍旧隐藏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的研究决策的灰色地带中。从它制度的、科学理论的和道德的组成中看，研究工作必须将自身放到一个接受并彻底探究它所隐含的政治意义的位置上——如果它不愿意在第一次遭到鞭打的时候就跳过所有的铁圈。

同时，可以认识到：科学认知实践产生影响和指导作用的可能性，存在于它选择的范围——这迄今为止仍被寻求有效性理由的科学理论所排斥，而没有得到任何估价。依照流行的假设形成理论，只要你自己的假设得到验证，因果链条可以从十分不同的方向上加以设计，而不与任何有效性标准相抵触。在发达

文明中,科学认知实践成为一种潜在政治变量隐含的和客观的操纵,隐藏在不服从证明的选择性决定的背后。这并不意味着客观化被排除了。这也不意味着假设的因果关系可以从政治上加以生产。当然,因果分析和行动分析是相互交织的——这与科学家对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无关。双重的和建构的风险现实使对其原因的客观分析政治化了。当科学在这些与出自被错误地理解的"中立性"的禁忌相一致的状况下从事研究的时候,它有助于造成这样的情况:不可见的副作用的规律仍旧主宰着文明的发展。

论"副作用"的可评估性

我们不能再忍受后果之不可预测性的意话了。白鹳没有带来那些后果——它们是被创造的。尽管有着不可计算性,它们是在科学中被创造的。当存在一种实际外在后果的可计算性和其内在可评估性的系统区分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成为可见的了。170

按照流行的见解,科学工作的次级影响的不可计算性必然因为科学的不断分化而加剧。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对他们成果的应用区分开来;他们不可能影响到那个领域;其他人为此负责。结果,科学家们不能为他们从分析的角度得出的实际后果负责。尽管人们开始在很多领域说一种共同的语言,但是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不是缩短而是增加了,相应地,应用者依照自己的利益去使用成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这一评估基于"可计算性"这个概念——古典科学化理论的关键概念,它的重要意义和适用条件今天才刚刚变得有疑问。只有当你明白因为反思性现代化,可计算与否本身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可能对次级状况进行估价。可计算性不再仅仅意味着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可控制性;不可计算性也不意味着不可

能进行工具性把握。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次级影响的不可计算性”仍将保留在当今的科学组织中；它甚至将增长，因为目标合理性(ends rationality)被情境化了并且不确定性在增长。

如果另一方面你从可估计性意义上理解可计算性，那么这正好适合反思性现代化条件下的事态。就事实而言，实际的后果仍旧比过去更不可计算。然而同时，次级影响失去了其潜在性，进而在如下的三个意义上变得可评估。有关它们的知识(原则上)是可获得的；也不可能再提出不可控制性的传统借口，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你会因为对可能的影响的知识而处于一种行动的压力下。因而，“可计算性”的减少伴随着“可估计性”的增加，并且，两者是互为条件的。有关次级影响的知识——现在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知识分支——总是(潜在地)呈现出来。因而，各种各样的后果和可递推的因果模式必须以对自身和他者的意义来加以权衡。以这种方式，实际的后果最终变得越来越不可计算，因为可能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可估计，而对它们的评估在研究过程和与其固有的禁忌领域的互动中越来越多地发生，并且在影响的过程中界定这些领域。但这也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对预期后果的隐含的应对获得了越来越高的重要意义。在预期(以及对预期的预期)的层次上次级影响被预见到，它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影响着研究过程，虽然与此同时最终的结果仍旧是 171 不可见的。这就是对科学家最有效的脑白质切除术。他们对实际的长期影响的完全不可计算性的强调与实际决定了他们工作的预期的后果成同比例增长——这是他们发问和回答的起点与终点。

我们现在将讨论这一表面上矛盾的双重主题——不可计算性的增长与“次级影响”的可评估性的同时增长。只有开启整个论证，我们才能发现要多少时间并在何种意义上，这一科技文明

的宿命论可以被克服。

应用的自主化

在反思性科学化的阶段,知识生产的地位和参与者都发生了变化。如上面所说的,科学在管理、政治、商业和公共领域中的目标群体,以一种共谋和敌对的复杂方式成为社会地有效的"知识"的共同生产者。但由此,科学成果向实践和政治转化的关系就动摇了。受到清算的科学"知识资本"的"股东",以一种新的和自信的方式去干预科学向实践的转化。

在初级科学化的模式中,科学和政治的关系被以演绎的方式设想的。按照这一模式,科学得到的后果被迫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极权方式实施。只要遭遇了抵抗,依照科学家的自我理解,非理性就仍然维持支配地位,而这些可以通过提高实践者的"合理性水平"来加以克服。这一极权式的演绎主义应用模式,在科学反思的自我怀疑的状况下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在外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应用问题,也就是说,在分类和选择当中,在质疑和重组所提供的解释中,在有意以"实践知识"(采纳的机会、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接触等等)丰富它们的过程中。因面由科学指导的、对实践的工具理性的控制的终结出现了。科学和实践在对科学依赖的状况下再次分裂了。应用的一方开始通过科学使自身越来越独立于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理性层次被颠倒的时刻。①

这里,目标群体新的自主性不是基于无知而是基于知识,不是基于不发达面是基于可能的科学解释的分化和超复杂性。虽

① 下面我提到了我和沃尔夫冈·邦斯在一次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的讨论会上共同提交的论文(Beck and Bonß, 1984),另请参见邦斯和哈特曼的著作(1985)。

然我们只会觉得矛盾,但它是科学产生的。科学的成功创造了越来越独立于供给的需求。这一朝向自主化的趋势的重要标172 志,首先是知识来源的特别多样化和对其批判方法论的思考。当它们变得越来越分化(但并不必然是作为它们的堕落或道德变化的结果),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变成了资金丰厚且需求论证的消费者的自助商店。个别科学发现的超复杂性给予了消费者在专家群体内和之间对专家进行挑选的机会。仅仅通过选择包括在顾问圈子中的专家代表就预先决定了政治程序,这是寻常之事。不仅是从业者和政治家可以在不同的专家群体中进行挑选,而且那些群体在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也在进行相互的争斗,而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的自主性增加了。正是作为与科学相联系的成功学习的结果,以上这种情况将以一种专业性不断增加的方式发生。相反,从那些专家和他们通过(或不通过)斗争解决的根本论战中,人们可以学到不受欢迎的后果是如何被以专业方式(比如通过方法论批判)加以掩盖的。因为这个过程的开端可能作为科学的自我怀疑的后果而增长,通过反思性科学化而提供给实践方面的辩护性批判的可能性将增加。

当然,这个例子中的科学越来越不能满足承受着决策压力的消费者的安全感需求。伴随着易错论的普及,科学的一方将自我怀疑转换到实践的一方,并强加给它行动所必需的降低不确定性的替代性角色。再次重申,所有这些不是作为虚弱的表现或科学不发达状况发生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它们高度发展的分化、超复杂性、自我批判和反思的产物面发生的。

论客观约束的制造

那些止步于这一步论证的人,忽略了科学的参与、它的劳动的结构分工和它在科学实践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上的理论程序。

具体而言，它们将从科学走向不确定性的普遍化的途径是不可逆的这个假设开始。同时，科学被看作在其历史前提和形式上是连续的。然而，科学已经像其他力量所做的那样艰难地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促成科学的改造呢？在一切都可变的地方，给世界带来改变的科学不能再将其基础和工作形式的恒久性作为借口。改变自身的可能性随着实践方面的自主性的增加而增加。分离的状况允许并促成了对那些来自公共领域、政治和商业的解释原则和应用要求的再思考和再定义。很多问题产生了：随着认知过程持续和分化，在科学实践当中哪里是减少自我产生的不安全感的开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自主性能被重新发现吗？如何能让怀疑论的普遍化和不安全感的减少在它们内在和外在关系中重新和谐起来？这里将提供一些能够说明一般概念的典型思考。

173

流行的理论上的科学自我概念意味着，科学以其合理性权威无法做出价值判断。它们提供所谓"中立"的描述、信息或作为在最广泛利益间进行决策的"无偏见"的基础出现的解释。然而，人们选择哪种利益，将谁或什么设定为原因，他们如何解释社会问题，他们将实现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不是中立的决策。换言之，科学独立于并超越于外在价值陈述而发展了它自己的导向能力。人们施加实践影响力的可能性存在于他们设计科学后果的方式。因而，在不同行动领域中对"需要"和"风险"的"纯粹客观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掩护，在它后面，未来的发展方向得到协商。什么被看做"需要"和"风险"，是在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能源保护措施和替代性资源间进行抉择的核心问题，就像在老年保险、社会福利保险和贫困线的确定等情况中一样。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对最终将融人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生活问题的一系列相关结果的隐含决定。涉及不涉及价值、

后果的确定和操作化以及假设等，是决定社会未来的根本决策将要使用的杠杆。

这意味着决定科学将是否有助于它们的实践风险的自控和驯服的因素，并不是它们是否超越了它们的影响范围并在它们的成果应用中寻求政治的咨询和协作。而重要的是，就其自身声称不可测量的次级影响的可评估性而言，究竟哪种科学将被采纳。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并在一种自身力量的无限夸大中使自己成为惟一对社会性地发生的科学后果担负责任的一方。而是意味着科学应该接受那些返回来的有关威胁和风险的报告，这些报告是作为对科学的自我概念的经验挑战，并且是为了促成对它的工作的再组织。在这个意义上，从科学内部减少外部不安全感的核心问题在于：(a)在何种程度上对症状的处置可以被对原因的消除所代替；(b)是否从实践中学习的能力将得到保留或被创造，或者是否通过忽视实践后果，不可逆的状况将被创造出来，它基于“无谬归因”(imputation of infallibility)，并使学习从一开始就不可能；(c)是否孤立的观点将被保留或者是否在语境中进行专业化的力量将被重新发现并得到发展。

174

消除原因或应对症状

在次级科学化的过程中，客观约束的建构——因为它，初级科学化的条件和产物被排除出行动的范围——融入进了变化的可能性。约束变得越客观，它保持客观约束的特征就越困难，而对它们的生产在各个方面都爆发出来。在对技术控制的考虑之下而被宣称和思考的“技术或经济决定论”，不能再维持它的决定性力量并通过合法化要求和其他可能的安排来封闭自己。至少在原则上，决定论自己都变得可具体化。即便是自我生产的

客观约束也被科学的反思性研究方法转变为建构的和制造的约束,这与感冒被认可的原因可以用来克服或防止它是一个道理。原先被看做"潜在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的毒性物质和污染物泄露,在科学家的观察下逐渐变得与掩藏在它们之中的决策参与者有关,并与它们的可控制性重新联系在一起。

以这种方式,在初级科学化当中遮盖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所有状况和动因的"客观约束"的面纱,在反思社会化当中得到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状况首先变得可结构化,其次变得依赖于合法化。"它可能有所不同"的观念逐渐——或公开或隐藏地——取得对所有行动领域的统治地位,在其中,它是以其对论证的坚持在背景中作为一种可能的威胁。而且这即便在科学用尽它理论和方法的所有定义力量去为所产生的风险树立起新的不可改变性的屏障的地方,也同样产生。但是,核心问题变成不仅是研究什么,而且是它如何被研究,这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方法、思考范围、目标等等去研究工业化风险的增长和规避。

因而,从根本上说,在处置文明风险中存在着两个相对的选择:在初级科学化中消除原因,或者对后果和症状的次级工业化(它趋向于扩张市场)。就这点来说,第二种途径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它是代价高昂的,让原因保持隐晦并允许将错误和问题转换为市场的繁荣。学习的过程是被系统地缩减和防止的。现代化威胁的自我起源淹没在选择性的考虑和对症状的治疗中。这可以通过治疗诸如糖尿病、癌症和心脏疾病这样的文明病的例子得到说明。这些疾病可以从起源上进行抵抗:通过减轻精神压力或者环境污染,通过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配餐。或者症状可以通过化学制剂来减轻。不同抵抗疾病的流派当然不会相互排斥,但实际上不可能通过第二种方法来谈 175

论治疗。尽管如此，我们到现在为止一般都选择医疗和化学的“解决方案”。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工业开始得益于它的次级问题，而忽略了它在它们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再一次产生了科学及其研究的替代性决定：或者它给出了风险的恰当定义，并以它孤立的专业化给出了对此的因果解释；或者它打破了这成本高昂的对症状的控制并发展出从理论上看独立可行的替代视角，来说明问题的来源和在工业发展中对它们的消除。在第一种情况中，科学变成“客观约束”连续链条上的参与者和合法化中介；在第二种情况中，它阐明了打断这些链条并进而在现代化之内或之上获得一点自主权的起点和方法。

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潜在地也是一个自我批判的社会。批判的参照点和前提以风险和威胁的形式产生出来。风险批判不是一种规范的价值批判。正是在传统进而是价值衰落的地方，风险出现了。批判的基础不是过去的传统而是未来的威胁。要认识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性物质所需要的不是已确立的价值，而是昂贵的测量工具和方法与理论知识。

因而，风险的测定很奇怪地跨越了客观和价值两个方面的界限。它们并不公开地宣称道德标准，而是采用量化的、理论的和因果的隐含道德形式。相应地，以通常理解的科学去研究风险的时候，一种“客观化的因果性道德”出现了。有关风险的陈述是科学化社会中的道德陈述。所有这些——批判的参照点和对象、发现和提供根据的可能性——都是在不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一个解传统化和自我批判的社会至少是潜在地伴随着风险社会而出现了。风险的概念像一根使我们可以不断去探究整个建构方案，以及整个文明结构上的每一块使文明自陷危境的水泥斑点的探针。

绝对无误或学习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再接受副作用,科技发展必然要保证在各个发展阶段、在发展速度及发展方式中进行学习的能力。这假定了造成不可逆境况的发展应该被规避。相比之下,重要的是揭示和估算那些给错误和改正留下空间的科技发展的变项。技术的研究和政策必须从至今被证明最确定且最吸引人的理论出发:人类的思想和行动陷入错误和过失的理论。在技术发展开始与这一确定性——也许是最终的,并且就此而言是令人安慰的——相抵触的地方,它们就以难以承受的绝对无误的负担阻碍了人性。当风险倍增的时候,压力增加而使人们假装成绝对可靠的,并由此剥夺了他们学习的能力。那么,最不证自明的事情,即承认的人们失败,将与作为原因的灾难同时发生而且必须以各种方式来加以避免。以这种方式,风险的倍增与无谬归因会合,并对与威胁的程度直接联系的风险最小化施加不太大的压力。所有这些都将被千方百计地通过人们自己的行动中的"对客观规律的遵守"而掩盖掉。

因而,我们必须研究实际发展,它们是否包含了一种将剥夺人们的人性并注定他们永远完美的"风险的畸态"。科技发展正开始越来越陷于一种显著的新矛盾中:科学的基础被以制度化的科学的自我怀疑探究着,而技术的发展已经同怀疑论隔绝了。就像风险和行动的压力在增加,一直站不住脚的对知识、绝对无误和安全感的专制主义要求,正在技术发展中复兴。教条在工程科学被迫采取行动的压力下繁荣起来。释放出来的和系统地激起的怀疑论遭遇了技术发展中的科学绝对无误禁忌的反现代性。这在风险增长的时候加剧了。"最安全的"东西最终成为不可测量的;核弹与核能以及其所有威胁超越了所有的概念和想

像力。因此，下面这些做法就成为必然的：将易错论从其理论和经验的围栏中解放出来，把技术贬低为一种可能性并检验技术发展的可能变量的“人性”，亦即它们“脱离过失的自由”。

在这种意义上，核能是与技术发展的“绝对无误”之间一场极为危险的游戏。它将客观约束从客观约束中解放出来，而客观约束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并且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进行学习。它涉及数代人（在处理和储藏原子废料中），涉及若干时代，也就是说，在其中即便是关键词的不变意义都无法确定。它甚至将不可测量的后果的阴影投向十分不同的领域。这适用于它所需要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表现在“独裁核国家”这个词语中。它同样适用于长期的生物学影响，而这在今天是根本无法测量的。但比较起来，能源供应的分散形式是可能的，而它不包括这一“客观约束的自动力”。发展的变量因而可以封闭未来或使未来总是开放。依赖于我们对这些变量的选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它赞成或反对一条通往不可见但可测量的次级后果的未知无人之地的道路。一旦车离开站台就很难停止。因而，我们必须选择那些没有封闭未来，但将现代化进程自身转化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变量，在这个过程中决策的可修正性使对以后发现的副作用的消除成为可能。

在语境中专业化

潜在副作用的生产的进一步的核心状况，存在于认知实践的专业化。更确切地说，专业化程度越高，科技活动的次级后果的范围、数量和不可计算性就越大。不仅仅是“不可见次级后果”的“不可见”与“次级的”特性来自于专业化。情况越来越可能是这样的：选择性的解决方案将得到构想和执行，而它的有意的主要作用将一直被无意的副作用所掩盖。因而，过分专业化

的科学变成一种问题和对其症状的代价高昂的处置的"转轨场"。化学工业产生了有毒废料。对它们应该如何处置呢?解决方案是:倾倒。它的后果是:废料问题成为一个地下水的问题。化学及其他工业可以通过饮用水"净化剂"来获利。如果含有净化剂的饮用水影响了人们的健康,这里还有药品,它的"潜在的副作用"可以被精心的医疗看护体系截止和推迟 以这种方式,依照过分专业化的程度,问题解决和问题产生的循环链产生了,并且这些再次"确证"了不可见的次级影响的"童话"。

因而,"客观约束"和"自动力"得以产生的起源结构,在本质上就是其狭隘眼光、对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以及职业阶梯等等之中的过分专业化的认知实践模式。达到极限的劳动分工产生了所有的东西:次级后果、它们的不可预测以及使这种"命运"看起来不可避免的现实。过分专业化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主动模式,它将有关后果的宿命论集中到一个自我确证的循环中。 178

一种打破这种"命运"的科学必须(学会)以新的形式在语境中专业化 这种独立的分析理路并没有丧失其正当性,但当它成为局部测量的指导方针和貌似建立在科学之上的"补救途径"时,它就变得错谬,并成为实践中的风险制造者。专业化语境研究的核心将被(比如说)问题的转轨场所占据(这典型地表现在处置风险和环境问题的方式上,也广泛出现在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医疗服务的许多领域中),也将被对主要发展替代方式及其包含的能避免或增加不安全感的转换装置的追寻所占据。

因而,在食物供给、农业、工业和科学的关系中,劳动分工模式的变量遭到了忽略,而这些变量自身或者可以产生或者可以缩短次级问题的链条。这条道路上最主要的岔路被这样的问题标示出来:是否处理土壤和食物的化学方法将继续得到使用,或者是否会返回到以从自然学习到的方法来处置自然,比如如何

除去杂草和如何以恰当的轮作方式来提高土壤的肥力？如果化学方法得到保留，研究的核心将是更有效的杀虫剂的制造以及相应的对这些有毒物质的作用的研究、对可接受水平的确定——这反过来要求研究它们对健康的危害，相应地还有动物研究（以及伴随着的虐待）、公众抗议、司法和管制措施。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条具有生态意识的农业发展途径，它同样需要研究的支持，但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研究。后者将增进有关耕作周期的知识和利用土地却不使其贫瘠的可能性。同时，影响的链条和客观约束画出了越来越宽泛的可以被打破的圆圈。在农业和营养学的联系中，拥有替代性社会未来的转换装置，它在一种情况下通过产生风险的"客观约束"链条将工业、科研、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连接起来，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会这样做。

吁求科学理性教育学

科学的理性和非理性绝不仅仅是有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同样也是可能的未来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这也意味着替代性的科学总是可能存在的。不仅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替代性的认知理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替代性关系和这种关系的替代性实践。如果"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我们还没有超越的假设"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就是反假设的时代。这些假设必然要面对的"试金石"（或"大山"）179 是明显的：现代性方案需要急救。它有被自身的异物窒息的危险。而以现在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就是这种异物之一。

我们需要一种科技活动的客观约束的理论，它可以将客观约束的生产和科技活动"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置于关注的中心。规避和消除后果宿命论的杠杆，同样必须在行动的框架和科学的自我概念中找到。不是根据科学实践，而是在科学实践中，在

科学实践认为值得注意或不值得注意的事物上,在它如何提出问题张开因果假设之"网"的做法中,在它如何确定自己假设的有效性的做法中,我们必须找到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如何被生产和避免的标准。通过改变它的自我概念和政治安排,我们必须给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进的"无人掌舵的"科技发展装上刹车和方向盘。这种可能性更多地是为例证所假定,而不是为预先的考虑所证明。至少对这一设想的要求在轮廓上是清晰的:科学必须被构想为客观约束的(一个)发源地,从中普遍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它必然通过对自我概念进行实践上有效的改变,来打破那种不确定性。激活并调动在科学中沉寂的理性来反对它的希望仍旧存在。科学可以改变自身,并通过对自己历史上的自我概念的批判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复兴启蒙。

解决这项要求的关键理由来自于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并如何证明有可能将这种转变了的科学实践制度化——无论是关于数据生产,还是关于"语义学分支的理论体操"(Mayntz, 1980)——并且在理论思考和自我批判的层次上将科学工作与现实通过一种尚未揭示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在我们已经给出的论证背景中,这当然意味着理论联系的证明对于科学的自主批判和实践潜力是本质性的。然而它也意味着,经验主义的概念恰恰必须通过理论和历史的理解来予以再思考和再定义。鉴于科学地生产的不安全感的水平,我们不能再假设经验主义"是"什么,而是必须从理论上设计它。假设是这样的:只有在一种经验主义理论中,思想的推理力量才会再次与"现实"相联系,而同时理论和经验主义的互补角色才能在它们的合作与对立中被勾勒和标明。

社会科学家可以对此有所贡献。到了他们去鼓励科学从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风险的命运中解放出来的时候

了。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处方，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咨询的东
180 西。在社会科学中，主导性的问题至少是：社会科学和社会经验如何通过一种减少不可见的次级后果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而社会学——就它分散成单个的研究领域来说——如何能对语境中的科学专业化作出贡献（从根本上说是它最初的目标）？

我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教育学，它将通过对自我生产的威胁的讨论使那种理性成为可改变的。与科学理论的情况——它假设并力图从其历史现状中重建科学的理性——不同，科学的知识要求变成了一项未来的计划，而它既不能被拒斥也不能仅仅从现在的形式中获得。盛行的科学实践的非理性的证据不再意味着科学的终结，就像拒绝牛顿力学并不意味着物理学的终结。这种证据的先决条件是，将研究实践中传统的批判和学习的实质能力转化为知识的基础和对它的应用。同时，那将意味着将现代化进程实际的潜在反思性提升到科学意识中。但在现代化自我遭遇的地方，这个词语也改变了意义。在现代化对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应用中，对以这种方式传播的掌控的兴趣，放松了技术控制并采取了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限制"的形式。在矛盾的混乱状况和新教条的争吵中，或许也会出现科技"第二本质"以及它的思想和工作形式在实践上的自我驯
181 化和自我改变的可能性。

第八章
开放政治

与所有更早的时代(包括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缺乏:外在危险归因的不可能性。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着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现代性甚至取代了它对手的角色——有待克服的传统,有待掌握的自然束缚。它成为威胁,以及从它自己造成的威胁当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后果——它将是本章的核心——是风险成为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自我政治化(self politicization)的动力;并且,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发生了变化。[①]

政治和亚政治

对在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变的评估,首先可以通过四个论

① 贝克(1988:Part II)进一步发展了风险政治学,特别是制度和组织的政治学。

点来加以勾勒：

（1）社会变迁和政治方向间的关系，最先是基于“分立的公民”(divided citizen)的模式在工业社会规划中得到构想的。一方面，作为公民(citoyen)，后者有助于他在政治意愿形成的所有领域获得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bourgeois)，他保护他自己在工作和商业中的私人利益。相应地，在政治经济的和技术经济的体系之间发生了一种分化。政治领域的核心原则是在代议制民主(政党、议会等)中的公民参与。决策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运用，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权力与统治只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实施的原则。

资产阶级的行动和追求技术—经济利益的领域，相比而言，183 被认为是非政治的。这一设计首先基于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等同；其次基于发展的方向和技术变迁的后果总存在着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技术经济客观约束的假定。技术创新增加了个体和集体的福利。负面影响(非熟练化，失业或换工作的风险，对健康的威胁和对自然的破坏)总是在这些生活标准的上升中找到自己的正当理由。即便是对“社会后果”的异议也不能否认技术经济创新的成就。这一过程，特别是与民主管理的程序和为履行民主管理所需的漫长时期相比，在本质上从政治合法化中被排除了；它拥有一种事实上免于受批判的实施力量。进步代替了投票。并且，进步变成问题的替代物，一种无名和不为人知的预先对目标和后果的赞同。

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为反对传统的优势地位而实施的创新过程，因为工业社会的规划而被以民主的方式分割为两个部分。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从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被转移给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在这些

语境中发生的社会变迁作为科学和科技决策的潜在副作用而被替代。人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行事:他们在市场里确证自己,运用创造利润的规则,进行科学和技术研究,并且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改变了整个日常生活的状况。

随着工业社会的全球化,两个彼此对立的组织社会变迁的过程相互贯穿起来: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的建立,以及在"进步"和"理性化"的合法化保护伞下非政治和非民主的社会变革的确立。这两者就像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一样彼作作用。一方面,政治体系的制度——代议制、政府、政党——在功能上,以一种受体系制约的方式,预设了工业、技术和商业的生产循环。另一方面,这预定了在科技进步的外衣下获得正当性的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永久变化,而这些与民主最简单的法则——对社会变化目标的了解、讨论、投票和同意——相对。

(2) 如我们可以回溯的那样,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和非政治的划分,至少主要基于两项重要的历史假设,而它们从 70 年代开始在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里都变得可疑起来。它们就是:(a)在阶级社会中不平等的显而易见,它给予了福利国家的扩张以意义和推动力;(b)生产力和科学化发展水平,它的变化潜力既没有超出可能的政治行动的范围,也没有取消通过进步发生的社会变迁模式的合法化基础。这两个前提在过去二十年的反思性现代化中变得脆弱了。在建立自身的过程中,福利国家牺牲了其乌托邦力量。同时,它的局限和缺点进人了公众意识。但那些仅仅哀叹和批判继之而起的政治麻木的人,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相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 184

当今已经被宣布的或正在涌现的变化浪潮,贯穿并撼动了社会。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它们可能将超过过去几十年所有的改良努力。因而,政治平衡被技术系统中的狂热变化——它

们使人们的想像力受到勇气测验——所削弱。科学小说逐渐变成过去时代的记忆。关键的术语已经广为人知并已经在本书里充分地讨论过了，包括外在和内在自然的持续破坏、工作的系统转变、基于身份地位的性别秩序的脆弱性、阶级传统的丧失、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各种新技术在灾难边缘的平衡。

政治平衡的印象是欺骗性的。它的出现，仅仅是因为政治局限于那些被贴上政治标签的东西，局限于政治体系中的活动。如果你更宽泛地考虑它，你就会看到社会陷于一个完全称得上革命性变化的旋涡——而这与你如何评价它毫无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变迁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发生。在这种意义上，对政治的不满不仅是一种对政治自身的不满，而且源自以下两者不成比例的关系：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行动权威以及它逐渐失去力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脱离了社会决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这一过程是在非政治的掩盖下不可阻止但又无声地到来的。相应地，政治和非政治的概念变得模糊了，它们需要系统的修正。

(3) 两种发展——福利国家的干预主义因其成功而衰微，大规模技术创新潮流及其未来未知的威胁——在一种双重意义上合并起来成为政治解放。一方面，既有的和已被运用的权利限制了在政治体系之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政治体系之外以新政治文化的形式（公民倡仪群体和社会运动）带来了新的政治参与要求。在这种意义上，结构化和实施的统治力量的丧失并不是政治失败的表现，而是既有民主制和福利国家的产物，在其中，公民可以使用所有的公共与法律控制和咨询的媒介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185 另一方面，与技术—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变迁和危险的潜在可能性相对应，它失去了非政治的特征。当替代性社会的轮廓在议会辩论或者行政决策中不再能看见，而出现在微电子学、

反应堆技术和人类基因学的应用中时，这些在政治上使创新过程中性化的构想就开始崩溃了。与此同时，技术—经济行动继续被其自身反对代议制的合法化要求的构造保护着。因而，技术—经济发展落到了政治和非政治之间。它成为获得了一种亚政治(sub-politics)的不稳固的混杂地位的第三实体，在其中凝固了的社会变迁的范围与它们的合法化相反地变化着。当风险增长的时候，它们的起源和解释的地位、条件和媒介将失去其技术—经济的客观约束。带着法律上的责任，政府的监控机构和对风险敏感的媒体公共领域开始谈论它们自己进入和控制工厂管理的"隐秘区域"。发展方向和技术变迁的结果变得适于讨论并服从于合法化。因而，商业和技术—科学的活动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和道德维度，而这在先前对于技术—经济活动来说是陌生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经济的魔鬼必然给自身洒上公共道德的圣水，并戴上关心社会和自然的光环。

(4) 以这种方式，一个与20世纪前三分之二时期中的福利国家计划背道而驰的运动开始发生了。假设政治获得了"干预主义国家"的权力潜能，那么现在结构社会的潜力就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中。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和非政治的颠倒发生了。政治变成非政治而非政治变成政治。悖谬的是，这一在不变表面下发生的角色颠倒进行得越明显，在政治和非政治社会变迁之间劳动分工就越是不假思索地得到坚持。对"科学进步"和"科学自由"的促进和保护变成了滑杆，在上面，政治安排的首要责任从民主政治体系滑到了经济和科技的非政治语境，而后者没有经过民主的合法化。在常态外衣下的革命发生了，它避免了受到干预，但仍然必须在逐渐变得具有批判性的公众面前得到证明和实施。

这一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和问题重重的。在福利国家方案

中,政治可以发展并保持一种相对独立于技术—经济体系的自主性,以利对市场实施政治干预。现在正相反,虽然政治体系的186 民主法规还在发挥作用,但它仍受到丧失权力的威胁。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管理者,对于这种发展,它既没有规划也不能建构,却要去证明其合理性。

另一方面,科学和商业中的决策充满了一种有效政治内容,而行动者却无法为这样的内容进行合法化。因为缺乏现身的场所,改变社会的决策变得语焉不详。在商业中,它们同将它们改变社会的潜力转移进"不可见的副作用"的投资决策联系在一起。规划了创新的经验和分析科学,仍旧被它们的自我理解和制度纽带同它们的发明的社会后果以及这些后果的后果相隔绝。后果的不可知性,它们无法辩护的性质,就是科学的发展规划。现代性的结构化潜力开始倒退回"潜在的副作用"中去,它一方面扩展到风险威胁着的生存中去,一方面失去了它们潜在性的面纱。我们没有看到和不愿出现的情况是以越来越明显和危险的方式改变着这个世界。

政治和非政治颠倒角色的游戏,虽然在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正在变得像幽灵了。政治家必须被告知那缺少规划和意识的道路通向哪里,而那些告知他们的人们对这二者一无所知,他们的兴趣在于某些相当不同的东西,因而也是可达到的。那么,因为有对进步逐渐丧失信任的实践姿态存在,它们必然将这进入未知的替代性领域的道路作为它们的发明呈现给选民,而如果你仔细考察它,那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从一开始,这里就没有而且一直没有替代物。这种必然性,这种技术"进步"的不可确定性,变成了通向其民主合法化(或非法化)的过程的保险栓。(不再)不可见的副作用的"无政府状态"(Arendt, 1981),在西方民主的发达阶段夺得了权力。

政治系统的功能丧失

有关政治对技术变革施加影响的潜力的科学和公众争论，已经通过一种特殊的暧昧性而普及起来。一方面，在考虑到工业和研究中的现代化时，我们以各种方式求助于国家有限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尽管有各种针对政治领域里的行动限制的批判，无论是系统强加的还是可避免的，对作为政治的惟一中心的政治系统的固恋（fixation）将继续存在。在过去二十到三十年里，在科学和公共领域的政治争论确实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加剧。对政治行动的限制条件的鼓吹——它因为“不可管理性”的说法和过度的民主而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从未被恰当地加以质疑：是否别的社会可以没有从技术经济发展讨论会得来的计划、共识或意识而存在？剩下来的是对政治性丧失的哀叹，这与 187 那种规范上有效的期待有关——改变社会的决策应集中在政治体系的制度中，即便它们不再集中在那里。

因而，作为政治核心的议会早在其衰微前期，就受到批判，并且这是从十分不同的角度进行的。那些依照宪法的条文是由议会和个体代表负责的决策，逐渐由派系和党派的领导层或者政府机构做出。议会权力的丧失，总是被解释成现代工业社会中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状况不可避免的结果。充其量，批判观察家是在谈论一种国家机器凌驾于公民意愿之上的进步自主性，而这已经隐含在代议制民主的原则里了。

以显著的一致性，这些情况也决定了原先议会权力向派别、党派或国家官僚机构的转变将会被两个进一步的发展趋势所遮盖：技术专家关闭议会和行政机构的决策领域，以及权力和以社团形式组织的影响团体的兴起。随着政治决策以及论证的科学化程度的增加，政治机构只是去执行科学专家的意见（比如在环

境政策领域，又如在大规模技术设施及其地点的选择上）。最近几年，对以下事实的关注在成倍增加：那些机构的运作领域仍然以这样的方式被设定得太狭窄了，据说政治从官方领域——议会、政府、政治管理——转移到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灰色领域。利益群体的组织力量被认为产生了预制的、其他人必须作为自己的创造物来捍卫的政治决策。

这些利用了科层制官方机构的压力群体的影响，如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同时向国家行政的决策和政治党派的“意愿形成”方面延伸。依据人们的立场，这一进程作为有着伪官方特征的私人压力群体对国家的侵害而被哀叹，或者作为对政府管理机器优先自主化和巩固的必要校正而受到欢迎。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和国家理论中——它根本没有一个有关政治的独立概念——这一国家权力和特定利益的联系被推到了极至。在这一理论视角的各种变化形式中，国家——在马克思的描述中被看做“理想的总资本家”——在范围上已经完全沦落为“统治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给予国家机器及其民主制度的最小自主性，在这种观点看来，是由统一局限的、短期的、冲突的和不完全表达的“个体资本家”利益和并针对他们自己阵营中的抵抗而加以实行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同样在这里，政治体系被看做政治的核心，但它失去了所有的自主性。这种以过于简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所进行的思考总是遭到反对，它误解了在代议制民主的发达阶段，政治行动的自主性程度。与此相似，它误解了现代政治史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组织是与极端多样化的政治统治的形式相适应的（这表现在瑞典、智利、法国和德国）。

188

在 70 年代，相对于经济体系的原则和利益的政治体系的“相对自主性”的主要历史证据，是由西欧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

的扩张所提供的。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中，这一国家的干预主义力量被追溯到以下的事实：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与结构相异的系统成分的形成"，"作为系统存在的一个必要部分"而发生(Offe, 1972:38)。以这种观点看，政治决策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市场机制机能紊乱的副作用，而且来自于"干预主义国家跳进了市场的功能缺口"(Habermas, 1973:51)这一事实——这是通过改进物质的和无形的底层结构、扩展教育系统和保护失业风险等等来完成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争论显然已经退居背景之中。不仅仅是普通化的危机概念(经济、合法性和激励危机等等)丧失了其理论和政治尖锐度。从不同的方面，它一致地宣称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的方案在被确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其乌托邦力量。在内部，福利国家越成功，它遭到个体投资者反对的状况就越明显，因为他们对工资和利润成本不断上升的应对之策就是不断降低投资意愿，或者逐渐用自动化装置来代替人力。与此同时，福利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的缺点和副作用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 福利国家计划借以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并不构成一种被动的媒介，事实上也并非没有任何特性。相反，它们与隔离事实、规范化和监视的实践——福柯将它们的具体化和主观化力量追溯到日常交往的最微小的分支上——相联系……简言之，目标与方法间的矛盾是福利国家计划本身所固有的。(Habermas, 1985:7f.)

即便从外部观察，民族国家的权限范围不仅因历史发展——国际间相互交织的市场和资本的集中——而且因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在全球范围的交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的健康威胁和自然

189 破坏而负担重重。

对这些发展状况的或多或少的困惑反应，集中在“新的模糊性”(the new obscurity)这种说法里(Habermas, 1985)。它同样适用于另外两种事态：首先是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行为的削弱，在过去的十年里成为政治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其次是公民和公民抗议活动的动员，以及很多社会运动强烈地表达了所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Brand et al , 1983)。

在所有的西方民主制里，政党领导层都被使政治事务变得不可预测的不断增长的摇摆选民(swing voters)的比例所迷惑。如果你在1963年的德国发现大约10%的摇摆选民，那么今天这个数目被各种研究证明已经介于20% 40%之间。选举的研究者和政治家都同意这样的判断：就任何党派都可以获得的微弱多数票来说，有着“善变灵活性”(Noelle-Neumann, 1991)的摇摆选民将决定未来的选举。

相反，它也意味着政党不能再指望“固定选民”(regular voters)，而必须运用所有的手段去向选民献殷勤——最近这些活动特别是针对妇女进行的(简略的论述请看Radunski, 1983)。与此同时，公民的倡仪团体和新社会运动因为市民的需要同他们在政党中的代表间的可见差距，而获得政治动力和广泛支持。

虽然对所有这些“不和谐”发展的估价依照不同政治观点而有所变化，虽然“政治解放”的因素总出现在“国家的解神秘化”中(Wilke, 1983)，这些诊断继续与政治核心的概念——它已经或者应该在政治和行政系统的民主制度中拥有地位并产生影响——或隐含或明确、或实际或规范性地联系在一起。不同于此，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政治和非政治的分离的前提条件在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脆弱了。

在“新的模糊性”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着在两个方面发生的政

治的深刻系统变迁。第一个方面是集权政治体系在以一种新政治文化形式出现的公民权利的执行和运用中所体验到的权力的丧失;第二个方面存在于与从非政治向亚政治的转化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一种似乎失去了其在至今还在流行的"和谐公式"——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应进行——中的适用条件的发展过程。两种视角构成了"政治的解放",这将通过三部分加以说明。[①] 190

作为政治失势的民主化

不是政治的失败而是其成功引致了国家干预力量的丧失和政治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你甚至可以说,贯穿20世纪并在其中具体实现的为政治权利所做的斗争越成功,政治体系的首要性受到的质疑就越强烈,同时人们所要求的在政治和议会体制上层发生的决策的集中就越虚假。在这种意义上,本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发展正在经历一种连续体的断裂,这不仅发生在它与技术—经济发展的行动领域的关系中,而且发生在它的内部关系中。政治(和非政治)的概念、基础和工具变得不清晰、开放并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新界定。

在政治体系中决策权威的集中化,如在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方案中公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设计的那样,是基于以下天真的想法:一方面执行公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时候保留等级权威,这两方面是有可能同时做到的。最终,对以民主方式制定的决策权利的独占是基于民主君主制的矛盾图景。民主制的规则被限定在政治代表的选择和政治程序的参与

① 这一章的论证基于一种局限的政治概念。兴趣的中心被生活状况的结构和变化所占据,传统地理解的政治则被看做统治、权力和利益的辩护和合法化。

上。一旦当权，就不仅是发挥独裁领导品质并将其决定以自上而下的独裁方式强制加以推行的“一段时间的君主”忘记了民主权利；受这些决定影响的行动主体、利益群体和公民群体也忘记了他们的权利，并变成无疑义地接受国家对统治权的要求的“民主主体”

在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中，这一理论视角在几个方面遭到了削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情况是，恰恰在民主权利确立的时候，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成为应急的做法。在政治（和亚政治）领域，既没有惟一的也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总是有很多解决方案。结果，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上，政治决策过程都不能再被理解成几个智者或领导——他们的理智不受争议并且必须被执行，就算要压制那些从属机构、利益群体和公民群体的意愿和“非理性反抗”——预先决定的某个模式的强制或执行。程序和决策过程的表述，以及这些决策的推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集体行动的过程（Crozier and Friedberg, 1979），而这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意味着集体学习和集体创造。然而，这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官方决策权威必然是分散的。政治行政体系再不能是政治事件的惟一或核心的场所。伴随着民主化，协议和参与的网络、协商、再解释和可能的反抗，就跨越权威化和权限的形式上的水平和垂直结构形成了。

191

政治核心的概念，如在工业社会的模式中所发展出来的那样，因此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民主的二分。一方面，亚政治行动领域不适用民主法则（参看上面的论述）。另一方面，即便在内部，依照系统地促成的外部需求，政治仍旧表现出君主制的特点。“政治领导层”必须表现出凌驾于行政和利益群体之上的铁腕和强制的独裁力量。至于公民，必然是乌合之众，被认为会听从领导者们的声音并认真对待他们的关注与恐惧。

这不只是反映了对所有那些隔离疑问、减少争议和协商的行动的约束。它同样表现了民主政治体系结构中固有的张力和矛盾：一边是议会辩论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边是行政部门，它对议会负责但也有自己的以其执行自身决定的能力来衡量的"成功"。竞选体系特别促进了决策权威的相互归因——无论是宣扬原先政策的成功还是指责它们——这不断滋养并更新着准民主的"一段时期的独裁"的实际虚构。在这里体系造成了这样的假定：政府和支持它的政党一旦当选，就要对所有在其任期内发生的好的和坏的事情负责，而这明显只有在该政府不是如下面所描述的那样时才有可能——它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以民主的方式当选并发挥作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公民和机构由于民主权利和义务的确立从而拥有很多机会去协商。

在这种意义上，民主化和非民主化、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总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通过如工业社会方案中所宣扬的那种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的专业性和可独占性模式而相互混淆起来。一方面，政治体系和其制度（议会、管理部门、行政部门等等）的中心化和专业化在功能上是必需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政治意愿的形成过程与公民利益和公民团体的代表才可以得到组织。而且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在选择一个政治领导层的意义上实践民主制才是可能的。在此方面，政治的阶段性事件带来了现代社会指引中心的假象，在其中，政治干预最终贯穿了所有的分化和相互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对政治领导地位和领导层的独裁 192 主义理解，随着民主权利的确立和接受而在体系上变得没有内容和不真实。在这种意义上，民主化最终成为一种政治的自我失势和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无论如何都会变成协商、监控和抵抗可能性的分化。

即便这一道路无论如何要走到其终点，仍然可以认为只要

权利受保护的地方，社会负担就得到重新分配，而协商则成为可能；只要公民变得主动，政治就会更少约束并可以更普及化一点。与此相应，在政治体系高层的等级化决策权力的集中概念，成为一种对前民主、半民主或形式民主的往昔的记忆。那么至关重要的是，在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主的某些情况下，反馈效应也是适用的。不断增加的民主继续产生新的标准和需求，这促成我们求助于对普遍状况的"泛漠"和"独裁主义特征"不满的意见，而不管民主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此方面，民主制中"成功的"政治可以引向这样一种境况：政治体系的制度丧失了其重要意义，并看到它们的本质受到损害。在这种意义上，公民在其中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并使用它们的既有民主制，需要得到一种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和不同于现今社会之趋向的制度。

公民权利的遵守和文化亚政治的分化

在西方的发达民主制中，一些制约被构建进去以限制政治权力的展示。早在19世纪这一发展的开端，就存在着权力的分立，它确保了与议会民主和政府并立的司法的控制功能。随着德国的发展，集体交涉(collective bargaining)的自主性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承认。就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党派在劳动市场里受控的争论，而国家在劳动争议中被规定保持中立。

迄今为止，这一发展方向的最后步骤之一就是对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和实际执行，而这与大众媒介(报纸、广播和电视)和新技术可能性一起，带来了多级的公开性形式。即便它们确实没有追寻受到褒扬的启蒙目标，但同样甚至是首先成为市场、广告和消费的"奴仆"(无论是消费所有商品还是消费制度性构造的信息)，而且即便它们可能产生或加剧了模糊性、孤立甚至愚

宪行为、对政治决策来说,仍旧存在一种受媒体指导的公众可以行使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监督功能。以这种方式,亚政治的核心 193 随着基本权利的确立而产生和巩固,而在相同的程度上,这些权利在其通过对抗政治(或经济)权力的侵蚀而建立的自主性中,从实质上得到完善和保护。

如果你将公民和宪法的权利实现过程的所有阶段想像成政治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下面这个矛盾的陈述就变得可理解了:政治现代化使政治和政治社会失势并获得解放。更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提供给那些逐渐出现的、它自身使亚政治具有的行动中心和领域以借助和针对体系进行超代议制监督的机会。以这种方式,或多或少明确界定的部分自主的协作和替代性的政治区域和手段,基于曾经被争取而现在受到保护的权利而分离开来。而这还意味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对这些权利的接受、扩张性解释和精心阐述而改变了。共同组织起来的敌手使政治体系的"头脑"面对着受媒体指导的公众所具有的"定义的权力"——它们可以从根本上共同决定并改变政治议程。甚至连法庭都变成普遍存在的政治决策的监督机构;矛盾的是,这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法官甚至要运用他们的"司法独立"来对抗政治的利益;另一方面,公民从对政治条令的忠实遵守者变成政治参与者,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会在法庭上对抗国家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种类型的结构民主化与代议制和政治体系相伴发生的事实,只会显得悖谬。民主化进程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所陷入的矛盾变得具体了。首先,在既有宪法权利的背景下,在亚政治不同领域中的民主共同决策和监督的可能性,被区分开来并详细加以阐释。其次,这一发展超出了民主的发源地——代议制。形式上继续存在的权利和决策权威衰弱了。在原先提供的政治

意愿形成中心里的政治生活，丧失了它的实质并存在着变得麻木的危险。

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伴随着专业化民主的模式，新的政治文化的形式正在变成现实，在其中，异质的亚政治中心，基于已有的宪法权利而对于政治上形成并推行的决策拥有某种影响。显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治逐渐没有影响力。它在外交和军事的核心领域与运用国家力量维持"国内安全"的领域仍保持着垄断地位。这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影响领域，这一点在以194 下事实上表现得很明显：从 19 世纪的革命开始，就存在一种公民动员与警察的"技术—经济"装备间的相对紧密的联系。即便在今天——以关于大规模技术的争论为例——也可以确定的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政治解放绝对是相互联系的。

新政治文化

在这种意义上，宪法权利对于拥有长期放大效应的政治分散化非常关键。它们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且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提供了打破先前盛行的、局限的和选择性的解释的新出发点。因而，最终的变化形式表现在公民的广泛政治活化过程中——从自发团体到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到（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核物理学家的）替代性的批判性职业实践形式。因为这一形式的多样性削弱了所有先前的政治计划，它们利用了它们在超代议制直接行动中在仅仅是形式上的权利，并用它们认为值得去争取的生活来丰富这些权利。公民们的这种在各类主题上出现的活化过程，因为亚政治的其他核心论题——司法和媒介公开性——同样对它们开放，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如这一发展所表明的，这些至少是一些可以用来（在环境保护、反核运动和资料保密中）很有效地保护公民利益的东西。

在这之中,"放大效应"表现了出来:基本权利可以持续地得到遵守,并且以一种相互增强的方式扩张,因而可以放大那些反抗"从上层来的"不需要的干预的"基本的"和"从属的机构"的"反抗力量"。公民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参与的兴趣——这在各种各样变化的公民自发团体和政治运动中,表现得和在大量人口统计学报告中一样引人注目 在对民主的独裁主义理解看来,好像是一种"反对国家权威的反抗力"。在科学家 他们听从他们自己的老习惯并固执地认为政治体系是政治的场所——看来,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不适当的施加政治影响的努力。但这是紧跟着民主权利的确立并引向具体民主的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在这些多侧面的发展中,政治行动的普遍化宣告了自身,它的主题和冲突不再只由争取权利的斗争来决定,而同样也为在整个社会中的阐述和使用所决定。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分阶段但(迄今为止)又一直是有方向地确立的带有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基本权利,形成了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它们一直在议会中被争取;另一方面, 195 亚政治的中心可以与会议平行发展并分化自身;而通过这些,民主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首先表现在前面提到过的亚政治的场所和形式中:司法和媒介的公开性。

在德国受到公务员法保护的法官的职业地位中,局部自主的决策领域正在出现,部分是通过新的观察和解释方式,部分是通过外部变化。并且,正如颇感惊异的司法界和公公众最近所看到的,这些也被以有争议的方式使用。这些权利原来基于长期存在的"司法独立"这一法律原则。然而只是到了最近,部分地也许是由于世代变迁和科学化过程,自由才被法官以主动的方式运用,并被自信地赋予内容

在很多对此具有决定性的条件中,我们将选择出其中的两

个:通过达成裁决的决策过程和对象的反思性科学化,原来普遍的客观约束构造开始崩溃,并至少在部分上允许个人决策的参与。这首先适用于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决策的科学分析。这些情况使在法律条文及其解释原则提供的框架内的司法行政的变量变得可见并可用;这些变量迄今为止一直被征募(recruitment)和普遍的基本信念所掩盖。因而,科学化揭示了论证中有用的技艺并以这种方式使司法职业从属于原来未知的、内部的职业政策方面的多元化。

这一趋势为这样的事实所支持:很多被推上法庭的冲突的主题和案例丧失了自身的社会明晰性。在很多冲突的核心领域——特别在核反应堆技术和环境问题上,但同时也包括家庭和婚姻法或劳动法——专家和反专家在一个无法协调的意见战场上对峙。以这种方式,决策权回到了法官手中,这部分是因为专家证据的选择已经包含着一种预先的决定,部分是因为在达成裁决之前衡量和记录论证过程就是法官的任务。在科学中通过假设的、孤立的和错综复杂的结果的过度生产而导致的对科学自我怀疑的系统培养,在司法体系上留下印记,并且打开了"独立"的法官决策的回旋余地;这就是说,它使达成裁定的过程多元化和政治化。

这对于立法机构的影响就是,它发觉自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被告席上。但现在,司法审查程序几乎成为有争议的行政活动(比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电站的问题)的规范过程的一部分。此外,计算这些程序如何从法庭中产生——以及最重要的——它们将持续多久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困难了。相应地,不安全感的灰色地带出现了,它加强了国家缺乏影响力的印象。

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这适用于一般的立法倡议。不管怎

196

样，它们很快将在州、联邦和欧共体的层次上与同级或更高权力的限制相抵触。在冲突状况中所需要的司法审查程序，提供了一种在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法官的潜在的裁决（需要指出的是这加强了律师对行政的垄断）并使安排的回旋余地变狭窄。

甚至出版自由的权利及其所有诠释的可能性和问题，都提供了无数将大的和部分地公开的领域（从全球电视网到学校报纸）与个体上非常特殊但整体上却值得考虑的影响社会问题界定的可能性区分开的机会。这些被信息生产的物质条件与一般法律和社会状况所限制和制止。正如环境议题的政治热潮以及社会运动与亚文化解释的兴衰所表明的，它们对于公众的——因此也是政治的——问题感知仍旧可以获得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这种情况在下面的例子里就变得很清楚：耗费昂贵和范围广泛的科学研究，总是要到了电视和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报道的时候，才会被安排它们的人注意到。在政治机构中的人看的是《明镜》，不是科研报告，这不仅是因为报告没有可读性，面且因为社会就是认为与政治相关的东西是在《明镜》里的，而这与内容和论证无关。突然间，结果本身丧失了任何为私人消费进行研究的线索；它萦绕在成千上万人心中，进而需要个人的责任和公众的声明（反声明）。

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被发展出来的界定问题和优先权的权力（它绝不能和"编辑的权力"相混淆，却与雇员的编辑工作相一致），当然主要依赖于发行量和评级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这一事实：政治领域只能冒着失去选票的危险来忽视得以发表的公众意见。从大量的假设性调查结果中，大众媒介选择发表具体的例子，它们由此获得了作为纯粹的科学结果已经无法再获得的熟悉性与可靠性。

这一切对政治的影响就是：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如果

197 突然上了头条，就会改变政治议程。既有的有关森林正在毁灭的公众意见强取了新的优先地位。当在整个欧洲层次上通过科学确证了甲醛的致癌作用，以前的化学政策就存在着崩溃的危险。以阶段性的政治事件的方式，如论证或议案或财政计划，对所有这些作出反应是必须的。媒体公开性的这种界定权力显然从未能预料到政治决策；而且它本身仍旧保持着与新闻事业中经济、法律和政治前提以及资本集中的联系。

这里至少要提到的亚政治的最后一个领域就是隐私（privacy）。出生数字是一个对所有政治领域都很关键的量；与此相似，也包括人们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问题，比如，母亲是愿意继续从事职业还是完全回到家庭去。从本质上说，所有那些男人和女人必须在其生活境况中寻找答案的问题都具有政治性的侧面。在这个方面，"问题指标"——离婚率的上升、出生率的下降和婚外生活状况的增加——不仅仅描述了男女之间的家庭和家庭外的关系，而且标明了所有政治计划和趋势的迅猛变化的参数。在这里作出的决定（比如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孩子数量和时间），甚至在退休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福利法案和社会政策的关键转折点与它们相联系的时候，都能免除外在干预。而这恰恰是因为，按照宪法上保证的家庭和隐私安排，这些决定完全是夫妇共同生活的责任问题。

对隐私领域的法律保护早就存在了。但它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看得这么重。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分散化中，这些自由空间才出现，而伴随着它们出现的是政治的社会基础中的不确定性。妇女在教育中取得的平等以及她们涌向劳动市场，在一方面只是标志着平等机会向原来受到排斥的群体的扩张。而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周围的状况都改变了：在家庭、婚姻、亲子关系中，在出生和事业的发展中，在福利法案中，在就业体系中等等。

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过程拓宽了亚政治在私人领域的构建作用和决策的范围，而这是处在国家可能影响的层次之下。同样在这个层次上，妇女运动所说的"个人是政治性的"，就切中了一种在历史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的事态。

这些文化和社会亚政治的不同局部领域——媒体公开性、司法、公民自发团体和新社会运动——组成了一种新文化的各种形式，有些是超制度的，有些是受制度保护的。这样一种政治甚至在其不固定的形式中都不会被范畴化，或者就是因为这个，198 它成为影响德国过去二十年政策和技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政治文化的有效性依赖于用社会生活充实法律的抽象条文；更确切地说，依赖于逐渐打开并克服对普遍有效的基本规律的选择性解释。这一发展的一个代名词散布在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和政治争论中：参与。绝对没有必要褒扬这已经开始的发展过程；你可以绝对地去批判它的趋向新神秘主义的过度发展，而仍旧拥有充分的理由去猜测，这种思想的特质和传播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景观，并将在未来更明确地产生这样的作用。

随着政治在代议制体系中的成功而出现的政治的社会和文化分化，也无法不留痕迹地通过政治社会学的审查。政治的理性选择、等级化的手段—目的模式（它或许一直是虚构的，但长期以来得到科层制研究和决策理论的培育）开始崩溃。它被强调咨询、互动、协商和网络的理论所代替，简言之，就是强调在那些负责任的、受影响的和有利害冲突的行动机构和个体的语境中的相互依赖性和过程性特征——从程序规划到实施形式。政治的传统理解从一种天真的假设出发：只要拥有恰当的手段，设定的目标都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达到，但在更新的研究理路中的政治，被看做不同行动主体的合作，它们甚至与形式上的等级制

相抵触并跨越了确定的责任。

因而，研究已经表明，行政管理机构的体系总表现出缺乏严格权威关系和对水平的联结渠道的支配的特点。即便在正式等级依赖关系呈现在上下级之间的地方，垂直影响的可能性也总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Mayntz, 1980）。在政治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行动主体和主体群体获得了协商和合作的机会。所有这些都强调政治领域的偶然性（contingency），而该领域在形式意义上仍旧在外部保持着等级化的特征。与此同时，政治向政治过程的液化只是被社会科学轻描淡写地看待。这一过程的指向和结构（比如在程序、措施和实施中）仍旧是假定的（只是因为政治科学分析的可操作性）。政治行政体系作为政治核心的虚构似乎还会延续下去。然而这样一来，占据了关注中心的那199 种发展过程在这里就看不见了：政治的解放。

政治文化和技术发展：进步共识的终结？

政治体系的现代化压缩了政治行动领域。既有的政治乌托邦（民主制、福利国家）在法律、经济和社会上约束我们。与此相应并且是非此即彼地，全新的干预机会通过技术-经济体系中的现代化而开启了。生活和工作的文化常数和基本前提至此可能这些情况弄得无效。微电子技术使我们可以改变就业体系的社会构造。基因技术使人处于一种类神的状态，他们可以创造新的物质和生物，并使家庭的生物和文化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设计和可建构性原则的普遍化——它现在甚至包围着那些它理应服从的对象——使风险成指数增长并使它们的起源和解释的地位、条件和方式政治化。

“老”工业社会为进步所困的说法总是被强调。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到今天，在所有对这一状况的批判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对

隐含的进步信念的质疑(而进步因为风险的增长在今天变得如此不稳定),这种信念就是对试错法的信念,对逐渐建构起对内在外在本质的系统把握的可能性的信念(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挫折和附属问题,以及对"进步的资本主义信念"的批判,这一神话直到最近对于政治左派仍旧是不可缺少的)。另外,这一文明批判的背景音乐丝毫没有减少那些在进步之帆下发生的社会变迁。这与进步的特性有关,在其中,社会变迁可以"隐姓埋名地"发生。"进步"远远超出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是社会永久变化的一种"规范的"制度化行动的超代议制结构 非常矛盾的是,在极端的情况中,它甚至可以不顾保持现状的愿望的抵抗而颠覆原来盛行的与国家警察力量的关系。

为了理解这一进步共识的合法化力量,就必须重提一种现在几乎被忘却的联系,即社会和政治文化与技术—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的开端,劳动、技术和商业体系所受的文化影响是一系列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焦点。马克斯·韦伯阐述了加尔文主义宗教伦理和它所包含的"内在禁欲主义"在"职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兴起和确立中的重要意义。半个多世纪前,特里斯坦·凡伯伦认为,经济学规律不总是合理的,并且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要从整体上与社会的文化体系联系起 200 来加以考虑。如果生活和价值的社会形式变化了,那么经济原则也必须发生变化。举例来说,如果人口中的大多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拒斥经济增长的价值,那么我们对劳动结构、生产力标准和发展方向的看法就会变得可疑,从而会出现一种对政治行动的新型压力 在这种意义上,韦伯和凡伯伦(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主张的是,劳动、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同文化规范体系,即人们的普遍期待和价值取向,紧密相关。

这种从根本上看很明显也被其他一些学者[①]所推崇的洞见,在口头表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实践意义。首先,简单地说,这可能由于这样的事实:社会和政治文化从二战后到60年代仍旧保持稳定。一个恒定的"变量"并没有进入视野;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再是一个变量,其重要性也仍然不被认识到。这一变化在那些稳定性崩溃的地方立即就发生了。可以说,随着规范背景文化共识的破裂,它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意义只有以回顾的方式才能变得明确。在战后德国的繁荣时期(同时也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经济、技术和个体进步显然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增长"或者"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合乎资本增长中的管理利益的经济目标 它们同样以一种所有人都清楚的方式引导社会的重建、个体消费的机会增长和对原来排他的生活标准的"民主化"。在对"进步"的追寻中,以经济和技术的方式理解的个体、社会和经济利益的相互联系,在战争留下的废墟的背景上非常成功,以至于一方面确立了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使技术创新显得可计算。这两种情况保持着与对福利国家的政治期望的联系,并且以这种方式,它们稳定了"技术转变"的政策和非政策领域。详细地说,这一技术政策中对进步共识的社会设计基于以下三个前提,而它们从70年代一种新政治文化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崩溃了(Braczyk et al.,1986)。

首先,这种共识基于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这一和谐公式。存在这样的假设,即技术发展产生明显的使用价值,这些价值以劳动安全设施、生活的改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式被每个人切实地感觉到。

① 除了韦伯和凡伯伦,还可以提到迪尔凯姆、齐美尔以及更近一些的加尔布雷斯和贝尔。

其次，只有这一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等式，才能允许将负 201 面影响（非熟练化、重组、对工作保障的威胁、对健康的危险或者对自然的破坏）孤立地和回溯地看做“技术变迁的社会后果”。“社会后果”在特征上就是伤害，特别是对于某些群体的次级问题，这些群体从来没有使为社会承认的技术发展的价值受到质疑。对社会后果的讨论允许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是任何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化的要求都遭受了拒绝。另外，有关“社会后果”的论战无需伤及技术变迁的运作就可以解决。仅仅是可能和必须去谈论负面的“社会”后果。始终无可争辩的技术发展本身对决策是封闭的，并且遵循自己固有的客观逻辑。

第三，在技术政策中，进步共识的承担者和生产者就是工业的谈判双方，即工会和雇主。只有间接的任务落在国家身上，那就是消化“社会后果”和监控风险。只有“社会后果”是劳资谈判双方争议的对象。在估价“社会后果”上的矛盾，总是假定了在技术发展如何进行上的共识。这一对技术发展核心问题的共识被一种经过充分演练的对“技术仇恨”、“劳工运动”和“文明批判”的共同反对所加强。

技术政策中的进步共识的所有支柱——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分离、系统和客观约束的归因、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的共识公式和集体交涉伙伴的首要责任——在过去二十年里开始解体，并且这不是出于偶然和因为文化批判的机制化，而是反思性现代化的后果。潜在性和次级影响被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所终结（参看以上论证）。当风险增加的时候，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统一的和谐公式被取消了（参看以上论证）。与此同时，群体进入了技术政策冲突的舞台，在利益的组织间结构及其感受问题的形式中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领域。比说，在有关核电站和回收技术的冲突中，雇主和工会——传统技术共识的支持者——不得

不上了听众席。现在冲突直接发生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抗议团体之间,进而是发生在一个完全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场景中,发生在那些初看之下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无关的行动主体间。

甚至场地和敌手间的这种变化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与202 风险密集型的大规模技术——核电站、回收技术和有毒化学物质的普遍应用——的发展有关,这种发展进入了一种与外在于工业领域的集体生活世界的直接相互关系中。另外,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政治文化不断增长的参与兴趣。从有关回收工厂的争论中:

> 我们可能会知道,数量上的少数(比如相关的"抗议群体")不能被当做捣乱者和流氓而清除。他们所表达的不满拥有一种指示价值,它表明着……一种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彻底变化,或者以前不为我们所知的社会群体的分化。既有的政治组织至少要像对待选举日那样严肃的对待这些信号——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宣告出现。(Braczyk et al.,1986:22)

最后,科学也作为合法化的根源衰败了。不是愚昧者和新的石器文化的倡导者在预告这样的威胁,这样的激进主义分子越来越多地是科学家自己——核能工程师、物理学家、遗传学家或者计算机专家——以及数不清的公民;对他们来说,对危险的屈从和能力是相互重叠的。他们知道如何论证,组织良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拥有自己的刊物,并处于一种向公众和法庭提供论据的地位。

因而,一种开放的状况逐渐产生:技术—经济发展正在失去其文化共识,并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技术变迁的加速发展和相

伴随的社会变迁的程度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然而,原来被接受的进步信念的丧失并没有改变技术变迁进程中的任何东西。这一比例失调就是技术-经济亚政治所意味的东西:社会变迁的范围随着它们的合法化而相反地变化,而丝毫不改变已经被理想化为"进步"的技术变迁的实施力量。

今天,在基因技术中,对"先进"的恐惧已经广为传播。听证会举行了。教会进行着抗议。即便信仰进步的科学家也不能摆脱紧张。然而所有这些像是很久之前作出的决定的讣告一样发生。或者不如说从来就没有作出过决定。"是否"的问题从来没有等在门外 没有一个委员会会让它进去。它总是在途中。人类遗传学的时代,即人们今天所争论的事实,早已经开始了。你可以对进步说"不",但这根本不能改变它的进程。进步是一张需要超越赞成和辩护而支付的空白支票。民主地合法化的政治对于批判的敏感度与技术-经济亚政治对批判的相对免疫性形成对比;亚政治没有计划、不受决策影响,只有在其实现的时候,才作为社会变迁而意识到自身。亚政治这一特殊的结构化和成就力量,下面将在医学这个极端例子中加以探询。 203

医学的亚政治——一个极端的案例研究

依照其自我理解,医学服务于健康。事实上它创造了全新的状况,改变了人与自身、与疾病(disease)、病症(illness)和死亡的关系,实际上它改变了世界。为了认识医学的革命性后果,根本不必进入从救世的医学保证到幼年期幻觉(visions of immaturity)这样的评价迷障。

你可以论证医学是否实际地改善了人们的福利。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它使人口增加了。地球上的人口已经增加了近十倍。这应该首先追溯到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

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生活境况不发生戏剧性的恶化，在中欧，社会上不平等的群体的平均寿命将达到七十岁，而这在19世纪还被看做是“不可想像的”。这主要反映的是卫生的改善，而这如果没有医学研究的成果是不可想像的。因为营养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死亡率在下降，并且我们第一次拥有有效的对付传染病的方法。结果是人口的急剧增长，特别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且伴随着饥饿和贫困这样的严重政治问题，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的不平等。

医学的社会变迁后果的一个相当不同的方面随着当代医学发展中诊断和治疗的背离而出现。

> 科学诊断的仪器、心理诊断的理论和术语大量增加，而一种现在更加深入人类身体和心灵“深层”的科学旨趣已经与治疗能力脱离开，并逐渐开始责备它“拖后腿”。(Groβ et al.,1985:6)

结果是所谓慢性病的急剧增加，这就是说，多亏有了更精确的医学和技术感应系统，疾病才能被诊断出来，而不必有任何对它们有效的治疗措施的出现或可能出现。

在其最发达阶段，医学产生了它界定为(暂时或永久地)无法治愈的病理状况，这种状况表现了全新的生命和危险状况，且跨越了现有社会不平等的体系。在20世纪开端，40%的患者死于急性病症。而到1980年，这个数字是1%。而另一方面，死于慢性病的比例从46%上升到80%多。这类情形中，生命终结之前越来越多的是长期的患病状况。在1982年的小规模人口

204 普查中，960万登记为健康受损的联邦德国人中，有接近70%是慢性疾病患者。当这一情况发展的时候，在医学的原初意义上

的治疗越来越成为一种期盼。而这还不单单是一种失败的表现。因为它的成功,医学将人们投入到疾病中,而这些疾病是靠它的高技术可以诊断的。

这一发展包含着一种医学的和社会—政治的转向,而其深远的后果在今天刚刚开始被意识和感觉到。因为19世纪欧洲的专业化发展,医学已经通过运用技术从人们那里接过疾病,独占并管理着疾病。疾病和病症被完全托付给医学制度以便进行外在的掌控,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医生在“军营”一般的医院里“折腾”着,同时,患病的人大体上仍受到忽视。

今天,正相反,那些在处置病症时被系统制造和忽视的病人,被扔给他们自己和其他的制度,而那些制度也完全不是为他们预备的:家庭、工作世界、学校或其他公共领域。艾滋病,这种迅速传播的免疫系统疾病,仅仅是这种情况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同样作为诊断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疾病开始普遍化。一切都是“患病的”,或者实际上或潜在地可以使之成为“患病的”,而这与人们实际感觉如何无关。相应地,“主动的患者”的形象被再次提出来;一种对“工作联盟”(working alliance)的需求被创造出来,在其中患者成为医学归之于他们的患病状态的“辅助医生”。不寻常的高自杀率表明了这种彻底改变令遭受疾患折磨者多么难以忍受。在那些受慢性肾病折磨、依靠按时透析维持生命的人里面,自杀率在各个年龄段都比一般人群高六倍(有关内容参看 Stössel, 1985)。

最近付诸实践的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当然有理由激动人心。公众中的争论是在“试管婴儿”这一术语的误导下进行的。这一“技术进步”主要包在于以下事实:

> 在人类胚胎发展的最初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从卵子

> 受精到第一次细胞分裂,被从妇女的输卵管转移到实验室中(体外=试管)。需要的卵子被以手术方法从妇女体内取出 在此之前,通过用激素刺激卵巢,已经在一个月经周期里产生了多个卵子(超量排卵)。卵子在含有精子的溶液中受精直至四到八个细胞的阶段。随后,只要它们的发展是正常的,就会被植入子宫。(Daele, 1985: 17)[①]

体外受精的应用是源于很多不孕妇女对孩子的强烈需要。目前为止,在大多数医院中,这种方法只向已婚夫妇提供。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非婚生活关系,这一限制显得十分过时。一方面,向单身妇女开放这一技术引致全新的社会关系,其后果今天根本无法预测。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已不是离婚后的母亲,而是前所未有的有意的无父亲的母亲。这只需要没有任何关系的男性捐献精子。在这种意义上,无父亲的孩子将会出现,他们的双亲将简化为母亲和一个匿名精子捐赠者。最终,这一发展将引致保留生物学上的父亲而废除社会性的父亲这样的结果(所有关于遗传父子关系的类似社会问题将根本不可能解决,如血统、特性遗传以及对抚养和遗产的要求等等)。

205

胚胎在移植之前应被如何处理——当你考虑这个简单问题的时候,附加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时候这个胚胎的发展将被

① 在此类成为可能的科学实验中,试管中的发展在技术上不限于在子宫中移植的通常阶段。"理论上,为了制造一个真正的试管婴儿,整个胚胎发育过程都可以在试管中达到。胚胎细胞可以与其他物种的细胞混杂来制造喀麦拉。喀麦拉特别适于胚胎发育的试验研究。最终,我们可以想像通过置换胚胎细胞核的方法来"克隆"人类胚胎。在老鼠试验上这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对人来说,它可能有助于产生遗传上完全相同的后代或者可以作为没有排异反应危险的器官移植材料。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都只是幻想而已。"(Daele, 1985: 21)

看做“明显正常”，因而可以被植入子宫？“体外受精使我们在妇女体外也可获得人类胚胎，而这开启了技术应用的广泛领域，某些研究已经实现，另外的一些经过日后的发展也有可能实现。”(Daele, 1985: 19)因而，随着既有的精子库出现的将是“胚胎库”和低温冷冻的胚胎的收藏和买卖，胚胎的可获得性提供给科学一直期盼的胚胎学、免疫学和药理学研究的“试验对象”。胚胎——这个词表示人类生命的开端——通过分割可以进行复制。由此得到的遗传上完全相同的孪生胞胎，可以被用来确定性别或者诊断遗传或其他疾病。这里是新学科和新实践的开端：对胚胎进行基因诊断和治疗以及所有相关的基本问题。什么能够构成一个社会上和伦理上“可取的”、“有用的”或“健康的”基因物质？谁会进行“胚胎的质量控制”(Brautigam and Mettler, 1985)，他将凭什么权利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对于那些不符合出生前的“准入考试”的要求的“低质胚胎”，我们将如何处置呢？

很多从这些使传统文化的惯例无效的医学技术(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技术)发展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已经被认识到并得到恰当的讨论。(也请参看 Jonas, 1984; R. Low, 1983)[①]

然而，一个不同的方面将占据我们注意力的中心，那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讨论中只是接触了其外围的问题：亦即，医学

①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出生前诊断和胎儿检查也产生了全新的问题和冲突，那就是，对母体中胚胎阶段的婴儿进行手术的可能性。母亲和孩子的根本利益在出生前已经被以这种方式分开了，虽然他们在肉体上还是一体的。当诊断和检查的可能性增加的时候，疾病的治疗延伸到还没有出生的生命上去。与治疗者及其对象的意识和意志无关的是，手术的风险及其影响对母亲(或者付钱的代理母亲)以及在其子宫中成长的孩子产生了矛盾的风险状况。这同样也表明，通过医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化可以超出身体结合的界限而进入心理—生理关系。

进步被作为制度化,被作为不经普通公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所认可的制度化革命,而被加以分析。这些如何可能发生?只是在事后有关这一寂静无声的社会和文化革命的结果、目标和危险的问题,才必须接受批判性大众的探询吗?——公众的探询针对的是人类遗传学家小诊所中的职业乐观主义,这些人没有他们自己的真正影响而完全专注于他们的科学猜想。

206

另一方面,在似乎可比较的东西(医学技术的革命)中产生了某些不可比较的东西。你会承认,人类发展中固有着某种程度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改变。你可以发现,历史预定并发展了改变和影响人类本质、生产文化、操纵环境并以自己创造的条件取代自然进化约束的能力。然而,这不会使我们相信向新领域的突破在这里发生。对"进步"的讨论预设了一个所有这些都最终将使之受益的主体时。在可行性范畴里的自由思想和行动着眼了相反的方面,即它使之成为可能的对象、对自然的把握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当技术可行性和安排原则以这种方式侵占了主体时,那么进步模式的基础就被取消了。资产阶级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破坏了市民的生存条件,按照工业社会劳动分工的流行图景,市民最终被假设成手中掌握着所有发展的民主线索。不知不觉地,对自然的把握在最真切的意义上已经变成对主体的控制——虽然这一把握原来理应服务的启蒙主体性的文化标准不再存在。

另一方面,对人类历史中一个时期的秘密告别,无需跨越任何同意的障碍而发生。虽然全世界的专家委员会还在草拟他们对这一步骤的可能和不可预测的后果——那也意味着在更远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的最后报告,试管婴儿的数量却在急剧上升。单单德国,从1978年到1982年就有七十例。而到1984年就超过五百例,共有六百多个孩子。那些可以进行体外

授精的医院排起了长队。

因而,医学拥有实施并检验其"发明"的自由通行证,这是基于它的行为结构。医学从业者总是可以减弱公众对于"什么样的研究者可能或不可能与既有政策有关"的争议和批评。那无疑还提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但这类疑问本身就缩略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把"君主的权力"还原为王室道德的努力。当你将在政治中改变社会决策的方法和范围与医学亚政治中的方法和范围联系起来的时候,这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207

尽管存在着这些对进步的批评和怀疑,那些在医学领域可能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转移到官方政治领域,将等同于一场丑闻:我们只是完成划时代的有关社会未来的基本决策,却绕过了议会和公共领域,并对因它们付诸实践而产生的非现实的后果进行争论。这甚至不会表现出一种科学的道德特性的失败。按照医学的社会结构,在医学亚政治中不存在议会,也没有可以事先对决策的后果进行研究的行政部门。这里甚至不存在一个决策的社会场所,所以最终没有确定的决策也没有一个决策可以变得确定。你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在西方彻底科层化和发达的民主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在其法律义务、权限和民主合法化上接受详细审察,而在同时有可能取消传统生活的基础,并绕过所有科层制的和民主的监督和决策。这在不断扩展的批判狂潮中发生,但也以另外的方式在超代议制常态中发生。

以这种方式,在外部争议和控制与内部医学实践的决策力量间,出现并维持着一种彻底的不平衡。按照它们的地位来看,公共领域和政治总是并且必然是"不知情的",无望地跟在这些发展状况的后面,根据那些从事医学的人感到陌生的道德和社会后果进行思考。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然谈论不现实的东西,谈论还不能看见的东西。体外受精的后果确实只能以实施

后的经验确定性来加以研究；若预先进行，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推测 按照"医学进步"的固有尺度和范畴，对有生命主体的直接实施面临着有关社会后果的恐惧和猜测，这些后果的猜想实质与对文化确定性的侵犯程度成正比。以政治的语言说就是，对法律的讨论要在它们生效后才能进行；只有到那时候，它们的后果才可见。

效力与匿名性的合作增加了医学亚政治的结构化力量。在这个领域中，以某种自信去超越界限是有可能的，这种自信的社会变化范围一方面远远超过政治的影响范围，一方面又只能通过代议制炼狱而在政治领域中实现 在这种意义上，医院和议会具有相当的可比性，甚至就结构化和改变社会生活状况而言在功能上是等同的，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们根本不能等同，因为议会没有相同范围的决策机会以及相同的有权将决定付诸实施的机会。家庭、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基础因为医院中的研究和实践正在遭到破坏，议会和政府还在着眼于限制和避免而争论减少健康系统开支的"关键问题"，虽然很清楚，在任何状况下，精心设计的方案和它们的实际实施都是两回事。

208

相对而言，在医学的亚政治中，轻率的无规划的对界限的超越的可能性存在于"进步"的逻辑中。即便体外受精也首先进行了动物试验。你尽可以论证那是否将获得允许。但当然，将这种技术在人身上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跨越了一条本质的界限。这一风险，无论如何不是医学自身的风险，而是对我们后代和我们自己的风险，应该并可以使它完全内在于医学实践过程，并且是在存在着一种（全球性）广泛声誉竞争的状况下。这似乎只是医学的一个主要的"伦理"问题，并且在此类范畴中被公开地感受和争论，因为已经存在了一种无需公众的赞同或讨论就将医学知识付诸实践的社会结构，它完全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协商。

你可以这样来说明政治和亚政治的核心区别：民主地合法化的政治，及其包含在法律、资助和信息（比如对于消费者的信息）中的影响力，拥有权力的非直接来源，其长期的“实施过程”提供了额外的监督、修正和缓解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亚政治的进步享有一种无需实施的直接性。在亚政治中，你可以说立法和行政部门都把握在医学研究和实践手中（或者与工业和管理有关）。起作用的是一个不分立的权威模式，它还不知道什么是分权，并且在其中，社会目标只需受影响群体事后认可、作为已经成为现实的次级后果。

这种结构当然在医学专业中得到最“纯粹”的界定。医生并不会把他们自己的结构化力量归诸他们特殊的理性，或者在保护得到高度评价的商品——“健康”——上取得的成功。相反，它是（在20世纪之初）一种成功的专业化的产物和表现，并且作为一种相应的有限例证，它同样对于产生专业（或以“不完全的”方式说就是职业）结构化力量的状况拥有普遍的兴趣。存在着一些前提。首先，专业团体必须成功地保护他们制度上的研究机会，并且对自己开放创新的源泉。其次，他们必须可以（共同）决定训练的标准和内容并以这种方式确保专业规范和标准向下一代的传递。第三，最主要却极少被跨越的障碍在于，获得的知 209 识和训练出来的能力的实际应用都是发生在专业控制的组织中。只有这样，专业团体才拥有一种组织屋顶（organizational roof），在其下，研究、训练和实践相互联系起来。只有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实质性定向的结构化力量才会在无需社会赞同的情况下发展和确定下来。“专业权力循环”的范式就是医院。这里，专业亚政治的影响力源泉与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相互确认和巩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很多其他专业团体和组织或者没有将研究作为一种创新资源来控制（社会工作者和护士），或者

从本质上与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应用割断了联系(社会科学),或者必须在超专业的、工业的标准和控制下来使用这些成果(技术和工程科学)。医学以医院的形式独自拥有一种组织安排,在其中,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患者并自动地趋近完美,这一切都是按照与外部质疑和监督隔离开的医学自身的标准和范畴进行的。

以这种方式,作为专业权力的医学为自己赢得并发展了一种相对于政治和公众的协商和干预企图的根本优势。在它的实践领域——医学诊断和治疗中——医学不仅控制了科学的创新力量,而它同时就是"医学进步"事务的议会和政府。当我们要去确定"玩忽职守"的时候,甚至法学这一"第三种力量"都不得不求助于医学生产和控制的准则和环境,这按照理性的社会建构最终只能被从事医学的人所决定。

这些就是"既成事实的政策"(policy of faits accomplis)可以在其中得到执行并向生与死的文化基础拓展的状况。因而,医学专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通过"新事实"的生产,去推翻从外部而来的批评、怀疑和命令。社会期待判断标准不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反思性的,这就是说,它们部分地要由进行研究、诊断和治疗的医师产生和界定,并因而是可改变的。在社会上被看做"健康"和"疾病"的东西,在医学垄断的框架中,丧失了其预先注定的"自然"品质,变成一种在医学工作中可以得到生产的东西。以这种观点看,"生"与"死"不再是超出人类所及的永恒价值和概念。更恰当地说,在社会上被当做"生"与"死"而接受的东西,在医学工作者的工作中并且因为他们的工作变成不确定的。这必须以所有可预知的含义,并且在医学和生物学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标准的背景和基础上,进行重新界定。210 因而,随着心脑外科技术的发展,对于以下状况就要重新界定一个人是否"死"了:大脑死亡而心脏仍旧在跳动;心脏功能只能以

复杂的仪器进行人工维持;某些脑功能丧失(所以患者处于永久的"无意识"状态)而其他身体功能依旧起作用等等。

基于遗传技术通过体外受精开启的可能性,生命不再等同于生命,而死亡也不再是死亡。只要医学(未经要求)可以并已经产生的事实超出了人类对于自己和世界的理解的清晰基本范畴和明确状况,那么它们就成为不确定的和可变化的。需要一种以前的发展中没有出现的决策的新情境,正在被不断产生,并且(至少部分地)它们总是为了着眼于研究的医学的利益在医学实践中事先被解答了。这些决策模式自身,只有基于医学诊断(当然也要和其他专业协作)才能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进行"把握"。以这种方式,关于事物的医学观点将自身客观化并把它向所有生活侧面和人类生存领域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在越来越多的行动领域中,一种经医学界定并完全结构化的现实正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前提。医学塑造的法律、"医学地评估的"劳动技术、环境数据和环境保护或饮食习惯的准则出现了。以这种方式,不仅医学形成和决策的螺旋越来越深地盘曲进风险社会的次级现实中,而且产生了一种对医学的不可满足的欲望,这是一个分支庞杂的医学专业无限扩张的服务市场。

一个管理着科学、培训和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职业团体,拥有的不仅是某种保护其产品市场的"专业策略"——对培训或资格证的合法独占或排他性的通道以及类似的东西(有关这点请参看 Beck and Brater, 1978)。远远超过这些,它拥有的是金鹅,可以说,是"出产"可能的市场策略的金鹅。专业组织的环境就等同于一种反思性的市场策略,因为它使专业团体处于这样的位置上:专业团体从对它所独占的行动领域的认知发展的控制中,不断产生新的专业策略。因而,它可以不断通过相关的技术—治疗发明而从自己产生的风险和危险状况中获益,并扩展

自己的行动领域。

然而，医学的专业统治不能与医师的个人权力混淆或等同。相反，医学的结构化力量是以专业形式行使的，并且在专业活动分子的个人旨趣与政治和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固有界限。警察、法官或者行政官员同样不能像君主在自己的王国中那样，运用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增加他们的个人权力，而这不仅是因为法律条例、监督者和监管者防止了这一切。这也是因为在专业形式中，就他们的工作的实际目标和副作用而言，存在着一种对私人经济利益（收入、事业等）内在的不关心。个体医生与他们所干预的社会性的变迁领域隔离开了。后者几乎不在他们的参照视野之内；它们在所有情况下都被转移到医学实践的副作用中。对于医师来说首要和核心的问题，如在职业中内在界定和控制的那样，是“医学进步”。当然，在这种发展方向上的成功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而只是转化为事业机会、薪水或者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进行人类遗传学研究的有薪医师像任何其他雇员一样是带有依赖性的。他们会依照在工作中的表现而被别人解雇、代替和监督，并且他们服从于外在的指导和规定（Beck，1979）。

亚政治的一种进一步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出来，它在行动的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自己。虽然在政治领域，意识和影响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与所行使的功能和任务统一，但在亚政治领域，意识和实际作用、社会变迁和影响是系统地分离的。换言之，社会变迁所放松的领域根本不需要与之相当的权力增长，相反，它甚至与一种影响力的缺乏有关。因而，规模相对较小的人类遗传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团体，正在无意识无计划地推进社会环境的剧变，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作为雇员的专业实践的表面上的常态下进行的。

技术政策的困境

现在,你可以说技术—经济亚政治的正当性源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在政治体系中并没有作出有关技术的直接决定这个事实应该没有任何争议。我们必须共同对之承担责任的副作用,不是由政治家造成的。尽管如此,技术政策还是控制着财政支持杠杆,控制着对于不受欢迎的后果的合法的疏解和缓和。有关技术—科学发展及其经济开发的决策,超出了研究政策所及。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工业拥有一种双重的优势,即投资决策的自主性和对技术应用的垄断。对以经济计划、经济产出(或风险)和公司的技术结构的形式出现的现代化进程的控制,都掌握在经济亚政治的手中。 212

现代化权力结构中的劳动分工使国家陷入多重的延迟中。首先,国家力求赶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而那是决定于其他东西的。尽管存在着对研究的支持,国家对于技术发展的影响仍旧是间接的。议会中不会表决微电子技术、基因技术或类似技术的使用和发展;最多,议会可能表决是否支持它们以保护国家的经济未来(和工作机会)。确切地说,有关技术发展的决定和有关投资的决定的紧密联系,推动工业为了竞争的原因而悄悄进行它的计划。结果,决策只是在被提出后才来到政治家的桌子上和公共领域。

在投资决策伪装下的有关技术发展的决策一旦被作出,它们自身就获得并发展出可观的分量。现在它们带着投资带给它们的限制——它们必须挣钱——来到这个世界上。基本的反对将危及资本(当然还有工作)。任何指出副作用的人,都损害了那些把自己的未来和雇员的未来交付给这些计划的企业,并最终威胁到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双重限制。首先，副作用的估算是在为了获益而作出的投资决策的压力下进行的。其次，对副作用的指责因为这样的事实而缓解：在任何情况下，对后果的估算都是很困难的，而且政府的对应措施需要很长的程序和时间去执行。其后果是一种典型境况："基于昨天的投资决策和前天的技术发明，今天的工业产生的问题，将遇到明天的对应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在后天才会起作用。"(Jaenicke, 1979: 33)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政治通过那些既不是它造成的又不是它能避免的后果的合法化，而变得专业化了。依据权力分立的设计，政治仍旧在一种双重意义上对工业中的决策负责。技术发展问题上的伪政治的工业"自主权"只拥有一种借来的合法性。它必须在逐渐具有批判性的公众注视下，一次又一次地在社会中重建自己。对没有作出的决策的政治合法化的需要，被政治和官方对副作用的责任所加强。因而劳动分工使工业拥有第一位的决策权力，却不用对副作用负责，政治则被赋予了以民主的方式对那些还没作出的决策进行合法化并"缓解"技术副作用这样的任务。

与此同时，副作用的证明(至少在早期)是与投入到所选择213 的技术发展途径中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利益相抵触的。副作用(或者公众对其的敏感度)越增长，对经济复苏的兴趣越大(同样以大规模失业的观点看)，技术政策的行动自由就越小，它被卡在公众批判和经济优先性这两块磨石之间。

在这里缓解是由进步的模式提供的。"进步"可以被理解为未经民主政治合法化的合法社会变迁。对进步的信念代替了投票。进而，那是一种对问题的替代，一种预先对未知和未提及的目标和后果的赞同。进步作为一种政治程序是一张白纸，它需要全体的同意，就像一条通往天堂的世俗道路。民主制的根本需要已经被进步模式颠倒过来。即便是人在进步中所关心的是

社会变迁这一事实,也必须回溯性地指出来。正式地说,人所处置的是非常不同但总是如此的东西:经济特权、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或者工作。社会变迁只以被替代的形式发生。进步作为"理性化进程",是理性行动的颠倒。它是社会朝向未知领域的不断变化,没有程序也无需表决。我们假定一切都会好起来,最后,所有我们带给自己的东西都能归之于进步性。但我们甚至会问,为什么其中会有某种离经叛道的东西。不知其所以然的赞同是前提。其他一切都是离经叛道。

这样,进步信仰中的反现代性变得明显了。它是一种现代性的世俗宗教。所有宗教信仰的特征都适合它,比如,对未知和不具体事物的信仰,或者违背自己的更好判断却不知道方式以及"如何"的信任。对进步的信仰,是现代性对其变得具有创造性的技术的自信。生产力,以及那些发展并掌管着它们的科学和商业,取代了上帝和教会的位置。

在工业社会时代,这替代的上帝对人所施加的魔力变得更加令人惊叹,当你更接近地考察它尘世的设计时。科学的无责任(non responsibility)与商业的暗含(implicit)责任以及政治合法化的单纯(mere)责任相对应。"进步"是被制度化到一个无责任位置的社会变迁。对一种被变形为进步的绝对律令的信仰的宿命性是被制造出来的。"副作用的无政府状态"对应着一种只能给予已经作出的决策以祝福的政府政策,对应着一种把社会后果留在潜在的提升成本的因素中的经济,对应着一种以对自己理论立场问心无愧的态度引导着整个过程并希望不去知道结果的科学。只要对进步的信仰变成了一种进步的传统——这传统如它创造进步那样推翻进步——技术—经济发展的非政治就将自身转化为需要合法化的亚政治。 214

工业自动化的亚政治

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那些组织社会学的分析，仍旧使用大规模组织和等级的“确定性”、泰勒主义和经济危机这样的术语，而这些术语早已经被工厂里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可能性所削弱。伴随着微电子和其他信息技术的自动化可能性，以及环境问题和风险的政治化，不确定性已经深入到经济信条的核心位置。那些似乎固定的和刚刚颁布的东西正成为可变动的：工资劳动的时间、空间和法律上的标准（对此请参看第六章的详细论述）；大型组织的权力等级；理性化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不再与传统计划和关系相一致。它们超出了分工、工厂和部门的严格界限；生产部门的结构可以独立于劳动力结构而变化，由于对市场、生态道德和生产的政治化所决定的灵活性的需要，赢利能力的概念正在变得不固定；而新的“灵活专业化”（Piore and Sabel, 1985）的形式与旧的大规模生产的“庞然大物”有力地竞争着。

这一改变结构的可能性的过剩，决不需要作为组织政策的一部分立即、直接和在不远的将来付诸实施。但是，在生态学、新技术和转变了的政治文化的交叉作用中对未来发展的这种迷惑不清，已经改变了今天的状况。

> 在繁荣的50和60年代，以相对的准确性预测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可能的。今天，甚至不可能再去预测从某个月到下个月的经济指标的变化。与国民经济变化中的不确定性相对应的，是对个体销售市场前景的迷惑不清。管理者并不清楚应该生产什么，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使用什么技术——事实上，权威与权限如何在公司内部进行

> 分配都是不确定的。任何与工业家交谈或阅读商业书籍的人都可作出这样的结论:很多公司都将面临如何作出可以理解的未来战略的困难,即便这里没有政府的干预 (Piore and Sabel, 1985:22)

当然,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但现在的混乱状况显示出新的特征,它

215

> 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完全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都力图仿效一个技术典范国家,那就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时,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显得极端脆弱并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去怀疑那些在今天变得特别可疑的工业组织原则。现在对于技术、市场和等级如何组织的困惑是一种可见的标志,它标志着决定性的但又很少被理解的经济发展的熟知体系的要素的崩溃。(Piore and Sabel, 1985:22f.)

因为微电子技术而变得有可能的组织性社会变迁的范围是相当大的。结构性失业代表着一种重要担忧,但那只不过是一种仍旧符合感知问题的传统范畴的标准的强化作用。以折中的方式说,它将与那些改变了经济体系传统前提的微电脑和微处理器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直率地说,微电子技术带来了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它从技术上驳倒了技术决定论的神话。首先,电脑和控制设备是可程序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目的、问题和境况。因而,技术不再详细规定它们该如何被使用;正相反,这可以并且必须被提供给技术。迄今,存在的按照"客观技术约束"安排社会结构的合法可能性正在消失,或者甚至被

颠倒了。你必须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水平和垂直社会组织维度，以使用电子控制和信息技术的网络可能性。另一方面，微电子技术允许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分离。这就是说，人力劳动系统和技术生产系统可以相互独立地发生变化（委员会的报告，1983: 167ff.）。

在组织的所有维度和层面上，新的模式都是可能的——它跨越了分工、工厂和部门的界限。工业体系在这一点上的基本前提，即合作空间上限制在一种服务于其目标的"组织结构"中，正在丧失其必须的技术基础。但那意味着组织的传统观念和理论建基其上的"积木"正在被交换。以这种方式开启的组织变量的范围还不可想像。这并不是为什么它们肯定不会在一夜之间耗尽的最无关紧要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规划的试验阶段，它几乎从不将限制私人领域中新生活方式的试验放在次要位置上。

正确地估价这一维度是重要的。以工作、技艺和技术体系216 的范畴改变为标志的初级理性化的模式，正在被针对这种变化之前提和常数的反思理性化所代替。因而，正在出现的组织安排范围相应地会被传统地盛行的工业社会支配原则所限制，这些原则就是工厂范式、生产部门安排以及对大规模生产的约束。

在对微电子技术的社会影响的争论中，某种观点仍旧控制着研究活动和公共领域。人们询问并研究是否最终工作会消亡，是否技艺及其等级体系会变化，是否新专业会兴起而旧专业会变得多余等等。人们仍旧以陈旧的工业社会范畴进行思考，而很少会想到后者不再能够把握不断涌现的"可能现实"。屡见不鲜的是，这样的研究提出一种"完全清楚的报告"，如工作和技艺将在某个可预期的范围内变化。工厂和分工的范畴、劳动和生产体系的分派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被保持着。但逐渐在

显露的自动化“智能”电子技术的特殊潜能，在工业社会和社会学思考并进行研究的系统网络里化为泡影。我们所关心的是体系的理性化，它使工厂、分工和部门等等之中及之间的、似乎超稳定的组织界限变得可塑了。

因此，即将出现的理性化浪潮的特征是它们的跨越界限和改变界限的能力。公司范式及其在部门结构中的深嵌状况将被夺取，这包括工厂分工结构、组织和公司的互动以及工厂组织的共存；而这与以下事实很不相同：整个分工体系（比如装配线或行政机构）可以自动化，集中在数据库里甚至通过电子方式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在这里隐藏着一种重要机会——公司政策以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变的工作结构去改变工作场所的管辖。可以说，组织内和组织间的结构可以在（现在更为抽象的）围绕着工作的公司的掩盖下变化，因而绕过了工会（Altmann et al.，1986）。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组织构造并不是如此“头重脚轻”，它只包含很少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可能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每一个个体“组织要素”都可能拥有它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寻求与其特定功能相对应的“组织性的对外政策”（organizational foreign policy），我们不用事先向核心组织咨询所有的事情，就可以去寻求规定的目标——只要以一种可以被监控的方式达到了某些效果（比如收益率、对改变了的市场状况的迅速适应和对市场变化的关注）。“支配”（domination）作为在大规模工厂和科层制中被组织起来的命令的链条在社会上可以被直接经验到，它被授予一致化的功能原则和效果。形成了这样一些体系，在其中几乎没有可见的“支配者”。命令和服从的位置被电子监控的“功能要素”的“自我协调”所代替，这些要素是假定的，并且服从更为严格推行的效率 217

原则。在这种意义上,有关表现监控和个人政策的透明组织将在可预期的未来出现 一然而,它可能具有这样的后果:监控机制形式的变化,将会伴随着 ·种次要、辅助和协作组织的水平自动化。

控制结构的微电子变体将使信息流的方向和垄断成为未来“工厂”中的核心问题。这种情况不仅指对于工厂(管理)来说雇员变成“透明的”,而且指工厂对于雇员和对之有兴趣的环境来说变成“透明的”。生产场所渐渐消失了,信息成为生产单位联系和协调的核心手段。因而信息成为关键问题:谁得到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方式、以什么顺序,关于谁或什么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不难预测,在未来的组织斗争中,对于信息流的分配和分配系数的争夺将成为冲突的重要来源。这 ·重要意义被以下事实突出出来:作为分散生产的后果,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法律所有权,然后是对它们的实际安排,开始变得更为分化,并且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开始依靠信息和信息网络的可管理性。这只会加强源于资本控制日益集中化的决策权威的垄断。

在密集和集中化方向上的持续约束,借助电信的帮助,能以·种新的方式把握并组织起来。现代性依赖于决策的集中及其执行所具有的高度复杂的协调可能性,这种说法仍旧是正确的。但这些无需以庞大组织的形式进行。它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得以转移,在分散的数据、信息和组织网络上持续工作,或者由(半)自动服务所提供,这种服务就像自动柜员机的例子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与接受者存在着直接的“互动协作”。

这里出现了 ·种全新的趋势,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说,它是矛盾的。数据和信息的密集化伴随着基于劳动分工的以等级方式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科层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崩溃。功能和信息的集中化被解科层化(debureaucratization)所贯穿。决策权威的集

中与劳动组织和服务机构的分散都成为可能。不管距离远近，218
(在行政、服务和生产部门里的)科层组织的“中间层”，通过信息技术所实现的视频终端能够保持“直接”互动。无数福利国家和国家行政的任务——同样也包括消费者服务、打零工和修理店——都可以被转化成电子自助商店，即便所有这些方式都不过是电子手段以客观化的形式直接传送给“成熟公民”的“管理的混乱”(chaos of the administration)。在这种情况下，享有某种服务的人不再直接与政府官员、消费顾问等类似的人打交道，而是依照某种其规则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查询的程序，去选择一种想要的待遇、服务和授权。事情可能是这样的：通过数据处理技术完成的客观化，对于服务的某些核心领域是不可能的、不灵敏的或者在社会中无法实现的。然而，对于更广阔的常规行为区域却不是这样，所以在不远的将来，行政和服务程序的很大部分将以这种方式进行，以节省人力耗费。

除工厂范式和部门结构外，至少两个工业社会中经济系统的组织前提已经表现在这些半经验的趋势预测中。首先是生产部门的轮廓，其次是一项基本的假设：长期来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和形式。今天已经可以预见的是，迫近的理性化进程将瞄准这样的部门结构。涌现出来的既不是工业的也不是家庭的生产，既不是服务也不是非正式部门；那是一种第三实体，一种对联合和协作的跨部门形式的界限的抹煞和颠覆，对于它的特性和问题，我们还不具有概念和经验的敏感性。

通过自助商店，特别是通过自动柜员机和视频终端提供的服务(也通过公民组织和自助组织等类似的东西)，已经出现了一种跨越部门界限的劳动再分配。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之外被动员起来，并整合成为商业性地组织起来的

生产过程。一方面，将无报酬的消费者劳动包括在内的做法当然是为了降低工资和生产耗费的自由市场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既不能理解为自助也不能理解为服务的自动化的界限上出现了相互重叠的区域。机器装置使银行可以将付薪柜员的工作移交给消费者来做，他们得到的"补偿"就是可以随时进入自己的账户。

在由技术促成并且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服务和消费间的 219 重新分配中，存在一种市场的巧妙自我废除，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我们今天经常听到谈论"灰色劳动"或"灰色经济"等等。然而，一般我们都没有认识到灰色劳动正在以市场为中介的工业和服务部门的生产中传播，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之外。微电子技术发动的自动化浪潮在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产生了混合形式，在其中，以市场为中介的劳动比例在减少，而无偿的消费者劳动在增加。服务部门的自动化浪潮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劳动从生产向消费、从专家向大众、从补偿向自我参与的转移。

当不安全感和风险增加的时候，雇主对于灵活性的兴趣就在增加——这是一直存在的要求，但一方面因为政治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因为工作的电子化组织的可能性、生产和市场波动的发展性，而变得紧迫起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前提开始崩溃了。这一工业社会的过度生产模式仍旧保留着它自己的应用范围（比如，在香烟、纺织品、电灯和食品工业中的长期生产流程），但在电子工业、某些自动化工厂和通信等领域中，已被新的混合类型，即大规模生产个体化产品，所补充和取代。根据模块原理，不同的电路或者不同的化合物被生产并被提供。

工厂依照市场的解标准化和内部产品的多样化而进行的调

整,以及相伴随的根据因风险识别而饱和或变化的市场对组织作出迅速调整的要求,或者无法完成,或者仅仅是笨拙而高成本地以传统的严格工厂组织来完成。这样的变化总是自上而下,消耗很多时间,并根据一项计划并以命令(应付抵抗)的形式推行。相比较而言,在动态的、宽松的和流动性的组织网络中,这些变化的适应能力可以与结构一体化。这样,似乎由历史决定的大规模生产和手工生产间的斗争开始了新的历史性回合。看起来像是永久的大规模生产的胜利,可以通过新的"灵活专业化"形式——它基于短周期生产的计算机控制的创新密集型产品——而遭受颠覆。(Piore and Sabel, 1985)

工厂时代,那"工业时代的大教堂",可能不会终结,但其对未来的独占正在被打破。这些服从于机械节奏指挥的巨大的等级制组织,也许曾经适合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业环境中,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并完成同样的要求。但借用一个与这些组织 220 一起成长起来的词来说,因为很多原因今天这些组织已变得"功能紊乱"(dysfunctional)。它们不再与工业化社会——在其中,自我的发展侵蚀着工作世界——的要求和谐一致了。作为"组织巨人",它们不能灵活地对快速变化和自我变革的技术、产品变更和受政治与文化条件制约的市场波动——在一个对风险和损害敏感的公众领域中——作出反应。它们的大规模产品不再能满足还在细分的亚市场的需要。它们同样无法恰当地运用个体化生产和服务的最先进技术。

决定性的要点是,对"巨大组织"及其标准化约束、命令要求等等的背离,与工业生产的根本原则——利益最大化、所有权关系和支配性利益——并不冲突,倒不如说是被它们所加强。

不是所有的工业体系支柱——工厂范式、生产部门的轮廓、大规模生产形式以及工资劳动在时间、空间和法律上的标准

化——突然之间以跨领域的方式遭到松懈和消除。然而，仍旧存在一种劳动和生产的系统转化，它使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的强制联合进入到它的大约延续一百年的短暂历史过渡阶段的相对语境中。

这一发展——如果确实发生了的话——将促使春天降临在组织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前提的"南极洲"上。显得铁板一块的对工业劳动变化的预期被颠倒了过来；[6] 这当然不是向资本主义经济成功前进的表面上具有"内在优越性"的组织形式的合法发展的新版本，而是作为有关劳动、组织和实施的形式的斗争与决策的产物。它总是与生产和劳动市场中的权力紧密相关，其实施的前提条件和规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在理性化运作过程中展开的亚政治组织空间的产物，运作的社会构造变得政治化了：不是阶级斗争结果的新版本，而更多地在于工业生产表面上的"惟一道路"成为可变化的，它牺牲了其组织统一性，变得解标准化和多元化。

在管理者、劳资联合委员会、工会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争议中，对于工作关系的替代模式的决策接下来将被提上日程。这些劳动关系模式将按照日常生活的观点加以构想　它们将提供

[6] 举例来说，这适用于零散化的工业劳动的"功能需要"。如我们所知，它在被"科学管理"光环包围的泰勒身上找到了自己的预言。即便是泰勒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同样十分确信对"劳动管理哲学"的固有系统需要，他们批判由之而来的无意义的和异化的劳动；然而矛盾的是，他们却与此同时凭借"天真的乌托邦主义"——力图突破泰勒主义的"需要的魔术"并充分发掘现有的"更人性的"劳动组织的范围——去保卫它的"理性主义"。更直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泰勒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是最坚决的泰勒主义宣扬者。被彻底渗透的资本主义权力所蒙蔽，他们不能看到泰勒主义仍旧兴盛(或再次兴盛)的领域　相当多的领域都是这样——这决不能解释成对"系统的统治需要"的确证。它是保守的管理精英颠扑不破的权力的表现，而他们正在暗中帮助确立其在历史上过时的泰勒主义独断要求。

日常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独裁统治,这是现有 221
财产关系的基础。典型之处也许在于,因为描述它们的概念不再适用,这两种替代不再相互排斥。本质的问题在于,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不同的模式和政策可以被宣扬和试验。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劳动关系政策中一系列无意义"时尚"的激增。总的来说,朝向生活方式多元化的趋势正在生产领域扩散开来,结果出现了一种劳动基础和形式的多元化,在其中,"更保守的"和"更社会主义的",或者"更乡村的"和"更城市的"东西处于斗争当中。

但这意味着,运作行为是在一种其程度前所未有的合法化压力下进行的。它需要新的与经济行为无关的政治和道德维度。工业生产的道德化——反映着运作对政治文化(它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依赖性——将会成为今后最有趣的发展状况之一。它不仅基于外在的道德压力,而且基于对立的利益(也包括那些社会运动的利益)借以组织自身的强度和效率,基于向敏感度不断增加的公众表现其利益和观点的技巧,基于风险界定的市场意义,基于工厂间的相互竞争,一个党派的合法化问题成为另一个党派的优势。以某种方式,公众在"拧紧合法化螺丝"的过程中,取得了对工厂的影响力。工厂的组织力量没有被取消,但它被剥夺了先验的客观性、必然性以及仁慈的本质;简言之,它成为了亚政治。

这是一种我们必须去理解的发展状况。技术—经济行动仍旧不受宪法的民主合法化要求的制约。然而,与此同时它丧失了其非政治特征。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非政治,而是一种第三实体:受经济原因指引的追寻利益的行动。首先,当风险的潜在性消失的时候,这种对利益的追寻获得了改变社会的机会,并且,它在其决策的多元主义和修正中丧失了客观必然性的外衣。

充满风险的后果和替代性的可能安排到处涌现。运作分析的单方面利益关系以同样的程度突现。

一旦某些决策及其对于不同受影响团体或对于普通大众的歧异含义得以出现，所有形式的商业行为(甚至延伸到技术生产和成本计算的细节)都会变得易于受到公众谴责并因此需要辩护。甚至商业行为都因此变成论证性的——或者在市场中受到妨碍。不仅是详细的计划，而且包括论证，同样成为在市场中自222 我确证的基本前提的一部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个体利益和公共福利在基于市场的行为中会自动变得一致——已经遭到抛弃。我们已经提及的政治文化中的变迁在这里同样表现了出来。通过各种各样亚政治核心——媒体公开性、公民自发组织、新社会运动、持批判观点的工程师和法官——的影响，运作决策和生产方法可以同时受到公开的批判，并因为丢失的市场份额而被迫为它们的措施提供非经济的和论证性的辩护。

如果这些在今天还没有出现，或者只以萌芽的状态出现(比如对化学工业的争议——它现在发觉自己必须尽力粉饰自己以应对公众的谴责)，那么这只是再次反映了大规模失业及其给予公司的解脱和市场机会。在这方面，替代性政治文化对公司技术—经济决策过程的影响，仍旧被经济复苏抽象的优先地位所掩盖。

可能的未来景象

对进步的现代信仰，无论多么矛盾，都拥有自己的时代并仍旧在那些它的前提遭到阻碍的领域里存在。这些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旧是真实可感的物质贫困、生产力不发达或阶级不平等，它们决定了政治争论。在70年代末的西方发达国家，两项历史发

展终结了这一时期。虽然政治遭遇了福利国家扩张的固有局限，从研究、技术和科学的合作中产生社会变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通过这种方式，以制度稳定性和不变的权限，组织权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亚政治的领域。在目前的争论中，我们不再期待"替代性社会"会从议会关于新法律的辩论中产生出来，而是期待它从微电子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媒介的应用中产生出来。

政治乌托邦已经让位于对副作用的推测。相应地，乌托邦变得消极了。对未来的结构在研究室和操作人员中间接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而这不是发生在议会或者政党中。其他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在政治和科学中最负责和消息最灵通的人——都或多或少依靠从技术亚政治的规划桌上掉下来的信息残渣过活。在面向未来的产业中的研究室和工厂管理变成常规性外衣下的"革命性因素"。在代议制体系之外，一种与知识进步的最终目标相关的新社会的结构正在建立，这不是通过与代议制对抗，而是通过忽略它而完成的。 223

对于正在取代政治的领导角色的亚政治来说，形势可能变得丑恶。政治正在成为一个公开接受资助的广告机构，宣扬一种它所不知道的发展的光明面，而对此它已经失去了其主动的影响力。对这一发展状况普遍的无意识，只能被它迫近的必然性所超越。以他们保留现状的姿态，政治家促进了向他们甚至不具备模糊概念的一个替代社会的转化，与此同时，他们责难"反文化的骚动"，因为它系统地引致了对未来的恐慌。在日常工作中致力于革命性地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规划的生意人和科学家，以天真的客观性面目坚持认为他们不对这些计划中决定的任何问题负责任。

但人们不仅丧失了他们的可信性，而且丧失了他们身陷其中的角色结构。当副作用呈现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的程度和形

式时,进步的自然性就展现出它所有的威胁特征。在现代化进程自身中进行的权力划分成为流动的。未来政治安排的灰色地带出现了,它最终将通过三个(绝不是相互排斥的)变量勾画出来。首先是返回工业社会(再工业化);第二是技术变迁的民主化;第三是分化的政治。

回归工业社会

这一选择今天被政治、科学和公共领域中的大多数人所追寻。他们跨越了政治对立和民族边界。并且事实上有很多可靠基础可以引证。首先是其现实主义,它相信自己从过去二百年来对进步和文明的批判中汲取了经验,而且它同样基于一种对永恒的市场约束和经济条件的评估。在这一评估中,与这些情况相反的论证和行动预设了严重的愚昧状况和受虐狂特征。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反现代主义"运动和争论的复活,它总是与工业发展如影随形,却不会最终成为其前进的障碍。与此同时,经济必需品——大规模失业和工业竞争——急剧缩小了所有政治行动的空间。结果是事情会以"后历史"的知识和对于工业社会发展途径之不可避免性的知识似乎在证实的那种方式进行(伴随着一些"生态修正措施")。甚至总是可以指望"进步"来提供的解脱都似乎赞同这一选择。每一代人都重新224 发问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由对于进步的信念作出回答:"与过去一样,更大更快更多。"在这方面,有很多东西暗示着在这一场景中我们应对的是可能的未来。

决定行动和思想的场景是一目了然的。它是从 19 世纪开始的工业社会的经验再版,延伸到 21 世纪的社会。按照这一版本,工业化产生的风险并不真的代表一种新的威胁。它们曾经并且现在也是自我造就的明天的挑战;它们动员起新的科学和

技术的创造性力量，并且以这种方式代表着进步的阶梯上的梯级 很多人觉得市场机会在这里开放，并相信旧有的逻辑，他们将今天的危险托付给要在未来以技术来把握的状况。他们误解了两个东西：首先是工业社会作为一个准现代社会的特征；其次是我们借以思考的范畴（传统的现代化）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范畴（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纪，世界在其间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换言之，他们没有看到在现代化中——亦即一般认定的不断创新——在连续性的掩盖下，出现了一种本质上的非连续性。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我们在当今的时代以现代化的初始世纪的心态行事所隐含的结果。

经济优先性占据了前台。它们的要求扩散到所有其他的问题上。这种状况即便在为了就业政策的原因而将领导角色给予经济扩张的地方，都是真实的。现在这一基本的利益似乎在以所作出的投资决策驱动我们进入盲目行进之中，技术的进而是社会的运动借此发动，而无需决策的机会，也无需知道事情为什么以及在哪里进行。这导致了两个转变 在技术亚政治的领域里，那些可以颠覆社会的潜在力量积累着 马克思曾经将这种力量赋予无产阶级——除非它们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在工会以及不那么好对付的公众的替代性权力的严厉监督下）行使。另一方面，政治转变为一个彻底改变社会的外在决策的合法化保护者。

这一向单纯合法化的回复被大规模失业的状况所加强。经济政策越是注重这一进程，对大规模失业的争论就越是明显地获得推动力，工厂的自由度就越大，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行动余地就越小 结果是，政治走上了自我失势的滑坡 与此同时，它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就是在其最显赫的民主权力中，政治都将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倡导一种发展趋势，其冠冕堂皇的闪

烁其辞总是被它所制约的社会当中那些不受挑战的基本力量所质疑。

225 在应付风险的时候，对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的公开倡导不再是无可质疑的，并且变成需要选民批准的危险。受政府行为权限影响的风险，反过来将需要对其产生的语境即工业生产的干预，那些干预是我们作为产业政策协调的一部分而放弃的。这样，在先的决策影响着另一个决策，所以现有的风险被假定并不存在。与此类似，当公众对风险的敏感度增加的时候，对最低限度的研究的政治需要出现了。这被认为是以科学的方式确保政治的合法代表角色。而在风险通过社会过程起源（如森林退化）的地方，在对政治上的可靠补偿的吁求获得一种也许会决定选举的意义的地方，自我规定的政治无能就会公开出现。它一直不给予它声称要给予的政治补偿。战争对于催化反应器的推广，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或为了减少食物、空气和水中的污染物和毒物的立法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很多典型的例证。

这一"事件进程"绝不像经常宣称的那样不可改变。替代选择也不存在于决定了20世纪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向风险社会转化的两方面——危险和机遇——均遭到了误解。企图将19世纪延长到21世纪的再工业化策略"原初的错误"在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间的对立仍旧没有被认识，把现代性在19世纪的发展条件——它集中表现在工业社会的方案中——顽固不化地等同于现代性的发展纲领，这阻碍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东西：第一，工业社会的方案在一些核心领域，在很多方面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扭曲；第二，对现代性经验和基本原理的执着提供了超越工业社会约束的连续性和机遇。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在妇女涌向劳动市场的潮流中，在科学

理性的解神秘化过程中,在对进步的信念消逝的过程中,在议会之外发生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中,现代性的要求针对它们工业社会中的分支得以申明,甚至在那些看不到可接受的、可制度化的解答的领域都是这样。即便是现代性作为工业社会而系统地释放的潜在威胁——没有任何预见并与它所服从的理性要求相抵触 —如果它们最终获得认真对待,都可能代表 ·种对塑造这个世界的创造热忱和人类能力的挑战。

对这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错误历史判断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情况可能是这样,在工业社会时代中,前而提及的在商业和政治间的"盲目进军"是可能和必须的。在风险社会的状况下, 226 像这样行动意味着将基本乘法表和多项式方程混淆在 ·起。跨越了商业和政治的制度边界的结构分化,则会如特殊部门和群体的不同利益 ·样明显。以这种方式,谈论有关风险界定的经济利益的统 ·是不可能的, 相反,风险解释楔进了商业阵营。在风险中,总是存在着失败者和胜利者。但这意味着风险定义并没有剥夺我们,而是使政治决策成为可能。它们对于驾驭和选择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在这方面,在统计上有足够根据的评估是正确的:对风险的感知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是选择性的,所以 ·种生态学的替代选择并不必然会因高代价面搁浅。

导致了经济利益和政治之间的风险的状况分化处在同 ·路线上。作为副作用,风险留给了政治责任而不是商业。这就是说,商业对其导致的东西并不负责,而政治在为 ·些超出其控制的东西负责。只要一切还是这种状况,副作用就会持续存在。这加剧了政治的结构缺陷,政治不仅(因为公共和医疗保健开销等)遭受挫败,而且不断被要求为那些越来越难否认,但其原因和变化超出了其自身直接影响范围的东西负责。

然而,这一自我失势和信用丧失的循环可以被打破。关键在于对于副作用的责任本身。或者说,政治行动获得了与对潜在风险的察觉和感知相同的影响。风险界定激起了责任并创造了不合法系统状况的区域,它们迫切需要一般公众兴趣的变化。因而,它们并不削弱政治行动,并且完全不必借助于一种或者盲目或者受到外部控制的科学,不惜代价地在系统地反感的公众面前加以掩盖。相反,风险界定开启了新的政治选择,借此可以重新获得并巩固民主代议制的影响力。

反过来,否认的做法不会消除风险。相反,旨在稳定政策的东西会很快会变成普遍的破坏稳定的因素 被掩藏的风险自身可能突然变成非常严峻的社会风险境况,以致无法想像工业社会的没有思想如何能被如此拙劣地处理 这是从政治上说,而不仅仅是从科技上说 对适当行动的敏感性——当民主权利变得内在化的时候它已经增长起来——最终不会满意于政治的无用功和粉饰的、象征性的处理。同时,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职业、家庭、性别关系、婚姻等等——不安全感都在增长。

227

一个习惯于将问题最小化的社会,对迎接"未来的冲击"是没有准备的(Toffler, 1980)。在这一冲击的影响下,政治冷漠和玩世主义会在人们当中迅速增长,而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或者政党与选民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会迅速扩大。或许对"政治"的拒斥将不仅影响个体的代表和政党,而且影响作为整体的民主规则体系。旧有的不安全感和激进主义的联盟将获得复苏。不祥的对政治领导人的吁求将再次回响。当人们看到四周世界的崩溃的时候,对"铁腕"的期盼就会增长。对秩序和可靠性的渴求将复活过去的幽灵。忽视副作用的政治的副作用具有破坏政治自身的危险。最终不能排除的是,(德国的)还没有被理解的过去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可能的发展选择,虽然是以不

同的形式出现的。

技术—经济发展的民主化

在这一发展模式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同现代性传统的联系,它的目的在于增加自我决定的程度。其出发点在于这样的估价:在工业社会的创新过程中,民主自决的可能性被制度的方式所削减。从一开始,技术—经济创新作为永久社会变迁的动力已经被排除了民主协商、监督和抵制的可能性。因而,很多矛盾被构建进创新过程的方案中,而且这些都显露了出来。

现代化被认为是"理性化",虽然对于超出我们的知识和控制的系统发生了某些事情。一方面,工业社会只能被想像为一个民主政体;而另一方面,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社会从缺乏知识的状态(这推动它变化)转变到其反面,即它所宣称的启蒙和进步。在这是一个威胁的意义上,对不受约束的运动之进步性的信仰和怀疑再次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对立——它使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能力成为它发展的基础。学说的冲突以及相联系的将某些人标定为异教徒并重建烧死他们的火堆的倾向,开始决定一种曾经依赖于对冲突的理性解决的社会发展。

在推动所有东西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科学,已经从自己的后果中摆脱出去,并在决策中寻求庇护,现代性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变成了决策。因而——结论是　　现在我们所关心的是,按照现代性对于这些情况所开的处方——民主　　提供的原 228 则,让这一决策的基础对于公众来说是可达到的。经过证明的政治体系的工具将扩展到外在于它的状况,对此,很多变量是可想像并被讨论的。建议的调色板从对整体技术发展的议会监督上延伸出去,到达特殊的"现代化议会",在其中,跨学科的专家团体将审核、估价和批准方案,乃至将公民团体包含到技术规划

和研究政策的决策过程中。

基本的思想是这样的：技术—经济亚政治——科学研究　的辅助和替代性政府可以担负起议会的职责。如果它们通过自由投资和研究的方式行使辅助政府的功能，那么它们至少将被迫在民主制度面前就“理性进步”的基本决策来为自己辩护。但这种简单化的转变正是这一认知和政治理路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它的规定中，它继续保持着与工业社会时代的联系，即便这是通过再工业化策略的相反要求进行的。19世纪对“民主制”的理解假设了集中化、科层化等等类似的东西，进而与那些在历史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过时和变得有疑问的状况相联系。

通过民主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足够明确的：在研究和投资决策作出后再进行公开政治讨论的做法将被打破。这里的要求是：在有关它们的应用的基本决定被作出之前，微电子或遗传技术的后果和行动的组织自由应先经过议会的审议。这样一种发展状况的后果很容易预测：科层制议会阻碍工厂自主性和科学研究。

然而，这只是这一未来模式的一种变体。另一种变体我们可以用福利国家的扩张作为例证。粗略地说，我们讨论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贫困风险。贫困风险和技术风险是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副作用。两种工业化风险都遵循一种类似的在时间中转换的政治轨迹，所以在处置技术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从对付贫困风险的社会和政治方法当中学到一些东西。贫困风险的政治和历史轨迹——痛苦的否认；为感知和承认所做的斗争；福利国家扩张的政治和法律后果——似乎在一种出现于新水平和新领域中的全球风险状况中重复着自身。正像福利国家的扩张在20世纪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工业产229 生的风险状况加以否认不是惟一的应对选择。它们也可以被转

变成政治行动的机遇和寻求保护的民主权利的扩大。

这一发展状况的代表预想了一种福利国家的生态变体。这甚至可能为两个根本的问题——自然破坏和大规模失业——提供答案。恰当的法规和政治制度将按照福利政策法规和制度的模式加以制定。机构不得不被创造出来并给予适当的权限，以有效地对抗自然的剥夺。通过模仿原来的保险业，一种保护健康不受环境和食物污染损害的保险体系建立了起来。当然，为此它需要改变法律基础，从而不以压倒一切的提供因果证据的艰难任务去折磨那些受害者。

迄今为止所表现出来的福利国家干预的局限和间接问题并不必然适用于生态学扩张。同样，会有来自个体投资者的抗议。在福利国家保护的情形下，这些人在提高工资和边际收益成本上有着自己的客观基础。类似的影响到所有企业的整个负担在技术政策提案中是付之阙如的。它们当中的某些也被当做成本，但它们为其他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可以说，扩张的成本和机会在部门和工厂之间是不平均分配的。从这个事实看，机遇来自于相应的着眼于生态学的政策的确立。商业的利益联盟在风险选择性的压力下分崩离析了。联盟被创造出来以帮助政治将进步的匿名创造性力量带到政治的民主行动领域。在有毒物质威胁到人类生活和自然的地方，或者在社会生活以及合作劳动受到自动化方法威胁的地方，对政治的期盼就会系统地产生出来，它们可以被转化成政治民主动议的扩张。着眼于生态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危险可能源自于与福利国家的类似：科学权威主义和过度科层制。

另外，这一思考方式是基于一种在再工业化的方案中也表现出来的错误，它假设现代性拥有或者应该拥有一个引导性的政治控制中心，贯穿它所有的再生产和隐蔽状况。控制的关键

应该抓在政治体系及其核心机构手中——这就是论点所在。任何与此相违背的东西都被看做和评定为政治、民主和类似之物的失败。一方面，这暗指现代性意味着自主性、分化或者个体化。另一方面，按照代议制民主的模式，已经瓦解了的亚过程的"解决方案"在政治体系的再中心化过程中被发现了。在这个过230程中，不仅仅是科层化的集权制和干预主义的阴暗面(现在它们变得足够明显了)被排除在外，甚至在那之前，基本的事态就被忽略了，即现代社会没有控制中心。当然，你可能会问：自主化趋势是如何避免成为或变得大于亚系统或单位的自我协调的可能范围的。但这个问题不应该蒙骗我们，使我们无法看到在现代性中缺乏一个核心或方向的事实。

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替代形式来说，并不是必然走上单向的社会失范道路。同样可以想像的是，避免了代议制集权主义并创造了较具强制性理由的新的相互控制的中间形式。过去二十年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为此提供了例证，比如媒体公开性、公民行动团体、保护运动等等。只要还与政治的制度中心的前提有关，后者就仍旧是无意义的。那么，它们就似乎是不适合的、不充足的、不稳定的，甚至似乎在非代议制的合法边缘运作。但如果你将基本的事态置于分析的核心，即政治的解放，那么那些作为实验民主制形式的现象就会展现其意义。在既有基本权利和分化的亚政治这一背景下，它们正在发掘新的直接协商和共同控制的方式，这超出了集中化和进步的虚构。

分化的政治

未来规划的出发点是政治的解放，这就是说，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性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即使为了民主化的

要求，政治缺乏核心的状况也不能再被颠倒过来。政治将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化了，进而变得“没有中心”。这一从行政政治向政治过程的转变之不可替代性——它同时失去了其惟一性、对立物、概念和行动模式——不只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状况。在其中，一种现代化的不同时代宣告着自身，它以反思性作为自己的特征。功能分化的“法则”因分化（风险冲突与合作、生产的道德化和亚政治的分化）而被颠覆和消除。在理性化的第二阶段，集中和科层制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僵化，与灵活性的原则相抵触。后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境况——它们正在形成，但也预设了亚系统和分散化行动单元受到外在监控的自我协调新的、还不可预测的形式——中获得不断增长的优先地位。231

更具可管理性的结构民主化的出发点在历史转变中隐藏着。这是在分权的原则中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包含在工业社会的模式中），并进一步为新闻自由所拓展。今天，至少变得明确的是，经济体系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不仅进步作为自利和技术约束的不可见结果被产生出来，而且在可以不同地发展的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具体的亚政治在进行着。突然间，污染的“技术—经济必要性”在要求作出一个决策的公众压力下变得无效。

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怀疑在私人领域之内的状况不必遵循婚姻和家庭或者男女角色的传统模式，但这要等到普遍的解传统化给予了他或她有关的知识或者决定之后。立法机构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去进行政府式的干预。“私人领域的辅助政府”可以改变目前人们共同生活的状况，而不必提出法律和决议，并且正在这样做，就像不断增加的生活模式的变化范围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对这一发展状况的认识，仍旧被从工业社会保留下来

的完整现实的假象所阻碍。这里所提出的评估是，随着工业社会出现并被构建进它的制度的垄断今天被打破了。垄断被打破了——科学对理性的垄断，男性对工作的垄断，婚姻对性行为的垄断以及政治对政策的垄断——但世界并没有崩溃。因为各色各样的原因，所有这些开始崩溃了，并伴随着多样的不可预测的和暧昧的结果。但这些垄断中的任何一个也都与伴随着现代性而确立的原则相抵触。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排斥了自我怀疑；男性对工作的垄断与现代性借以走上历史舞台的普遍平等的要求相抵触。然而这也意味着，很多风险在现代性的持续中产生，并通过它在工业社会方案中的原则分歧得到申明。风险社会带给痛苦的人类的不确定性的另一面是此种机会：发现并促进现代性所允诺的平等、自由和个性表现的增加，反对工业社会中的限制、基本规则和进步的宿命论。

对这样的状况和发展的感受和理解在根本上遭到了歪曲，232 因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安排的和实际的角色扮演系统地发生了分歧。在很多领域，我们仍旧依照工业社会的剧本来表演，虽然我们不能再扮演我们的生活状况所规定的角色，我们为了自己和他人而扮演着，虽然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那样进行的。"似乎"的姿态占据了从19世纪直到21世纪的历史舞台。科学家似乎占据了真理，并且他们必须为了外部世界而这样做，因为他们的整个地位都依赖于此。政治家被迫——特别在竞选活动中——模仿一种决策的权力，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那是体系所创造的神话，下一次就可能被扔回到他们的脸上。

这些虚构在工业社会的功能性角色扮演和权力结构中有其现实性。但在反思性现代化造成的复杂局面下，它们同样有其非现实性。悲惨的状况是否由此造成或者由此减轻，并不容易确定，这至少是因为概念的定义体系已经受到影响并开始模糊

了。为了整体描述和理解分化的(亚)政治所达到的层次,我们需要一种对于政治的不同理解,而不是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专业化的基础。在广泛民主的意义上,政治当然还没有得到普及。但在何种意义上这是真的呢?政治的解放对于政治领域与亚政治和替代性政治的网络,代表着什么样的丧失和获取呢?或者说得更谨慎一点,它意味着什么呢?

最初的观点是,政治必须跟得上历史地进行的自我限制。政治不再是惟一的甚或核心的对政治未来作出安排决策的领域。在选举和竞选中关键的不是选择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此后便执掌权力并对他执政期间发生的所有好事和坏事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选举其独裁者的专制中,而不是在民主制中。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政治中,所有集权的观念与一个社会中的民主化程度是成反比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强迫我们以虚构的集权国家权力来运作政治的做法,产生了一种期望背景,政治独立性的现实在此背景上呈现为一种缺陷和失败,只能通过"铁腕"来加以改正;即便情况正好相反,这在主动合作和对立的意义上是一种普遍的公民不安定状态。

这同样适用于同一关系的另外一面,即变化的亚政治领域。商业、科学以及类似的东西不再能表现得似乎它们并没有在做它们所做的事,那就是,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状况并进而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政策。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加以掩藏或保密。相反,这是现代性所开启的行动领域的有意安排和利用。在一切都变得可控制、变成人类努力的产物的地方,辩解的时代完结了。不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客观约束,除非我们允许并使它们成为支配性的。那当然不意味着一切可以像我们喜欢的那样安排,但那的确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客观约 233

束的外衣，进而必须去平衡利益、立场和机会 积累起来的创造原来被进步的乐观承诺所掩盖的既成事实的特权也不能继续期望跨越全球的有效性 这便引起了以下的问题：像重新界定生和死这样的科学研究，如果不通过法规或议会决议，将如何受到控制？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不控制我们必须的研究自由度，我们如何防范未来的人类遗传的逃避现实？

我的回答是，通过对某些亚政治的可能性加以扩张和进行法律保护以施加影响 对此，核心的背景条件当然包括强有力和独立的法庭，以及强有力和独立的媒体及其假定的所有东西。你可以说，它们是亚政治控制体系中的两大支柱。但过去告诉我们的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这里需要一个补充性的步骤。所有垄断者都把持着的自我控制的可能性，必须通过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加以补充。这就是说，迄今为止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付出艰苦努力才可以对抗职业和运作管理的支配的事务，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护：可选择的评价标准、可选择的职业实践、在组织和职业内部进行的有关它们自身发展后果的讨论以及受到压抑的怀疑论。对于这种情况，波普尔是正确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进步。只有当医学反对医学，核物理学反对核物理学，人类遗传学反对人类遗传学或信息技术反对信息技术的时候，在试管中酝酿的未来对于外部世界才会变得可理解和可评价。促进所有形式的自我批判不是某种危险，而可能是事先探知那些迟早要破坏我们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惟一方式。

在单个例子中还无法详细地预知需要什么样的法规和保护。然而，如果那些使人们成为他们为之工作者的观点的奴仆的法规减少了，我们会获益良多。那么以下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工程师会报告他们在组织中的经历和他们所看到或造成的风险，或者至少他们不会一离开工作岗位就将这些抛诸脑后。职

业和组织内的批判权利,像罢工的权利一样,必须去争取并在公众利益中予以保护。这种自我批判的制度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很多领域,没有适当的技术知识,风险以及规避它们的可选择的方法都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 234

对于科学研究,这当然会有以下的后果:在某些步骤和计划实施前,对其风险进行可争议的和可选择的讨论是必须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学科圈子内进行,而且也需要在制度性地产生的跨学科的局部公共领域中进行。考虑到这是从未被写下的一页,详细地思考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这些跨职业和超职业的机构能够进行的监督作用,似乎是不必要的。

对于官方政治来说,相当多的施加影响的机会将与这联系起来。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拥有一种替代性的有着强有力论点的医学,有关减少卫生保健成本的讨论将如何变得富有朝气。当然,这也意味着政治无法重建其垄断地位。相对于不同的亚政治领域,将出现一种决定性的差异,其重要意义将不断增加。虽然有关特殊利益和观点的争斗在商业中(同样在科学中)爆发了或者将要爆发,政治却可以规定整个的(司法)条件,核实法规的普遍适用性并产生一致意见。

这意味着政治的保护、决定和论证功能——它已经悄悄地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仍旧为虚构的权力建构所遮蔽——会成为政治任务的核心。通过与亚政治核心的比较,政治将展现出一种更具保护作用的影响。已经达到的社会和民主权利的层次将受到免于(甚至是来自于政治阶层的)侵蚀的保护并得到扩展。相比之下,创新将不得不继续沿着自我失势的悖谬道路走下去,在其中,我们将创造法律和制度的条件去促成社会学习和实验的持续过程,以继续对抗现有的约束。这类过程包括个体化过程中新的生活形式的发展,或者职业中的多元化和批判。在仍

旧不断涌现的老旧的工业社会的外表下，伴随着诸多风险和威胁，存在于政治和亚政治间的新的劳动分工和权利分化形式，今235 天是否已经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实践？

BIBLIOGRAPHY

Preface

Adorno, T w (ed) (1969) *Spa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Frankfurt

Anders, G (1980)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Uber die Zersto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unich

Beck, U (1985) 'von der Verganglichkei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in T Schmid (ed), *Das pfeifende Schwein* Berlin

Bell, D (1976) *Die Zukunft der westlichen Welt Kultur und Technik im Widerstreit* Frankfurt

Berger, J (ed) (1986) *Moderne oder Postmoderne* Special issue 4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gerger, P , B Berger, H Kellner (1975) *Das Unbehagen in der Modernitat* frankfurt

Brand, G (1972) 'Industrialisierung, Modernisierung,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no 1: 2 14

Dahrendorf, R (1979) *Lebenschancen*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9) *Life Chances* London

Eisenstadt, S N (1979) *Tradition, Wandel und Modernitat* Frankfurt

Etzioni, A (1893) *An Immodest Agenda* New York

Fourastie, J (1969) *Die Grosse Hoffnung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Cologne

Gehlen, A (1963) 'Uber die kulturelle Kristalisation', in his *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Neuwied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Habermas, J (1985a) *Der Philosophische Diskf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

Habermas, J (1985b) *Die Neue Unu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Horkheimer, M , T W Adorno (1969) *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Jonas, H (1984)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Versuch einer Ethik fu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sation* Frankfurt

Koselleck, R (1979) *Vergangene Zukunft* Frankfurt

Lash, S (1992)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0, no. 3

Lepsius, M. R. (1977) 'Soziologische Theoreme uber die Sozialstruktur der "Moderne" und der "Modernisierung"', in R Koselleck (ed)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Lodge, D (1977)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Birmingham

Luhmann, N.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chelsky, H (1965) 'Der Mensch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Zivilisation', in his *Auf der Suche nach Wirklichkeit*. Dusseldorf

Toffler, A (1980) *Die dritte Welle Zukunftschancen, Perspektiven fur die Gesellschaft des 21 Jahrhunderts* Munich

Touraine, A (1983) 'Soziale Bewegungen', *Soziale Welt*, 34, no 1

Chapters 1 and 2

Alexander, J , P Sztompka (1990) (eds) *Rethinking Progress* Boston

Anders, G (1983) *Die atomare Bedrohung* Munich

Bauma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Bechmann, G. (ed) (1984)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ungen und Folgen der Technologiepolitik* Frankfurt/New York

Beck, U. (1988)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Frankfurt In English (1992) *Counter – Poisons* Cambridge

Beck, U. (1991) *Politik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 In English (1993) New York.

Beck, u (1992)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risk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9(1): 97 123

Berger, J (ed) (1986) *Die Moderne – Kontinuitaten und Zasuren*. Special issue 4 of *Soziale welt*.

Brooks, H. (1984) 'The resolution of technically intensive public policy disputes',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9, no. 1.

Conrad, J (1978) *Zum Stand der Risikoforschung* Frankfurt battelle

Corbin, A. (1984) *Pesthauch und Blutenduft* Berlin

Daele, w v.d (1986) 'Technische Dynam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ral Zur soziologischen Bedeutung der Gentechnologie', *Soziale Welt*, 37, nos 2/3

Douglas, M., A. Wildavsky (1982) *Risk and Culture*. New York

Eisenstadt, S. (1979) *Tradition, Wandel and Modernität* Frankfurt

Eppler, E. (1981) *Wege aus der Gefahr* Reinbek

Etzioni, A (1968) *The Active Society* New York

Friedrichs, G , G. Bechmann, F. Gloede, (1983) *Großtechnologien 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Kontroverse* Karlsruhe.

Glotz, P (1984) *Die Arbeit der Zuspitzung*. Berlin

Habermas, J. (1971)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London.

Jänicke, M (1979) *Wie das Industriesystem von seinen Mißständen profitiert* Cologne

Janicke, M., U. E. Simonis, G. Weegmann (1985) *Wissen für die Umwelt 17 Wissenschaftler bilanzieren* Berlin/New YorK

Jungk, R (1977) *Der Atomstaat Vom Fortschritt in die Unmenschlichkeit*. Hamburg

Kallscneuer, O (1983) 'Fortschrittsangst', *Kursbuch*, 74

Keck, O. (1984) *Der Schnelle Bruter Eine Fallstudie uber Entscheidungsprozesse in der Großtechnologie* Frankfurt

Kitschelt, H (1984) *Der okologische Diskurs. Eine Analyse von Gesellschaftskonzeptionen in der Energiedebatte*. Frankfurt.

Koselleck, R (ed) (1977) *Studien uber den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ruedener, J v, K v Schuiert (eds) (1981) *Technikfolgen und sozialer Wandel* Cologne

Lanl, U, B Zeschmer (1984) *Formaldehyd Portrait einer Chemikalie: Kniefall der Wissenschaft vor der Industrie?* Freiburg

Leipert, C, U E Simonis (1985) *Arbeit und Umwelt, Forschungsbericht* Berlin

Lepsius, R (1977) 'Soziologische Theoreme uber die Sozialstruktur der "Moderne" und der "Modernisieurung"', in R Koselleck (ed),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Mayer Tasch, P C (1985) 'Die Internationale Umweltpolitik als Herausforderung fur die Nationalstaatlichkei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20

Moscovici, S. (1982) *Versuch uber die menschliche Geschichte der Natur*. Frankfurt.

Nelkin, D, M S Brown (1984) *Workers at Risk* Chicago

Nelkin, D, M Pollok (1979)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echnological decisions: reality or grand illusion?', *Technology Review*, August/September

Novotny, H (ed) (1985) *Vom Technology Assessment zur Technikbewer*

tung. *Ein europaischer Vergleich* Vienna

O'Riordan, T (1983) 'The cognitive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of risk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 345—354

Otway, H , P D Pahner (1976) 'Risk assessment', *Futures*, 8: 122—134

Otway, H , K Thomas (1982) 'Reflec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 *Risk Analysis*, 2, no 2

Perrow, C (1984)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 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Rat der Sachverstandigen fur Umweltfragen (1985) *Sondergutachten Umweltprobleme der Landwirtschaft* Abridged, unpublished ms Bonn.

Renn, O (1984) *Risikowahrnehmung in der Kernenergie* Frankfurt

Ropohl, G (1985) *Die unvollkommene Technik* Frankfurt

Rowe, W D (1975) *An Anatomy of Risk* New York

Schumm, W (1985) *Die Risikoproduktion dapitalistischer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Unpublished ms Frankfurt

Schutz, R (1984) *Okologische Aspekte einer naturphilosophischen Ehtik*. Unpublished ms Bamberg

Short, J F (1984) 'The social fabric of risk: towar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isk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December: 711 725

Spath, L (1985) *Wende in die Zukunft: Die Bundesrepublik in die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Reinbek

Starr, C. (1965)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 *Science*, 165: 1232 1238

Stegmuller, W (1970) *Probleme und Resultale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Berlin/New York.

Strasser, J., K. Traube (1984) *Die Zukunft des Fortschritts Der Sozialismus und die Krise des Industrialismus*. Berlin

The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1977) *The Acceptability of Risks*. London

Thompson, M., A. Wildavsky (1982) 'A proposal to create a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in H Kunreuther and E. V Ley (eds), *The Risk Analysis Controversy* New York

Touraine, A. et al (1982) *Die antinukleare Prophetie Zukunftsentwurfe einer sozialen Bewegung* Frankfurt.

Umweltbundesamt (1985) *Berichte*, vol 5. Berlin

Urban, M (1985) 'Wie das Sevesogift wirkt', *Suddeutsche Zeitung*, April 30.

Wambach, M M (ed) (1983) *Der Mensch als Risiko. Zur Logik von Pravention und Fruherkennung* Frankfurt.

Chapter3

Abelshauser, W (1983)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 1980 Frankfurt

Alber, J (1982) *Vom Armenhaus zum Wohlfahrtsstaat. Analysen zur Entwicklung der Sozialversicherung in Westeuropa* Frankfurt/New York

Allerbeck, k. R , H R Stork (1980) 'Soziale Mobilität in Deutschland 1833—1970 Eine Reanalyse', in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2: 13ff

Badura, B (ed) (1981) *Soziale Unterstutzung und chronische Krankheit* Frankfurt

Bahrdt, H. P. (1975) 'Erzählte Lebensgeschichten von Arbeitern', in M. Osterland (ed), *Arbeitssituation, Lebenslage und Konfliktpotential* Frankfurt

Ballerstedt, E W. Glatzer (1979) *Soziologischer Almanach* Frankfurt.

Balsen, W , H Nakielski, K Rössel, R Winkel (1984) *Die neue Armut Ausgrenzung von Arbeitslosen aus der Arbeitslosenunterstutzung*

Koln.

Beck, U. (1983) 'Jenseits von Stand und Klasse?',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Beck, U. (1984) 'Jenseits von Stand und Klasse' *Merkur*, 38, no 5: 485 497

Beck Gernsheim, E (1983) 'Vom "Dasein fur andere" zum Anspruch auf ein Stuck "eigenes Leben"', *Soziale Welt*, 34: 307 -340

Bellmann, L , K Gerlach, O. Hubler (1984) *Lohnstruk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r Theorie und Empirie der Arbeitseinkommen* Frankfurt/New York

Bendix, R., S M Lipset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Los Angeles

Beger, J. (1983) 'Das Ende der Gewiβheit Zum analytischen Potential der Marxschen Theorie', *Leviathan*, 11: 475ff

Berger, P (1986) *Entstrukturierte Klassengesellschaft? Klassenbildung und Strukturen sozialer Ungleichheit im historischen Wandel*. Opladen.

Berger, P , B Bergr, H Kellner (1975) *Das Unbehagen in der Modernitat* Frankfurt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London

Bischoff, J. et al. (1982) *Jenseits der Klasse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im Späkapitalismus*. Hamburg

Blossfeld, P (1984) 'Bildungsreform und Beschaftigung der jungen Generation im offentlichen und privaten Sektor Eine empirisch vergleichende Analyse', *Soziale Welt*, 35: 159ff

Bolte, K M (1983) 'Anmerkungen zur Erforschung sozialer Ungleichheit',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Bolte, K M , S Hradil (1984)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Opladen.

Bonβ, W., H. G. Heinze (eds) (1984) *Arbeitslosigkeit i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Frankfurt

Borchardt, K. (1985) 'Nach dem "Wunder".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Merkur*, 39: 35ff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Paris In English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 R. Nice Cambridge, Mass

Bourdieu, P. (1982)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Frankfurt

Bourdieu, R., J. C. Passeron (1971) *Die Illusion der Chancengleichheit* Stuttgart

Brock, D., H. R. Vetter (1982) *Alltagliche Arbeitsexistenz* Frankfurt.

Buchtemann, C. F. (1984) 'Der Arbeitsprozeβ Theorie und Empirie strukturierter Arbeitslosigkei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W. Bonβ and H. G. Heinze (eds), *Arbeitslosigkeit i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Frankfurt

Bundesminister der Sozialordnung (1983) *Arbeits- und Sozialstatistik: Hauptergebnisse* Bonn

Cohen, J. L. (1982)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Conze, W., M. R. Lepsius (eds) (1983)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itrage zum Kontinuitatsproblem* Stuttgart.

Cottrell, A. (1984) *Social Calsses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Dahrendorf, R. (1957) *Soziale Klassen und Klassenkonflik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Stuttgart

Engelsing, R. (1978) *Zur Sozialgeschichete deutscher Mittel- udn Unterschichten* Göttingen.

Feher, F., A. Heller (1983) 'Class,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2: 211ff.

Flora, P. et al. (1983)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in Two Volumes Vol. I: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Frankfurt/London/Chicago

Fuchs, W (1983) 'Jugendliche Statuspassage oder individualisierte Jugendbiographie?', *Soziale Welt*, 34: 341–371.

Geiger, T (1969) *Die Klassengesellschaft im Schmelztiegel* Koln/Hagen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In German (1979) Frankfurt.

Glataer, W, W Zapf (eds) (1984) *Lebensqualitat in der Bundesrepublik Objektive Lebensbedingungen und subjektives Wohlbefinden* Frankfurt/New York

Goldthorpe, J H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Goldthorpe, J H et al (1970) *Der 'Wohlhabende' Arbeiter in England*, 3 vols Munich In English (1968) *The Affluent Worker* London.

Gorz, A (1980)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urt

Gouldner, A W (1980) *Die Intelligenz als neue Klasse*.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m

Haller, M, W Muller (1983) *Beschaftigungssystem im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 Frankfurt/New York

Handl, J, H U Mayer, W Muller (1977) *Klassenlagen und Sozialstruktur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Heinze, R G, H. W Hohn, K Hinrichs, T Olk (1981) 'Armut und Arbeitsmarkt: Zum Zusammenhang von Klassenlagen und Verarmungsrisiken im Sozialstaat',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10: 219ff.

Herkommer, S. (1983) 'Sozialstaat und Klassengesellschaft Zur Reproduktion sozialer Ungleichheit im Spatkapitalismus',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Hondrich, K (ed) (1982) *Soziale Differenzierungen*. Frankfurt

Hondrich, K O. (1984) 'Der Wert der Gleichheit und der Bedeutungswandel der Ungleichheit', *Soziale Welt*, 35: 267ff.

Honneth, A (1981)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Einige Schwierigkeiten in der Analyse normativer Handlungspotentiale', *Leviathan*, 9: 555ff

Horning, K (ed) (1971) *Der 'neue' Arbeiter Zum Wandel sozialer Schichtstrukturen*. Frankfurt

Hradil, S. (1983) 'Die Ungleichheit der "Sozialen Lage"',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Huck, G (ed) (1980)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 Wuppertal

Kaelble, H (1983a) *Industrialisierung und soziale Ungleichheit Europa im 19 Jahrhundert. Eine Bilanz* Göttingen

Kaelble, H. (1983b) *Soziale Mobilitat und Chancengleichhei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Gottingen

Kickbusch, I , B Riedmuller (eds) (1984) *Die armen Frauen Frauen in der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Kocka, J (1979) 'Stand Klasse - Organisation Strukturen sozialer Ungleichheit in Deutschland vom spaten 18 bis zum fruhen 20 Jahrhundert in Aufriß', in H -U. Wehler (ed), *Klassen in der europaischen Sozialgeschichte* Gottingen

Kocka, J. (1983) *Lohnarbeit und Klassenbindung* Bonn.

Kocka, J. (1983) 'Diskussionsbeitrag',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Kreckel, R. (1983) 'Theorie sozialer Ungleichheit im übergang',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Landesregierung Baden Wurttemberg (1983) *Bericht der Kommission 'Zukunftsperspektiven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Stuttgart

Langewiesche D., K Schönhoven (eds) (1981) *Arbeiter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Lebensweise der Arbeiter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Paderborn

Lederer, E (1979) 'Die Gesellschaft der Unselbständigen. Zum sozialpsychischen Habitus der Gegenwart', in J. Kocka (ed.), *Kapitalismus, Klassenstruktur und Probleme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Gottingen

Lepsius, M R. (1979) 'Soziale Ungleichheit und Klassenstruk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H.-U Wehler (ed), *Klassen in der europaischen Sozialgeschichte* Gottingen.

Lutz, B (1983) 'Bildungsexpansion und soziale Ungleichheit Eine historisch-soziologische Skizze', in R. Kreckel (e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pecial issue 2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Lutz, B (1984) *Der kurze Traum immerwahrender Prosperitat Eine Neuinterpretation der industriell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m Europa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New York

Maase, K (1984) 'Betriebe ohne Hinterland? Zu einigen Bedingungen der Klassenbildung im Reproduktionsbereich', in Institut fu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 *Marxistische Studien Jahrbuch des IMSF* 7 Frankfurt

Marx, K (1971) *Die Fruhschriften*. Stuttgart

Marx, K (1982)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in *Marx Engels Werke*, vol 8 Berlin.

Meja, V, D Misgeld, N Stehr (eds) (1987) *Modern German Sociology* New York

Miegel, M (1983) *Die verkannte Revolution Einkommen und Vermogen privater Haushalte* Stuttgart

Mommsen, W J, W Mock (eds) (1982) *Die Entstehung des*

Wohlfahrtsstaates in Großbritannien und Deutschland 1850—1950 Stuttgart

Moore, B (1982) *Ungerechtigkeit Die sozialen Ursachen von Unterordnung und Widerstand*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i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London

Mooser, J (1983) 'Auflosung proletarischer Milieus Klassenbildung und Individualisierung in der Arbeiterschaft vom Kaiserreich bis i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oziale Welt*, 34: 270ff

Mooser, J. (1984) *Arbeiterleben in Deutschland* 1900—1970. *Klassenlagen, Kultur und Politik* Frankfurt

Muller, W, A Willms, J Handl (1983) *Strukturwandel der Frauenarbeit* Frankfurt/New York

Osterland, M (1973) *Materialien zur Lebens- und Arbeitssituation der Industriearbei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Osterland, M (1978) 'Lebensbilanzen und Lebensperspektiven von Industriearbeitern', in M Kohli (ed), *Soziologie des Lebenslaufes* Darmstadt

Pappi, F U (1979) 'Konstanz und Wandel der Hauptspannungslin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J Matthes (ed.), *Sozialer Wandel in Westeuropa* Frankfurt

Reulecke, J, W Weber (eds) (1978) *Fabrik, Familie, Feierabend Beitrage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Alltags im Industriezeitalter* Wuppertal

Schelsky, H (1961) 'Die Bedeutung des Klasssenbegriffs für die Analyse unserer Gesellschaft', in Seidel and Jenker (eds) *Klassenbildung und Sozialschichtung*. Darmstadt

Schneider, R (1982) 'Die Bildungsentwicklung in den westeuropaischen Staaten, 1870—1975',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11, no. 3

Smith, G. (1982) 'Nachkriegsgesellschaft im historischen Vergleich', Kollo

quium des Instituts fur Zeitgeschichte, Munich/Vienna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83) *Bildung im Zahlenspiel* Wiesbaden Stuttgart

Teichler, U , D Hartung, R Nuthmann (1976) *Hochschulexpansion und Bedarf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Touraine, A (1983) 'soziale Bewegungen', *Soziale Welt*, 34, no. 1

Voigt, R (ed) (1980) *Verrechtlichung* Konigstein

Weber, M (197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3rd edn. Tubingen

Wehler, H U (ed.) (1979) *Klassen in der europaischen Sozialgeschichte* Gottingen

Westergaad, J. (1965) 'The Withering away of class: a contemporary myth', in P Anderson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Wiegand, E., W Zapf (eds) (1982) *Wandel der Leben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Wohlfahrtsentwicklung seit der Industrialisierung* Frankfurt/New York

Zapf, W (ed) (1977)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Sozialer Wandel und Wohlfahrtsentwicklung* Frankfurt/New York

Chapter 4

Allerbeck, K , W Hoag (1984) *Jugend Ohne Zukunft* Munich

Aries, P (1984) 'Liebe in der Ehe', in P Aries, A Bejin, M Foucault et al (eds), *Die Masken des Begehrens und die Metamorphosen der Sinnlichkeit Zur Geschicte der Sexualitat im Abendland* Frankfurt

Beck, U , E Beck Gernsheim, (1990)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Frankfurt In English (1993) Cambridge

Beck Gernsheim, E (1983) 'Vom "Dasein fur andere" zum Anspruch auf ein Stuck "eigenes Leben"', *Soziale Welt*, 34: 307—340

Beck Gernsheim, E (1984) *Vom Geburtenruckgang zur Neuen Mutterlichkeit? Uber private und politische Interessen am Kind* Frankfurt

Beck Gernsheim, E (1985) *Das halbierte Leben. Mannerwelt Beruf, Frauenwelt Familie*, 2nd edn. Frankfurt

Beck Gernsheim, E (1986) 'Von der Liebe zur Beziehung? Veranderungen im Verhaltnis von Mann und Frau in der individualisierten Gesellschaft', in J Berger (ed), *Moderne oder Postmoderne* Special issue 4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Beck Gernsheim, E. (1988) *Die Kinderfrage: Frauen zwischen Kindern und Unabhangigkeit* Munich.

Bejin, A (1984) 'Ehen ohne Trauschein heute', in P Ariès, A. Bejin, M Foucault et al (eds), *Die Masken des Begehrens und die Metamorphosen der Sinnlichkeit Zur Geschichte der Sexualitat im Abendland* Frankfurt

Berger, B, P L Berger (1983)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New York. In German (1984) Reinbek

Berger, P, H Kellner (1965) 'Die Eh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 *Soziale Welt*, 16: 220—241

Bernardoni, C, V Werner (eds) (1983) *Der vergeudete Reichtum – Uber die Partizipation von Frauen im öffentlichen Leben* Bonn

Beyer, J et al (eds) (1983) *Frauenlexikon Stichworte zur Selbstbestimmung*. Munich

Biermann, I, C. Schmerl, L Ziebell (1985) *Leben mit kurzfristigem Denken – Eine Untersuchung zur Situation arbeitsloser Akademikerinnen* Weilheim und Basel.

Brose, H G, M Wohlrab Sahr (1986) 'Formen individualisierter Lebensfuhrung von Frauen ein neues Arrangement zwischen Familie und Beruf', in H – G Brose (ed), *Berufsbiographien im Wandel* O

pladen

Buchholz, W et al (1984) *Lebenswelt und Familienwirklichkeit* Frankfurt

Bundesminister fu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1982/83, 1984/85) *Grund und Strukturdaten* Bonn

Bundesminister fur Jugend, Familie und Gesundheit (1981) *Frauen 80* Cologne

Bundesminister fur Jugend, Familie und Gesundheit (1985) *Nichteheliche Lebensgemeinschaf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ologne

Degler, C N (1980) *At Odds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Demos, J , S S Boocock, (eds) (1978) *Turning Points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on the Family* Chicago

Diezinger, A , R Marquardt, H Bilden (1982) *Zukunft mit beschrankten Moglichkeiten, Projektbericht* Munich

Ehrenreich, B (1983) *The Hearts of Men* New York In German (1985) Reinbek

Erler, G A (1985) 'Erdol und Mutterliebe – von der Knappheit einiger Rohstoffe', in T Schmid (ed.), *Das pfeifende Schwein* Berlin

Frauenlexikon (1983) Munich

Gensior, S (1983) 'Moderne Frauenarbeit', in *Karriere oder Kochtopf: Jahrbuch fur Sozialokonomie und Gesllschaftstheorie* Opladen

Gilligan, C (1984) *Die andere Stimme Lebenskonflikte und Moral der Frau* Munich

Glick, P C (1984) 'Marriage, divorce,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5, no 1: 7—26.

Hoff, A , J Scholz (1985) *Neue Manner in Beruf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 Berlin

Imhof, A E (1981) *Die gewonnenen Jahre* Munich

Imhof, A E (1984) *Die verlorenen Welten* Munich

Institut fur Demoskopie Allensbach (1985) *Einstellungen zu Ehe und Familie im Wandel der Zeit* Stuttgart

Jarreit, M L (ed) (1979) *Frauenprogramm Gegen Diskriminierung Ein Handbuch* Reinbek

Kamerman, S B (1984) 'Women, children poverty: public policies and female headed famil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Women and Poverty*. Chicago

Kommission (1983) *Zukunftsperspektiven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en*, *Bericht (erstellt im Auftrage der Landesregierung von Baden Wurttemberg)* Stuttgart

Lasch, C (1977) *Haven in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Metz Gockel, S , U Muller (1985) 'Der Mann', *Brigitte Untersuchung*, ms Hamburg

Muller, W , A Willms, J Handl (1983) *Strukturwandel der Frauenarbeit* Frankfurt

Muschg, G (1976) 'Bericht von einer falschen Front', in H P Piwitt (ed), *Literaturmagazin* 5 Reinbek

Offe, C (1984) Arbeitsgesellschaft Frankfurt

Olerup, A , L Schneider, E. Monod (1985) *Women, Work and Computerization - Opportunities and Disadvntages* New York

Ostner, I , B Piper (eds, (1986) *Arbeitsbereich Familie* Frankfurt

Pearce, D , H McAdoo (1981) *Women and Children: Alone and in Poverty* Washington

Pross, H (1978) *Der deutsche Mann*. Reinbek

Quintessenzen (1984) *Frauen und Arbeitsmarkt* IAB Nurnberg

Rerrich, M S (1983) 'Veränderte Elternschaft', *Soziale Welt*, 34:

420—449

Rerrich, M S (1986) *Balanceakt Familie* Freiburg

Rilke, R M (1980) *Briefe* Frankfurt

Rubin, I B (1983) *Intimate Strangers Men and Women Together* New York

Schulz, W (1983) 'Von der Institution "Familie" ze den Teilbeziehungen zwischen Mann, Frau und Kind', *Soziale Welt*, 34: 401 419

Seidenspinner, G , A Burger (1982) *Madchen* 82, *Brigitte Untersuchung* Hamburg

Sennett, R (1976) *The Fall of Public Man* London, In German (1983) Frankfurt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83) *Datenreport* Bonn

Wahl, K et al (1980) *Familien sind anders!* Reinbek

Weber Kellermann, I (1975) *Die deutsche Familie. Versuch einer Sozialgeschichte* Frankfurt

Wiegmann, B (1979) 'Frauen und Justiz', in M L Jurreit (ed), *Frauenprogramm Gegen Diskriminierung Ein Handbuch* Reinbek.

Willms, A (1983) 'Grundzuge der Entwicklung der Frauenarbeit von 1800 bis 1980', in W Müller, A Willms, J Handl (eds), *Strukturwandel der Frauenarbeit* Frankfurt.

Chapter 5

Adorno, T W (1982)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Anders, G (1980)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Munich

Baethge, M (1985) 'Individualisierung als Hoffnung und Verhängnis', *Soziale Welt*, 36: 299ff.

Beck Gernsheim, E (1986) *Geburtenruckgang und Neuer Kinderwunsch* Postdoctoral thesis Munich

Bolte, K M (1983) 'Subjektorientierte Soziologie', in K M Bolte (ed),

Subjektorientierte Arbeits und Berufssoziologie Frankfurt
Brose, H G (1982) 'Die Vermittlung von sozialen und biographischen Zeitstrukturen', in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pecial issue 29: 385ff
Deizinger, A, H Bilden et al (1982) *Zukunft mit beschrankten Moglichkeiten* Munich
Durkheim, E (1982) *Uber die Teilung der sozialen Arbeit* Frankfurt.
Elias, N (1969) *U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Bern/Munich In English (197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Fuchs, W (1983) 'Jugendliche Statuspassage oder individualisierte Jugendbiographie?', *Soziale Welt*, 34: 341—371
Fuchs, W (1984) *Biographische Forschung* Opladen
Geulen, D (1977) *Das Vergesellschaftete Subjekt* Frankfurt
Gross, P (1985) 'Bastelmentalitat: Ein postmoderner Schwebezustand', in T Schmid (ed), *Das pfeifende Schwein* Berlin
Hornstein, W (1985) 'Jugend Strukturwandel in gesellschaftlichen Wandlungsprozess' in S Hradil (ed) *Sozialstruktur im Umbruch* Opladen
Imhof, A E. (1984) 'Von der unsicheren zur sicheren Lebenszeit', *Vierteljahresschrift f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71: 175—198
Kohli, M (1985)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es',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 1—29
Kohli, M, J. W Meyer (eds) (1985)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ife Stages* Symposium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M W Riley, K U Mayer, T Held, T K Hareven *Human Development*, 18
Kohli, M, G Robert (eds) (1984)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Stuttgart.
Ley, K. (1984) 'von der Normal zur Wahlbiographie', in M Kohli and

G Robert (eds),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Stuttgart
Landmann, I (1971) *Das End des Individuums* Stuttgart
Luhmann, N (1985) 'Die Autopoiesis des Bewußtseins', *Soziale Welt*, 36 402
Maase, K (1984) 'Betriebe ohne Hinterland?', in 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 *Marxistische Studien. Jahrbuch des IMSF* 7 Frankfurt
Mooser, J (1983) 'Auflosung proletarischer Milieus', *Soziale Welt*, 34
Nunner Winkler, G (1985) 'Identitat und Individualität', *Soziale Welt*, 36:466ff
Rosenmayr, L (ed) (1978) *Die menshlichen Lebensalter Kontinuitat und Krisen* Munich
Rosenmayr, L (1985) 'Wege zum Ich vor bedrohter Zukunft', *Soziale Welt*, 36 274ff
Shell Youth Study (n d)
Simmel, G (1958a) *philosophie des Geldes* Berlin In English (1978)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ed. D Frisby) London
Simmel, G (1958b) *Soziologie*. Berlin
Vester, H G (1984) *Die Thematisierung des Selbst in der postmodernen Gesellschaft* Bonn

Chapter 6

Althoff, H (1982) 'Der Statusverlust im Anschluß an eine Berufsausbildung', *Berufsbildung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5: 16ff
Altmann, N et al (1986) 'Ein neuer Rationalisierungstyp', *Soziale Welt*, 37, nos 2/3
Arendt, H (1981) *Vita activa oder Vom tatigen Leben* Munich
Beck, U, M Brater, H J Daheim (1980) *Soziologie der Arbeit und der Berufe* Reinbek

Blossfeld, H p (1984) 'Bildungsreform und Beschaftigung der jungen Gen eratio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Soziale Welt*, 35 no 2

Buck, B. (1985) 'Berufe und neue Technologien', *Soziale Welt*, 36, no 1:83ff

Bundesminister fü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1983) *Grund – und Strukturdaten* 1982/83 Bonn

Dahrendorf, R (1980) 'Im Entschwinde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Wandlungen der sozialen Konstruktion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Merkur*, 34: 749ff

Dahrendorf, R (1982) 'Wen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die Arbeit ausgeht', in J. Matthes (ed),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Frankfurt.

Dierkes, M., B Strumpel (eds) (1985) *Wenig Arbeit, aber viel zu tun* Cologne

Dombois, R, M Osterland (1982) 'Neue Formen des flexiblen Arbeitskräfteeinsatzes: Teilzeitarbeit und Leiharbeit', *Soziale Welt*, 33: 466ff

Handl, J (1984) *Zur Veranderung der beruflichen Chancen von Berufsanfangern zwischen* 1950 *und* 1982 Thesis paper Nurnberg

Heinze, R. G. (1984) *Der Arbeitsschock* Cologne

Hirschhorn, L (1979) 'The theory of social services in disaccumulationist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9, no 2: 295 – 311

Hornstein, W (1981) 'Kindheit und Jugend im Spannungsfeld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d', in *Jugend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Eine Generation ohne Zukunft?* Schriftenreihe des Bayrischen Jugendrings Munich

Jurgens, U, F Naschold (eds) (1984) *Arbeitspolitik Materialien zum Zusammenhang von politischer Macht, Kontrolle und betrieblicher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Opladen

Kaiser, M et al (1984) 'Fachhochschulabsolventen zwei Jahre danach', *MittAB*: 241ff

Kern, H, M. Schumann (1984) *Ende der Arbeitsteilung?* Munich

Kloas, P W (1984) *Arbeitslosigkeit nach Abschluß der betrieblichen Ausbildung* Thesis paper Nürnberg.

Kommission (1983) *Zukunftsperspektiven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en* Stuttgart

Kubicek, H, A Rolf (1985) *Mikropolis mit Computernetzen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Hamburg

Kutsch, T, F Vilmar (eds) (1983) *Arbeitszeitverkurzung* Opladen.

Mertens, D. (1984) 'Das Qualifikationsparadox Bildung und Beschaftigung bei kritischer Arbeitsmarktperspektive', *Zeitschrift fur Padagogik*, 30

Muller, C (1982) 'Ungeschutzte Beschaftigungsverhaltnisse', in C. Hagemann White (ed.), *Beitrage zur Frauenforschung* Bamberg

Negt, O. (1984)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Frankfurt

Offe, C. (1984) *Arbeitsgesellschaft: Strukturprobleme und Zukunftsperspektiven* Frankfurt/New York

Offe, C, H. Hinrichs, H. Wiesenthal (eds) (1982) *Arbeitszeitpolitik*. Frankfurt

Schelsky, H (1942) 'Die Bedeutung des Berufs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in T. Luckmann and W. Sprondel (eds), *Berufssoziologie* Cologne

Sklar, M (1968) 'O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political-economic society', *Radical America*, 3: 3—28

Chapter 7

Adorno, T W, M Horkheimer (1970) *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Frankfurt

Beck, U (1974) *Objektivitat und Normativitat Die Theorie Praxis*

Debatte in der modernen deut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Soziologie Reinbek

Beck, U (ed) (1982) *Soziologie und Praxis, Erfahrungen, Konflikte, Perspektiven*. Special issue l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Beck, U , W Bonβ (1984) 'Soziologie und Modernisierung Zur Ortsbestimmung der Verwendungsforschung', in *Soziale Welt*, 35: 381ff

Bohme, G , W v.d Daele, W Krohn (1972) 'Alternativen in der 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302ff

Bohme, G , W V d Daele, W Krohn (1973) 'Die Fin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28ff

Bonβ, W (1982) *Die Einubung des Tatsachenblicks Zur Struktur und Veranderung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Bonβ, W , H. Hartmann (1985) 'Konstruierte Gesellschaft, rationale Deutung Zum Wirklichkeitscharakter soziologischer Diskurse', in W. Bonβ and H Hartmann (eds),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 Zur Relativita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Special issue 3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Campbell D T (1985) 'Häuptlinge und Rituale Das Sozialsystem der Wissenschaft als Stammesorganisation', in W Bonβ and H Hartmann (eds),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 Zur Relativita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Special issue 3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New York

Commoner, B (1963) *Science and Survival* New York

Duerr, H P (ed) (1981) *Der Wissenschaftler und das Irrationale*, 2 vols. Frankfurt

Feyerabend, P (1980) *Erkenntnis für freie Menschen*, rev edn Frankfurt

Gouldner, A , S M Miller (1965) *Applied Sociology: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Hartmann, H (1970)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Munich

Hartmann, H , E Dübbers (1984) *Kritik in der Wissenschaftspraxis Buchbesprechungen und ihr Echo*. Frankfurt.

Hartmann, H , M Hartmann (1982) 'Vom Elend der Experten: Zwischen Akademisierung und De Professionalisierung',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93ff

Hollis, M , S. Lukes (eds) (1982)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Oxford

Illich, I (1979) *Entmundigung durch Experten. Zur Kritik der Dienstleistungsberufe* Reinbek

Knorr Cetina, K (1984)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Frankfurt.

Knorr Cetina, K , M Mulkavy (eds) (1983)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Kuhn, T. (1970) *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en*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Kuppers, G , P. Lundgreen, P Weingart (1978) *Umweltforschung die gesteuerte Wissenschaft?* Frankfurt.

Lakatos, I (1974) 'Methodologie der Forschungsprogramme',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Kritik und Erkenntnisfortschritt* Braunschweig

Lau, C (1984) 'Soziologie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Voraussetzungen und Grenze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Rationalisie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Praxis', *Soziale Welt*, 35: 407ff

Lindbloom, C. E (1959)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79ff

Matthes, J (1985) 'Die Soziologen und ihre Wirklichkeit Anmerkungen zum Wirklichkeitsverhältnis der Soziologie', in W Bonβ and H Hartmann (eds),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 Zur Relativita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Special issue 3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Mayntz, R (ed) (1980) *Implementationsforschung* Cologne

Meja, V , N Stehr (1982) *Der Streit um die Wissenssoziologie*, 2 vols Frankfurt

Meyer Abich, K. M (1980) 'Versagt die Wissenschaft vor dem Grundrecht der Freiheit? Grunde der Vertrauenskrise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öffentlichkeit', *Zeitschrift fur Didaktik der Philosophie*, no. 1

Mitchell, R C (1979) *Science, Silent Spr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in the Untied States* Ms. Washington.

Novotny, H (1979) *Kernenergie: Gefahr oderNotwendigkeit* Frankfurt.

Overington, M A (1985) 'Einfach derVernunft folgen: Neuere 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der Metatheorie', in W Bonβ and H Hartmann (eds),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 Zur Relativita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Special issue 3 of *Soziale Welt*. Göttingen

Pavelka, F (1979) 'Das Deprofessionalisierungsspiel Ein Spiel fur Profis', *Psychosozial*, 2: 19ff

Popper, K R (1968) *Logik der Forschung*, 6th, edn Tubingen In English (198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Popper, K R. (1972) *Objektive Erkenntnis. Ein evolutionarer Entwurf*. Hamburg

Scott, R , A Shore (1979) *Why Sociology does not Apply: a Study of the Use of Sociology in Public Policy*. New York

Shostak, A B (ed) (1974) *Putting Sociology to Work* New York

Stehr, N , R Konig (eds) (1975) *Wissenschaftssoziologie Studien und Materialien* Special issue 18 of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Cologne/Opladen

Stehr, N , V Meja (1981) Wissenschaftssoziologie Special issue 22 of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Opladen

Struening, E L , B Brewer (eds) (1984) *The University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Evaluation Research* London/Beverly Hills

Weber, M (1982) 'Vom inneren Beruf zur Wissenschaft', in J Winkel

mann (ed), *Max Weber: Soziologie, weltgeschichtliche Analysen* Stuttgart

Weingart, P (1979) *Das 'Harrisburg Syndrom' oder die De - Profes sionalisierung der Experten*

Weingart, P (1983)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ellschaft Poli t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225ff

Weingart, P. (1984) 'Anything goes rien ne va plus', *Kursbuch*, 78: 74.

Weiss, C H (ed) (1977) *Using Social Research for Public Policy Mak ing* Lexington

Wissenschafttszentrum Berlin (1977) *Interaktion vo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Frankfurt

Chapter 8

Alemann, U. v. (ed) (1981) *Neokorporatismus* Frankfurt/New York

Alemann, U v., R C Heinze (eds) (1979) *Verbande une Staat Vom Pluralismus zum Korporatismus* Opladen.

Altmann, N. et al (1986) ' Ein "Neuer Rationalisierungstyp"', *Soziale Welt*, 37

Arendt, H (1981) *Macht und Gewalt* Munich.

Beck, U (1979) *Soziale Wirklichkeit als Produkt Gesellschaftlicher Arbeit* Unpublished postdoctoral thesis Munich

Beck, U (1988)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Frankfurt In English (1992) *Counter Poisons* Cambridge

Beck, U (1991) *Politik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 In English (1993) New York.

Beck, U , M Brater (1978) *Berufliche Arbeitsteilung und soziale Ungle ichheit*. Frankfurt/New York

Berger, J. (ed) (1986) *Moderne oder Postmoderne* Special issue 4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Berger, S 'Politics and Anti Politics in Westen Europe in the Seventies', *Daedalus*, 108· 27 -50.

Bergmann, J , G Brandt, K Korber, O Mohl, C Offe (1969) 'Herrschaft, Klassenverhaltnis und Schichten' in T W Adorno (ed), *Spa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Stuttgart

Braczyk, H J et al (1986) 'Konsensverlust und neue Technologien - Zur exemplarischen Bedeutung des Konfliktes um die Wiederaufarbeitungsanlage fur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euerung technischen Wandels', *Soziale Welt*, 37, nos 2/3

Brautigam, H H , L Mettler (1985) *Die programmierte Vererbung* Hamburg

Brand, K W. (ed) (1985)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Westeuropa und in den USA*. Frankfurt.

Brand, K W D Busser, D. Rucht (1983) *Aufbruch in eine neue Gesellschaft*. Frankfurt

Buhl, W (1983) *Die Angst des Menschen vor der Technik* Dusseldorf

Crozier, M , E. Friedberg (1979) *Macht und Organisation* Konigstein.

Crozier, M , S P Huntington, J Watanuki (1975)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Daele, W v.d (1985) *Mensch nach Maß*. Munich.

Daele W v d (1986) 'Technische Dynam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ral', *Soziale Welt*, 37, nos 2/3.

Donati, P R (1984) 'Organization between Movement and Instituti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3, (4/5): 837 -859

Elster, J (1979) 'Risk, uncertainty, and nuclear powe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Flora, P , J Alber (1981)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P Flora and A.J Hei-

denheim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Brunswick

Freeman, J (ed) (1983)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New York/London.

Gershuny, J I (1978)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 Service - Economy* London

Grew, R (ed.) (1978)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Gross, P (1984) *Industrielle Mikrobiologie Sonderheft Spekturm der Wissenschaft* Heidelberg

Groß, P , R Hitzler, A Honer (1985) 'Zwei Kulturen? Diagnostische und therapeutische Kompetenz im Wandel', in *Osterr ,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Sonderheft Medizinsoziologie*

Habermas, J (1973)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 Frankfurt In English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abermas, J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vol 2, Frankfurt In English (1984 and 1988)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2 vols London

Habermas, J (1985) *Die neue Unu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Hirschmann, A O (1981)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76) *The Politics of Planning.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Centralized Economic Planning* San Francisco

Jaenicke, M (1979) *Wie das Industriesystem von seinen Mißstanden profitiert* Cologne

Japp, K P (1984) 'Selbsterzeugung oder Fremdverschulden Thesen zum Rationalismus in den Theorien sozialer Bewegungen', *Soziale Welt*, 35

Jonas, H (1984) *Technik, Ethik und Biogenetische Kunst*. Ms

Kitschelt, H (1985) 'Materiale Politisierung der Produktio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4, no 3: 188—208

Kommissionsbericht (1983) *Zukunftsperspektiven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Stuttgart

Kreß K, K G Nikolai (1985) *Bürgerinitiativen Zum Verhältnis von Betroffenheit und politischer Beteiligung der Bürger* Bonn

Lipset, S M, S Rokkan (1976)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Löw, R (1983) 'Gen und Ethik', in P Koslowski (ed.) *Die Verführung durch das Machbare* Munich

Luhmann, N (1981) *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 Munich

Mayer Tasch, C P (1976) *Die Bürgerinitiativbewegung* Reinbek.

Mayntz, R (ed) (1980) *Implementationsforschung* Cologne.

Melacci, A. (1984) 'An end to social movements? Introductory paper to sessions on new movements and change in organizational form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3, nos 4/5: 819—835

Neidhardt, F. (1985) 'Einige 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ozialer Bewegungen', in S Hradil (ed), *Sozialstruktur im Umbruch* Opladen

Noelle Neumann, E (1991) *Öffentliche Meinung*. Berlin.

Offe, C (1972)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

Offe, C (1980) 'Konkurrenzpartei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R Roth (ed), *Parlamentarisches Ritual und Politische Alternativen* Frankfurt

Offe, C (1986) 'Null option', in J. Berger (ed), *Moderne oder Postmoderne* Special issue 4 of *Soziale Welt* Gottingen

Piore, M. J, C. F Sabel (1985) *Das Ende der Massenproduktion* New York/Berlin. In English (1985)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Radunski, P (1985) 'Die Wahler in der Stimmungsdemokratie', *Sonde*, 2: 3ff

Schenk, M (1984) *Soziale Netzwerke und Kommunikation* Tubingen

Sieferle, R P (1985) *Fortschrittsfeinde? Opposition gegen Technik und Industrie von der Romantik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Stössel, J - P. (1985) 'Dem chronisch Kranken hilft kein Arzt', *Suddeutsche Zeitung*, November 21, 1985

Toffler, A (1980) *Die dritte Welle*. Munich

Touraine, A. (1977) *The Self Production of Society*. Chicago

Willke, H (1983) *Entzauberug des Staates, Uberlegungen zu einer sozietalen Steuerungstheorie*. Königstein

索 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陆月宏 译)